

刘少奇一生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刘 少 奇 传

刘少奇一生

目 录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 湖南有个炭子冲。炭子冲有个外号叫“刘九书柜”的伢子 (1)
- 讨袁斗争使刘少奇第一次经受革命的洗礼，可“习武救国”的梦想却破灭了 (7)
- 从长沙到北京到保定又到上海，在连连受挫之后终于柳暗花明 (12)
- 杨明斋介绍学员们去苏俄。从上海到莫斯科走了 3 个月 (18)
- 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即将开学之际，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23)

第二章 工人运动领袖

- 刘少奇被陈独秀派往湖南，在长沙清水塘同毛泽东第一次会见 (28)

- 领导安源路矿 1 万多工人
大罢工，刘少奇初露头角 (32)
- 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
潮，安源工会硕果仅存 (40)
- 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
时候，刘少奇还不到 27 岁 (46)
- 中共中央急调各路精兵强
将，赶赴上海领导五卅运动 (49)
- 邓中夏在欢迎会上说：刘少奇是我们工
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 (57)
- 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冲进汉口
英租界，把“米”字旗扯下来扔在
地上 (65)

第三章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 署名“谭少连”的文件通过地下交通频
频发出，顺直省委的整顿悄然进行 ... (79)
- 奉天高等法院找不到刘少奇“煽
动工潮”的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85)
- “拥护红毛子，反对白毛子”的口
号在中东铁路工人中传播开来 (92)
- 中共临时中央找刘少奇谈话，

给他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的帽子 (113)

●刘少奇匆匆告别妻子潜往中
央根据地，没想到竟成永诀 (109)

第四章 开创华北新局面

●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作为党中央代表
赴华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
政策 (117)

●K·V·的一封信引起震动。“打
倒宋哲元”改成“拥护宋委员长
抗日” (124)

●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不时出现
报端，人们不知道它们的作者
是谁 (131)

●刘少奇派周小舟、吕振羽密赴南京，
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联合抗日 (139)

●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薄一波
等出狱，刘少奇要柯庆施速办 (143)

●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全面
展开，各路诸侯纷纷表态 (149)

●西安事变像一颗政治原子弹，给

- 动荡的中国政局带来强烈冲击波 …… (156)
- 毛泽东说：刘少奇指出了白区
工作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 (160)
- 华北抗日局面迅猛发展，共
产党成为华北敌后最大政党 …… (168)

第五章 发展华中根据地

-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重点发展
华中，派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 …… (180)
- 从澠池到竹沟，刘少奇沿途听
取汇报，召集会议，部署行动 …… (185)
- 小小竹沟镇热闹非凡，一派厉
兵秣马、生气勃勃的抗日景象 …… (193)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切中时
弊，很快在各根据地广为流传 …… (196)
- 在洛阳贴廓巷 56 号，刘少奇同
郭寄峤不期而遇，徐海东吃了一
惊 …… (203)
- 在总结彭雪枫游击队经验之后，
刘少奇提出发展豫皖苏新思路 …… (212)
- 新四军在津浦路两侧连打几个
漂亮仗，皖东根据地初具规模 …… (17)

- 皖东北一时部队云集，刘少奇抓紧点将布阵，扩大战果 (227)
- 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大获全胜，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胜利实现 (236)
-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委 (248)
- 重建后的新四军声威大震，华中抗日根据地一步一步巩固起来 (258)

第六章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 从苏北到延安，穿越敌人 100 多道封锁线，行程 3000 里 (267)
- 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276)
-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系统阐述 (284)
- 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289)
- 刘少奇主持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

御”重大决策，中共军队大规模战略移动 (292)

●刘少奇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 (306)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 (312)

第七章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

●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 (320)

●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328)

●朱德写来祝寿诗：“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332)

第八章 开国建国费运筹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毛泽东要刘少奇赶紧去天津一趟 (341)

●刘少奇秘密赴苏同斯大

- 林会谈，为开国作准备 (357)
-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
升起，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 (366)
- 全世界刮起一股中国旋
风，国际要事纷至沓来 (371)
-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国
内工作更是千头万绪 (378)
-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刘少奇开
始对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宏观研究 (384)

第九章 探求中国富强之路

- 刘少奇再次赴苏同斯大林会
谈，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准备 (391)
- 向社会主义过渡、制订宪法、全民
选举，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 (399)
- 高岗、饶漱石企图拱倒刘少奇、周
恩来后取而代之，结果自取灭亡 (407)
- 刘少奇向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说：现在
的任务是保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20)
- 波匈事件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种种反
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上工作
日程 (433)

- 继毛泽东之后，刘少奇当选为
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443)
- 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怀，庐山会议由反“左”变为反右 (455)
- 刘少奇常常说：“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 (463)

第十章 领导国民经济调整

- 尽管庐山会议后不断反右倾、鼓干劲，“大跃进”还是难以为继 (472)
- 刘少奇到湖南省农村住下来，调查研究了 44 天 (476)
- “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 (493)
- 蒙哥马利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 ... (498)
- 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工作会议，调整国民经济大步推进 (504)
-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城乡四清运动曲曲折折，波澜迭起 (521)

-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 (540)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 刘少奇主持常委会议讨论通过
《二月提纲》，随后出访亚洲 3 国 ... (547)
- 历时 20 多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开完了，可与会者仍充满困惑 (556)
-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
起，工作组开进学校 (568)
-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580)
- 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检讨后批
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 (594)
- 各方面打击接踵而来。刘少
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606)
- 伪证报告获得批准，铸成中
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623)

尾声 共和国不会忘记 (634)

●主要参考书目	(641)
●注释	(643)
●后记	(661)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湖南有个炭子冲。炭子冲有个外号叫“刘九书柜”的伢子

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西部是巍峨壮观的高原，东部沿海则是一马平川。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它的中部出现了广袤的丘陵带。其中，以覆盖中南、华东数省的江南丘陵最为秀美、丰饶：绵延起伏的峰岭，曲折流淌的河溪，山和水之间镶嵌着一片片色彩斑斓的小块盆地。在鱼米之乡的湖南，人们把这样的小块盆地叫作“冲”。

炭子冲，便是这许许多多“冲”里面的一个。它隶属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西距宁乡县城 30 多公里，东离省会长沙市也不过 40 多公里。这里群峰环绕，林木茂盛，历史上当地老百姓擅长烧制木炭，不少人以此为业，所以得名炭子冲。

在炭子冲东侧山坡下的池塘边上，居住着一户姓刘的庄户人家。刘家三代同堂，¹⁰ 来间土墙瓦顶的砖木结构房舍，曲折围接成几个小天井，倒也小巧别

图 1 炭子冲刘少奇故居。

致，自成一体。1898 年 11 月 24 日，刘少奇便诞生在这所典型湖南风格的农家宅院里。他的父亲名叫刘寿生，母亲姓鲁。

刘家的祖籍原是江西省吉水县，后来因为祖上有人要到湖南省益阳县做官，便举家迁往湖南，辗转搬到炭子冲定居。但几次搬家并没有为刘家带来福祉，家境反而越来越不好，传到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时，已经是靠租地打工维持生计了。

刘在洲（1791—1875）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农民。由于祖上没有在炭子冲留下田产，他就在附近租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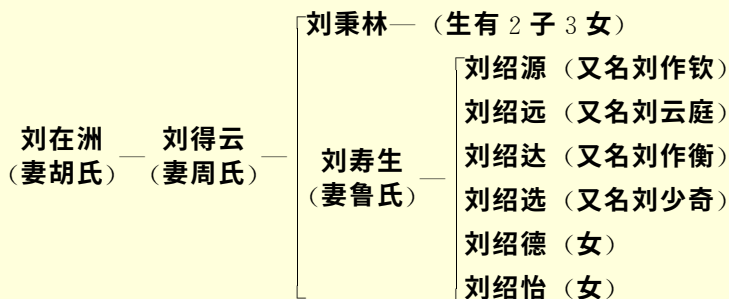
了几片土地。他带着一家人省吃俭用，精耕细作，除种植粮食外，还种烟叶等经济作物。苦心经营的结果，使家道逐渐中兴起来，终于在炭子冲有了自己的田产。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1833—1882）继承父亲的传统，辛勤耕作，发展家业。到他当家的时候，刘家在炭子冲的田产逐渐增加到 60 亩，并把原来的 3 间旧草房翻建成 7 间新房，还将祖上在茅田滩留下的田产也扩大到了 60 亩。刘得云娶妻周氏，生有两个儿子：刘秉林、刘寿生。

在刘秉林、刘寿生两兄弟当中，刘寿生（1864—1910）粗通文墨，比较开明。他对于盖房买地置家产不太热心，但比较重视让子女学文化受教育。他的 4 个儿子都从小上私塾读书，这在当地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刘寿生治家也有一套。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 60 亩田地之后，自家只耕种在炭子冲的 30 亩，而把远处的 30 亩地租给别人，同时又在近处另向别人租种 15 亩地。全家人耕作 45 亩地，一年到头相当紧张，农忙时忙不过来，便雇几个零工。刘少奇后来回忆家庭情况时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①

刘寿生夫妇共有 4 子 2 女。刘少奇是他们在 34 岁时得的最小的儿子。按家族辈份排列，取名绍选，

字渭璜。因为他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也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小时候族中人都叫他“九满”。

炭子冲刘家的简谱如下：



19 世纪末叶似乎是集中诞生中国革命伟人的年代。在刘少奇出世之前 5 年，毛泽东诞生于同炭子冲仅一岭之隔的另一个“冲”——韶山冲。从炭子冲到韶山冲，相距不过 30 公里，使长沙市、韶山冲、炭子冲三处构成一个扁三角形。在刘少奇出生这一年的 3 月，周恩来诞生于苏北古城淮安，两个人的生日只相差 8 个月。而出生于四川仪陇县农民家庭的朱德，也只比刘少奇大 12 岁。多年以后，这些中国革命的领袖们从不同的方位走到了一起，在中华大地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刘少奇从 8 岁起便被思想开通的父亲送去念书。旧中国农村的教育十分落后，农家子弟上学读书实属不易。刘少奇由于是家中最小的伢子，深受家人钟爱，所以幸运地得到了从小上学的机会。他的父母

着意要培养他成为知书识礼的人，家境再难也千方百计保证他就读，在这方面相当舍得下本钱。

刘少奇当时所谓的上学，上的并不是那种正规的学校。那样的学校办在县城、省城，农家子弟是无法问津的。在广大的乡村，特别是交通不发达的山区，只有一些当地富人或老先生办的私塾，大都是在祠堂或老先生家中辟出一二间堂屋，由老先生兴之所至地讲学。刘少奇上的就是这样的农村私塾。

由于学习费用等原因，刘少奇不得不经常变换学堂。从8岁到13岁，他先后在柘木冲、罗家塘、月塘湾、洪家大屋、红米冲、花子塘等地的私塾读书，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其中，他11岁时在洪家大屋私塾一年多的读书生活，给刘少奇留下的印象最深。

所谓洪家大屋，并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子，而是一户姓洪的大地主的宅院。这所宅子占地广房子多，墙高院深，颇有气势，在当地小有名气。洪家科举出身，几代做官，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为使幼子洪赓扬得到良好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一位上过师范学院、掌握一定新知识的名叫杨毓群的先生，来家开设学堂，并招收功课好的邻家子弟一起上学。刘少奇和洪赓扬同龄，加上品学兼优，当即被录取。

洪家大屋的教学环境和学习内容使刘少奇耳目

一新。洪家是书香门第，近年来受西方文化影响，日常生活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新事物。洪家的女孩子都不裹脚，而且可以同男孩子一起读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举动。教学的课程也和刘少奇前几年上的迥然不同，不是枯燥无味的“子曰诗云”那一套，而是学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常识等等，还讲寓言、童话，学起来十分有劲。

洪家大屋还有不少藏书。这对刘少奇吸引力很大。在自己家里，父亲从不允许他看那些神话故事、传奇小说之类的杂书，在洪家可以随便阅读。刘少奇一有空就拉了洪赓扬一起到书房找书看，往往一坐半天，读得津津有味。

刘少奇 12 岁时离开洪家大屋到红米冲上学。红米冲私塾藏书寥寥，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他就千方百计找人借。他听说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过的一位本家家里收藏了不少书，便登门相借，隔三差五地去借一包书带回家阅读。刘少奇还有个要好的同学，姓周，父亲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长沙等地教书。周家的住宅安在首自冲，同炭子冲相邻，家里收藏了很多书籍、报刊。一日被刘少奇发现，大喜过望，从此便常来常往找书看。有几次，他在周家的火盆边看书入了迷，以至把衣服、鞋子都烤焦了。

在家里，刘少奇把自己住的一间斗室变成了书

屋。室内堆放着从各处借来和搜集来的一本本书。一有时间，他就一个人躲在屋子里静静地看书，乐此不疲。

读书使刘少奇学到了很多知识。炭子冲的人们发现，这个伢子在和小伙伴们争论问题，或是在同大人交谈时，言语之间常常引经据典，讲出一番道理。这一点竟在炭子冲远近闻名。加上他常常四处找书借书，读起来手不释卷，于是大家送了他一个外号：刘九书柜。

●讨袁斗争使刘少奇第一次经受革命的洗礼，可“习武救国”的梦想却破灭了

正当刘少奇在炭子冲附近的各个私塾读书的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变革。1911年10月，武昌城头一声炮响，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国的封建统治一朝覆亡，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民主共和国随之成立。但没有多久，革命胜利的成果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这种种变故，像层层展开的波涛，传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给少年刘少奇带来了强烈的震荡。

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在湖南新军部队里当兵。1911年10月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湖南新军奋起响应，刘云庭在长沙参加了所在部队的起义。第二年，他回家探亲，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的书。年方14的刘少奇读了这本书，心头激动不已。为了响应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当即要求姐姐为他剪掉辫子，以示同清王朝决裂。

革命的气浪一阵阵撞击着刘少奇，沉闷的私塾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他那躁动的心怀。他再三向母亲和兄长要求走出本乡去外地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终于获得同意。1912年，刘少奇去西冲山上了芳储乡小学。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宁乡县最好的学校——玉潭学校（又称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从此，他像一只冲出笼子的小鸟，飞向外面的世界。

1915年5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公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玉潭学校的师生们奋起罢课游行，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刘少奇义愤填膺，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勿忘国耻”的标语牌，喊着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充满激情的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在宁乡县的街道上，使这个平时比较宁静的江南县城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游行之后，刘少奇和同学们又在几处闹市街头向群众演说，还组成抵制日货的小组，将商店的日本商品检查封

存。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刘少奇始终是其中的骨干分子。

投身这场讨袁斗争，使刘少奇第一次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从此，他踏上了漫长的革命道路。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他在自己的书本、作业簿上，都用毛笔重新写上了刘卫黄这个新名字。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用过许多化名和笔名，“刘卫黄”是他为革命而起的第一个新名字。

1915年12月，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竟复辟帝制，做起了皇帝。消息传来，宁乡县城再次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刘少奇和同学们重新发动罢课、游行、演讲等活动，一直持续到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才复课。

1916年夏，当刘少奇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18岁的青年。下一步怎么办？他面临抉择。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黑暗。袁世凯垮台之后，中华大地复又陷入派系纷争的军阀们的铁蹄之下。祖国和人民在苦难中呻吟。怎样才能拯救祖国、帮助老百姓翻身？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强国富民之路？这些问题困扰着刘少奇等许许多多有志青年。他们在认真地思考，执著地追求。

出路在哪里？一时还难以找到。刘少奇别无良策，只有先继续求学。玉潭学校的史地教师梅冶成是一个革命思想激进的人，同长沙楚怡学校主任教员何叔衡相熟。刘少奇和同学任克侠、贺执圭便去求助于这位梅老师，请他给何叔衡写一封介绍信，然后带着介绍信，步行几十里来到长沙求学。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进入设在长沙的宁乡驻省中学就读。

刘少奇在小学读书时，就对岳飞精忠报国、班超投笔从戎等故事钦慕不已。现在面对国家孱弱、外侮入侵，老百姓备受战祸之苦的局面，他越来越感到武力和军事的重要。1916年秋，当他听说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开办陆军讲武堂时，非常兴奋，立即决定中止中学学业前往报考，实践投笔从戎的理想。

可这个讲武堂专收下级军官和退伍军官。刘少奇只好向二哥刘云庭求援，设法向刘云庭的一位刚退伍的战友借了证件，冒名顶替报上了名。考试的结果，刘少奇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找不到校舍，讲武堂迟迟开不了学。刘少奇一直等到第二年3月，才踏进讲武堂的教室。头半年是文化补习，接着是军事训练。不料，军事课程刚进行一个月，护法战争爆发。1917年10月南北两军在长沙发生激战。陆军讲武堂在湖南省

督军署旁边，因而成了双方交战的战场。在一阵阵炮火纷飞过后，讲武堂校舍成了一片废墟。手无寸铁的几百名学员，在战乱之中一溜烟走散各方。讲武堂就这样被迫解散。刘少奇也只得离开长沙，回到家里。

习武救国的梦想就这样一下子破灭了！没有法子，只有在家等待时机。母亲和兄嫂都劝告他从此安分守己，不要再出去闯祸。但是，在外见过世面，特别是亲身参加过火热激荡的革命斗争的刘少奇，已经不可能再重复老一辈养家糊口的路了。这时他虽然人在炭子冲，心里却时刻想着外面的世界，渴望重新回到那激动人心的革命活动中去。可是天不遂人愿，机会迟迟不来。在难熬的等待中，刘少奇一面抓紧自修各门知识以便报考大学，一面起早贪晚学习武术拳脚，作好闯天下的准备。就这样，他在苦闷和期待中度过了漫长的 1918 年。

刘少奇思索再三，决定去外地报考大学，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走出去。但报考大学需要有中学毕业证书，他只得在同学的帮助下又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于 1919 年初直接插入长沙市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准备花几个月时间拿到文凭后立即外出报考。

就在刘少奇进入育才中学不多久，1919 年 5 月 4 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

命群众运动在北京爆发，很快由北到南席卷中国大地。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革命的声浪很快扩展到长沙。刘少奇再也坐不住了。他参加完各门功课的毕业考试，等不及领取毕业证书，便急匆匆动身北上，奔赴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

●从长沙到北京到保定又到上海， 在连连受挫之后终于柳暗花明

北京不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各种新思潮新知识新议论令人目不暇接。许许多多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追求真理的志士仁人云集于此，文化氛围同湖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刘少奇决定争取留在这里读大学。

暑假，正是各个大学招生考试的时候。刘少奇先后报考了几所大学，都以优秀成绩录取。但是，他最想上的北京大学，不仅学制长，而且学费贵得吓人，根本支付不起。有一个陆军军需学校倒是免费，可专业实在不合心意。其他几个学校也都因为种种缘故上不成。无奈之下，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只得放弃。

忽一日，刘少奇得到一个信息：北京华法教育会

正在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鼓吹的一条救国之路。刘少奇连忙跟踪找人，报名参加。交涉的结果，华法教育会规定路费一律自理。从中国到欧洲，路途遥远，旅费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刘少奇囊中羞涩，实在支付不起，四处奔波请求减免也没能解决，赴法留学之事只有告吹。

1919年8月，山东发生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事件，使本已接近尾声的学生运动再度高涨起来。8月下旬，北京、天津的学生几千人包围总统府、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动警察将学生强行驱赶到天安门前，打伤学生100多人，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人。为了营救马骏等代表，天津几百名学生在天安门、总统府连续几天露宿请愿。刘少奇闻讯连忙赶去现场，加入了请愿队伍。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于8月30日释放了马骏等人。斗争的胜利使刘少奇真切地感受到五四运动力量的伟大，更加坚定了克服困难、追求真理的决心。

多年以后，刘少奇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仍印象深刻：“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成果。”②

凑巧的是，1919年8月下旬周恩来也从天津赶来北京，在天安门等地参加了这场营救马骏的斗争。不过，当时他和刘少奇互相都不认识。

上大学不成，出国留学无门，刘少奇无奈又去找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他们出了个主意，要他先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学一段时间之后再等待安排去法国。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了。于是，刘少奇来到了保定。

育德中学在辛亥革命时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一带的秘密集会场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的许多师生都参加过五四运动。毛泽东、蔡和森曾先后来这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李富春、李维汉从留法预备班第二期毕业后刚刚离校。

9月间，刘少奇进入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这个班采用半工半读的学习方法，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校里革命气氛浓郁。校长王国光和教师刘仙洲等，对新生事物很支持。《新青年》、《东方》等进步刊物在这里公开陈列，广为流传。校刊上还经常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评论国内外大事。这一切，对刘少奇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

③

为什么后来没去呢？原来，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后返回北京，向华法教育会联系去法国，可华法教育会仍规定留学费用一律自负，而且比以前还涨价了。钱的问题又一次使刘少奇犯了难。

他想赶紧回湖南筹措经费。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正值直皖军阀战争开打，致使京汉铁路瘫痪，南下火车停开。刘少奇只得滞留北京，暂且寄宿在鼓楼大街一个同学家里。由于失却经济来源，他只有勒紧裤带，仅吃每月3元钱的包饭，整天处于半饥饿状

态。尽管生活极为困难，但他仍坚持每天外出阅读书刊，参加进步团体的各种活动。

挨到8月，好不容易铁路恢复通车，刘少奇立马返回长沙。

他在长沙正要张罗集资，没想到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法国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数百名已经赴法的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为此通知各地停止办理赴法勤工俭学。这意味着，刘少奇蓄意准备了很长时间的留法计划又落空了。

从刘少奇1916年夏背井离乡外出寻找出路以来，从长沙到北京到保定，现在又从北京回到长沙，4个年头过去了，其间经过的艰难辛苦，真是一言难尽！小时候上私塾时，曾读过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刘少奇算是对这段话有了切身的体会了。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长沙《大公报》刊登的一则消息，顿使刘少奇兴奋异常，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这家报纸报道：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并且“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

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④报纸还连续发表组织留俄勤工俭学的消息，说：“赴俄学习旅费花费较少，到俄国后，俄国政府可以优待，不致冻馁，因此，赴俄比赴法容易。”

刘少奇决定改赴法为赴俄。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他早已风闻。他还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压迫和剥削，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人，苏俄政府还主动废除了沙皇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对刘少奇吸引力很大。能到列宁领导下的国家去学习，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

原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何叔衡等湖南的革命人士在1920年8月发起组织的。稍后，他们又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筹建过程中，他们得到了长沙船山学校贺民范的帮助。贺民范又名贺希明，50多岁，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被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议员，是当地著名进步人士。他同陈独秀有交往，对先进青年的活动很支持。因此，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都借用他的声望公开出面号召。许多湖南青年也都通过他同这两个组织发生联系。

毛泽东和刘少奇这时虽然都在长沙，而且在从事同样的革命活动，但他们还互不相识。所以，刘少奇得知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情况

后，就去船山学校找贺民范，请他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办理赴俄勤工俭学的手续。

交谈过后，贺民范对刘少奇很是赞许，随即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处在筹建过程中，因此没什么具体活动。关于赴俄学习的问题，贺民范提出要他先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学一段时间后由那里统一组织去俄国。在此前后，贺民范还介绍任弼时、肖劲光、周兆秋、胡士廉等湖南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刘少奇拿到贺民范写给外国语学社杨明斋的推荐信，很是欣喜。多少年的奔波，多少年的寻觅，这下总算有了结果了。

他立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说服母亲、兄长为他筹措了一些费用。初冬的一天，刘少奇和几个同学结伴买了船票，沿湘江、长江顺流而下，直抵东方大都市上海。

●杨明斋介绍学员们去苏俄。从上海到莫斯科走了3个月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有一幢两层小楼，门口挂着一块小木牌：“外国语学社”。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办起来的，目的是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为未来的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学社的具体负责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杨明斋，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荐。

当刘少奇一行下了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新渔阳里6号的时候，外国语学社已经开学。好在学社的学制比较灵活，加上有贺民范的介绍信，杨明斋热情地安排了刘少奇等人的食宿和学习事宜。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不很固定，多时五六十人，少时二三十人。和刘少奇同期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当时他们都还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精力旺盛，工作学习积极性很高。一般上午上课，主要学俄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杨明斋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亲自教俄文。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这时刚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他也曾来学社讲这本书。学员们常常在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刻钢板、印传单、下工厂搞宣传，有时还打工。遇到纪念日，他们就和工人、市民一道上街游行，在队伍前面举旗喊口号的总是这帮小伙子。

刘少奇性格内向，几乎没什么个人爱好。除了集体活动，他从不随便上街，也不闲聊天，空下来的时

候，就是背俄文，读陈望道翻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刘少奇被它的内容和文字深深打动，封面上印着的大胡子马克思像，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这里，他度过了几个月非常有意义的时光。

1920年在期盼中过去了，历史的车轮进入1921年。不知不觉之间，又一个春天降临了。一日，杨明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大家：去苏俄学习的途径已经联系好，要去的现在就开始办手续。

这是刘少奇盼望已久的事，当即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同时报名的还有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吴芳等十几个青年。学员们兴奋地忙碌起来。他们分头联系办护照、买船票，收拾行装。杨明斋给他们开了一封介绍信。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刘少奇等人登上黄浦江的一艘轮船。汽笛响过之后，他们缓缓离开上海港，向大海驶去，开始了一次不平凡的远行。

他们买的是上海到海参崴的船票。轮船在太平洋上颠簸航行，在途经日本长崎稍作停留之后，抵达海参崴。

刘少奇等从上海出发时是暖融融的春天，海参崴却仍旧遍地白雪。这里还是日本军队统治着，共产

党不能公开活动，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下一站是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刘少奇等拿着介绍信找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海参崴大学教授伊万诺夫，办妥了去伯力的手续。

没有想到，他们的行踪被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领事馆盯上了，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派出来的。一天，他们住的小旅馆里突然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领事馆人员，把刘少奇、吴芳等几个人带走了。

刘少奇等被带到领事馆的一间屋子里。一个当官儿的坐在正中，两边站立着几个枪手，有点像京戏舞台上都督升帐的场面。那当官的拍着桌子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来这干什么？”

刘少奇马上回答：“是做裁缝的。”当时南方人到这里来打工或做裁缝、理发等手艺活的人很多。

刘少奇说的是湖南话，领事馆的人听不大懂，因此胡乱审问威胁一通之后，也就信以为真，把他们放了回去。总算是虚惊一场。

离开海参崴，过了伊曼河，就到了苏联红军控制的地盘。刘少奇等人到伯力，一下车就受到了当地红军的热情接待，吃住都免费。大家不再躲躲藏藏、互相装不认识，而是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一路上的担惊受怕一扫而光。

这些中国青年在伯力愉快地住了一段时间。由于等不到火车，便改乘小轮船沿黑龙江航道到海兰泡，又从海兰泡乘火车到赤塔，经伊尔库茨克，向莫斯科进发。这段铁路旅行也是困难重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沿途到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刘少奇等乘坐的火车十分简陋。由于没有煤，火车头靠木柴生火作动力，路轨状况也很差，开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或者上山运木柴，有时还遇到土匪骚扰。就这样开开停停，十几天以后才到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已经是初夏的6月。这一段行程，路上走了将近3个月。

刘少奇后来曾多次谈起这段艰难的旅程。1960年他出访苏联时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还讲到了这件事：“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3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柴，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

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⑤

●就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即将开学之际，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礼堂里，掌声阵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主席台上，端坐着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坐在主席台上。他是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并向大会作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中国青年幸运地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有关部门将他们安排在会议代表住的招待所里。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张太雷还专门到他们住的房间看望。会议期间，刘少奇等人成了大会的编外人员，帮助做些会务工作。每逢开大会听报告，他们就领了入场券进去旁听。

刘少奇坐在会场里，看到主席台上列宁和其他一些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喜悦之情不言而喻。这些领袖的大名，在国内时就已如雷贯耳，现在能亲眼见到，聆听他们作报告，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从6月22日开始，7月12日结束。大会闭幕后，刘少奇等人被分配到新近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个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目的是为中国、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培养革命骨干，斯大林是名誉校长。

就在东方大学即将开学之际，远在中国东部的上海、嘉兴，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但这时共产党在国内是秘密组织，加上通讯困难，刘少奇等对此毫无所闻。

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是东方大学首批中国学员。开学前，他们一起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招待所搬出，住到了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东方大学的集体宿舍，在学校的食堂吃饭。

这时苏俄的经济十分困难，粮食供应不足，生活用品极为匮乏。刘少奇等人在东方大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非常艰苦。肖劲光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们这些外国学生都享受红军的待遇……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是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

一人一勺，一勺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⑥

东方大学学员中有少数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生活，情绪消沉起来，想打退堂鼓，有的提出退学。但刘少奇等大部分学员始终意志坚定，精神乐观，把困难环境作为锻炼自己的机会。在 1922 年新年晚会上，一向深沉文静、从没有演过戏的刘少奇，还和肖劲光等一起上台，为大家表演节目。

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有 30 多人，开设了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和俄文等课程。当时任北京《晨报》记者的瞿秋白，还为他们当过翻译。

开学没多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学校。刘少奇闻讯，便四处向人打听怎样可以做一个共

产党员，怎样能够加入共产党。中国班有一个学校派来的政治教导员，专管学员的政治生活。刘少奇就一再找他询问，同他商讨参加共产党的手续。一些互相熟悉的同学聚在一起，也时不时地议论入党问题。但这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初创阶段，成员很少，组织上很不完备，也没有什么文字宣传材料，所以刘少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打听出什么结果。

到了1921年的冬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终于延伸到东方大学，开始在中国班发展成员。学员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都已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便首先由团员转为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

加入共产党，是刘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转变和崭新起点。为了追求光明，他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摸索过程，现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崇高愿望。从此，刘少奇把自己的一生和共产党水乳交融般地溶为一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献身奋斗的目标，竭尽全力，义无反顾，一直到生命的终止。

后来刘少奇在讲到这一思想转变时说：“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确定了。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的很深。”⑦

1922年初，东方大学让学员们填写“团员调查表”。刘少奇在“对现在社会作何感想”一栏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目中，他提议：“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对今后希望从事何种工作的问题，他填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⑧

果然，刘少奇很快就开始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生涯。

第二章

工人运动领袖

●刘少奇被陈独秀派往湖南，在长沙清水塘同毛泽东第一次会见

1922年7月下旬，上海正热。在英租界成都路附近的一处寓所里，两个人正在轻声交谈。一个年龄稍长，学者模样，这是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另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便是不久前才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刘少奇。

原来，刘少奇于这年春天，根据组织决定奉调回国，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相当于总工会书记处。这时共产主义书籍刚传到中国不久，给翻译家出了不少难题，许多新名词不晓得翻译成什么好，于是把工会译成了劳动组合，是从日文转译来的。

刘少奇回国不久，正遇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

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便也参与一些中共二大的会务工作。中共二大刚开完，陈独秀就找刘少奇谈话。在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派刘少奇去湖南工作，指定他参加湖南地区的党委。临走时，陈独秀又把中共二大刚刚通过的一些文件交给刘少奇，要他带给湖南的党组织。

中共在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叫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是1922年5月成立的，书记是毛泽东。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所以毛泽东还兼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当时在湖南的共产党人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夏明翰、李六如等。

刘少奇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名字早有所闻，对湖南革命运动的形势也大体了解。他想到自己即将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家乡从事革命，自然十分兴奋。8月初的一天，他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带着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党章》、《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文件，告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们，轻快地踏上了奔赴湖南的征程。

湖南省长沙市小吴门外，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菜园和草地。菜地的旁边，是一口面积不大但水质清爽

的池塘，几株轻轻摇摆的垂柳文静地伫立塘边，显得宁静而又幽雅。这便是清水塘。在池塘的一侧，有一座普通的青砖小平房，就是清水塘 22 号。中共湘区执委会机关就设在这里，区委书记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

刘少奇从上海来到长沙，顾不上别的，首先找湘区委接头，径直来到清水塘。

就在长沙清水塘这座小房子里，毛泽东、刘少奇会面了。在这之前，他们虽然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和大概情况，但互不相识。今天，他们在各自经过了一段艰辛坎坷的探索历程之后，不约而同走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两人不免一番感慨，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两位革命者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合作奋斗，共同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会见中，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共二大的召开情况，转交了临行前陈独秀给的文件。毛泽东也介绍了湖南的形势和组织情况。两人在交谈中都自我介绍了过去的经历。毛泽东对刘少奇百折不回地追求真理，最后跑到苏联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的传奇经历很感兴趣，问道：“你们是怎样到苏联去学习的？”

刘少奇回答说：“我们是经过船山学校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过他介绍给上海外国语学社杨明斋，后来又经杨明斋介绍到苏联去的。”接着他大略介绍了一下这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那时贺希明不听话了，同革命青年搞不到一起。后来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我们才能利用船山学校。以后又把船山学校改为湖南自修大学。”①

初次会面以后，就在清水塘 22 号这座平房里，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形势和工作。刘少奇因为初来乍到，了解情况不多，在会上发言比较少，倒是同毛泽东个别交谈比较多。

对在清水塘同毛泽东的相识相交，刘少奇一直怀有美好的回忆。30 年后的 1952 年，他在全中国解放后第一次回长沙时，还和夫人王光美专门去寻访同毛泽东初次见面的清水塘，可由于年久变迁，当时竟没有找到。

刘少奇向中共湘区委和毛泽东报到之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当时湘区委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向军阀赵恒惕政府开展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决定由湖南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刘少奇参与了发起工作。不几天，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夏明翰、李六如等任

干事。9月5日，刘少奇和李立三、易礼容一起出席长沙土木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了演说。

9月初，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酝酿罢工。湘区委已经派郭亮在岳阳发动，这时再派刘少奇到长沙沿线组织配合。9月9日，粤汉铁路长沙段2400多工人全线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六条经济政治要求。刘少奇忙得不可开交。岳阳也是紧张万分，郭亮在那里率领工人卧轨拦车。粤汉铁路顿时全线瘫痪，斗争进入高潮。

正当刘少奇在粤汉铁路罢工前线昼夜忙碌之际，忽然接到刚从萍乡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的通知，要他立即从粤汉铁路撤出，去执行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速速赶往安源路矿，指导那里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领导安源路矿 1 万多工人 大罢工，刘少奇初露头角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拥有矿工 12000 多人，铁路工人 1000 多人，是当时南部中国最大的产业之一。中共湘区委从一开始就把它

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1921年冬，毛泽东去安源考察，随即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1922年五一节，安源正式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初，安源工人在粤汉铁路、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为争取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和路矿当局形成对峙。一场大工潮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当然不会坐失良机。他一面通知正在醴陵探家的李立三迅速返回安源，一面果断地将刘少奇从粤汉铁路罢工前线调往安源，以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想想看，如果安源13000多工人罢工成功，不仅在湘区范围内规模最大，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这对全国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形势将发生多么大的影响！

1922年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同李立三会合。情势已经十分急迫，工人中到处弥漫着激动不安的气氛。他俩顾不上寒暄，立即切入正题，在交换有关情况之后，迅速分头到路矿各处了解准备工作和社会动态。

原来，就在刘少奇到达安源的前一天，路矿当局串通萍乡县知事和新近调防来的赣西镇守使，威逼工人俱乐部自行解散。工人们极为愤慨，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每月发给俱乐部

津贴 200 元、发清工人欠饷三项要求，限 9 月 12 日中午答复，否则“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在情况掌握之后，李立三、刘少奇决定召开工人俱乐部负责人紧急会议，进行最后的决策。9 月 12 日晚，紧急会议在一位老工人家里秘密举行。一开始会上出现不同意见，有的提出最近当局新调来军队，增加了武装，弄不好会遭镇压。但李立三、刘少奇和多数党员意见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为什么要李立三“秘密策应”呢？这是有缘由的。李立三从 1921 年冬起就在安源活动，反动派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扬言要杀他。为预防不测，大家一致要李立三在罢工期间躲起来。而刘少奇刚来安源，敌人还不熟悉他，因此决定由刘少奇公开出面，长住在工人俱乐部坐阵指挥。工人俱乐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安源路矿工人的代表和核心，在罢工中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指挥部所在地了。

9 月 13 日，李立三、刘少奇和蒋先云、朱少连等俱乐部负责人整天都在进行罢工的各种准备：起草罢工宣言和标语口号、组织工人纠察队、联络当地红

帮头目防止他们捣乱。正在紧张忙碌之际，又收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给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来函：“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母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②而这时，当局对工人俱乐部的三项要求仍是置之不理。

行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刘少奇等紧急磋商后毅然决定：实行全路矿大罢工！9月13日午夜，发动罢工的命令从罢工指挥部迅速下达到全矿区。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还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中。株萍铁路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蜿蜒躺卧在安源山下。十里矿区，一片寂静。

突然，呜——呜——呜——，安源车站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紧接着，安源修理厂、八方井的电笛也高声长鸣，一直持续了五分钟之久。这响彻云霄的笛声，划破黑暗的长空，在向人们庄严宣告：安源路矿13000多名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

工人们潮水般涌出矿井，奔出车间，冲出工棚，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斧头、岩尖，大声高呼：“罢工了！罢工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天亮后，人们发现，往常热闹繁忙的安源镇完全换了模样：工厂关门，矿井封闭，列车停驶，工人们

全部在宿舍待命，整个环境显得平静而有序。臂带袖章的纠察队员把守着要道路口和厂、矿出入处。墙壁和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标语、布告。街道和矿区的醒目处，贴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那哀而动人的语言，叩人心扉：“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③

这份《罢工宣言》还印成公函送到了路、矿两局，上面特意声明：“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开始后，李立三住在秘密处，被工人们保护了起来。刘少奇以俱乐部全权代表的身份，从容地指挥和应付一切。

大罢工的汽笛，把路矿当局惊得目瞪口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面火速向萍乡县知事和赣西镇守使告急，要求派兵进驻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罢工，一面要地方商会出面斡旋调停。

上午时分，调停的人果然来了。安源商会代表谢岚舫和一位地方绅士，以调解人身份来到俱乐部，同刘少奇会谈。刘少奇慷慨陈述了罢工的原因和工人的要求条件，请他们转告路、矿两局。

晚上，谢岚舫带来了当局的回音，说：“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

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答道：“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④

罢工进行到第三天。9月16日中午，路矿当局派人送来一封信，请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刘少奇决定亲自前往。

设在矿局办公大楼内的戒严司令部，警卫森严。门口台阶两旁，架上了两挺机关枪。进门楼梯的两边，站着背盒子枪的卫兵。走廊里也站着上了刺刀的卫兵，一个营长挎着手枪来回巡逻。

图2 在安源时的刘少奇。
(1922年)

刘少奇拿着条件书向戒严司令部走去。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大家为他的安全担心，纷纷说：“刘代表，你不能去，他们会害你的。”他笑答道：“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

穿过道道岗哨，刘少奇进到谈判室，从容地在戒严司令和矿长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戒严司令李鸿程

瞪眼望着这个 24 岁的年轻人，想给他个下马威，便抬高嗓门蛮横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毫无惧色，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我？如果今天不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说着又理直气壮地申述了罢工的理由。

双方僵持了一阵，李鸿程气急地拍着桌子嚷：“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但是不能解决！”

“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李鸿程又凶狠地喊。

刘少奇马上愤然回击：“就请你下令制裁去！”⑤

这时，戒严司令部外面，黑压压地站满了闻讯赶来的数千工人。工人们高声喊叫：“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片瓦不留！”“要谈到俱乐部去谈！”愤怒的人群边喊边向戒严司令部包围过去。

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见势不妙，担心乱子闹大，连忙恳求刘少奇出面维持一下秩序。

刘少奇走出谈判室，来到走廊上，向工人们招了招手，高声说：“工友们，兄弟们，大家静一下，现

在正在谈判，请大家再耐心等待等。”人群马上安静了下来。

工人的强大力量，把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的威风一扫而光。他们不得不向刘少奇表示，一定认真考虑俱乐部的条件，要刘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谈。

刘少奇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⑥说着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戒严司令部。

9月17日，路矿当局被迫答应再同工人俱乐部谈判。当晚，李立三、刘少奇等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地方商会和绅士代表，三方坐下来谈判复工条件。为了起草协议条文，三方一直争论到深夜。第二天，谈判继续进行。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13条协议，在路局机务处正式签字生效。协议的内容包括俱乐部代表工人权利、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等。工人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坚持五天的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安源大罢工是在敌人重兵把守的矿区，有13000多工人参加的大规模政治经济斗争。由于领导得法，组织严密，注意争取社会同情和利用合法形式，因此在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就迅速获胜，这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历史上是罕见的范例。

事后，安源工人们称赞刘少奇“一身是胆”，敢

于只身赴戒严司令部同全副武装的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工人张明生问刘少奇：“听说你有 13 块金牌护身，所以老板和军队不敢动你，是吗？”刘少奇笑着说：“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真理在我们一边，因此我不怕。我哪有什么 13 块金牌，半点也没得，1 万多工人的团结，才是我力量的源泉。”⑦

后来，安源工人还编了一首名叫《劳工记》（又名《罢工记》）的歌谣，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其中写道：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⑧

●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工会硕果仅存

大罢工的胜利，使安源工人俱乐部声名远播，工

人们更是扬眉吐气。

工人俱乐部由于万余工友的纷纷加入而更加壮大了。1922年10月，俱乐部重新选举各级代表和负责人，李立三任总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因事离开安源，刘少奇代理总主任。8月16日，刘少奇正式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后来还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汉冶萍总工会是由汉阳铁厂、大冶钢铁厂、萍乡安源路矿等5个厂矿的工会组织联合成立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

首次罢工的胜利，固然得来不易，但更重要也是更困难的，是要把胜利的成果加以巩固和发展。由于李立三的调离，这副重担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

大罢工的胜利首先引起了一班工头的嫉恨。这帮人原先横行安源，威风十足，现在工人地位提高了，他们神气不起来了，便心生坏意，伺机捣乱。他们一方面故意不负责任，不认真签点上工人数，造成生产混乱，反过来又把问题推到工人和俱乐部头上；另一方面，他们联络一些亲信和被俱乐部摒退的工人，策划成立所谓“游乐部”，以同工人俱乐部抗衡。

刘少奇获悉情况，立即组织反击斗争。他指挥工人们将几个密谋刺杀俱乐部负责人的工头抓起来，送到矿司法课查办，同时严加追查工头们秘密开会

的阴谋活动。

工头们慌了，只承认开会是议论加入俱乐部和将包工制改合作制。刘少奇听得此言，决定将计就计。因为包工制是工头向矿局包揽工程后交给工人干，工头从中盘剥，而合作制可以由工人自动组合生产。包工制改合作制是俱乐部早想实行的事，这回正中下怀。俱乐部乘机迫使工头们放弃工头包工制，改为工人合作，一举打破了实行 20 多年的带封建性的包工制。同时，在俱乐部的强烈要求下，矿局不得不将 6 名为首破坏的工头开除。其余表现较好的工头被俱乐部吸收为部员。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去，“游乐部”的计划便胎死腹中了。

这年年末，刘少奇又亲自出马同矿长李寿铨交涉，代表工人要求增加半个月工资，即年终夹薪。经多次谈判，据理力争，矿局终于答应了要求。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工人俱乐部不光层层建立了组织，选出了代表，还开办了工人夜校、工人消费合作社，各方面的事业搞得红红火火。

时光进入 1923 年。正当安源工人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大批工人被捕被杀，罢工惨遭失败。

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工人

运动面临严峻考验。形势有变，刘少奇赶紧调整策略：“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⑨他在冷静分析之后，提出了巩固内部的三项措施：“（一）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智识并训练工人作事的能力。”^⑩

在大气候变坏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实在不容易。刘少奇带领工人俱乐部一班人，忙里忙外，既要整顿内部，又要对付资本家、军阀势力的破坏，煞是辛苦。

幸好，这时刘少奇的个人生活遇上了喜事：1923年4月，他同聪明伶俐的湖南姑娘何葆贞喜结良缘。

何葆贞又名何宝珍，是道县城关镇人，原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她后来到长沙，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毕业后，中共湘区委将她分配到安源，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当教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何葆贞工作认真，待人热情，安源工人都很尊敬她、喜欢她。工人俱乐部的工作紧张而充满激情。在共同的奋斗中，她和刘少奇相爱了。

4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何葆贞的婚礼在工人俱乐部举行。朴实的安源工人纷纷来为他们贺喜。婚

礼办得简单而又热闹，一改当时的种种旧风俗，不办酒席，不收礼物，不拜天地，只开了个欢快的茶话会。这在工人中一时传为佳话。

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成绩显著。

俱乐部的组织进一步健全了。部员每 10 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 1 人；再由 10 个 10 人团选举百代表 1 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 1 人。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总主任、主任。同时，在俱乐部设立互济股（即合作社）、故工抚恤会、劳动介绍所、教育股、讲演股、游艺股、文书股、工厂委员会等办事机构，还成立了工人纠察团。

为工人谋利益的事业也增多了。俱乐部在全路矿开办了 7 所工人学校，5 个工人读书处，1 个工人图书馆，2 个消费合作社。

1924 年 5 月 1 日，安源工人度过了极其兴奋的一天。显示工人力量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正式落成，工人们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礼堂里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两周年大会。

俱乐部礼堂座落在安源山牛形岭下，旁边是宽阔的大操场，气势庄严，建筑精巧。楼内除前面部分

图 3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

作俱乐部办公室外，还设有一个可容纳 1000 多人开会的讲演厅。这是安源工人从罢工斗争得到的年终夹薪中，捐出一半钱建筑起来的。为盖这座礼堂，刘少奇可没少操心。从设计图纸到准备材料、监督施工，他都一一过问。礼堂大厅的几根主要大柱子，还是他亲自到株洲采购来的。

这年秋天，刘少奇还领导在安源办了一所党校。党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训练工人和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算起来，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了。

在二七惨案后反革命势力嚣张、各地工人运动走入低谷的情况下，安源的工会仍然搞得有声有色，

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中心之一。当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赞扬安源工会在全国工运低潮中“硕果仅存”，“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⑪

为了及时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刘少奇在这期间写了不少文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这些文章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珍贵文献。

随着安源工人运动的步步胜利，刘少奇的声望日隆，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4年底，中共领导机关决定调刘少奇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时候，刘少奇还不到27岁

1924年临近年底的一天，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一间宿舍里，刘少奇、何葆贞夫妇望着小床上不满周岁的儿子葆华（后名刘允斌），左右为难。这时他们已接到上级组织的通知，要调刘少奇到新的工作岗位去。可儿子实在太小，随身带吧，不方便；不

带走吧，何葆贞怎么也舍不得，再说又托给谁呢？

刘少奇思索片刻，果断地说：“搞革命，孩子带在身边不行。再说，革命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孩子跟着我们也很危险。”

工人俱乐部的一些骨干分子听说后，都跑来要求收养这个孩子，路局主任、火车司机朱少连尤其积极。刘少奇夫妇商量之后同意了。

正巧，刘少奇的哥哥刘云庭从长沙来到安源。他眼见此事，立即要求将葆华带回宁乡老家抚养。他提出，朱少连今后也可能调动工作，而乡下比较平静，再说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怎么能麻烦别人呢？刘少奇夫妇觉得言之有理，就把儿子交给了刘云庭。

当时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临时安排，分离的时间不会太长。谁能想到，此后刘少奇夫妇为革命东奔西忙，根本顾不上孩子。这中间除了1925年冬他们在回湖南时看过一次儿子以外，一直到1938年夏，14岁的葆华才被送到延安刘少奇的身边。而这时，何葆贞已经牺牲4年了。

1925年春，刘少奇告别战斗了两年多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安源工友们的依依惜别中，离开安源前往广州。

广州，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1925年3月20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

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联合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的时间定在5月1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1922年5月举行的。那次会议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只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时隔三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切需要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要讨论的议案也特别多。

时间已经很紧。刘少奇一到广州，就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要讨论通过30多个文件。其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等大部分文件，都是刘少奇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亲自起草和主持起草的。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从5月1日开到5月9日。大会在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之后，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真是一次工人力量的大检阅！

大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在第一次执委会议上，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当选为副委员长。这时，刘少奇还不到27岁。

就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期间，在中国最

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连续爆发了多次罢工斗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因势利导，决定派已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刘华等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在广州的全国总工会也闻风而动，立即委托副委员长刘少奇赶赴上海，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

刘少奇于5月下旬匆匆到达上海。刚刚开始工作，中共中央又要他马上赶去青岛。因为青岛四方机厂4月底爆发的15000多工人大罢工，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急需加强领导。

刘少奇马不停蹄奔赴青岛。他刚着手采取措施巩固罢工成果，忽又接到中共中央急电，要他火速返回上海。此时上海的情况更加紧急，一场大规模的工人反帝斗争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 中共中央急调各路精兵强将，赶赴上海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下午，上海数千名学生和市民群众，在南京路等处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讲演。突然，租界的巡捕向人群中开枪射击。随着阵阵枪声，成片游行群众倒在血泊中。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一致反击帝国主义。中共中央除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亲自领导运动外，又先后紧急抽调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刘少奇等加强第一线指挥。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

刘少奇从青岛赶回上海已是6月初，全市大罢工已经开始。他一到，便受命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掌管总工会文牒、庶务等几个部门的工作。这一职务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实际上是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这时以总工会为首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已经成立，李立三作为总工会的代表参加联合会的领导，协调工、商、学各界的行动。上海总工会的具体领导工作便由刘少奇承担了。

进入6月，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长期压抑在中国人民心底的对帝国主义的千仇万恨一齐迸发出来。刘少奇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厂，英国的、日本的，统统都起来罢工了，一共罢下了25万人。不但是工人，连工程师、洋行银行的职员、领事馆内的雇工，也都罢了工。这便

是所谓五卅后的上海总罢工。后来不但商人罢市，学生也罢了课，商人和学生一致跑到各商会和总商会去请愿，要求总罢市。于是召集了各店家、各学校的代表齐集总商会，向当时的总商会长虞洽卿提要求，结果上海统统罢工、罢市、罢课。同时，封锁租界，不许粮食及小菜到里边去。……运动自上海发生后，全国都响应，跟着起来罢工，如平津、广州、武汉等地工厂也罢了工，大中小学学校也都罢了课，各地都发生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⑫

上海闸北宝山里 2 号门口，挂着一块簇新的牌子：“上海总工会”。五卅运动以来，这里作为上海数十万罢工工人的指挥部，整天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负责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更是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正当斗争的紧要关头，原来加入“三罢”同盟的上海总商会却发生了动摇。他们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6 月 20 日单独宣布提前开市。

商人此举使罢工工人面临严峻考验。当天下午，上海总工会紧急召集代表大会，磋商对策。刘少奇主持会议，提出目前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要代表们讨

论。他说：“一，总商会议决将于6月26日开市，我工界应持何种态度；二，发放工友救济费应有良好秩序；三，工人罢工须有良好的组织，如无良好的组织，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行涣散。现上海罢工工友达20万，因此我等应讨论如何使组织严密而坚固。”^⑬

代表们群情激愤，纷纷发表看法。会议最后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对另外两个问题，代表们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然而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发放罢工工人救济费就是一件琐碎而又极重要的事情。罢工后，工人失去了工资。总工会为解决工人生活困难，从全国各地争取捐款，“各处举行了援助上海工人罢工的大募捐，工人得到了一笔数目很大的钱，差不多有几千万。那时已是冯玉祥在北平把宣统皇帝赶出故宫之后，开放皇宫参观的票价收入，也拿出来捐给工人”^⑬。但如何将这些捐款合理地分配下去，有秩序地发放到几十万工人手中，困难相当大。刘少奇深知兹事体大，所以亲自抓这件事。当时上海的报纸还报道了他直接发放救济费的几个例子：

1925年6月20日《申报》载：6月19日，英美电车路工人因五卅惨案罢工后亟待救济，总工会刘

少奇携款会同英美电车路工会总干事潘志亮、吴长年等在闸北新民路一段的空地上，发给路工补助费，计领款者 1006 名，每人 1 元。

1925 年 8 月 21 日上海《民国日报》载：岳州路经纬纺织厂 30 多名女工找到总工会，反映这个厂的 500 余名工人，已有 3 个月未做工，急需救济。刘少奇接待来访女工后，一面向济安会交涉经费，一面派人前往纺织工会调查确切人数，以便分发。

刘少奇对上海工会组织的巩固、扩大也下了不少功夫。经过五卅运动的考验，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各业工会和会员人数有了大幅度增加。同时，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也已筹备就绪，1925 年 7 月 6 日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承担指导北方及长江流域各地工会的任务。

进入 1925 年 8 月，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已经坚持了两个多月。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改变斗争策略、有条件复工的指示。8 月 10 日，李立三、刘少奇召集上海总工会会议，提出 9 条复工条件，并决定发表宣言向社会公告。

在这种情势下，反革命势力嚣张起来。8 月 22 日晚，上海总工会住地突然闯进来 100 多名流氓打手，操着手枪、刀斧等凶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正在总工会办公的李立三、刘少奇见状不妙，立即分

手，乘着混乱跑了出来。他俩一面亲往当局报警，一面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为了表示工人阶级的不屈精神，刘少奇主持发出上海总工会《檄告全体工人》的文告，揭露反动派的暴行。文告号召：“工友们，起来自卫吧！总工会职员是替全体工友谋利益的，决不怕死。打死一个还有十个，打死十个还有百个、千个、万个。”刘少奇、李立三都坚持照常到总工会办公。

形势越发严峻起来。反动当局下令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几个行业工会，积极准备向总工会下手。前一阵子出面比较多的李立三、刘华等工会领导人，逐渐不便公开活动。面临着组织有条件复工的大量工作，刘少奇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要组织几十万罢工工人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有序地上工，同样是一件艰巨复杂的事情。

刘少奇决定分批解决复工问题。日商工厂复工谈判开始较早，条件相对成熟，因而作为第一批相继复工。接着，从8月底到9月上旬，刘少奇又领导总工会组织华商工厂复工。

8月29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开会。他耐心向工人们解释说：“开工以前，必须向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要求应当能够做得

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⑭当天下午，他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决了六项复工条件。

之后几天，在刘少奇的带领下，工人代表同工厂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经过反复斗争，六项条件中除补发罢工期间工资由6元减为2元外，其余条件都得到满足。9月10日，华商工厂也顺利复工。

英商工厂的英国资本家最顽固，刘少奇和总工会把它们放在最后一批解决。工人们在工会的领导下，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坚持厂方不答应条件就不复工。

但是形势也越来越恶劣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买办资本家、流氓工贼沆瀣一气，正磨刀霍霍向总工会扑来。

9月18日，敌人终于露出凶相。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向上海当局下达镇压密电。傍晚时分，淞沪戒严司令部、淞沪警察厅出动军警，悍然将上海总工会强行封闭，当场逮捕刘贯之、杨剑虹等工会骨干，下令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会领导人，并限令上海总工会所属的120多个分会即日自行取消。

刘少奇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一面带领总工会向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和各传媒单位发出紧急通电，一面抓紧处理各种善后事务。斗争环境恶劣，

要办的事又是那样多，他不得不拖着虚弱的身体终日奔波。9月25日，他又一次召集秘密会议研究抗议办法和应变措施。月底，经过坚持斗争，英商工厂的资本家也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有秩序地复工。

五卅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组织上海20多万工人坚持罢工达3个月。这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席卷全中国，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上海的五卅运动结束了。刘少奇却因操劳过度肺病发作，病倒了。1925年10月16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一篇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文章，记述了他的情况：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种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

织公开的时候看他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上海总工会查封后，工人运动暂告一段落，工会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这时刘少奇的身体情况也已无法坚持工作，党组织安排他回湖南治病和休养一段时间。1925年11月，刘少奇在妻子何葆贞的陪伴下离开上海，回湖南长沙。

●邓中夏在欢迎会上说：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长沙市城北贡院西街，有一个卖书的小店。1925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一对青年夫妇来到这里。正在书店值班的女会计热情地将他们迎进书店里屋，稍事寒暄，即安排他们在书店后楼住了下来。

这个书店叫长沙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1920年9月创办的，历来是湖南党组织的一个活动地点。书店经理叫易礼容，但这时易经理因事去了广州，不在长沙，书店业务暂由女会计许文煊负责。这天许会计接待的客人，便是刚从上海来到长沙

的刘少奇、何葆贞。

文化书社附近有一所湘雅医院。刘少奇在同当地党组织接上头之后，除了了解情况、看望几个故旧以外，便抓紧时间去湘雅医院治病，检查身体。何葆贞则抽空去宁乡看望年幼的儿子允斌。

经过一个来月的治疗、将养，刘少奇的肺病逐渐好转。

不曾想到，正当刘少奇积极准备重返工作岗位的时候，1925年12月16日中午，几个便衣突然闯进文化书社，二话不说将刘少奇抓了就走，将他带到长沙戒严司令部关了起来。

这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干的事。五卅运动在湖南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学生运动，至今余波未息，赵恒惕为此伤透了脑筋。正在这个当口，他得到工运领袖刘少奇从上海潜来长沙的密报，十分恐惧，马上下令军法处拘捕刘少奇。

第二天，长沙《大公报》报道了刘少奇被捕的消息，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各地抗议赵恒惕的电报雪片般飞来长沙。中共有关组织也全力组织营救。

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各地工会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抗议电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本其爱国

热忱，四处运动罢工，揭露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政策，藉以唤醒工人之觉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奔走数日，积劳成疾，近返湖南养病，竟被万恶军阀赵恒惕扣留。”“深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实力援助，敝会同仁愿为后盾，务须达到恢复刘少奇同志之自由的目的。”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等借机向共产党表示好感，也发电报要赵恒惕释放刘少奇。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赵恒惕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病，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刘少奇夫人何葆贞、哥哥刘云庭更是到处奔走，千方百计调动各种社会关系出力营救。他们先后动员了许多湖南上层人物出来说话、担保。其中有：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旧友洪赓扬，赵恒惕手下的师长叶开鑫、贺耀祖，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一时间，省内要人为此频繁活动。

赵恒惕没有料到，抓了一个刘少奇，竟使自己陷入内外受责、四面挨骂的境地。为避免惹更大的麻烦，他便借叶开鑫等头面人物出来担保的由头，顺水

推舟同意释放刘少奇，只要求他5天内离开湖南。

1926年2月上旬，刘少奇终于获释。处境尴尬的赵恒惕为了借梯子下楼，在刘少奇临走前派人送赠一册《四书》。赵恒惕这一自打嘴巴的举动，被当时报纸嘲讽为“最滑稽”的一件事。

刘少奇的被捕，着实把他的母亲吓得不轻。老人家一辈子老实本分，突然遭此打击，几乎难以承受。后来听到获释的消息，她连忙从宁乡乡下赶到长沙，流着泪跪在刘少奇面前，要儿子不要再干这种身家性命都不顾的危险工作。刘少奇自小非常爱他的母亲，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要求断不能从命。他急忙扶起母亲，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事实实在不能依您。”望着慈母惊恐不安的面容，他只有再三劝慰老人家放心回去。第二天，他就急匆匆离开长沙赴上海。

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之后，刘少奇本想继续休整一下，以便使病后虚弱的身体恢复过来，中共中央机关还安排他住医院诊治。可休息了没有几天，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又要他尽快赶去广州。因为全总委员长林伟民病情严重，已不能工作，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将于5月1日召开，时间紧迫，急需刘少奇前往接替林伟民，主持繁杂的筹备工作。

刘少奇抓紧收拾行囊，又登上了上海开往广州

的轮船。经过几天的航行，2月19日抵达广州港。

刘少奇的来到，使广州越秀南路93号的全国总工会机关热闹了许多。大家热烈欢迎他的到来。3月3日下午，能容纳1500多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座无虚席，不时传出阵阵掌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欢迎刘少奇出狱和到达广州，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

刘少奇同志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而被捕的。经过各方努力，各地打电报，才迫使赵恒惕放他出来。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是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曾率领工友罢工一次，提出条件13条，率使资本家屈服，得到胜利。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及大会闭会后他回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刘同志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20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地方

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最厉害，工人组织因之以前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刘同志能将幼稚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地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却因此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入狱 52 日，经全国人民大众一致电报，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现在已来省城，此后有机会与各工友一齐奋斗。⑮

刘少奇也在会上讲话。他在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后，着重提出了当前省港大罢工中应注意的问题。他强调：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帝国主义来与我们工人订条约，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邓中夏、刘少奇的讲话，不时被掌声、口号声打断。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这时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省港大罢工还在坚持进行，斗争任务非常艰巨。刘少奇作为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既要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又要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巩固工作，还要组织工人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忙得团团转。

单为筹备第三次劳大，刘少奇就要经常召开会议、起草各种文件，布置许多琐碎的会务工作。经过

紧张筹备，第三次劳大终于决定于5月1日如期举行。

4月29日、30日，刘少奇主持第三次劳大预备会议，提出大会的三项议程：一，总结一年来的工人运动；二，确定工人运动方针；三，改选全总执行委员会。会上一致推举刘少奇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长，推选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1日上午，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鼓乐齐鸣，掌声雷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隆重开幕。刘少奇主持开幕式，邓中夏致开幕词，各界代表纷纷前来祝贺。2000余名代表欢聚一堂，群情振奋，一致表示要将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全市工、农、商、学各界30多万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刘少奇代表全总在大会上演讲。这两次盛况空前的大会，显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掀起了新的高潮，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即将挥师北伐的全民动员大会。

第三次劳大于5月12日结束。大会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刘少奇先后在大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和全总执委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这样几个鲜明的观点：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不彻底，工人阶级应与它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但应反对它的妥协倾向。①⑥

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同毛泽东 1926 年 3 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精神一致，观点吻合，可谓不约而同。在刘少奇代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也都在广州。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他们分别在工运、农运、军事战线上从事着同一个事业：国民革命。

5 月 7 日，刘少奇组织全体与会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两个月后，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的领导人员。刘少奇任全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长为李立三，宣传部长为邓中夏，委员长由海员出身的工人领袖苏兆征担任。

●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冲进汉口英租界，把“米”字旗扯下来扔在地上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从广州挥师北上，开始了著名的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各地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屡战屡胜，7月11日夺取长沙，8月下旬占领湖南全境。军阀赵恒惕早已望风而逃。9月6日、7日，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被彻底击败。广州国民政府开始陆续迁往武汉。

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直接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工人运动。办事处由李立三任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10月21日，刘少奇从广州抵达武汉，开始组建全总办事处并为全总机关迁武汉作准备。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还兼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

汉口友益街尚德里4号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楼房。刘少奇和李立三、项英等工会领导人到武汉后，都住进了这所房子。街对面的另一幢小楼，也就是友益街16号，便作了全总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的

办公地址。

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北后，这些地区的工人革命斗争由秘密转为公开，用不着躲躲藏藏了，因此一下子迅猛发展起来。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培养骨干，健全组织。富有工运经验的刘少奇立即着手解决这方面问题。他和李立三一起，首先创办了湖北全省工人运动讲习所，把工会积极分子招进来学习培训。第一期讲习所 10 月底开学，有 100 多名骨干分子参加学习。刘少奇、李立三都亲自去上课。刘少奇主讲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李立三主讲罢工战术、苏俄情况。

随着国民政府等首脑机关的迁入，武汉成为新的大革命中心。刘少奇作为全总武汉办事处、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发展工会组织。从 1926 年 10 月到 12 月，武汉工会组织迅速增加到 300 个以上，会员达 30 万人。湖南的工会组织发展到 52 个，会员 32.6 万人。江西有 20 多个县市成立了工会，会员 10 万人左右。这期间各地工会发动的反帝罢工此起彼伏，仅在武汉就发生 50 余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是如此之快的发展，在中国工运史上绝无仅有。

大潮冲击，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蓬勃发展的工会中，出现了组织涣散和不正之风。也有不少

工会干部盲目“左”倾，水平低，好心办坏事。对如此大量的工会组织进行教育、整理，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迫在眉睫。

1926年12月26日、27日、28日，一连3天，汉口友益街尚德里4号刘少奇的住室天天夜里灯光明亮，几乎彻夜不灭。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把大量新发展的工会建设好，刘少奇根据他几个月来深入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3篇指导工会建设的著作：《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他在序言里面讲到写这3篇文章的目的说：“我们为武汉的工会在加过工资之后，更进一步地团结和巩固起来，并消除内部的危险，特费了几夜的工夫，很简要地写成《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及《工会基本组织》3本小册子，交总工会宣传部印行，以备各工会及工友采纳施行。”^{①7}

这3篇著作提出和解决了当时工会建设中的3个基本问题，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工运史上的重要文献。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武汉人民迎来了喜庆的1927年。元旦这天，武汉三镇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各界群众举行盛大庆典，欢庆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民政府正式迁来武汉。

元旦这天，也是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开幕的日子。刘少奇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开幕式。这次大会是在全省工会组织空前发展、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因而会议气氛格外热烈。

1月3日下午，刘少奇代表全总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组织报告。会议刚散，有几个工人急猴猴前来报告：江汉关附近出事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月3日下午3点左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向群众讲演，人群越聚越多。英租界当局很是恐慌，如临大敌，急调大批英军武装水兵登岸，向赤手空拳的听讲群众挥舞枪托乱打，拔出刺刀乱捅，当场刺死1人打伤30余人，酿成“一三惨案”。

刘少奇得到工人的紧急报告，立即带人赶赴出事地点。江汉关附近已经密密层层地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刘少奇仔细察看了现场，然后带领工人纠察队员向英租界巡捕房提出了强烈抗议。

入夜，江城一片阴冷。家家户户都在议论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武汉老百姓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沉重和悲愤！鸦片战争后，英、俄、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强行在汉口设立“租界”，霸占地盘。这些俨然国中之国的“租界”，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严重践踏。中国人民为收回租界同帝国主义进行过长期斗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这一愿望一直未能

实现。

此时，汉口友益街 16 号这座三层楼的风子里灯光通明。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湖北全省总工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惨案真相和现场情况，对如何开展这场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经过热烈讨论，起草了《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老百姓的罪行，提出立即收回英租界等六项要求。

第二天，《通电》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名义在《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发表。里面严正提出：“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 30 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随后，刘少奇、李立三分别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政府立即收回英租界！

1 月 4 日下午，刘少奇参加了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 200 多个团体共 500 多名代表举行的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在全省总工会《通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八条要求：一，请政府立即向英领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领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三，令英领将行凶水兵交我政府惩办；四，撤销驻汉英舰及英界沙袋电网；五，撤销内河航权；六，英领向我政府道歉；七，英界巡捕缴械；八，

由政府管理英租界。会议推选代表向政府请愿，提出如 72 小时内英领无圆满答复，即请政府：一，封锁英界；二，收回英界；三，收回关税；四，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会议还决定 1 月 5 日下午举行对英示威大会。

在刘少奇等工会领导人的组织下，湖北全省总工会和各业工会接连发布了一系列通电、通告、宣言。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全市、全省、全国，有力地揭露了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收回英租界进行坚决的斗争！

全市人民动员起来了！长期积蓄在武汉人民心头的反帝怒火爆发了！1 月 5 日，刘少奇等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命令：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顿时，数十万群众紧急行动起来，斗争进入了高潮。

1 月 5 日下午，武汉三镇上空阴云密布，风雨交加，天气十分恶劣。但是，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斗志高昂。激动的人群潮水般涌上大街，列队通过英租界，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集合。“武汉市民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就要在这里隆重举行！

当——当——，江汉关钟楼的大钟深沉地敲响了两下。

2 时许，有二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正式开始。李

立三、刘少奇等站在队伍的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挺立在寒冷的风雨中，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会后，举行反英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如滚滚洪流，向英租界挺进！

“惩办杀人凶手！”

“收回英租界！”

“英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

雄壮的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英租界。英勇的纠察队员们迅速拆除租界内用沙包、电网组成的防御工事，勇往直前。英租界的巡捕和水兵节节败退，狼狈地逃往江边的兵舰。英国的“米”字旗被愤怒的人们从一个个高大的建筑物上扯下来扔在地上。至此，整个英租界完全被纠察队员和群众占领。

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出面对英方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和政府外交谈判配合斗争，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同意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于2月19日在协定上签了字。被英帝国主义霸占了60多年的租界，终于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在夺回英租界的喜庆声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

一次代表大会于1月10日闭幕。大会选举李立三、向忠发、项英、刘少奇、许白昊等35人为省总执行委员，推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委员长，刘少奇任秘书长。

1927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正式迁到武汉。此时身兼全总秘书长、省总秘书长的刘少奇，工作之繁忙自不待言。

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广泛注意。1927年3月底，共产国际组织英、俄、美等国工人组成国际工人代表团，来武汉参观访问。刘少奇带领武汉工人热情地接待了这批国际朋友。4月3日，武汉各界举行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的大会。刘少奇主持大会，发表了热诚友好的欢迎词。

就在刘少奇主持欢迎大会的时候，汉口又发生一起事件：一个日本水兵乘坐人力车不付钱，反将车夫打伤，又刺死前来救助的另一位工人，事态扩大。接着，停在长江里的日军舰水兵大批登岸，三次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是为“四三惨案”。

武汉的老百姓再次被帝国主义的暴行激怒。总工会又一次成为群众反帝斗争的指挥部。从4月4日起，刘少奇连续召开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省总各工会联席会议、全总各工会代表会议，并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常委会议，报告惨案发生经过，议决斗争方法。

总工会在会后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并向国民政府提出收回日租界。

但这时革命形势已经开始逆转。武汉国民政府处境困难，不便再以强硬方式处理这一事件。为讲究斗争策略，各工会联席会议决议并由全省总工会发出布告，号召群众在反日斗争中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这次运动虽然没能达到收回日租界的目的，但由于以总工会为核心的各界群众的坚决斗争，仍迫使日租界当局作出让步，答应撤退水兵、发还罢工工人工资等条件，取得部分胜利。

然而局势还在急剧恶化。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连续发生反革命大屠杀。5月17日、21日，武汉国民革命军内的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叛变。一时间，反革命逆流甚嚣尘上，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猖狂扑来。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紧急时期的对策。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能提出相应的纠正办法。陈独秀继续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刘少奇出席了中共五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常委会确定刘少奇为经济斗争问

题负责人，并决定成立由李立三、林育南、苏兆征、项英、刘少奇、王荷波、许白昊七人组成的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

形势陡然逆转。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滑向反动。工人运动面临更大困难。

还好刘少奇对蒋介石的面目早有认识，因此有所准备。差不多在四一二政变之前一个月，刘少奇在3月17日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抗议反动军官倪弼杀害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本性。他写道：“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江西这件事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①8}6月14日他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更是大声疾呼：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应一致反对，“立即削平湖南事变”！

尽管形势险恶，业已筹备就绪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还是于6月19日在汉口如期开幕了。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向大会作会务报告。武汉的局势在会议期间进一步恶化，汪精卫集团倒向反动的行为越发表面化。会议开到第十天，6月28日晚，武汉卫戍司令部突然派士兵侵占全总、省总机关。经过苏

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当局和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强烈交涉，卫戍司令部才通知士兵撤离。

差不多在军队骚扰总工会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局势的对策。会议在陈独秀主持下作出决定：为维护国共合作，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央紧急会议的指示立即下达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

对武汉工人纠察队，刘少奇没少花心血。从调配装备、扩充人员到健全组织，他都直接过问，还几次给纠察队员讲课。为对付日益严重的反革命逆流，5月19日省总工会发出通告，要求纠察队“正式荷枪弹”加强武装。在反击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刘少奇还部署工人纠察队同叶挺部队配合作战。到1927年5月，武汉工人纠察队拥有队员5000人，枪支3000条，成为共产党掌握的一支不小的力量。现在要解散纠察队，不少人想不通。但中共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湖北全省总工会当日发出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28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

刘少奇等省总负责人在执行中共中央命令时多了一个心眼。他们将纠察队中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而所谓解除纠察队武装，实际上只将一些破旧枪支和童子团的木棍集中

起来上交，以应付差事。

几天来一系列的变故，使第四次劳大在仓促中草草结束。6月28日大会宣布闭幕，第二天又宣布续会一天，公布选举结果、补行闭幕式。苏兆征继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

7月2日，刘少奇抱病向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向忠发主持会议并报告了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原因和经过。会后刘少奇也奉命代表全国总工会去向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报告了解散纠察队的经过。这样，纠察队问题总算交待过去了。

面临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7月12日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7月的武汉，闷热得使人窝心烦躁。更令人不安的是，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越发肆无忌惮。各级工会已经很难开展活动，革命面临夭折。中共中央开始作应变准备，组织干部隐蔽起来。当时共产党员掌握的部队大多驻扎在江西，革命势力相对较强，因此不少中共中央负责干部开始往九江庐山一带转移。

刘少奇已将纠察队问题处理完毕，并安排前一

段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工会骨干分批派往贺龙、叶挺部队。他自己也准备撤离武汉。

然而，这时刘少奇、何葆贞的女儿爱琴，出世还只有4个月。严酷的斗争环境使他们不得不再次经受骨肉分离的痛苦。经反复商量，他们决定将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位工人家里。7月13日，刘少奇一人经党组织安排，乘坐贺龙将军的差船离开汉口，顺流而下到达九江。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为他在庐山牯岭街找了一处叫“晓梅别墅”的旧房子。刘少奇就在这里暂且住了下来。不多几天，何葆贞也来到了庐山。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分共”决定，宣布同共产党决裂。他不久就同蒋介石完全同流合污，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刘少奇在晓梅别墅住了几日，有一天听说汪精卫要来庐山牯岭，便避到海汇寺去住，后来又搬到了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他一面养病，一面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7月下旬，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军委书记聂荣臻，奉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示，专程来到刘少奇的住处，向他通报一个重要事情：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要他有所

准备，注意安全。刘少奇听了极为振奋。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枪声大作，武装起义成功！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又一次秘密开会。会上旗帜鲜明地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给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

刘少奇在庐山休息了一段时间，身体状况有所好转。10月的一天，他化装成水手悄悄下山，从庐山脚下星子县登上一艘客轮，驶向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第三章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署名“谭少连”的文件通过地下交通频频发出，顺直省委的整顿悄然进行

1927 年的中国政局，在经历了“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的浩劫之后，急转直下。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归于失败，30 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腥风血雨笼罩着整个南部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中共党员人数由 6 万减少到 1 万。党的组织大部分被毁坏，少数幸存的被迫全部转入地下，成为非法的秘密组织。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在由此开始的长达 10 年的内战时期，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

民党，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发动群众，积蓄力量，支援土地革命战争。

刘少奇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天津、唐山总工会的领导，同时以中央委员身份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5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会。

3月的一天，刘少奇来到北方大都市天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中共顺直省委都设在这里，当然是秘密的。

顺直，指的是北京市和后来的河北省。为什么叫顺直呢？因为历史上北京又名顺天府，北京所在的省叫直隶省，所以这时中共党的组织就叫了顺直省委。1928年6月6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北京、天津。6月20日，国民党政府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省会设在天津，北京市改为北平市。但这时中共组织的名称没有改，还叫顺直省委。中共顺直省委除了主要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地区党的组织外，还兼管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豫北、陕北等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

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中央为顺直省委的问题一直大伤脑筋。1927年5月为筹建中共顺直省委，在中共中央派的代表和天津当地的代表之间就产生纠纷。8月彭述之任省委书记后，矛盾加剧。以后中共中央两次派人去改组省委，换了两个省委书记，问题仍未解决。中共顺直省委因而在当地共产党员中威信极低，上下级经常互相埋怨，好几次一些同志将省委下发的文件不等看完就怒而撕得粉碎，有的地方甚至还非法成立了第二“省委”。

刘少奇到天津，心存疑虑的中共顺直省委同志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又要改组省委？中共中央给省委的经费为什么这么少？顺直省委还能维持下去吗？刘少奇耐心向大家解释说：“中央经济困难，我在中央知道。但我在上海时还不感觉到中央不要顺直省委，或有与省委为难的倾向。至于维持顺直的党，这不成问题，自然要竭力维持，我们还活着一天，即须维持一天。”^②对省委书记王藻文煽动干部诘难中共中央的错误行为，刘少奇作了严肃的批评。

1928年6月，中共中央再次采取果断措施：指派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为特派员，组成“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主持中共顺直省委并领导北

方地区党的工作。

于是，一份份署名“谭少连”的指示、通告，频频通过地下交通从天津秘密发出。这是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的代号。整顿顺直省委的工作开始了。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处于非法地位，中共六大移至莫斯科郊外召开。刘少奇没能出席会议。周恩来后来在谈到中共六大的缺点时说：“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3月底来电通知，4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困难的，但还是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③他还说：“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④

中共六大选出的新中央对顺直省委的问题很是重视，认为：“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得着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⑤

确实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中共中央如此重视，“谭少连”对顺直省委的整顿也是毫不含糊。一系列举措果断而又切实：1928年7月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9月陈潭秋、刘少奇先后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起草《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中央告顺直同志书》，随即由中央通过发出；10月果断处理“京东护党请愿团”事件；11月编辑出版党的刊物《出路》，以统一党内认识。

《出路》是不定期出版的油印小册子，外表看起来简陋，起的作用可不小。一个时期以来，顺直党内意见纷纷，对许多问题看法不一。《出路》发表了一批战斗力很强的文章，对统一顺直党内的思想非常管用。

刘少奇除了指导《出路》的编辑工作外，还亲自为它撰写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是几块钱的事吗？》、《职运须知》、《革命职业家》等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关于白区策略思想的最初一批著作。

这期间“谭少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备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当时在顺直省委工作的徐彬如回忆说：“我们看了一段时间的材料之后，分

四路到基层去调查：谭秋去平汉线保南、保北地区；少奇去京东唐山、玉田、丰润等县；韩连惠去津浦线沧州、大名府等地；我去平绥线北平、张家口等地。半个月以后，大家陆续回到天津，进行会议的具体准备。我们一面着手会议文件的起草，一面进行代表人选等组织准备……有关组织准备工作，由少奇同志负责，詹大权协助。”⑥

1928年12月底的几天，对中共顺直省委是极为重要的日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艰巨准备，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会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来到天津，亲临指导会议。

天津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有两排平房。房子是新盖的，但样子普普通通。12月底，来自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地的40多名代表，陆续秘密赶来这里，出席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首先由周恩来传达中共六大的精神，然后陈潭秋、刘少奇分别作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产生了新的省委。顺直党的工作方向算是拨正过来了。

历时长久的顺直省委问题总算基本解决。刘少奇也结束了在顺直的工作，于1929年春返回上海。

●奉天高等法院找不到刘少奇“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好把他放了

1929年7月14日晚，一辆黑黝黝的普通客车缓缓驶进奉天（即沈阳）火车站。两位衣着整齐的旅客，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匆匆走出车站，随后又雇车到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他们便是刘少奇和夫人何葆贞。

当时东北三省统称满洲，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法西斯统治下，白色恐怖严重。满洲的共产党组织尚处于初建时期，又连续遭到破坏，使得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处于危难之中。1929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在对东北作了3个月的巡视之后，郑重向中央提出：“满洲党需要有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⑦5月28日，中共中央又收到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请求中央“选择有领导能力的人才”来。中共中央很快在6月4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满洲工作，决定派刘少奇赴奉天，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新的满洲省委组成人员：赵子琪（书记）、孟坚（组织）、

李易山（宣传）三人为常委，任国桢、刘子奇为候补常委。

赵子琪，是刘少奇为适应满洲白区斗争需要新起的化名，有时又叫之后。孟坚即孟用潜，李易山即丁君羊。

三天之后，一位自称是海军司令部某副官的人出现在奉天西北工业区皇字 78 号寓所。这是刘少奇用于对外掩护的身份。

奉天的街头，到处是衣衫褴褛的市民。成群的人露宿马路，行乞要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捕人的警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军阀的官兵在人群中横行霸道。环境严酷，刘少奇深感责任重大。

刘少奇和中共满洲省委一接上头，马上开始了解各方面情况。经过一番调查摸底，他心中有数。8月20日，他主持省委会议，制订了近期工作计划，对省委常委作了分工。

图 4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面上的工作布置完毕，刘少奇准备抓一抓满洲

首府奉天的工人斗争。分管奉天市工作的是省委常委孟坚。这天，他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他和厂党支部已经联络多次，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

不用说，对于罢工，刘少奇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听完汇报，一连向孟坚问了好几个问题：厂里当局情况怎么样？工人情绪如何？罢工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发动罢工的方法、步骤怎样安排？

孟坚没有考虑这么细。对这些问题，有的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当然也就答不上来了。

刘少奇在屋里来回踱着步，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最后，他问孟坚：“你过去搞过罢工没有？”

“没有。”孟坚答。

刘少奇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说：“那么好吧，下一次纱厂支部开会，我同你一道去参加。”

孟坚高兴得连连点头，说：“那太好了。”

奉天纱厂坐落在偏僻的郊区。厂周围是一片坟地和小树林，显得有点荒凉。8月22日下午五六点钟，一位头戴礼帽、身穿绸长衫的教书先生来到奉天纱厂门外约200米远的树林子里，这是孟坚。过了一会儿，一身工人打扮的刘少奇也来了。他们是按事先约定，在这里等候同纱厂党支部的同志碰头。这时离工厂下班约莫还有一刻钟光景。

过了一会，呜——呜——，奉天纱厂响起了下班

的汽笛声。孟坚焦急地向厂门口张望，但见厂门紧闭，没有一个工人出来。

刘少奇立即警觉起来，问孟坚：“平时也这样吗？”

“不是这样。”孟坚也感到十分奇怪。

大约又过了一刻钟，还是不见厂内动静。刘少奇迅速站起来，说：“可能出了什么事，我们不能等了。”他一面转身快步顺着小路往下走，一面吩咐孟坚：“分开走！”孟坚连忙向另一条大路跑去。⑧

正在这时，厂门突然大开，从厂里跑步冲出来几个厂警。他们见不远处有两个人，便喊叫着追过来，不由分说就把刘少奇和孟坚扣了起来。

原来，工人们酝酿罢工的消息被纱厂当局探听到了，厂方提前下了手。奉天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首先被拘留，供出了外面有人要来接头开会的情节。

面对这突变的情况，刘少奇决定利用刚到奉天别人还不认识他的有利条件，编造口供蒙蔽警方，想办法早点脱身。

厂警把刘少奇和孟坚押进奉天纱厂。一个管理员模样的人主持审讯，问刘少奇：“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刘少奇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成秉真是他一个表哥的名字。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武汉来。”

“来干什么？”

“因为在武汉没得工作，生活不下去了，听说奉天日子好过，想投奔这里来找个工作，混碗饭吃。”

站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厂警突然大声嚷道：“什么武汉？你是上海来的，上海纱厂工人才闹得凶哩！”“你们南蛮子是有来头的，知道你要来捣蛋！”他们想恐吓讹诈刘少奇。

刘少奇不为所动，从容辩白说：“我确是从武汉来，不是从上海来。刚下火车，人生地不熟，摸到这里来。天气太热，想进来找口水，不知为什么就被抓来了。你们平白无故抓人，太不讲理了。”他嘴里这样解释，心里却很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声威感到高兴。他由此观察到，奉天纱厂当局很怕上海来的人，对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简直谈虎色变。事后他还对满洲省委的同志特意谈起这一情形。⑨

主持审讯的管理员又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做工的工人。”刘少奇平静地答。

厂警中的一个头儿瞪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刘少奇，突然吼道：“把手伸出来！”

那头儿看了看刘少奇的手，嘿嘿笑了两声说：“工人？您骗不了老子！看你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到这儿来冒充工人？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刘少奇冷笑一声，说：“我是个排字工人。若是你们这儿有排版的活儿，我可以干得蛮好哩！”

他们挑不出毛病，互相嘀咕了几句，又突然喝道：“你为什么要来煽动工潮？”

“什么工潮？我根本不知道。”

厂警冒火了，拉起刘少奇的手，打了一阵板子，又拉过常宝玉来对质。常宝玉只认识孟坚，确实从未见过刘少奇，当然答不出来。⑩

奉天纱厂警察见问不出什么名堂，第二天便把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解送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隔了一天，他们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

这个地方又脏又杂，管理混乱。里面关押的犯人很多，大多是反动当局胡乱抓来又来不及审讯判决，暂时寄押在这里。

一天，在监狱放风的时候，刘少奇凑到孟坚身边，悄悄说：“既然把我们解到地方法院，看来案情并不严重，敌人没有抓住我们什么把柄。关键问题是那个工人。你要向那个工人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了做好事，如今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但他们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如果他能翻供，否认有人组织工潮，我们的案子就会比较容易解决。”他还教给孟坚如何向常宝玉做说服工作的方法。⑪

于是，经过一番私下串连，他们统一了口供的说法。

一个星期后，法院开庭审讯了。主审法官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学生，穿着法官大礼服，派头十足地坐在审判桌前。他审问过孟坚之后，接着审问刘少奇：“你叫成秉真吗？”

“是的，我叫成秉真。”^⑫

法官问了几个问题，刘少奇的回答同前两次一点不差。

接着，法官把常宝玉叫上来。常宝玉推翻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动刑逼的。

不到一小时，法庭调查结束。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人前后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他决定了结此案。

过了几天，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的判决书下来了。对刘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关系，判罚40天拘役。

就这样，刘少奇和孟坚很快被释放了。刘少奇出狱后，特意交待孟坚派人去看望常宝玉并送他一点东西。

在刘少奇、孟坚被捕期间，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向

中共中央报告，一面组织营救。9月1日，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回电满洲省委指示“用全力去营救”。9月中旬，正当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各处活动并且初见成效的时候，刘少奇、孟坚先后获释了。省委同志喜出望外，当天即派秘书处干事张干民将刘少奇接了回来。

刘少奇回到省委，马上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出狱经过。9月21日，中共中央回电指示：“现时省委既已恢复，临委取消。”临委就是在刘少奇、孟坚被捕期间组成的临时省委。中共中央还向满洲省委提出了“抓住中东路问题为中心”的新任务。10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人员变动情况，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分工作了新的调整：刘少奇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易山任组织部长兼管奉天工作，唐宏经管职工运动，三人组成省委常委；孟坚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委候补常委，任国桢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省委候补常委。

● “拥护红毛子，反对白毛子”的口号在中东铁路工人中传播开来

1929年9月下旬，刘少奇收到中共中央给满洲

省委的指示：满洲党当前的工作路线是抓住中东路问题为中心，去进行各项的基本工作；应把中东路问题看作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附属于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

显然，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如此重视的中东路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东路的全称叫“中国东省铁路”。它包括满洲里——哈尔滨——长春和哈尔滨——绥芬河两段铁路，是1897——1903年间沙俄帝国利用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东北修筑和经营的。1924年，苏联政府清除了十月革命后盘踞中东路的沙俄残余势力，5月31日中苏两国签订协定，废除原不平等条约，中东路暂由中苏两国共管。1929年7月10日，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策动东北当局武力夺占中东路，屯兵中苏边境挑衅。8月，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东北军惨败。是为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问题的实质是国民党政府实行亲帝反苏政策。这一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发动群众同东北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成为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任务了。

刘少奇一到东北就十分重视中东路问题。1929年七八月间，他首先派李梅五去哈尔滨任市委常委，专门负责中东路的群众工作，随后又派省委候补常委任国桢去哈尔滨充实市委领导力量。9月中旬刘少奇、孟坚出狱后，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要孟坚先行一步去哈尔滨，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他自己在对省委工作做了安排布置之后，也于9月26日亲赴哈尔滨。

这时中东路已为东北当局接管。这一变动的结果，使中国工人的待遇大幅度下降，苏联职工被统统赶走，大批声名狼藉的白俄分子混了进来。全路上下矛盾重重，恐怖阵阵。

遗憾的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内部意见不一，指导上很不得力。郭隆真等共产党员的正确主张得不到支持。

刘少奇经过调查了解，积极支持郭隆真的意见。郭隆真在五四运动中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领导学生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春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经满洲省委分配到哈尔滨搞工运。她的公开身份是机器分厂旋盘工人李梅五的“妻子”。她开展工作的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俗称三十六棚，是当地产

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郭隆真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在目前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不宜马上组织游行示威，应该以怠工的形式进行反抗斗争，在适当时机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口号。

刘少奇看到，在中东路斗争中工作最积极、政治上最正确的是郭隆真。他在研究工作的会上表态支持郭隆真，说：怠工斗争不但不应停止，而且应该扩大，反对只顾个人利益而拼命工作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要提出工人们的切身要求。他还提议在斗争中提出“反对白毛子，联络苏联工人”这样鲜明易懂的口号。^⑬白毛子，指混进中东路的白俄分子。后来在实际活动中，这个口号被工人们通俗地叫作“拥护红毛子，反对白毛子”，在整个中东路传播开来。它作为一个行动口号，把工人们要求清退白俄分子、让中国工人复工的经济斗争，同拥护社会主义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了。

在刘少奇指导下，中共哈尔滨市委开会，经过激烈辩论，改变了原来反对怠工的做法，基本统一了认识。中东路工人斗争终于有了转机。11月初，以三十六棚为主的700多名铁路工人包围铁路管理处，要求改善待遇。斗争逐渐形成高潮。

10月下旬，刘少奇在对中东路工人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后，离开哈尔滨回奉天。年底接中共中央通知

回上海汇报工作。

时隔不久，中东路又出现新情况。1929 年底，中苏两国签订《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共管，确定 7 月 10 日后被裁的苏联员工复职，新补的华工和白俄工人解雇。但东北当局在执行中偏袒白俄，大量裁减中国员工，还宣传“红毛子抢了中国工人的饭碗”，煽动反苏。一时间各种议论蜂起，失业工人愤愤不平。反动的工业维持会乘机策动反苏罢工。中共哈尔滨市委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束手无策，贻误了时机。

情势紧急。刘少奇从上海刚回奉天，顾不上休息，立即于 1930 年 1 月 11 日再次赶赴哈尔滨。

首要的问题仍是帮助中共哈尔滨市委统一认识。刘少奇当即同孟坚等研究对策。他分析说：前一段中东路罢工形势出现时市委不敢上前领导，不敢正面揭露反苏的中国官厅在裁人问题上耍弄的阴谋诡计，这是犯了严重的尾巴主义错误。这不仅使大批失业工人得不到解决，而且给工贼、白俄和反动职员造成了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抢先组织了带有反苏性质的罢工。尽管如此，组织总罢工的时机还没有完全错过，补救的办法一方面是在报纸上发表揭露事实真相的报道，以抵销反苏罢工的影响，一方面领导失业工人开展复工运动，并且使失业工人的斗争得到在业工人甚至其他各行业工人的支持，在此基础

上组织全路工人总罢工。刘少奇指出：“实现这个目标，固然不容易，但经过努力是能够办到的。”他还具体指示郭隆真、李梅五，要他们串连失业工人拒绝进厂结帐，集合起来要求复工。

第二天，三十六棚全厂¹⁰⁰多名失业工人都拒不结帐，在李梅五带领下到路局请愿，要求裁掉白毛子，用华工递补。

铁路督办莫德惠被迫出来接见工人，假惺惺说：“白毛子也是中国人，裁了很可怜。”

工人代表立即反驳：“为什么不可怜失业的中国工人？”

莫德惠敷衍说：“尽量设法使你们不失业，造个名册来！”^⑭工人们利用这句话，立即筹备成立“东铁工人失业团”。

刘少奇捕捉住这一契机，要求中共哈尔滨市委把领导失业工人复工作为“目前发动北满群众斗争的中心”，说：复工运动的目的，不只是限于争得失业工人的复工，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和组织全路以至其他各行业的工人斗争。他指导市委立即作出部署：除李梅五已担任失业团总代表外，另派孙秀峰担任失业团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派唐宏经去指导在业工人的斗争，派郭隆真等组织失业团的讲演队、体育队。失业团名正言顺地推选

出代表、委员，组成代表会、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1月19日，在郭隆真的领导下，又成立“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与此同时，失业团、后援会在报上刊登启事，号召失业工友速来报名，呼吁各界援助失业工人。

失业团越来越兴旺，迅速沿中东铁路向外扩散。全东北为之震动，连奉天兵工厂也成立了后援会。中东路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中东路工人斗争取得新的胜利。

在失业团大闹复工运动的同时，在业工人作为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另一条战线，掀起了反对工业维持会的高潮。

工业维持会名义上是三十六棚的工人组织，实际是受当局控制的工具。刘少奇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在场斗争中打倒工业维持会，“树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⑮

郭隆真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利用春节拜年，联络三十六棚工人，3天即有800多工人报名参加工会组织。紧接着，在9个分厂推选出了15名工厂委员，正式成立了三十六棚总工厂委员会。郭隆真起草的声明宣告：“总工厂全体中国工人一致决议，否认工业维持会代表的资格，并经全体工人一致选举委员15人组成总工厂委员会，办理厂内一切日常有关工人

事宜。”^{①⑥}

但是，正当工厂委员会日益红火，迅速向全中东路扩展之时，李梅五、孙秀峰等党内反对派竟背着中共哈尔滨市委，擅自拉一部分工人跑到南岗，去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刚刚诞生的工厂委员会面临夭折危险。

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斗争局面功败垂成！在这紧要关头，刘少奇决定亲自出面。

本来刘少奇在哈尔滨一直是采取幕后指挥的领导方式。因为他是南方人，口音同东北差异很大，中共中央出于安全考虑，早就来信嘱咐“少奇同志本人不要在群众中露面”^{①⑦}，加上有奉天被捕的前车之鉴，所以他轻易不出面。但眼下到了挽救胜利成果的关键时刻，哪里还能顾个人安危呢？

刘少奇当机立断，决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亲自出面召集工厂委员会开会。

工厂委员会成员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得知全国总工会代表召集他们开会，极为兴奋。1930年2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和工厂委员会的同志们坐在一起亲切交谈。户外是冰天雪地的世界，室内却气氛热烈，如沐春风。

会议总共开了4个多小时。刘少奇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作了长达3小时的讲话。他深入浅出地分析

了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形势，指出今后的任务。他提出，今后中东路工人可采取五种形式组织起来：一，成立“护工团”，其性质有如纠察队，担负保护工会等任务；二，组织工人互济会；三，成立小报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四，开办几所工人补习学校；五，召集工人代表会，先成立哈尔滨市总工会，接着成立中东路华工总会，再扩大到各厂各业。

刘少奇的讲话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疑云。工人们群情振奋，在郭隆真等的带领下照刘少奇的话去做，成效显著。⁴月初，工业维持会在工人的斗争下垮台。在这段时间，中共满洲省委利用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影响，推动其他地方的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前后 8 个多月，其间身体一直不好。他本来就抱病赴任，东北严寒的冬季，又使他原有的肺病不时复发，以至有“一月多不能睡好，只能晚上工作，许多事都是想到了做不到”^⑮。

1930 年 3 月 13 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说：“现在满洲一切群众革命斗争，还是正在发展，形势还是非常之好的，党所领导的反帝运动正在很快开展，并已影响到许多城市。兵士的革命化，农民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爆

发，各种工人斗争，党还能上前领导。今后只要党的路线正确，肃清一切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坚固的团结起来，有了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作武器，是能领导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高潮的。”

为了保卫和巩固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成果，在中共中央来信的支持下，刘少奇于3月20日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通过了《满洲省委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决议——反对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取消派》，开除了李梅五的党籍。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接连来信，调刘少奇回上海工作。3月下旬，刘少奇离开满洲返回上海。

●中共临时中央找刘少奇谈话，给他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1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上海中共中央的一处秘密住所里，两个人正在进行着一场严肃的谈话，气氛颇为紧张。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一个是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

卢福坦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他是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正式找刘少奇谈话。接着，他向刘少奇提

出了一连串的批评指责，说：根据你从赤色职工国际回来后所发表的许多意见，表明你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央将在党的会议上宣布你在职工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要接受中央的这个批评。

刘少奇当即提出异议，对卢福坦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个批评表示不理解。10月10日他又给中共中央写信争辩道：我回来后的确是提出了许多工作上的政治上的意见，是完全站在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观点上提出来的。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被采纳，都在党的组织。但中央对我的这些意见并没有个别的具体的指出错误，错误在什么地方，要如何才不会错误，就对我下了一个总的批评，要我接受，这就使我不能明了我的错误之所在。

这场批评谈话缘何而起？事情是这样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刘少奇缺席的情况下，补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但刘少奇一进入工作，很快发现工会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而这又是中共中央指导所致。他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实际斗争的经验，深知“左”的东西为害极大，于是提出不同意见。10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工运的意见》，陈述了他对工人斗争形势和策略的看法。

但这时的中共中央已非往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由于王明本人将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1年9月下旬组成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常委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全党。临时中央不承认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的现实，提出了一套“左”倾冒险方针，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强调城市工人斗争“已经带有很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要求在白区普遍地武装工农和“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这时他们看到刘少奇关于工运的意见书，当然十分恼火。于是派卢福坦两次找刘少奇谈话，给他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刘少奇的意见确实是同中共临时中央的路线格格不入的。他不同意当前工人斗争“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这种看法，而认为“最近有许多工人斗争是在积极要求改良生活的口号下面进行的（如上海装订、印刷，天津、唐山等），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要求是由黄色工会提出来，但也只有在群众的逼迫之下黄色工会才提出来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承认这一方面（进攻），而否认另一方面（防卫），实际情形完全不是一致的”。①¹⁹

刘少奇对中共临时中央的批评不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10月10日，他再次给临时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再派一个人来和他谈话。但临时中央不予理睬，于11月1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坚持认定目前工人斗争“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要求开展同盟罢工，使“罢工政治化”。后来的发展表明，这是朝“左”倾冒险的路上又迈了一步。

刘少奇知道再争辩已经没有用处，他只有组织服从，保留意见。

回想起来，刘少奇自从被中共临时中央紧急召回以来，已经不止一次被批评为“右倾”了。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从满洲回上海的时候，正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恶性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总书记向忠发能力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作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李立三等人幻想发动全国总暴动、中心城市总罢工，说什么“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刘少奇不同意这种冒险计划。他劝李立三说：“现在不能罢工，因为条件还不成熟，罢工会失败。”李立三却根本听不进，反驳说：“你怎么知道罢工一定会失败呢？斗争嘛，要趁热打铁。”^{②①}

1930年6月，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

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8月开会，刘少奇在会上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没有想到，他在那里又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在莫斯科协助刘少奇工作的杨尚昆讲到这段情形说：

联共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

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②①}

1931 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职工国际的帽子确实吓人：“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②②}于是，便有了本节开头卢福坦找刘少奇谈话的一幕。

刘少奇顶住压力，坚持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正确的斗争策略，决不盲目蛮干。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3 月，他以仲篪等为笔名，写文章阐述在白区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这些发表在《工运指南》、《红旗周报》上的文章有：《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反对国民党管理海员新章》、《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国民党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1931 年职工运动的总结》。

刘少奇的这些文章再次拉开了同中共临时中央的距离，进而惹火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1932 年

3月，王明在他的“左”倾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再版书后”中，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批判。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即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当天，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之后，刘少奇就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降职到上海市工联会担任党团书记去了。

刘少奇被降职处分后，中共临时中央掌握的刊物上还接连发表文章，公开、半公开地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在前一阵子写下的那些文章，也就成了挨批的靶子。

那么，这些文章都讲了些什么呢？当时担任全总宣传部长的杨尚昆，对刘少奇文章中提出的策略思想作了这样的概括：

少奇同志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既反对取消主义者在困难面前投降，又坚决

抵制“左”倾盲动主义的种种错误。为实现这个方针，少奇同志主张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严格分开，又要巧妙地联系起来。他反对那种鄙弃一切合法手段，甚至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的做法，因为这会导致两项工作都遭破坏。王明上台后，他们号召在黄色工会里公开组织赤色反对派，少奇同志对我讲，这是自己把“红帽子”戴上孤立自己的愚蠢做法。^{②3}

然而，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当时却遭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拒绝和打击。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上述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得到了充分肯定。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和后来主持华北白区工作时提出的关于工人运动、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刘少奇匆匆告别妻子潜往中央根据地，没想到竟成永诀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处于高度秘密状态，开展活动越来越困难了。1931年上半年，负责中央特科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更使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到1932年后，中共中央已经很难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决定一些负责同志陆续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根据地，中央机关也随后迁往。

这样，由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的地下秘密交通线，便空前地繁忙起来。

1932年一个严寒的冬日，刘少奇告别了妻子何葆贞和正在牙牙学语的儿子毛毛，化名唐开元，只身离开上海，潜往去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

谁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何葆贞的这次分离，竟是他们的永诀！

刘少奇、何葆贞是一对恩爱夫妻。自从1923年他们在安源结婚以来，何葆贞跟随丈夫走南闯北，辗转于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在

革命队伍里从事党务、工会、妇女方面的工作，协助刘少奇做了大量事情。这次刘少奇去江西苏区，何葆贞像以往多次分离时一样，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离别，平静地送走了丈夫。她根据党的决定，在全国互济总会担任领导职务，留在上海坚持工作。

全国互济会成立于1925年10月，是中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主要从事对被捕、遇难同志及其家属的救援工作。何葆贞在互济会中兼任营救部长，化名王芬芳，对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上海地下党组织指示互济会尽力营救。何葆贞与张琼夫妇到处奔走，请何香凝出面保释。不料，她们的活动被国民党便衣特务盯上了。3月底的一天，特务包围了何葆贞的住处。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她当即把3岁的儿子毛毛往邻居大嫂怀里一放，说：“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有人来领他。”说罢迅速转身回屋，以最快的动作销毁了文件资料。宪兵队特务冲进来，凶狠地将她抓了出去。

何葆贞被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帅孟奇、夏之栩、耿建华等女共产党员关在一起。她们在狱中团结难友，多次组织绝食，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徒告密，何葆贞的身份终于暴露。敌人决定判她死刑。令何葆贞抱憾终身的是，她再也没能见到自

已日夜思念的亲人，她甚至不知道亲爱的丈夫和 3 个幼小的子女现在哪里？1934 年深秋，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献出了年仅 32 岁的璀璨生命。而这时，她的丈夫刘少奇正在充满险境的长征路上辛苦跋涉，3 个子女正靠别人的接济艰难度日。一家人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她的丈夫、孩子同样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

由于斗争环境的严酷，刘少奇这回已经是第三次抛下幼小的子女出走。1925 年春他离开安源时，把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允斌捎回宁乡老家抚养。允斌在穷苦的农村度过了饥寒交迫的童年。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撤离武汉，又把不满周岁的女儿爱琴

托给汉口一位工人。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原先由党组织提供的补助逐渐中断，使爱琴在七八岁时被卖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小小年纪就过着挨打受骂的奴婢生活，饱尝人间苦难。直到 1938 年 4 月，才由党组织派人找到。1932 年冬

图 5 何葆贞。（1924 年）

刘少奇离开上海时，二儿子毛毛（后名刘允若）只1岁多。何葆贞被捕后，毛毛被送给一个贫苦农民家作养子，十二三岁时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1946年被地下党组织在苏北农村发现。这3个孩子都是从小离开父母，沦落他乡，吃尽了千辛万苦。允斌、爱琴1938年才被接到父亲身边，允若则又过了8年才找到。刘少奇在儿女们回到身边后对他们说：“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②5}

1932年的冬季，天寒地冻，凉气袭人。

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苏区走的是一条水陆相间、迂回曲折的秘密路线。这条交通线是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根据地的主要路线，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由中共中央交通局直接掌握。1931、1932年间，许多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先后经过这条路线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刘少奇离开上海，先乘船到广东汕头，同地下交通员接上头，然后由交通员带领，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换乘小轮船到大埔县。大埔有中共地下党交通站。刘少奇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又叫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两省交界地带，是以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军开辟的赣南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中共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在刘少奇到达后不久，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也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样，中共中央正式迁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与此相适应，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也迁来中央苏区，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苏区和全国的工运工作，刘少奇任委员长。

然而，中共临时中央的到来，并没有给中央根据地带来好运。他们一到，便在苏区全面地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3年2月和3月，临时中央连续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实际矛头是指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1933年10月，瑞金又来了一个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国名字叫李德。此人得到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特别信赖。这样，“左”倾路线如虎添翼，在中央苏区更加猖獗起来。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而这时，刘少奇头上也仍戴着从上海带过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瑞金城里有有一个地方叫双清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就设在这里。刘少奇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勤恳工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工人组织起来，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以应付国民党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他的主持下，全总在苏区的领导机关健全了，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成立了，中国农业工人代表大会、苏区国家企业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宣誓诞生了。这期间，刘少奇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1934年7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但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这时仍操在一些不懂中国国情、却为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面临险境，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被迫撤离，踏上艰难的长征之路。

刘少奇自始至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长征中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于1935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

张。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刘少奇摆脱了中共临时中央加给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紧密配合毛泽东，理直气壮，如鱼得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陕西省北部的安定县有一个小镇，叫瓦窑堡。这里老百姓居住的窑洞和别的地方不同，多数是砖瓦或石头砌的，所以称瓦窑堡。1935年12月17日，在张闻天、刘英的新婚石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正围着一张旧方桌开会。他们当中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会议前前后后一共开了8天，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瓦窑堡会议一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立刻忙碌起来，全力贯彻会议精神。一项重要的开拓性工作交给了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

奇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华北，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第四章

开创华北新局面

●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作为党中央代表赴华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1936年初，天津。

虽说已经过了春节，但在北方，冬季的景色仍未褪去，天气依然很冷。

在天津日租界的兴安路，有一家阔气的饭店，叫北洋饭店。这天上午，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来到饭店。他手上随意地拿着一卷报纸，不慌不忙地上得楼去，在一个高级包间的房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开门迎客的是一位身穿绸袍的富商和他的妻子。

“你是×××先生吗？”来客问。

“是×××。”富商一面回答，一面瞟了一眼来客手上的报纸。从露出来的报头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益世报》。

“我是李先生介绍来的。”来客自我通报。

富商点点头，把客人让进房间。来客又把带来的《益世报》放在桌子上。

这时，两个人都会意地笑了笑。他们立即关上房门，小声交谈起来。

这位富商，就是刚到天津的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此时化名胡服。来的那位客人，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林。他们按事先通知的暗语暗号，接上了关系。①刘少奇随即要王林汇报华北地区的形势和河北省的工作情况。

刘少奇是1936年春节前从陕北瓦窑堡出发来天津的。为了落实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12月29日专门开会，讨论转变白区工作问题，具体研究中共北方局的组织和工作方针。当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的张闻天向会议报告：“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紧北方的领导，需派得力同志前往，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少奇可以去，已得少奇同意。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那边的工作，主要是加强对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北平外，还要加强热河、察哈尔、山西等地党的领导。”②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去领导北方局的工作，推行瓦

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这是中共中央为扭转白区工作被动局面，促使白区工作策略转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尤其是在北平、天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工作，此时已经成为牵动全局的关键。日本帝国主义自 1931 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不停步地向关内进攻，1935 年策动华北事变，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魔爪伸向整个华北。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却步步退让，指派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成立适应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 年 12 月 9 日，忍无可忍的北平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却遭到反动当局军警的严厉镇压。一二九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北平、天津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然而，这时的中共北方局，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却远远不能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经过多年严重的白色恐怖，北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绝大多数被破坏，这时只剩下一个河北省委和少量基层组织。中共北方局同河北省委已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更为严重的是，保存下来的中共北方局即河北省委，从 1935 年 5 月起就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既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又得不到活

动经费。他们像没娘的孩子，在反动白色恐怖下苦苦挣扎。当时正在长征路上的中共中央，也无法获悉他们的情况。什么遵义会议，什么清算“左”倾冒险主义，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一概不清楚。因此，在华北地区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中，还在盛行“左”的一套，多年“左”倾路线的统治，还几乎原封不动地在这里保留着。这种状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乃至全国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

刘少奇郑重地接受了派往华北的重任。出发前，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哪！”刘少奇回答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的局面。”③

从瓦窑堡到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路途遥远，敌情严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对护送刘少奇作了周密安排，选择了从瓦窑堡经耀县到临潼，再从临潼乘火车去天津的路线。考虑到北方地下党经费困难，还让刘少奇随身带了一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首饰。

和刘少奇同行的，有负责安排护送的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特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和中共渭北工委统战委员谈国帆，还有刘少奇的新婚妻子谢飞。谢飞原在江西苏维埃政府国家保卫局、工农检察部

工作，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同刘少奇结婚。

一行人马在几个游击队员的护送下，避开大路，沿着坑坑洼洼的山间小路疾行。一路上晓行夜宿，住住停停，经过大约一个来月的长途跋涉，刘少奇、谢飞终于到达天津，在北洋饭店住了下来。

天津是长期的白区环境，共产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开展工作都是秘密进行。接到通知第一个来同刘少奇秘密接头的，便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林。刘少奇抓紧时间，一见面就要王林谈情况。王林这样回顾他向刘少奇汇报工作的情景：

第一次谈话，他就急于了解华北形势和河北省委的工作情况，我向他一一作了汇报。他问得很细，很具体，提出了不少当时我还难以完全说得清楚的问题。虽然是头一次见面，在他的简短的谈话中，对我们的工作还是作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在我向他介绍了河北省委主要干部的情况后，他非常高兴地说道：“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强有力的骨干，这可是党的宝贵财富呀！”④

王林一面汇报，一面望着眼前这位身穿绸面皮袍、头戴礼帽的“茶叶巨商”，心里不免纳闷：这位新来的中共中央代表究竟何许人也？可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许王林随便打听，只好把问号装在肚子里。

刘少奇似乎看出了这一点。在第二次谈话结束后，他用手在桌子上划了“刘少奇”三个字。王林看后一阵惊喜：原来面前的这位就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刘少奇！他说：

这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心想，这一下遭到敌人连续破坏后的北方党有希望了，内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听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些策略原则，使我顿开茅塞，深感少奇同志的到来，给我们战斗在敌人血腥统治区的同志们，带来了党的温暖，增添了力量，心里有了明灯，工作有了方向。⑤

在王林之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省委中负责组织的柯庆施、负责宣传的李大章，也先后来同刘少奇谈了话。

住大饭店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不仅房费贵，且人

员嘈杂，很不安全。所以刘少奇在北洋饭店只住了两三天，便搬到了另一家旅馆，一面要当地的同志帮助寻找住房。

十来天后，倒是刘少奇自己在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物色到一处比较合适的房子。这是一个小裁缝店的楼上。房间不大，大约十七八平米，但地点比较理想。它处在天津日、法租界的交界处，临近海河广场吊桥，既隐蔽又交通方便。楼下就是房东开的“惠兴德成衣铺”，房东姓王，人很老实，从不过问刘少奇的来历和活动。这样，刘少奇便以正在养病的南开大学周教授的名义住了下来。

在白区开展工作，必须严格按秘密活动的一套章法行事。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尤其是高级干部绝不能公开露面，只能通过秘密电台和地下交通员单线联系，否则一旦暴露，就有杀头坐牢和组织破坏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刘少奇在公开场合从不出面，只在家中指挥，真可谓“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

“惠兴德成衣铺”的王师傅做梦也不会想到，开春以后天津、北平和整个华北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变得有章有法，步步得胜，抗日局面为之一新，原来同他的这位少言寡语的房客“周教授”大有干系。

●K·V·的一封信引起震动。“打倒宋哲元”改成“拥护宋委员长抗日”

在那个裁缝店的小楼上，刘少奇处理的头一件要事，便是北平学生抬棺游行事件。

1936年3月31日，一支雄壮的游行队伍从北京大学三院出发，呼喊口号向长安街进发。引人注目的是，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一群青年学生抬着一具白木棺材和一些花圈，气氛悲壮。这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同学们，为追悼郭清烈士而举行的抬棺游行。

郭清，是北平高级中学的学生，年方18，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当局警察逮捕，受到酷刑虐待，于3月9日惨死狱中。哀讯传出，学生们满腔怒火，强烈要求向反动当局算帐。3月31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征得中共北平市委同意，组织了1000多名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追悼郭清大会。会后，学生们抬着棺材，喊着“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等口号，上街游行。

游行队伍行进到南池子，早已等在那里的大批军警一拥而上，挥舞棍棒向学生们袭来，当场打伤

100 多人，捉走 40 多人。许多原本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团体负责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被捕。其中有北平市学联负责人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大学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随后，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等也被校方开除，北大学生会被迫停止活动。其他革命团体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进步力量遭到一次沉重打击。

对这次事件，刘少奇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当他从 1936 年 4 月 1 日的天津《大公报》上读到《北平学生抬棺游行，警队弹压略有冲突，北大开除参加学生 4 人》的报道时，深感“左”倾冒险倾向在华北的影响之深。刘少奇立即作出反应，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在华北党内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教育。

刘少奇决定采取党内通信的方式，帮助北平的同志和其他同志好好地分析总结一下这件事。4 月 5 日，他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让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火线》尽快发表。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署了一个使人无法猜到的名字：K·V·。4 月 10 日，《火线》第 55 期出版了，华北中共党内的同志们读到了这封信。

刘少奇在信中说：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在这时鼓动少

数先进分子向敌人作冒险的进攻，会招致敌人更残酷与更野蛮的进攻，使自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地位。“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的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息爱国运动。最后只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里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

信中提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当时那样头脑发热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这样就会争取群众和社会的同情，而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镇压。刘少奇说：“左”倾错误在党内有长久的历史，因此这件事不是你们负责的，但必须懂得，“现在中央已在反对这种错误，而认为‘左’倾关门主义是党的重要危险”。

这封信，着实给华北地区尤其是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带来不小的震动。多年来，他们在党的刊物上看惯了鼓吹斗争、暴动的文章，这封信一扫过去那种充满火药味的论调，娓娓道来，使人心悦诚服。共

产党员们不禁猜想：这个从未听说过的 K·V· 是什么人？有的还跑去问秘书长王林。秘密工作的纪律当然不允许王林讲出来，他只告诉他们：“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在北平学生群众中做了很多善后工作：安排学生复课，重建组织，尽量挽回损失。中共北平市委随即作了组织调整，原北方局驻冀东省委代表李葆华调任北平市委书记。

新的中共北平市委迅速改变政策，打开大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6 年 4 月 18 日，北平市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检讨过去的错误，提出要“把一切的同学们都组织起来”。一时间，各种抗日文艺组织、学术团体在北平校园里雨后春笋般兴起，团结了一大批师生。

抗日形势在一步步好转。到 1936 年夏，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的时候，群众中的反抗怒火越来越强烈了。

天津英租界广东路福荫里 1 号，是一所普通僻静的房子。租住在这里的是林枫、郭明秋夫妇。林枫原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刘少奇来天津后，北方局调他给刘少奇当秘书，市委书记由李铁夫接任。1936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福荫里 1 号进来一个瘦高个子

客人。林枫一见，连忙吩咐妻子到外面看着去。

郭明秋见过这个人，光知道他叫老戴，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老戴就要到这里来一次。每次他一来，林枫就要郭明秋出去放哨、买烟，留神外面的动静，他们俩留在屋子里密谈。但郭明秋一直不知道老戴就是刘少奇。几年以后她和林枫离开天津到了山西，林枫才把真相告诉她。

这天，刘少奇和林枫关在屋子里进行长时间谈话。刘少奇谈了自己考虑成熟的意见：根据天津当前的形势，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需要组织天津学生和爱国群众，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刘少奇估计说：这一行动将会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情绪增长的气氛下，也很可能同情学生运动而采取中立态度，运动有胜利的把握。他要林枫代表中共北方局召集天津市委负责人开会，传达他的意见，布置有关工作。

几天后，中共天津市委在西郊玲琅阁附近的一座地主陵园里秘密开会，听取了林枫的传达，研究了实施办法。会议内容层层布置了下去。

1936年5月28日，大游行顺利发动。这天，天津学生、工人、市民1万余人，举着标语、横幅，分两路游行示威，然后汇合到预定地点开群众大会。整个游行队伍气氛热烈，群情激愤。“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华北特殊化！”口号声响彻海河两岸。游行队伍经过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前，气愤的群众要冲进日租界，纠察队按照预先确定的注意事项，阻止了这种冒险行动。

天津抗日救国大游行很快传向全国，激起巨大反响。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学生纷纷响应，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北平学生首先行动起来。5月30日，北平几十所学校举行罢课，通电全国响应天津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6月13日，北平各校学生1万多人在钟鼓楼集会，然后游行至新华门。示威队伍呼喊的口号有：“抗议日本增兵华北”、“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委员长抗日”，表明北平的抗日运动逐渐走向成熟。

刘少奇的辛劳没有白费。北平、天津的两次大游行，从指导到组织都很成功，从而成为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掀起的抗日救国高潮。它标志着在北方中共组织中长期存在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开始得到纠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逐渐变为群众的行动。

初冬的北平，树叶已经掉光，放眼望去，灰蒙蒙一片。

一辆高级小轿车在西单大街上穿行，一拐弯进

了西单北槐里胡同。忽然，迎面过来了一队熙熙攘攘的人群，手里打着五颜六色的小旗，使平时寂静、单调的胡同一下子变得多彩、喧闹起来。显然，这是一支出来游行的小队伍。轿车里的人反应过来了：今天，12月12日，北平学生要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游行示威。

游行的学生见到同一辆高级轿车狭路相逢，很是意外。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是大名鼎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学生们纷纷上前，把手上的传单塞进车里递给他。宋哲元打开一看，见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不禁笑了起来。他打开车门对学生们说：“你们游行后到故宫后面的景山集合，我派秦德纯市长来讲话。”大家高兴地让开一条道，宋哲元含笑而去。

当天下午，数万学生和市民在景山集合。北平市长秦德纯果然受宋哲元委托也来参加集会。他在会上讲话表示：二十九军一定要本着光荣的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响应全国民众的要求，和一切不要作亡国奴的人们合作，担负起解放民族的重大责任。会场洋溢着团结抗日的热烈气氛。

北平出现这样的局面，实在不容易。

宋哲元是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掌握着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在一二九运动中，

宋哲元曾动用军警镇压爱国学生。学生们因此对他十分痛恨，“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就成为前一阵子游行时必呼的口号。

刘少奇一到华北，就面临着怎样对待宋哲元的问题。他在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他指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口号是错误的，应该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⑥他要求向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官兵做工作，把他们争取到抗战方面来。刘少奇还派王世英、张友渔通过秘密关系，在第二十九军上层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

在抗日力量的内外夹攻下，宋哲元的态度有所进步，开始同情爱国学生，转向抗日。这种变化，使北平的群众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华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打开了。

●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不时出现报端，人们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

1936年5月初，在北平的一些书店里，新出版的

一期《自由评论》杂志，被抢购一空。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作者：陶尚行。

在文章的前面，《自由评论》发表了一段编者的话，说：“陶尚行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很明显的他是在替共产党辩护，但是他是在用和平辩论的态度，不是一般共产党常用的谩骂诅咒的态度，所以我们把他的信发表在这里。”

《自由评论》是国家社会党的机关报，在北方地区颇有影响。这家刊物和这个党的首领张东荪，在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1936年2月7日，张东荪在《自由评论》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陶尚行的“信”就是答复张东荪那篇文章的：

拜读了贵刊第十期张东荪先生的大文《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之后，很感谢张先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来讨论共产党中央与苏维埃政府在去年8月1日的宣言，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意见。我想张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意见，不只是代表先生个人和贵刊，而是中国许多人和朝野各

党派在实行全国大合作以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所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公开的答复先生，并要求先生作更进一步的研讨，我想这对于中国不是无益的。正如先生说：“这真不啻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了！”

接下来，陶尚行毫不客气地把张东荪的一些观点逐条加以评论。在评论的中间，一步一步地亮出了共产党的观点，特别是表明了关于抗日救国的各项主张。文章针对张东荪的论点批驳道：“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也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文章说：“共产党仅仅要求（一）停止内战，（二）抗日救国，（三）实行民主自由，以使全国人民大家来抗日救国，（四）进行救国所必须的经济与教育政策，（五）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日的力量。”文章最后提出：“望先生将这封信在贵刊上发表，并在贵刊上答复我。这或者对于中国民族不是无益的吧！”陶尚行这样结束了他的长文。

在长期国民党统治的北方白区，人们对共产党不甚了了，许多人甚至仍然听信所谓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样的谣传，连张东荪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大谈共产党是“废除私产”、“完成世界革命使命”、“对于一切不妥协”、“毁坏人类天真性情”，要求共产党“至少 10 年内对于全国放弃共产主义的潜伏运动”。这时忽地冒出一篇陶尚行的文章，而且又是以如此高屋建瓴的气势评论张东荪，传达共产党的声音，令人们在惊喜之余有茅塞顿开之感，消除了不少人对共产党的误解。连许多北方的共产党员，也从中了解到许多党的基本知识和中共中央的新政策。

陶尚行究竟是谁？读到和听说这篇文章的人纷纷猜测，到处打听，可最终也没搞清楚。人们怎么能猜到呢？除了中共北方局领导机关的少数同志，谁也不晓得华北来了个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化名陶尚行的这篇文章，是刘少奇 1936 年 4 月 13 日写好了投给《自由评论》的。

这样的故事在遥远的南方都市香港又一次重演。

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1936 年 6 月 7 日在香港出版了它的创刊号“星期增刊”。在这一期的前面，刊登了一封公开信。信是写给邹韬奋

的，作者署名莫文华。

莫文华的信一开头说：“听说你的日报就要出版，并附有星期增刊，非常愉快。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虽还未能读到贵刊，但是因为看过你们以前所编行的刊物，深信贵刊是很值得珍爱的。因此就觉得似乎我有权利先向贵刊贡献意见。”接着，这封信讲了民族解放人民阵线的方方面面，说：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大祸面前，“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方、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信里还强调，组织人民阵线应该“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招致来，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

邹韬奋不知道莫文华是何方人士，只是感到信写得好。于是，他以《生活日报》编者的名义，将这封信热情地向读者推荐：“这封信对于‘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有着剴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我们于欣慰之余，并觉得这种意思实有公开于一般热心救国民众之必要。”

莫文华的信在孤岛似的香港引起广泛影响是理所当然的。许多读者给《生活日报》写信，表达他们的共鸣，说：“我觉得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确有他的非常正确的见地”，“感到很深的兴味”。

化名莫文华的信，是刘少奇 1936 年 5 月 24 日写的。

7 月 12 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又发表署名莫文华的另一篇文章《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香港的读者们仍然不知道作者是共产党人刘少奇。

类似的情况不时发生。1936 年 6 月 20 日，北平《长城》杂志发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11 月 10 日又发表《论“全国抗战是否立刻爆发”和救亡阵线当前主要的任务》，署名吕文。10 月 15 日，上海《作家》杂志登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署名莫文华。1937 年 3 月 15 日，北平《国防》杂志发表《“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署名莫文华。

刘少奇到华北的使命，“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⑦华北的白区环境使他本人不便公开出面，因此他采取了写化名文章在公开刊物上宣传共产党主张的办法，确实社会效果显著。但这样做必须十分小心，要谨慎选择时机、方式，还要考虑安全，所以不能经常做。比较起来，在党内刊物上处理这些问题

相对容易。因而，通过党刊统一党员思想、指导工作，就成为他经常使用的方法了。

从1936年4月1日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刘少奇仅用K·V·的化名在《火线》上发表的指导性文章就有：《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关于北平问题》、《所谓具体领导》、《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怎样进行群众工作》、《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论左派》等。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还在1936年4月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1937年2月26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3月4日再次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总结报告。给中共中央的这些长篇报告，都署名胡服。不过，中央的同志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

这些文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党在白区工作策略思想。在这方面，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的第一人。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了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并作了高度评价：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 1927 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 1924 年至 1927 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的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

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

⑧

●刘少奇派周小舟、吕振羽密赴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联合抗日

1936年3月，南京。

两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在房间里闭门密谈。年龄稍大的一位，叫吕振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也是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的书记。另一位年轻人是周小舟，他是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任北平武装自卫委员会党团宣传部长。

周小舟郑重地对吕振羽说：“组织已批准了你的入党要求，无候补期，为正式党员。”

吕振羽表情严肃，点了点头。

周小舟又说：“你的工作由陈酉生直接联系。以后，有关谈判问题的秘密通信按一式两封寄出，一封寄天津陈酉生，一封寄北平给我。”

说着，周小舟又从身边拿出一本内部刊物，指给他看一篇署名陶尚行的文章。

吕振羽接过文章，很快地看了一遍，觉得内容新颖精采，忙问：“陶尚行是谁？”

周小舟说：“是北方局负责人，是一位很优秀的领导同志。”他接着又拿出几张纸，告诉吕振羽，这是党组织给他的指示。

他们把纸浸入专用药水。上面的字样清晰地显示出来：“派吕振羽为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望继续……”^⑨

两人欣慰地笑了起来，重又坐下来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周小舟和吕振羽，是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秘密任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联合抗日问题。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5年冬，国民党方面由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辗转战到吕振羽，隐晦地发出了希望同共产党方面商谈联合抗日的信号。吕振羽通过周小舟向中共北平市委作了汇报。北平市委要吕振羽先去南京探明这件事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提出的？得到谁的

支持？吕振羽 1935 年 11 月底到南京，通过他认识的在南京政府铁道部任劳工科长的谌小岑，会晤了曾养甫，终于打听到是国民党官僚宋子文在主持这件事。

吕振羽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周小舟和中共北平市委，汇报给了刚到华北的刘少奇。这显然是一个重要信息。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不仅要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发动和组织抗日群众运动，而且要在地方实力派、社会上层分子和主张抗日的政治派别中开展工作，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决定同意和国民党方面接触。于是，他打电报给毛泽东，提议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去谈。毛泽东回复同意。^⑩

这样，周小舟在 1936 年 3 月再次赴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组织的意见，要他留在南京继续和国民党方面保持接触。

此后，南京谈判在中共北方局的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有条有理地进行。这项工作由华北联络局具体负责。

华北联络局是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负责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的秘密机构。1935 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在多次遭到敌人破坏后被迫撤销，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干部在王世英带领下转移到天津，

同刘少奇和北方局接上了关系，随即组成华北联络局，仍由王世英负责。王世英是省港大罢工中的纠察队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在白区从事中共秘密工作。周小舟要吕振羽直接联系的陈酉生，就是王世英的化名。

周小舟还向吕振羽传达了准备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六项原则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二）由各党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吕振羽本着这些原则，同曾养甫进行了多次谈判。不久，曾养甫提出这样传来传去太麻烦，要共产党方面派出正式代表。1936年六七月间，周小舟便作为正式代表再赴南京，同曾养甫谈判。

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周小舟系统地陈述了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回答了曾养甫提出的问题。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不久，周小舟离开南京，由吕振羽接着谈。

过了一段时间，曾养甫提出这样谈法还是不行，

表示他愿意去一趟延安，并希望周恩来来一次南京，当面解决一些问题。又过了些时候，南京和延安双方通过武汉电台沟通了联系，曾养甫也调任广州市长，南京谈判便告中止。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北方局，为避免步调不一，以后同南京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统一由中央直接进行。

这样，周小舟、吕振羽先后离开南京，撤回北方局。周小舟随后又奉命带着这次南京谈判的材料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看中了周小舟的机敏和才华，把他留下来担任自己的秘书。

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联合抗日，是刘少奇和中共北方局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一个有远见的步骤。这是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而进行的最早的一次接触，为西安事变后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开了一个头。刘少奇1943年在延安总结华北经验时还特意提到：“我们还通过某方面的关系和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某种非正式的接洽。”^⑪

●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薄一波 等出狱，刘少奇要柯庆施速办

北平市内北海公园西侧，西什库教堂旁边，有一

条狭小、僻静的胡同，叫草岚子胡同。胡同里有一个外表看很不起眼的院落，人们从偶尔开启的大门口向里张望，可以见到一座灰色的两层小楼、一排筒子房和一个面积不大的院子。它四周的院墙上架着道道电网，给过往的行人带来了几分恐怖。

这个院子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是国民党在北方集中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人们通常叫它草岚子监狱。1931年，北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两次遭到破坏，一批中共干部先后被捕，陆续押解到这里。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到1936年的时候，还有60多位同志继续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其中有：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殷鉴、周仲英、周启敦、刘亚雄、胡锡奎、刘锡五、张友清等。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住处汇报工作。他讲到：北平草岚子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他介绍了这批同志的情况后请示刘少奇：“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

刘少奇马上明白了这事情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内战时期王明的“左”倾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批幸存下来的干部极为宝贵。虽然草岚子监狱里的这些同志他都不认识，只有一个担任过顺

直省委书记的殷鉴他稍微知道一点，但他觉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机关的北方局，必须尽力保护和营救这批同志。尤其是目前，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将很难生还。再者，华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日趋发展，迫切需要大量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如能将狱中的这些具有长期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经历的同志营救出来，派去进行各项开拓性的工作，正好解决当前干部奇缺的问题，这明显有利于党的事业。当然，这件事关系重大，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措施，必须请示中央。刘少奇首先征求柯庆施的意见，因为他是组织部长，主管这方面的工作。

刘少奇问柯庆施：“你的意见如何？”

“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柯庆施回答。^⑫

于是，刘少奇很快将这种情况写信报告中共中央，还把狱中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也附上，请中央决定。

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张闻天，接到了刘少奇的报告。他当即和当时也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张闻天还代表中共中央在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上签字同意。^⑬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批复，很是高兴，立即将这件事交待给柯庆施，要他迅速办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在柯庆施和徐冰、孔祥祯、魏文伯等共同配合努力下，这批关在草岚子监狱的干部分九批先后履行有关手续出狱。他们出狱后，被中共组织陆续分配到急需的对敌斗争岗位：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董天知、韩钧等被派往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张友清赴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李楚离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刘澜涛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马辉之参加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工作。华北地区由于这些同志投入工作，缓解了干部缺乏的状况，加强了中共在白区的领导力量。

刘少奇来到北方局，除了端正路线，推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恢复和重建北方地区的中共组织。

北平、天津是北方的重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刘少奇首先就近调整了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班子。原市委书记林枫调任刘少奇的秘书，另派李铁夫任市委书记，易吉光任副书记，重新决定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妇女部长人选。新市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扎扎实实地在基层发展组织，使共产党员人数和基层党组织有了很大增加。

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是刘少奇关注的重点。原中共北平市委对3月31日“抬棺游行”事件处置不当，招致革命力量受挫，刘少奇提议调整市委班子。中共北方局重新选派李葆华任北平市委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赵仲池任宣传部长。新北平市委加强了各区委建设，着重在各大学开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36年5月28日天津发动群众抗日大游行之后，在北平学生群众中引起连锁反应。5月30日，北平40多所学校的代表聚集清华大学开会，决定采取响应天津学生的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北平市委却对群众热情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组织抗日游行。后来在全国学联的推动下，6月13日北平组织了1万多人的抗日集会。市委领导这时又提出“长期罢课”等多数群众难以接受的口号，致使这次运动没有在全国起到应有的影响。

刘少奇和中共北方局对北平市委的失误作了批评，提出：市委自从在“三三一事件”中犯了偏“左”的错误之后，变得缩手缩脚了，当形势变化、群众起来要干的时候，你们却犹豫，特别是当天津起来游行的时候，你们还没有马上行动是不对的。本来学生运动过去多是由北平来领头的，这回北平落后了。

⑭

不料想，这次批评，却引出一场小小的风波。原

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在1936年六七月间给北方局写了一封信，全盘否定北平市委的工作，提出“旧瓶子不能装新酒”，“应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改组市委。

事情又回到刘少奇那里。他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托，处理北平党内的这场争论。他把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计划、决议等文件调来，又仔细研究了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关于北平工作的报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看法。1936年10月5日，刘少奇写了《关于北平问题》的文章，把北平党内的争论提高到整个北方局和全党的角度加以总结。

刘少奇指出：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工作，已有了转变，许多同志已经开始了解党的新策略，但仍十分不够。他批评了徐高阮信中的错误观点，说：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要看到极大多数同志那种刻苦、坚持、忠实为党工作的精神，他们只要努力工作，改正错误，是能够完成党所委托给他们的光荣任务的，采取过去随便斗争、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刘少奇派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北平调查。彭真在北平找许多基层干部谈话，调阅了各方面的材料，然后向北方局写了报告。

刘少奇在听取了彭真的详细汇报之后，提出了

改进北平市委领导的意见。经过中共北方局的安排，再次调整充实了市委班子，李葆华仍任市委书记，黄敬任组织部长，李雪峰任宣传部长。市委新增设学委、文委、农委，分别由蒋南翔、李俊明、刘杰任书记。

北平市的抗日救国运动，在调整后的市委的领导下，有了稳步的发展。到1936年底，北平的共产党员数比一二九运动之前增加了近10倍。

在这期间，刘少奇还领导中共北方局充实加强了中共河北省委，派黎玉去济南重建中共山东省委并任省委书记，派人去山西、河南建立了省一级的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刘少奇还直接派出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寻找同中共失去联系的党组织和重新建立组织。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中共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也在北方局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活跃在整个华北地区。

●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全面展开，各路诸侯纷纷表态

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安子文（化名徐子文）、

周仲英（化名周斌）、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徐子荣（化名徐之荣）、董天知（化名董旭生）、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冼维勋（化名夏维勋）、马辉之（化名冯俊斋）9人，跨出了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大门。他们是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第一批出狱的干部。

不几天，薄一波的住处来了一个人。此人名叫郭挺一，是山西军阀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他向薄一波介绍了山西的形势，传达了阎锡山的意见，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为表示诚意，郭挺一还出示了阎锡山给薄一波的邀请电报。

原来，这是阎锡山为应付时局危机而想出的一个新招。阎锡山，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是山西的土皇帝，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他虽然名义上归南京中央政府管辖，可实际上依仗实力拥兵自重，搞独立王国。1936年8月以后，日本军加紧南侵，对他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蒋介石对阎锡山早已不满，也时时觊觎山西这块地盘。这种南北夹击的态势，使阎锡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生怕失去土皇帝的宝座。而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日见扩大。阎锡山身处北方，平津地区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他有很大的

触动和启发。他挖空心思出一个新政策：请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来山西组织抗日活动，“共策保晋大业”。他要求请来的人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名义开展活动，不以共产党员面貌出现，但可以在活动中仿照共产党的某些措施。

薄一波是山西人，阎锡山决定把他作为邀请的首要对象。于是，他派郭挺一前往北平，几经周折找到了薄一波。

听罢郭挺一的介绍，薄一波觉得自己过去一直从事中共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统战工作，心里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当即婉言谢绝了。过后，他把这一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

事情报到了刘少奇那里。他觉察到这是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一个好机会，应不失时机地抓住。他立即派徐冰去向薄一波传达他的意见。

第二天，徐冰找到薄一波，告诉他：“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徐冰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

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⑮

刘少奇的指示，已经将这件事情的意义、目的讲得一清二楚。薄一波豁然开朗，很快奔赴山西。

1936年9月，薄一波先去山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随后返回北平，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认为：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他愿同共产党合作抗战还是好的，应当积极推动他抗日，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这一行动的方针：要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戒备他反对共产党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⑯

情况明朗了，方针明确了，组织方面必须跟上。中共北方局在研究之后，决定除薄一波外，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第一批去山西，到那里做一篇联合抗日的大文章。

在薄一波等出发之前，刘少奇又经徐冰向他们传达他的意见：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

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①⑥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一行到了山西。

在太原，薄一波同阎锡山会面，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作客，按照家乡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东西都做，不利的东西都不做；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锡山听了，表示对这些要求都同意。①⑦

得到了这些承诺，薄一波等便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同阎锡山的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11月，薄一波等首先把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接了过来。这个抗日团体名义上仍由阎锡山任会长，薄一波只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实际领导权很快便被共产党员掌握。1937年2月，牺

盟会改选，7个常委中除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外，其余薄一波等6人都是共产党员。到1937年6月，牺盟会会员发展到60万人，遍及全省工厂、学校、农村，还办了各种形式的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大量抗敌干部。

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使山西方面的工作越发重要起来。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来一封信，说：“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还提出：“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⑮

刘少奇再次调兵遣将。他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陪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去绥远，直接去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推动该部抗日。与此同时，刘少奇又要华北联络局王世英，找到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委托朱蕴山再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

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是爱国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1933年成立起来的一个抗日政治团体。朱蕴山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接受委托后，他亲赴太原向阎锡山转达共产党的意见。几次密谈之后，朱

蕴山和阎锡山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防共保卫团”；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

在这之前，北平地方实力人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华北抗日高潮的影响下，于1936年8月派刘子青找中共接洽。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作为联络代表，同宋哲元保持经常联系。刘少奇派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二张”着重在第二十九军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转向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伴随着华北地区群众抗日运动的日趋高涨，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全面展开，成效显著。北平宋哲元，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甚至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等各路诸侯，都直接间接地向中共北方局派出联络人员，表示愿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1936年12月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连发两封电报，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①⑨}

正当刘少奇着手贯彻毛泽东指示，进一步打开统一战线大局面时，一场震惊中外、改变时局的大事件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像一颗政治原子弹，给动荡的中国政局带来强烈冲击波

“号外！号外！”

“西安发生重大事变！”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

报童的清脆喊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响起。市民们纷纷停步买报看报。这时，已是1936年12月13日的早晨。

天津福荫里1号，正在楼上厨房里生炉子做饭的郭明秋闻声吃了一惊。她连忙打开窗户，喊住报童，把装有零钱的竹篮用绳子放下去，让报童把报纸投进篮子，又赶紧把竹篮吊上来。

报上的大字标题十分醒目：“西安昨天发生重大事变”。郭明秋一目十行急速溜了一遍，确信蒋介石已被活捉，不禁喜上眉梢。她顾不上炉子，三步并作两步，跑去把报纸交给丈夫林枫。

林枫接过“号外”，站着读了一遍，说：“这是大

事，我马上找老戴去！”说着把报纸装进口袋，匆匆出门而去。

林枫来到黑龙江路隆泰里那裁缝店的小楼上，一面把报纸交给刘少奇，一面讲述着沿途见闻。刘少奇仔细读罢“号外”，对林枫说：“这么大的事情，要好好收集各方人士的反映。”^{②⑩}

西安发生的事件，确实重大。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于12月12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逮捕了蒋介石，同时囚禁了正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等10余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这不啻是投下一颗政治原子弹，给动荡的中国政局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

刘少奇要林枫在天津、彭真去北平了解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映，动员舆论拥护张学良、杨虎城通电，督促各实力派起来响应。12月14日，中共北方局又以“人民通讯社发表北方共产党发言人谈话”为名，昭示了对西安事变的初步表态：“只要南京彻底改正蒋委员长以往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的代表会议，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一切对内对外救亡大计，对内实行民主，

对外即实行抗战，此事则解决甚易”。

林枫一连几天忙着外出搜集情况。各方面反映一汇总，发现各界议论的热点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多数人要求把蒋介石杀掉。

林枫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些反映，说：广大群众包括进步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还有我们的党员，都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大家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10年仗，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这回可不能放了他。

听完汇报，刘少奇陷入沉思。林枫和在场的郭明秋急切地望着他，希望听到他的意见。没想到，刘少奇只说了一句“还得看看”，就离开了。^{②1}

不可一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下子成了阶下囚，人们对他下场的关心程度可想而知，一时间议论蜂起。不少人抱怨中共北方局不出来说句话，一些共产党员也对见不到上级的明确表态有意见。林枫把这种反映也专门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却冷静地回答说：“我们现在受一点责备有什么要紧？要沉住气，一定要等中央的电报。中央知道全局，等中央发来了指示，我们再说话。如果我们现在忙于表态，看起来挺有主张，万一我们说的和中央的指示不一致，我们又得纠偏，那就制造了混乱。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我们现在暂时多受一点责

备”。^{②①}

中共中央的指示终于来了。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②②}

刘少奇立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宣传工作。他找党内同志谈话，解释中央的方针；布置平津等地党组织，派干部到各界各派中做工作。彭真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再次赴北平，重点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委中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

为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引导社会舆论，1936年12月26日刘少奇为《长城》杂志写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1937年1月1日又为党内刊物《火线》写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从政策理论上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基本政策之执行”。^{②③}

在西安事变前后那些波谲云诡的日子里，刘少奇和中共北方局临变不乱，经过一系列举措，坚定不

移地稳定了华北地区局势，支持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方向发展。

风云变幻的 1936 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步入了更加动荡莫测的 1937 年。

●毛泽东说：刘少奇指出了白区工作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37 年新春元宵节过后，刘少奇离开住了一年的天津黑龙江路隆泰里 19 号那个小裁缝店，迁往北平。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长期敌对的局面开始松动，北平的社会政治环境也随之缓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局考虑到北平政治地位更加重要，工作对象多，往来联系比较方便，决定将北方局机关移至北平。春节一过，林枫先去北平为北方局机关的迁移打前站。他在北平西四砖塔胡同四眼井 10 号一个小四合院里租了 3 间北房，和夫人郭明秋在这里住了下来。

不多几天，刘少奇夫妇也搬来了。3 间屋子住了两家人，一家一间，当中的一间过堂屋，就作为大家吃饭和会客的地方。

刘少奇在这里住了 10 来天。每天除了找干部谈话，就是写东西。郭明秋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

在天津的时候，虽然我经常见到少奇同志，但那时他总是坐下就谈工作，一句寒暄话都没有。现在，少奇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仍然是那么少言寡语，除了谈工作，几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

在那段时间里，少奇同志日夜都在忙着写东西。晚上灯光昏暗，有时还要用煤油灯。少奇同志穿着单薄的棉衣，写累了，就站起身，来回走动，沉思着，那双穿旧的圆口布鞋在地上发出轻轻的声响，一支烟吸完了，又点起一支，经常工作到夜深。林枫同志曾感动地对我说：“老戴这人有个特点，他特别用功。”^{②4}

半个月后，有关同志在鲍家街后面的寿逾百胡同 17 号物色到一处更为合适的房子，刘少奇便搬了过去。到了这里，刘少奇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写作上。

他在写什么呢？

他在写工作总结。确切地说，是为了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给中共中央写信。

刘少奇根据过去自己长期从事白区斗争的经历，和一年来在北方局的领导实践，深感党的白区工作问题很多，亟需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他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对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因此，从1937年2月20日至3月4日，刘少奇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时提出了加强和转变白区党的工作的问题。1936年春将刘少奇派往北方局，是中共中央为转变白区工作采取的首要举措。刘少奇不负重托，在去北方局后不久就扭转了局面。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信河北省委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

等群众中，均有较好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②⑤}

白区工作的这种“基本上的转变”已经是相当不易，但离彻底的转变却还差得很远。许多同志对王明“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表现仍然认识不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沿用原来“左”的一套。所以，认真总结白区工作的历史教训，推动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成为中共面临的迫切问题。这样一个重要使命，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派往北方白区的代表，自然而然地担当了起来。

刘少奇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党内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敢承认的问题：过去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他列举了这种错误在四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问题。在秘密工作中，常有意地用“怕死”、“害怕”等说法去批评同志，提倡冒险，否认合法手段；混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把能够合法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这就帮助了侦探。十年来由于在这个问题的

错误，使群众工作和党组织受到无法计算的损失。

（二）关于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发动群众斗争的目的，是聚积力量，准备将来的进攻与决斗。但过去白区群众斗争常常为纪念节或为直接拥护红军而罢工游行，机械地要将每一个斗争提到最高阶段；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忽视经济斗争。这就使斗争经常失败，力量的聚积也就不可能。

（三）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问题。白区宣传工作中的虚浮、夸大、形式、刻板，至今还未纠正过来。常使宣传口号与行动分别不清，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分别不清，把谩骂当战斗。

（四）关于党内斗争问题。过去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夸大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反对“左”倾，甚至以思想斗争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用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在斗争中带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成分和成见。

刘少奇认为：这些错误就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但

这个转变还在开始，甚至有些地方还未开始。”^{②6}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的信极其重视。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代表会议（也叫白区工作会议），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制订新的方针。刘少奇的信，为这次白区工作会议作了很好的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刘少奇在1937年4月21日离开北平赴延安开会。来自苏区、白区和红军中的200多名中共负责干部汇集延安。5月2日先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刘少奇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并讲话。5月14日苏区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

1937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城内大东门南侧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央大礼堂开幕。主持第一天会议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刘少奇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从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党的工作的转变等方面提出了今后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十年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强调白区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并指出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

艰巨性。他说：“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的全般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②⑦

尖锐的批评，深刻的揭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会上对刘少奇报告的讨论非常热烈，多数赞成，也有少数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对过去白区工作的评价。有些同志不承认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一些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感到委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不仅得不到表扬，反倒落了一身不是！

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党在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作出结论，一些同志还认识不到过去那种“左”的东西的严重性。这方面的问题是到了后来延安整风运动中才解决的。

最理解和支持刘少奇观点的是毛泽东。1937年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和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说：刘少奇对白区工作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在具体直接解决纠正白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问题时，基本上也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毛泽东说：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②⑧}毛泽东的发言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刘少奇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

1937年6月6日，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会议在6月10日刘少奇作了结论发言后闭幕。

这次中共白区代表会议意义重大。它像一道击穿云层的闪电，把统治白区工作长达10年之久的“左”的思想禁锢冲破，把长期盛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革命”面具撕碎，从而成为白区工作走向彻底转变的历史转折。

●华北抗日局面迅猛发展，共产党成为华北敌后最大政党

在北平市西南郊的永定河上，有一座始建于金代的著名古桥，即卢沟桥。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借口军事演习，在卢沟桥畔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双方猛烈交火，激战至天明。这就是卢沟桥事变。

为时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自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当天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征抗日。

猖狂的日本侵略军迅速向北平、天津和整个华北全线进攻。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血雨腥风！

局势的突变，使原先准备在中共白区代表会议后返回北平的刘少奇，不得不改变行程。1937年7月16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自延安出发，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达任务。

随后，经西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28日抵达太原。

驻守华北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一触即溃，节节败退。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危急的形势，使留在北平的中共北方局机关无法立足，以林枫为首的一批留守干部只得赶紧撤离。为不失时机地指导抗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迅即于8月初在太原重新组建了中共北方局，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宣传部长，彭真任组织部长，朱瑞任军事部长。新的中共北方局机关设在太原成城中学东侧的一个四合院里。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随后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华北国民党军队败退后，大批国民党官僚也跟着如鸟兽散，造成敌后大片政权空白。日本军贪婪地鲸吞华北，却贪多嚼不烂，后方空虚。这种情形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造成良好时机。

刘少奇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进行了10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说是等待了10多年，等待

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如果又轻轻地把它放过，不利用这种时机迅速前进，那就等于犯罪。”^{②9}

首先是巩固和发展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大力开展抗日群众运动。刘少奇把在阎锡山那里进行了一年多统战工作的薄一波等找来，向他们作了布置。薄一波对此回忆道：

少奇同志来到后，立刻向我们传达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他指示我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他向我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

放在防右上。③⑩

8月底的一天，刘少奇又在太原正大饭店召集王世英、南汉宸、张友渔、阮慕韩开会，对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作了部署。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日军的步步进逼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旧晋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不堪一击，溃不成军。无奈之下，他又找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帮忙组织一支新的抗日军队。他要薄一波先组建一个团，试试看。

薄一波马上向刘少奇报告了这件事。刘少奇一听，这是给共产党送上门来的建立武装的机会，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它抓住。他果断地对薄一波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③⑪为了让薄一波集中精力去组织新军，刘少奇把牛荫冠调去牺盟会总会，接替薄一波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即山西新军，于1937年8月正式诞生。新军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是以牺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组建的。后来，又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队。随着抗日运动的发展，山西新军的规模不断壮大。决死队增编为4个纵队，工人自卫队从团扩大到旅，又发展了3个政治保卫旅和1个暂编师。

要抗日就要抓枪杆子，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刘少奇对这一点非常重视。他已经看到，抗战的需要和敌后空虚的现状给大力发展武装提供了千载难逢却也是稍纵即逝的机会。

1937年8月下旬至9月底，八路军3个师开往山西前线，全军编制为45000人。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天晚上，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开会磋商行动方针，刘少奇提出：“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③2}11月，刘少奇打电报给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张闻天，正式提出他的意见：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的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3个月内扩大到10万，半年内扩大到20万。^{③3}

但当时中共党内有些干部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一是做不到，二是会破坏统一战线，主张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刘少奇批评和否决了这些意见。

刘少奇的就见得到这时正在山西视察的周恩来的支持。他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胡服提议3个月扩大到10万，我赞成。”^{③4}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更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一方针。9月26

日，邓小平在山西五台县八路军总部向部队高级干部传达了北方局的决定，作了部署。

为了使华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更好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刘少奇在1937年10月16日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书，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③⑤}11月15日，他又为中共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强调扩大部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他在这个指示文件里响亮地提出：“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③⑥}

刘少奇、杨尚昆等在成城中学东侧的四合院里住了不到3个月，太原面临失守。中共北方局决定向南迁往临汾。临汾西面20里处有个小镇叫刘村。村里的居民有编草帽辫的传统手艺，因此当地俗称帽儿刘村。帽儿刘村坐落在吕梁山脉的姑射山下，地形条件不错。这样，村里一个叫“五同丰”的宅院，就

成了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刘少奇、杨尚昆等在山西的又一处临时住地。

八路军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按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在抗战中不断壮大自己。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3个师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4个地区实行战略展开，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山西新军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部队到1939年夏达到50个团，兵力约7万余人。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的同时，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呈遍地开花之势。1937年11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太原，接着于第二年春又从太原沿同蒲铁路向南进犯，攻占临汾，一直推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这时，山西的大批旧县长早已望风而逃。薄一波等根据刘少奇和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从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出任县长。在山西全省7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有薄一波、宋劭文等4个牺盟会领导人、共产党员担任专员。全省105个县中，有62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绝大多数是牺盟会的县特派员。

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的一支3000人的部队，开到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

交界处，在这块敌后地盘扎了下来。1937年11月7日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在这块地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成熟，就差一个公开的政权机构——政府了。刘少奇看准时机，不顾一些人的反对，竭力主张赶快把政权机构建立起来。1937年11月16日，刘少奇起草以他和周恩来两人名义发给聂荣臻的电报，指示他“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并要他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和组织临时县政府。^{③7}

根据这一指示，经过1个多月的筹备，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于1938年1月10日在冀西阜平县召开。经民主选举，成立了以宋劭文为主任的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它像一面鲜亮的大旗，高高飘扬在敌人后方。以后，八路军各师又陆续开辟了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等党、政、军齐备的抗日根据地。

山西和整个华北抗日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干部紧缺，到处都抱怨人手不够。刘少奇决定办干部训练班解决干部问题。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和河北的抗日活动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云集山西，男男女女的来了很多人。这些热血青年为训练班提供了充足的学员来源。

这样，在临汾西面帽儿刘村的“五同丰”大院里，就办起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和一个名为“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学兵队”的干部训练班。刘少奇一开始曾想办成一个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后来之所以称“学兵队”这样一个叫起来不那么正规的名字，是照顾到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好在名称叫什么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解决了人才缺乏的大问题。

刘少奇挤出时间为训练班编教材，给学员讲课。《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本著名小册子，最初就是他为训练班编写的教材。先后有上千名学员从这一期接一期的训练班中毕业出来，又立即被分配到各个岗位，一些优秀青年还被选送到延安。

到了1938年2月，临汾也面临日本军占领的威胁。2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北方局机关撤至晋南吉县南村。第三天即2月28日，临汾就沦陷了。

幸好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局面已经打开。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各级抗日政权雨后春笋般建立，统一战线巩固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和力量越来越雄壮，各方面的工作都上了轨道。1938年3月中旬，刘少奇奉毛泽东电召，回中共中央工作。

刘少奇回到延安和张闻天等一起，住进了延河北边新辟的一排窑洞里。他除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外，仍负责指导北方局的工作。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

处通知北方局说：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暂时住在延安，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组织联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况，除向杨尚昆报告外，同时直接向刘少奇报告。

刘少奇这回在延安住的时间比较长。正好，大革命失败后留在武汉的大女儿爱琴，¹⁰多年没有音讯，这时被中共长江局派人找到。现在条件好一些了，刘少奇就想把女儿和寄养在湖南老家的大儿子允斌接到延安来，因为允斌已经 14 岁，爱琴 11 岁，早就过了上学的年龄了。

四五月间，爱琴先接到了延安。长这么大，她还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父女俩在延安窑洞见面的情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女儿带着多年的委屈放声大哭，父亲则搂着女儿喃喃自语：“太瘦了，太瘦了。”

刘少奇对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以后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他告诉女儿：“像你这样受苦的人还很多。我们就是要解放那些和你一样受苦的人。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的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

接回女儿之后，刘少奇为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她认字，送她上学。这天，刘少奇拿出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刘”字，问她：“你认识这个字吗？”爱琴从未念过书，但她记得延安墙上有很多标语，其中有一条听人们说叫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她觉得这个字同标语中的“倒”字一样，便说：“是‘倒’。”父亲笑了，说：“噢，你还认识‘倒’字。”^{③⑧}

过了不久，允斌也由刘少奇的哥哥刘云庭送到了延安。3个子女回来了两个，只有二儿子允若（毛毛）自1934年在上海失散后仍下落不明。

允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刘少奇要两个孩子记住自己的妈妈，他对他们说：“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了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里住。革命嘛，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回来了，不是很好吗？”^{③⑧}

父子父女团聚没有多长时间，刘少奇又要离开延安去外地工作了。这次他不是回华北，而是去华中。他的妻子谢飞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没有随他一起去。不久由于家庭原因，两人正式分手。第二年夏天，正好周恩来要去苏联治疗受伤的胳膊，可以带一些在延安的家属子女同去治病或读书，刘少奇就让允斌、爱琴也跟着去苏联上学。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刘少奇调

任中共中原局书记。自从 1935 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作为党中央代表指导华北工作以来，他担任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工作将近 3 年。在这 3 年中间，华北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成为华北敌后最大政党。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群众运动和共产党组织都大大发展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刘少奇带着十分欣慰的心情离开北方局，走向新的岗位。他后来回顾道：“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③⑨}

第五章

发展华中根据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重点发展华中，派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

在延安城东面的桥儿沟，老远就可以看到一座天主教堂。这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屋顶又高又尖，显得同陕北当地的民居很不协调。1937年后，这座教堂被利用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礼堂。

1938年9月26日下午，一些人三三两两地从桥儿沟教堂西侧一排石窑洞中走出，步入中央党校礼堂。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40人。这次中共中央全会是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全会开了一个多月，到11月6日才结束。会议经过严肃讨论，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的路线，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全会开幕的头一天，首先选出由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 12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作为这次会议的领导班子。然后，由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季米特洛夫还说：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①

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有针对性的。王明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候补书记，1937 年 11 月底被派回国参加中共领导。他回国后，以钦差大臣自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一套右倾投降主义方针，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共产党独立自主。

对王明的这一套，刘少奇早就作过抵制。他在华北的工作方针同王明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在几次报告中，又通过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实践经验，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11 月 5 日毛泽东在作全会结论中说：“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

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②

王明的右倾路线曾使一些共产党员一度受到影响。通过这次全会，基本上纠正过来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几个党规党法方面的文件：《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些文件是会前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11月6日，刘少奇在全会上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对这几个文件作了说明。

这件事情也是有针对性的。远的有张国焘。此人由长征中进行反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在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近的有王明。他在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共中央同意，就代表中国共产党表态，自作主张起草和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件。鉴于此类经验教训，全会立了这些规矩。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确定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把长江局管辖的范围划为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兼任中原局书记和南方局书记。

发展华中的重任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

华中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然而，同华北地区如火如荼的人民抗日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中地区抗日斗争未能很好开展，局面没有打开。

日本侵略军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进攻上海和 12 月 13 日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继续大举向纵深侵犯，1938 年 10 月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顶不住日寇其势汹汹的进攻，接连弃城失地，大步后撤，使中原和江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而身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却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由于他拉大旗作虎皮，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影响了一部分共产党干部。他们缩手缩脚，不敢领导华中敌后的人民起来抗日，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撤退时抛下的几十万支枪，也不敢组织抗日军民拣起来武装自己，使华中敌后在 1937 年冬至 1938 年春没能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错过了时机。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刘少奇多次在关键时候被中共中央派去担负重任，开创局面。这一回又是如此。

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共中原局委员，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

刘少奇利用开会的间隙抓紧为组建中共中原局作准备。除中共中央已任命的中原局委员外，又调李先念、谭希林、胡林到中原局工作，派刘向三到洛阳建立八路军驻洛阳通讯处，抽调向明（又名巨任吾）、李拓（又名李伟良）、栗在山（又名栗剑秋）任中原局秘书。

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离开延安赴华中。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晴日。美丽的霞光把宝塔山、延河水映照得红灿灿的，使古城延安熠熠生辉。

清晨，四辆大卡车早早地停在了路边。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和派往中原局的其他干部，精神抖擞地登上卡车。刘少奇不同往常地一身戎装：蓝色军大衣、军制服、军帽、马裤绑腿，佩戴着上校军衔的肩章、帽徽。他坐进一辆大卡车的驾驶室，俨然是一位出征的将领。除了刘少奇的随行人员，这天还有一批同志分乘着几辆卡车，和他同行到西安。他们是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单位选调出来，派往抗日前线的干部战士。

刘少奇一行当天到达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11月27日，他带着随行的秘书、警卫和机要人员，乘火车赶赴河南浉池县。

浉池，已经是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范围。中共豫西特委根据刘少奇的通知，将在这里召开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刘少奇在中共中原局的工作，也就从这次会议正式开始了。

●从浉池到竹沟，刘少奇沿途听取汇报，召集会议，部署行动

浉池是著名的古城池。这里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战国时期秦昭王和赵惠文王相会结盟的地方。浉池县城四面环山，陇海铁路横穿东西，交通便利。因此，从延安派赴洛阳建立八路军通讯处的一部分军事干部，奉命先在浉池开设了八路军兵站。

刘少奇决定在浉池召开豫西地区干部会议，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豫西地处敌我斗争的前沿，随时有沦陷的可能。所以，豫西的共产党组织必须随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

地。事关战略部署，刘少奇决定在豫西采取相应的举措。渑池地形条件好，又有八路军兵站作依托，他因此决定把召集豫西干部会议的地点就近放在渑池。

1938年12月20日，中共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在渑池县城东关八路军兵站所属的一座三间相通的砖圈窑洞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特委书记刘子久，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组织部长席国光，妇女部长吴平，青年部长吴祖贻，以及来自河南省西部洛宁、灵宝、临汝、偃师、密县5个中心县和其他一些县的中共县委负责人，共30多人。

上午大约8点，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刘子久陪着一位穿棉大衣的干部走进会场，向大家介绍说：“同志们，这是中央派来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的胡服同志……”为了安全，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胡服就是刘少奇，别人也没问。整个会议都是秘密进行，要求与会人员只在院子里走动，不能外出，吃住都在窑洞里。

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刘少奇走马上任要做的头一件大事。因此，从延安到中原的沿途，他利用一切机会召集会议，作报告，调整领导机构，布置军事行动，目的都是为了尽快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从思想、行动、组织各方面落实下去。

刘少奇向出席渑池会议的同志传达了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的内容和意义。大家听得很入神。由于秘密工作的条件限制，他们平时没有机会这样直接地了解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刘少奇向他们强调，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当前要特别注意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传达之后是分组讨论。在这期间，刘少奇依次召集豫西特委和各中心县委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分别对他们作出指示。为适应新的任务，他决定对豫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适当改组：将中共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仍由刘子久任书记，将几个中心县委改为地委。他把刘子久、王志杰、席国光、郭晓棠、吴平等原特委的主要领导干部找到他的住室，对机构改组和干部分工中的问题一一作了落实。末了，刘少奇提议新成立的豫西省委开办干部训练班，培训骨干人才，向抗日根据地输送。

中共豫西省委马上行动。首先在渑池八路军兵站办起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原特委、县委的干部七八十人参加第一期受训。

这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来到河南，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要从华北来渑池转去洛阳。刘少奇为了等彭德怀来后一起去见卫立煌商谈问题，便暂时在渑池留了下来。这样，在渑池城东关海露大街的一个老式院子里，刘少奇住了差不

多有1个月。利用这一机会，他应邀向中共豫西省委训练班的同志作了几次报告，重点讲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共产党员的修养。参加训练班的同志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内容新颖深刻的报告。

卫立煌是同共产党有着友好合作关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这时升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月21日，卫立煌派来一列蓝钢皮专列，接刘少奇和刚刚抵达渑池的彭德怀，到洛阳会晤。

刘少奇、彭德怀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路同行，机会难得。他们都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领受了新的使命。刘少奇在华北工作了3年，情况熟悉，成绩显著。彭德怀1937年8月就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也带领部队开赴华北。两个人都对华北的形势特别关切。一路上和到洛阳住下之后，两人的主要话题就是怎样巩固、发展华北的好局面。经过一番讨论，他俩对今后华北工作的思路越发清晰，都认为：要采用一切办法保持我们在华北既得的阵地，同时要准备在某些阵地失去和顽固分子控制某些地区后的工作；现在部队不要急于追求数量上的扩大，要注意提高部队的质量；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要到处一律称八路军，可以组织一些独立的部队，用农民自卫军、抗日联军或接受别人一些适当的名义，以便在磨擦时求得某些缓冲；对顽固分子的斗

争，要避免一些正面冲突，可采取各种方法去瓦解某些顽固分子的部队。两人最后商定，这些意见由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③

到达洛阳，刘少奇住到城南关贴廓巷 56 号的八路军通讯处。他在洛阳停留了 3 天，和彭德怀一起会见了卫立煌，同他交换了对局势的意见，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会谈。刘少奇和卫立煌并不陌生，一年多以前在山西垣曲见面晤谈过。这次重逢，卫立煌还客气地送刘少奇一支绿色粗钢笔作为纪念。双方经过谈判，卫立煌同意将洛阳八路军通讯处升格为八路军办事处。

进入 1939 年，全国抗战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后方更加空虚，兵力明显不够用，很快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整个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见状不妙，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展政治诱降。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网罗一帮汉奸，拼凑了卖国的伪中央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对抗日更加动摇，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更制订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一股妥

协、分裂、倒退的逆流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

形势有坏转苗头。刘少奇抓紧时间于1939年1月25日清晨乘一辆烧木炭的汽车，离开洛阳继续南行，向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进发。

河南省南阳县县城中心十字街附近，有一个小书店，叫新知书店南阳分店。1939年1月26日中午，年轻的店员韦木君正在门市当班，一个身穿上校军服、佩戴第十八集团军蓝色臂章的军官，在四个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书店。那军官对韦木君说，他是来找一个叫王阑西的人，希望马上能见到。

韦木君感觉到此人肯定有来头，不敢耽搁，连忙跑出去找人。他急急来到城东北角一所中学的教职员宿舍，推开一个房间的門，低声对里面的一个人说：“有一个高级军官带着四个警卫员到书店找你，要见你，不知是怎么回事？”

这人就是王阑西，是中共河南省委驻豫西南特委的代表。新知书店南阳分店是中共豫西南特委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韦木君是以店员身份作掩护的特委机关干部。

王阑西一听韦木君的报告，便猜到这是上头来了。因为不久前他在竹沟出席中共河南省代表会议的时候，省委负责人朱理治曾对他说，最近中共中央会有人来，经过南阳到竹沟，要他留意。

王阑西立刻起身，和韦木君赶回书店。

进得书店，那军官放下手中正在翻阅的书本，笑着迎出来问：“你是王阑西同志吗？”

王阑西连忙点头称是。军官伸出手来，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自我介绍：“我是胡服——刘少奇，从延安来的。”

王阑西不禁大吃一惊：著名共产党人刘少奇竟忽然出现在南阳这个小小县城，实在想不到，原来只说中共中央要来，没想到竟是久闻大名的刘少奇！

刘少奇告诉王阑西，他暂时住在城东关路北的交通旅馆，要王阑西和其他负责同志下午到他的住处谈工作。

下午，王阑西和中共豫西南特委副书记郭一青来到东门外交通旅馆刘少奇的住处。两人首先向他汇报当地政治、军事形势和党的工作情况，还谈了下一步的打算。刘少奇一面听，一面针对其中的重要情况不时提问和发表意见。

汇报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在情况大体了解之后，刘少奇对中共豫西南特委的工作作了指示。他说：“国民党当局和日寇的动向正在发生变化。你们这里正是国民党要变化的地区，他们想要在这里稳住阵脚，同地方封建势力、驻军在反对我们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日寇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他们还不可能大

举西犯，你们这里会稳定一个时期。这样，整个中原地区的形势，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形势，是发展的形势。但必须看到，你们这个地区还是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统治区。在当前的形势下，你们的任务是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在上层人士中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友军工作中要积极进行和上层人物交朋友的活动。”

刘少奇在谈了当前局势后又说：最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出现一股逆流，国民党顽固派怕群众起来抗日，怕共产党，不愿意前进了，要倒退一下子了。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压制抗日救亡运动，打击我们，许多地方都已有这种动态，对此你们要有精神准备。他还具体提出：被国民党注意的点，比如新知书店，要少使用或做些隐蔽工作，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可早些撤退到竹沟去。根据目前局势，王阑西不宜继续留在南阳任省委代表，应早日撤回竹沟，回去后负责组建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

在谈话中间，王阑西、郭一青不时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刘少奇一一作了解答。王阑西后来回忆说：“少奇同志这一次谈话，使豫西南党的工作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使豫西南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有了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方针。”④

汇报和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刘少奇留王

阚西、郭一青一起吃晚饭。告别时，他叮嘱他们不要再来了，以免引人注目，暴露行动。

1月27日，刘少奇和随行人员继续乘那辆洛阳开来的木炭汽车向竹沟进发，当晚到达泌阳县城。中共河南省委派了刘贯一和县委书记高子扬前来迎接。泌阳到竹沟已经不远，但道路崎岖狭小。第二天，泌阳县殷楼地下党组织准备了两辆牛车，拉着电台设备等行李，刘少奇等跟着牛车一路步行，当天就赶到了未来的中共中原局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这天是1939年1月28日。

●小小竹沟镇热闹非凡，一派厉兵秣马、生气勃勃的抗日景象

竹沟，坐落在伏牛山、桐柏山余脉交错的小盆地，是河南省南部确山县的一个小镇。它只有东西一条街，居民也就是千把人。但它所处的地形和环境很好，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大沙河由北向南绕镇而过，河岸上竹林茂密，树木苍翠。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就设在镇东门外的河流旁。

竹沟一带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确山的农民群众就在马尚德的领导下发动了规

模不小的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召开了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成立了由马尚德任会长的县农民协会，一度掌握了政权。这个马尚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他是确山县李湾村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支以周骏鸣、王国华为首的游击队，一直在竹沟周围活动。在中共中原局组建以前，竹沟是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刘少奇来到竹沟后，这里也就成为中共中原局的驻地了。

刘少奇住在镇北一个四合院中的一间土屋里。他来的消息，很快在干部战士中传了开来。尽管他们只知道新来的中原局书记叫胡服，对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也搞不大清楚，但大家了解到这位首长是中共中央派来的，是一位中央的领导干部。这就足够了！人们的心情因而异常兴奋。

刘少奇一到，便立即召集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并着手建立中共中原局领导机关。这时已在竹沟的负责同志有朱理治、陈少敏、向明、王国华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刘少奇主持中原局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个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区党委；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

刘少奇提出，当前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要特别注意两点：一，在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他要求领导机关要面向敌后，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的辽阔地区，开辟敌后战场。

这些指示被迅速传达下去。中共中原局机关、边区党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掀起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深入敌后的种种打算和行动。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新出版的机关报《小消息》，及时报道各单位的动向，在干部战士中间广泛传阅。宣传部的同志忙着把自己编印的和从延安运来的宣传材料分发出去。战士们加紧练兵，准备上前线。紧接着，一批批干部和革命青年从延安来到竹沟，准备派往抗日敌后。小小的竹沟镇一时热闹非凡，《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歌声不断，一派厉兵秣马、生气勃勃的抗日景象！

每天，刘少奇除了召集会议、作报告，就是在他那间土屋子里一批又一批地找人谈话。他们当中，有中原局和各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有派往敌后开辟工作的军政干部，有应邀来竹沟帮助工作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也有普通的战士。

与此相呼应，中原地区的抗日局面活跃起来，敌

后游击战争大有起色。一支支抗日武装先后从竹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由团长周骏鸣率领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到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地区，由司令员彭雪枫率领抗日游击纵队到豫皖苏边区，由李先念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到鄂豫边区，由陈少敏率领一支武装队伍从四望山南下鄂中与李先念部会合。

这些抗日队伍像种子一样撒向广阔的中原敌后战场，在中共中原局的统一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李先念、陈少敏游击支队，他们在到达鄂豫边区后很快统一了鄂、皖、豫、湘的二十几股游击武装，队伍和地盘都得到相当大的扩展，成为一支独当一面的部队。

1939年3月，中共中央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他在指定中原局工作暂由朱理治代理之后，于3月18日离开竹沟，经西安返回延安。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切中时弊，很快在各根据地广为流传

1939年3月底，刘少奇回到延安。他还住在原来住的窑洞里，一面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一面继续负责指导华中的抗日斗争。

陕北和华中相隔几千里，指挥只有通过电波来进行。刘少奇的电台同中原局各负责人的电台频繁通报，联络工作。

1939年5月17日、18日，刘少奇连发两封电报给朱理治，指示中原地区的行动方针：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的深远后方，这是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应即动员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武装部队，确立共产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为在桐柏山脉建立根据地，要在这里建立新四军1万人以上的基干部队。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给予坚决抵抗，必须不怕磨擦以至采用武装自卫手段。

这时在中原建立武装搞得最好的是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陈少敏部，刘少奇对他们特别关注。4月5日，他发电给朱理治，指示：应即将信阳挺进游击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去鄂中活动，由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陶铸暂以中共鄂中区委代表资格帮助部队工作。6月19日，刘少奇又给正奉命在湖北京山养马畝整编部队的陈少敏、李先念发去电报，指示他们：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部队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

根据这两次指示，鄂中、豫南的抗日武装统一整

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

1939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举行，讨论时局和行动方针。这次会议拖得比较长，中间断断续续开会，一直到8月25日才结束。经会议讨论，发出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在延安，刘少奇做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应邀到几个学校作报告。5月，他向延安工人学校的学员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报告。6月1日，他又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演。

有一天，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找刘少奇，约请他为马列学院学员们作一次关于思想修养的讲演。刘少奇答应了。

张闻天作此提议，是有原因的。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跋山涉水，涌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并且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秘密组织，抗战以来发展了大批新党员。这一方面壮大了共产

党的力量，同时也使革命队伍的成分和思想意识复杂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每一个共产党员自觉地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奋斗，就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9年8月25日专门作了一个《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设在延安兰家坪。1939年7月8日，马列学院窑洞外面的场地上，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师生。马列学院没有礼堂，平时上课的窑洞又太小，坐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因陋就简，把会场设在了露天场地上。

这一天，就是听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

“同志们：很对不起！你们很久以前就请我来讲演，我直迟至今天才来。”刘少奇这样开始了他的讲演，“我今天所要讲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想，在建设巩固党的基本任务面前，来讲讲这个问题，或许不是没有益处的吧！我并想分作几次来讲，今天讲一部分，其余的只好留待下次。”⑤

这一天，刘少奇讲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有修养、修养的内容、修养的方法、思想意识修养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等等问题，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他说：

同志们！我们要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忠实最好的学生之一，我们就需要在无产阶级与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进行各方面的修养。首先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以及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理论的修养；要有思想意识与道德品质上的修养；要有党内团结、党内斗争与纪律上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与工作作风上的修养；要有战略、战术、工作方法上的修养；要有善于对待各种人们、处理各种问题，以及各种科学知识与某些专门技术上的修养……⑤

由于内容太多，这天没有讲完。7月12日，刘少奇又去讲了一次。第二次主要讲共产党员在组织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

这两次讲演在学员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对刘少奇的讲演很是重视，认为这正是当前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新党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立即请刘少奇把讲演的稿子整理出来，以便在《解放》周刊上发表。《解放》周

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张闻天兼着这个杂志的主编。

可这段时间刘少奇很忙，除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要抓紧时间返回华中前线作各种准备，因此只能断断续续挤时间修改他的讲稿。他先把7月8日的讲演稿整理出来，交给了张闻天。

张闻天看过稿子，觉得很好，准备发表。他把这件事情交给《解放》周刊的编辑吴黎平去办。当时中共中央有个内部规定，发表重要文章要送请毛泽东审阅。吴黎平立即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稿呈送毛泽东。

图6 刘少奇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

毛泽东拿到稿子，很快就看完了。他给吴黎平回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当快登。稿子在毛泽东那里总共停留了不到3天。

⑥这次速度之快，连吴黎平都觉得有点意外。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快在1939年8月20日至9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81—84期上连载发表了。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随即组织了学习。“共产党员修养”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论述是这样的新颖，这样的切中时弊，使延安的共产党员们为之一震。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虽然有不少论述，但他们都是着重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专门论述应该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在讲演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透辟地论述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以便有效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因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强大的教育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就不奇怪了。

读者们纷纷给《解放》周刊写信，希望出版单行本。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共产党员们的要求，很快安排延安新华书店出书，当年11月就把单行本印了出来。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也陆续转载，有的翻印

了单行本。没有多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书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开来。

1939年8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局势，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看法。他说：目前时局包含着发生突变的危险，我们要有必要的准备，要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批评国民党顽固分子；在国民党区域，必须重新准备秘密工作，保存一部分公开工作的干部，进行秘密工作技术上的准备。后来的情况发展表明，刘少奇的这些提议都用上了。

参加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作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刘少奇于1939年9月15日带领徐海东等40多名干部和随行人员，从延安出发，再赴中原。

● 在洛阳贴廓巷56号，刘少奇同郭寄峤不期而遇，徐海东吃了一惊

1939年9月20日上午，一大一小两辆汽车先后从洛阳老城区贴廓巷开出，向城南驶去。大车在前，小车远远尾随。⑦

大汽车开到南城门，正要出城而去，不料路边的国民党宪兵岗哨突然伸出小旗挡住去路：停车检查！

几个宪兵一面吆喝车上的人统统下来，一面窜到车里东张张西望望。他们见车上装着几个箱子，便要动手检查。

驾驶室里坐着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他见状打开车门下来，不动声色地站在一旁。

不一会儿，后面的小车飞快赶到，嘎地一声在车边刹住。一位军服笔挺、佩戴少将徽章的军官快步从车上下来，对着忙乱的宪兵大喝道：“这是干什么！”

“长官，我们是……”

“走开！这是我的人，我的东西！”少将军官威风凛凛地往车前一站，大声呵斥。

宪兵们不敢再动车上的东西。一个小头目狐疑地指着那位中年人小心地问道：“长官，他是……”

“我的秘书！”军官不耐烦地回答。

“呵，对不起，对不起。”宪兵们连忙举手敬礼，放汽车出城。

两辆汽车疾驰而去。车出洛阳城，地势越来越平坦。秋风送爽，气候宜人。在宽阔的平原大道上，汽车以最快的速度急急南行。

大汽车中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刘少奇。那位军

官，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晌午，停车休息。刘少奇和徐海东分别从车上下来，走到一起。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笑什么？”徐海东明知故问。

刘少奇指了指徐海东的少将领章，说：“我笑这个。这东西还有点用处呢！”

“嘿嘿，它的用处是吓唬丘八。”徐海东停住笑，又认真地说，“这些天，我睡都睡不实，真有些担心，真怕出点什么事。”

刘少奇仍笑着说：“今晚你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是的，离开洛阳，就意味着走出了日寇经常骚扰和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地区，徐海东的掩护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

刘少奇是1939年9月15日从延安动身的。为加强中原局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调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随刘少奇一起赴华中。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限共反共方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两党关系逐渐紧张。为预防不测，出发时徐海东身着少将军服，以奉命去中原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应付外界。刘少奇的身分不能公开，一般场合仍化名胡服，对外就

称是徐海东将军的秘书，实际则是由徐海东掩护刘少奇秘密赴华中。

“不要忘了，路上，我可是你的秘书哟！”刘少奇出发前叮嘱徐海东。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福气。”徐海东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刘少奇说：“这也没什么，需要么，该装成什么人，就得装成什么人。白区工作那些年，什么样的人装过了。”

从延安出来在西安停留小住，有时需要出外应酬，刘少奇总是身穿八路军普通军服，站在一身将服的徐海东背后。有一次徐海东刚脱下军帽，刘少奇立即双手接住，履行着“秘书”的职责。这使徐海东很不安。因为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而徐海东只是八路军的一个旅长，无论职位和资历，两人都相差很大。刘少奇却随意地笑着说：“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必须机智哩！就跟演戏一样，演得要像才行。”晚上，刘少奇总要工作到很晚，或写东西，或找干部谈话。徐海东为了保护刘少奇的安全，不是在房外走来走去巡查，就是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后来徐海东幽默地回忆说：“那些天，我白天当首长，晚上可就是小学生了。”

1939年9月18日，刘少奇抵达洛阳，住进贴廓

巷 56 号八路军办事处。这是一所建于清道光十一年（公元 1831 年）的老式宅院，原本是一个姓庄的富豪的宅邸，前后共三进小院，后院两侧连通有带天井的厢房。刘少奇在后院东侧厢房内支起一张单人木板床，住了下来。

刘少奇先在办事处召集了一次中共豫西省委会议。自上次渑池会议之后，豫西省委以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为依托领导工作，省委书记刘子久同时兼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在听取了刘子久等的汇报后指示说：当前国民党到处与共产党磨擦，时局趋向恶化，豫西党的任务应以巩固为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已经暴露身分的干部和党员，分别撤回延安或敌后抗日根据地去。

在刘少奇继续找干部谈话的工夫，徐海东便去城里第一战区长官部向司令长官卫立煌作礼节性拜访。第二天，长官部参谋长郭寄嶠中将，来贴廓巷八路军办事处回访徐海东。

“卫司令长官的夫人病故了，所以这次他不能多陪徐将军。”郭寄嶠一进门便作了解释，然后发出邀请，“今晚，由我为徐将军洗尘。”

徐海东连忙辞谢：“不必客气了。我想早点到华中视察，请尽早帮助我办好手续。”这倒并非客套，徐海东确实想快点离开，主要是担心刘少奇来洛阳的

消息传出去引起麻烦，万一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更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后果。所以，他对郭寄峤的宴请一再推辞。

真是赶巧，正当徐海东送郭寄峤出房门之时，刘少奇有事从门前经过，两人打了个照面。郭寄峤连忙上前要打招呼。

徐海东吃了一惊，赶紧掩护说：“这是我的……”

“秘书”二字刚要脱口而出，郭寄峤已经领先一步握住了刘少奇的手，一面说：“认识，认识。”

“你们认识？”徐海东大惑不解，手心里捏了一把汗。

“认识。刘先生你好！真不知刘先生驾到，失礼，失礼。”郭寄峤热情地上来问候。原来，刘少奇以前同卫立煌会晤时，郭寄峤在场，所以早就见过面。

刘少奇却不紧张，显得胸有成竹，说：“请代我问候卫司令长官！我刚到此地，正准备前去拜访将军。”

郭寄峤马上正式发出邀请，说：“欢迎，欢迎！今晚在西工嘯余庐舍间备了几杯薄酒，到时我派车来接刘先生和徐将军。”

刘少奇顺水推舟，笑着答应：“好啊，一定登门拜访。”

郭寄峤走了。徐海东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场面，着实有些担心。因为眼下国共两党明争暗斗，关系日渐紧张，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特务横行，他怕万一出现纰漏影响到刘少奇的安全。

刘少奇本来也不准备在洛阳公开露面，现在既然无意中碰见了，“这送上门的工作，只好做了”。他对徐海东分析说：“郭寄峤将军我虽然不太熟悉，但知道卫立煌先生对我们态度还好，估计不会出什么差错，去一趟也无不可。”

刘少奇又考虑到，既然接受了郭寄峤的邀请，不去见一下卫立煌不合适。于是，他和徐海东提前到长官部先拜访卫立煌，接着去郭寄峤家。

郭寄峤在家里盛情款待刘少奇、徐海东，席间气氛融洽。刘少奇谈笑风生，向主人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又据理反驳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种种谰言。郭寄峤频频点头，很是佩服。

第二天，刘少奇、徐海东就率领随行人员乘一大一小两辆汽车离开了洛阳。当天到达叶县后，他们把汽车退了回去。从叶县到确山竹沟，要向南经过舞阳县和遂平县嵒岈山，沿途都是丘陵山地。刘少奇一行经过几天的行军，终于在9月底来到竹沟。

这时竹沟地区的形势已非昨日了。在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大气候下，全国各地的反共

磨擦活动日甚一日，中共领导的部队和后方人员遭袭击的事件时有发生。竹沟周围大都是国民党控制区，一些顽固派也在蠢蠢欲动。

刘少奇和中共中原局在分析权衡之后，决定中原局领导机关撤离竹沟。1939年10月12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报告了中原局战略转移的决策：在河南信阳、桐柏，湖北应山、随县的豫鄂边区及沿平汉铁路南段两侧若干地区，有创立小块根据地之可能，“竹沟环境甚为严重，顽固分子在竹沟周围布置了反对我们的特务工作。五战区有命令给汝南八区行政专员，通缉朱理治，要相机拿获法办。”“对于此间工作我拟作下列布置：1，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装、教导队去信、应、随、桐交界之四望山（该地区已成为我们一小根据地，能自筹给养），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地，筹措给养。2，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3，调刘子久来竹沟主持河南及鄂西北秘密党的工作。郑位三最好能设法转到鄂东，靠五、六大队主持鄂豫皖边区工作。”⑧

严密部署之后，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原局主要机关和徐海东、刘瑞龙等干部共300余人，于1939年10月下旬第一批撤离竹沟，向皖东敌后转移。大家恋

恋不舍地告别竹沟，留下来的同志们送了一程又一程，终于依依惜别。刘少奇再次叮嘱王国华等留守干部：“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要打你们了，你们应该做些准备。一旦有事，要注意东门的守备。”^⑨

几天后，朱理治率领留守处 600 余人武装，第二批撤离竹沟，南下转移到豫鄂边界四望山，同李先念、陈少敏部会合。11 月 3 日，刘子久从洛阳到竹沟，主持已经恢复的中共河南省委的工作，并准备第三批撤离竹沟。

中共中原局成立以来，所辖华中各支部队已经先后开赴预定地区，实现了战略展开的目标。新四军一部从江南挺进江北，在扬州至六合一带站住了脚。张云逸、罗炳辉率领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开辟了皖中、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在豫皖苏边界建立了根据地。李先念率领的豫鄂挺进纵队，在四望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这些部队中的许多骨干，都是从竹沟出发去开辟工作的。竹沟作为中原地区向敌后发展的基地，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事实证明中原局撤离竹沟非常正确和及时。1939 年 11 月 11 日，国民党确山县县长许工超，纠合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的常备队和国民党第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部，共 1800 余人，袭击竹

沟新四军留守处。刘子久、王国华率留守部队 500 多人经过激战后突围成功。一部分新四军伤病员、家属、印刷厂工人未能突出重围，惨遭捕杀。连同当地群众，共有 200 余人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杀害和逮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

刘少奇是在向皖东转移途中，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集停留时得到“竹沟惨案”的报告的。他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情况，部署善后。11 月 21 日，刘少奇电报指示朱理治，要他布置向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提出严惩凶犯、赔偿损失等条件。接着，他又部署豫鄂边区组织武装人员，仍以新四军留守部队和王国华的名义回竹沟附近活动，要在信阳的新四军部队协助配合王国华占领一二山头作据点。⑩没有多久，豫南的老百姓就惊喜地发现，新四军的旗帜没有倒下，继续在竹沟地区飘扬！

●在总结彭雪枫游击队经验之后， 刘少奇提出发展豫皖苏新思路

清晨，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东北角的一片宽阔场地上，红旗招展，人欢马跃。手持武器、身背背包的一队队战士，在各部队首长的调度下，排列成一个

个方阵。前面是架起的各种火炮、机枪，中间是军容整齐的战士，后面是排列有序的战马。这天是 1939 年 11 月 7 日。

列队完毕，现场指挥一声令下，整个广场鸦雀无声。

战士们个个兴奋不已。他们在热切地期待着，准备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

这是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全体官兵，共有 3 个主力团和 1 支直属警卫部队，还有支队直属机关和随营学校，足有好几千人。

干部战士群情激昂。一年前，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率队从竹沟出发的时候，只有 300 多人。经过一年来在豫皖苏敌后的征战，终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当他们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要来豫皖苏边区和新四军游击支队检查指导工作的消息，便决定利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机会，举行阅兵式，向中央汇报他们的战果。“党中央”、“中央首长”，这些字眼平时在干部战士中十分神圣。今天，他们就要直接接受中央首长的检阅，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

上午 8 时，刘少奇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支队司令员彭雪枫、中共豫东省委书记吴芝圃、支队参谋长张震、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的陪同

下，来到检阅场。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全军立正致敬。阅兵指挥、二团团长沙海清跑步上前，请刘少奇检阅部队。

刘少奇依次检阅了各个部队。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吹响行军曲，整齐划一的一个个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正步走过主席台前。

阅兵式结束后，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

彭雪枫司令员高兴地说：“在这盛大的节日里，党中央的代表、我们的胡服同志检阅了我们的部队，这是对我们的爱护、鼓舞和教育。现在，请胡服同志给我们讲话。”

在整齐热烈的掌声中，刘少奇发表讲话。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向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了13个月的同志们致敬！向为民族流血受了伤的优秀儿女敬礼！”刘少奇郑重地举手行军礼，然后继续说，“同志们，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节的大会上，我们见面了！我喜欢，大家也喜欢。22年前的今天，俄国穷苦大众在党、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建立了苏维埃，人民得到解放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战胜了敌人和困难。同志们，你们挺进豫皖苏地区，打了很多胜仗，解救了解放区的人民，发展壮大部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致以亲

切的慰问。”^⑪

接着，刘少奇讲了抗战的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指出：我们的抗战已进入相持的新阶段，困难更多更大，在今天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准备力量，迎接反攻。

^⑪

全场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在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声中结束。

这次阅兵，显示了彭雪枫游击支队的良好素质。刘少奇对此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一连几天，刘少奇连续听取各方汇报，深入了解情况，向他们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在总结了彭雪枫游击队的成功经验之后，一个新的发展豫皖苏根据地的思路在他脑海中形成。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连发两封电报，提出他设想的方案：

彭雪枫部基干部队7个团、1个总队、1个直属队，共7369人。部队各种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服装整齐，情绪很好，已开始走向正规化。但大规模的战斗尚未经验过，连以下部队缺少战斗经验。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只要有干部，年内扩大到2万至3万人完全可能作到。建议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

挥。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肖县、宿州四县根据地，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在一二个月后，抽出一部分主力部队和省委干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杞县、太康及鹿邑、中州、商丘等地建立小块根据地，以便将来联成大块根据地。⑫

中共中央书记处显然经过了认真的分析研究。11月19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刘少奇：同意11日两电对游击支队及豫皖苏边区今后工作的布置，整个江北新四军应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要求在此广大区域内发展抗日武装5万至10万人枪。责成北方局及抗大拨出学生700人送往彭雪枫处。⑬

刘少奇迅即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的部署组织落实。扩大部队、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新区都需要人手。刘少奇抓紧调配骨干人才，不断找干部谈话，把他们派出去开展工作。

豫皖苏边区很快形成了。1939年11月，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参议会，吴芝圃任议长。很快又通过召开边区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建立了政权机构——边区联防委员会，下辖4个县政府和5个办事处。边区党委也迅速充实人员，健全了机构，由吴芝圃任书记，加派刘瑞龙任副书记。与此同时，豫皖苏游击支队正式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一些在邻近县活动的共产党掌握的抗日部队，陆续

改编为第六支队领导下的总队。这样，第六支队拥有3个主力团，1个特务团，4个总队，3个独立营，共17800人。又一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豫皖苏边区迅速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豫皖苏边区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刘少奇离开涡阳县新兴集，奔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皖东定远县。这时已是1939年的12月了。

●新四军在津浦路两侧连打几个漂亮仗，皖东根据地初具规模

从涡阳县新兴集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藕塘镇，要穿越淮河和淮南铁路，经过好几个县，敌情复杂，交通不便。刘少奇已经顾不上这些，急于要赶往江北指挥部。

为什么这样急？就是为了尽快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和极其重要的。八路军已经控制了华北的抗战局面，山东根据地也已开辟起来，如果华中地区能成为新四军控制的根据地，那么从华北经山东到华中的广大地区，

就将成为连成一片的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

但发展华中的任务实在是非常的艰巨。刘少奇到华中，面对的是严峻、复杂的态势。华中的大片国土，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主要城市和水陆交通线，都已被日本军占领。虽然在敌后有几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但零星、分散，力量不大，给养困难。在新四军活动的皖南、江北地区，四周布满了国民党重兵：苏浙皖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皖中是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部，苏北是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部，豫皖苏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这几个人各拥有数十万军队，立场反共，一直在寻找机会围歼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尤为严重的情况是，作为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支柱部队新四军，它的领导内部却存在着很深的右倾思想，几乎还是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一套，不积极去扩大武装和建立根据地，唯恐得罪了蒋介石国民党。

这种种情况，不能不使刘少奇忧心如焚。现在豫皖苏边区的工作已经上了轨道，他要尽快赶赴皖东。时间对他来说只觉得不够用。

离开涡阳县新兴集，一路上基本上是骑马和步行。1939年12月初，刘少奇和徐海东等随行人员到达定远县藕塘区山黄家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

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带着干部战士兴奋地迎接刘少奇一行的到来。他们已经盼望好久了。

像到别的地方一样，刘少奇在住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召集当地负责同志汇报情况。汇报会夜以继日，接连开了好几天。

当时在皖东地区活动的，主要是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苏皖游击支队。第四支队辖3个团，约4000人，随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扎在津浦路西定远县藕塘一带。这次随刘少奇来华中的徐海东，被派到第四支队兼任司令员，政委是戴季英，参谋长谭希林。第五支队活动于津浦路东来安县半塔集一带，辖3个团，约2000多人，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这两支部队都是1939年年中才整编组建起来，开到皖东时间不长，减员后还没有来得及补充，人数不足，地方工作也很薄弱。

经过听汇报和实地考察，情况已经清楚。在同张云逸等研究之后，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他对华中发展方向的意见，提出：在武汉失守前后，我方已经失去了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的汉阳、京山、

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我们已令他在半年内发展至两万人枪；（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尚有发展三四万人枪的可能；（三）江苏北部我们现没有正规部队和党的机关去活动，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目前依靠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困难，而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⑭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1939年12月下旬，侵华日军第六师团调集了嘉山、蚌埠、全椒、滁县等地的自伪军数千人，三面包抄，向新四军活动地区全椒县周家岗“扫荡”过来。刘少奇、张云逸研究决定由第四支队承担这次反“扫荡”任务，由徐海东实施战场指挥。经过三昼夜激战，第四支队大获全胜，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送上了一份奠基礼。部队官兵更是喜笑颜开，说：“胡服同志和徐司令员一到，第四支队翻身了！”

在皖东，有了靠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便利条件，刘少奇着手把中共中原局的领导健全起来。敌后的战争环境和根据地的分散，使得中原局领导成员四散各处，很难凑在一起开会，撤离竹沟以来更是如此。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的中原局成员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5人中，朱瑞调

往华北实际并未到职，朱理治去了豫鄂边区，彭雪枫在豫皖苏边区。尚在皖东的只有刘少奇、郑位三，人数太少，不便研究问题。1939年12月11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增加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3人为中原局委员。经中共中央同意之后，刘少奇连续在皖东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

第一次会议1939年12月在定远县瓦屋薛村举行。过新年以后，又分别在定远县山黄家村、大桥镇开了两次会。

这三次会很是要紧，除了解决中原局组织问题以外，对在整个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反磨擦斗争决定了大政方针。

由于新四军领导层中的严重右倾思想，使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部署在前一段时间老是落实不了。江南新四军部队实际已处于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的态势。江北的新四军部队来自不同的方面，思想不统一，有的主张西进，有的打算向北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多次要求江南新四军派部队北上到长江以北发展，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却总是托故不派，甚至要求已在江北的部队返回江南。

刘少奇首先把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拿到中共中原局会议上讨论。他再次传达解释了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路线，强调华中新四军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只能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他对中原局的同事们说：豫皖苏包皖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都面敌背顽，如果向西发展，不仅会受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限制，而且容易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极为不利。苏北地区辽阔，全属敌后，顽固派韩德勤反共不抗日，内部矛盾重重，且孤悬敌后，国民党增援接济困难。因此，新四军全力向苏北发展既有理又有利，应该号召部队集中力量，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有人指责我们招兵买马，为革命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发展人民武装，多多益善。

中共中原局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委员们在向苏北发展、坚决反磨擦、创建根据地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划清了界线。

反磨擦斗争决不是纸上谈兵，此时已经是山雨欲来。1940年春节过后，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磨擦的重点转向华中，首先是皖东。盘踞安徽的桂系军阀李品仙和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开始暗中调集部队，向皖东津浦铁路两侧的新四军部队逼近，挑起争端。3月初，国民党军委游击队党务主任委员李春初，

率千余武装人员，企图强行通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部千余人和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部约3000人，也分南北两路向大桥镇逼来。皖东上空一时战云密布。

刘少奇决定狠狠地打一场反磨擦战斗。3月6日，他同张云逸、郑位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李品仙决以武力解决新四军，桂军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们决心还击来犯的桂军，进一步巩固新四军在皖东的阵地。⑮

刘少奇、张云逸迅速调兵遣将，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反击由南路进犯的李本一部，调第五支队主力和新四军苏皖支队赴津浦路西增援。战斗开始，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联名向皖东各部队下令：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反磨擦斗争已进入紧急关头，应坚决彻底地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⑯

3月上旬，各部队战斗陆续打响。北路主力谭希林的第十四团迅速击溃向大桥镇进犯的李本一部，3月11日攻占定远县城，国民党县长吴子常逃得无影无踪。3月12日，第十四团和第九团又一举歼灭赶来援助的颜仁毅部。与此同时，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和陶勇所率的苏皖支队协同作战，打掉了国民党滁

县常备队，占领滁县、凤阳县城。皖东反磨擦斗争取得全胜。

还在攻打定远时，第十四团团团长谭希林就问刘少奇：“把吴子常打跑了，国民党会有好县长派来吗？”

“自己派嘛！”刘少奇回答说，“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我们有一个县，就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

“人家不承认怎么办？”旁边有人表示担心。

刘少奇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要谁承认？党承认你，人民承认你！在这革命高潮的时刻里，我们一定要大刀阔斧地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我们的政权。如果不把政权掌握到手，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①7}

皖东反磨擦斗争结束后，吴子常果然被打跑了。刘少奇和中原局几位领导一商量，决定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科长魏文伯去担任定远县长。

魏文伯正在永宁集一位老乡家里休息。这天夜里，已经是后半夜两点钟，刘少奇的秘书刘彬找到魏文伯，笑着对他说：“要你去做官——当县长。”

刘彬要魏文伯连夜跟他去见刘少奇。

刘少奇正在住处同郑位三、彭康谈工作，一见魏文伯进来，转身笑问郑位三：“他行吗？”

“行。”郑位三肯定地说。

刘少奇没有客套话，随即对魏文伯作了三点指示：（一）革命要夺取政权，现在我们夺取了政权，要把它用好；（二）要全面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救国，要团结群众，武装群众；（三）要抓税收，同时取消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征粮，保证军队人员的给养。^⑮

两天后，魏文伯走马上任。1940年3月17日，定远县军民隆重集会，敲锣打鼓庆祝皖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国民党顽固派当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韩德勤乘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开往津浦路西作战、路东空虚之机，调集10个团万余兵力，于3月21日向盱眙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新四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又一场磨擦事件不请自到！

刘少奇、张云逸指示留守路东的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率部坚守待援，同时电令苏北新四军叶飞部火速西援，又令第五支队、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一部回师东进。路东留守部队奋战七昼夜，直到两路援兵赶到，东西夹击，粉碎了韩德勤部的进攻。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

半塔集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反磨擦斗争的成功战例。这就是：以少量部队固守阵地，吸引、消耗来围攻的顽军，然后大部队增援合围歼敌。这一战例后来

在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中又一次得到运用和发展。

几仗一打，皖东津浦路两侧的大片地区为新四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原局指示，皖东军政委员会陆续向各县委派县长。1940年3月到9月，定远、滁县、凤阳、全椒、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来安、嘉山、天长、盱眙、高邮、宝应、淮（安）宝（应）、六合、仪征等15个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毛泽东获悉皖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极为高兴，指出这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①9}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联名发出指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凡军事行动归朱德、彭德怀及胡服指挥，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②0}

皖东的局面已经打开。刘少奇又要抓紧时间赶赴新的目的地了！

刘少奇华中之行的下一站，是皖东北。

●皖东北一时部队云集，刘少奇抓紧点将布阵，扩大战果

所谓皖东北，是指安徽东北部灵璧、泗县、宿县一带以及同它们交界的江苏东北部部分地区。

进入 1940 年，皖东北形成了一定的抗战局面，但政治、军事情况很是复杂。这一带是日本军占领区，东一个西一个的日伪军据点比比皆是。国民党方面，安徽的李品仙和江苏的韩德勤都有重兵在这里活动，而且都虎视眈眈地把矛头对准共产党抗日武装，尤以盘踞此地的江苏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王光夏为最。

皖东北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好几支：由张爱萍任总队长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由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黄春圃（又名江华）率领的一支部队，由钟辉任支队长、韦国清任政委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由胡炳云任大队长、田维扬任政委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亦称胡田大队），豫皖苏彭雪枫部派来的一个团，还有当地地方抗日武装。这些部队进入皖东北的时间都不长，且来自不同的方面，相对分散，所以在团结协调、统一指挥方面存在很多问

题，弄得不好有被敌伪和反共顽固派分割包围的危险。张爱萍等军政领导对此十分担忧，盼望尽早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他们一听说刘少奇到了华中，便发电报请他快来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

刘少奇对皖东北早就关注在心，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考虑得更远：要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开辟苏北，而皖东北紧靠苏北，又有了一定的军事、群众基础，从这里向苏北挺进，最为有利。他在1939年12月19日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依靠豫东、皖东北雪枫、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并可与山东联系。”^{①④}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皖东北各部队的团结协作和统一指挥问题。1940年2月25日，刘少奇还在半塔集的时候，就把中共苏皖区委书记金明找来汇报，然后他给皖东北几位主要军政领导写了封信，让金明带回去传达。他在信里指示他们：苏皖地区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必须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他特别提出：“总之，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党的武装，都需要扩大，不应该分彼此，不应该为这些问题来争论，应该好好的团结。”^{②①}

为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刘少奇和中共中原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先在皖东北建立军政委员会，由黄春

圃、张爱萍、金明、田维扬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调刘瑞龙去担任书记，协调皖东北的军政领导。

1940年4月21日，刘少奇和中共中原局部分机关人员，从半塔集动身去皖东北。

时值春末夏初，淮河两岸景色迷人。青翠的麦苗，金黄的菜花，把平展展的大地装扮得煞是好看。

4月29日下午，淮河北岸的泗县罗岗村忽然热闹起来。八路军部队，新四军部队，游击队，共产党干部，地方名流，老百姓，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人群从罗岗村一直排到了几里外的淮河边。喜形于色的人们在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原局书记胡服就要来了！而胡服，就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刘少奇！皖东北是开辟不久的敌后根据地，这里的人们都还没有见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到来的消息显然使大家感到格外兴奋！

一只渡船从淮河南岸越驶越近，靠上了北岸。在欢迎人群的热烈掌声中，刘少奇一行走下渡船，同前来迎接的刘瑞龙、张爱萍、金明等一一握手见面，向干部战士们招手致意！

刘少奇到罗岗村住下后，马上要刘瑞龙、张爱萍等汇报情况。汇报会一直持续到半夜，第二天又开了一天。刘少奇边听边记，仔细询问，终于把皖东北和

苏北的有关情况搞清楚了。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敌后，机会难得，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希望听中央首长作报告。5月1日，在罗岗的各部队聚集在一个广场上召开大会。刘少奇站在用牛车搭成的讲台上向部队作报告。他讲了形势，讲了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讲了斗争前景，听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后来，他又向全体军政干部作了一次反顽斗争的报告。

正当刘少奇根据皖东北情况准备部署斗争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敌情。盘踞在泗县、五河县的日本军和伪军，两面夹击向罗岗地区“扫荡”过来。张爱萍立即率部队护送刘少奇和中原局机关连夜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谁知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却乘人之危，率四个团倾巢出动，趁机侵占了原属新四军活动范围的朱湖、新行圩子及其以北地区。

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组建不久，武器和给养都不好，这下子又失去了大片活动地盘，被敌伪顽包围在南北五六十里、东西三十来里的狭长地带，处境十分困难。总队长张爱萍向刘少奇如实报告了情况。

刘少奇听罢汇报，平静地反问道：“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呢？”

“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

磨擦，这家伙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张爱萍回答。

“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少奇要的就是这样的回答。他果断地说：“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乘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你们部队同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怎么样？”

张爱萍答道：“我军有3个主力团，1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也打垮过顽固分子李品仙派来闹磨擦的马馨亭两个团的进攻。这次由于要以一部分力量牵制日寇，要歼灭王光夏4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是打垮他，赶出我们根据地是可能的。”

“那就是说，我们又有利了，是不是？”刘少奇又反问。

“是这样。”张爱萍有把握地说。

刘少奇又询问了部队的政治情况和作战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②②}

同刘少奇谈完话出来，张爱萍心里有了底。他立

刻行动，部署作战。

战斗很快打响。趁王光夏部队立足未稳，第四总队各团兵分两路，实施强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天，第四总队夺回了朱湖、新行圩子及其附近的大小20余个村庄。紧接着，第四总队又在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下连续作战，终于将王光夏部队从新四军活动区域彻底赶了出去，还打垮了他的两个团。

这一仗，张爱萍旗开得胜，打得非常漂亮。

战斗结束后，胡田大队等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来到泗县，同张爱萍部会合。皖东北一时部队云集，人欢马叫，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刘少奇抓住时机，点将布阵，扩大战果。

首先是把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刘少奇连续在罗岗、朱湖等地召集一系列的干部会议和有关人员座谈会，提出抗日政权问题。他对干部们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能存在，现在是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②③}刘少奇要皖东北军政委员会选派最好的干部去政府工作，担任县长、区长、乡长。

1940年6月，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由刘玉柱任行署专员，下辖泗县、泗宿等5个县、16个区、104个乡镇。它标志着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正式建成。

刘少奇到皖东北，更重要的目的是谋求开辟苏北的最佳途径，以便尽快使南方新四军和北方八路军连成一片。1940年5月，他向苏北的中共组织发出指示说：“目前苏北党的总任务是：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准备自己，以现在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为基干，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根据地”，“部队党与地方党要一致为猛烈扩大苏北新四军而斗争。在三个月内（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要扩大新四军至一万人枪，并加以巩固。”^{②4}

为解决苏北问题，刘少奇早已布下了一着妙棋。

还在1940年3月半塔集保卫战的时候，刘少奇把从苏北赶来增援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找来，向他面授机宜，布置任务。

在场谈话的就是刘少奇、邓子恢、叶飞3人。刘少奇在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了项英的右倾错误之后说：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苏北问题，发展华中、开辟苏北，这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是全党的任务。但是，现在解决苏北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华中的情况与华北、山东不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就逃跑一空，八路军是奉命挺进敌后作战，所以，北方局能够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共产党和八路军迅速在华北占了主导地位，国民党是哑巴吃

黄连，没法说话。

“现在华中的情况不同了。”刘少奇继续分析说，“国民党接受了教训，苏、浙、皖、赣是它的命脉地区，比华北更重视，所以它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10万大军。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新四军进来抗日。他们还与日寇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时常有点暗中勾结。日寇因为兵力不足，想借韩德勤之手为他反共，因而也很少对韩顽施加压力。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那怎么办呢？刘少奇接着说：“文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刘少奇铺开军用地图，边指点边向叶飞讲解：中央已抽调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现在，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

说到这里，叶飞已经明白，刘少奇是要他的挺进纵队担当这个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刘少奇

说：“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之后就不是你的责任。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就可以到了。就像这次半塔集保卫战一样，守一个星期增援便来了。”他又向叶飞反复交待：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要让人家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如果你们主动去打人家，那没有理，八路军不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②⑤

随后，刘少奇把这一部署向毛泽东作了报告，说：现韩德勤已退过淮河，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已不能与其接触。叶飞部在苏北有相当历史，与地方打成一片，须要叶部在苏北活动，然后我们才在政治上有理由并在自卫口号下增援叶部，解决苏北问题。②⑥

叶飞不打折扣地领受了这一特殊任务。他带着刘少奇的郑重嘱托，率领部队返回苏北，准备行动。

就在刘少奇在皖东北指导工作的期间，叶飞已经在苏北动作起来，把部队拉到了泰州大桥一带。1940年5月22日，刘少奇给叶飞去电报，要他在那里发展武装，准备独立支持。5月22日、24日，刘少奇两次向延安毛泽东和华北朱德、彭德怀去电报，要他们派八路军部队南下，在援助叶飞部的口号下一鼓而破韩德勤主力，解决苏北问题。②⑦

在作了各方面的部署之后，刘少奇离开皖东北，于1940年6月12日回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半塔集大田郢。

●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大获全胜，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胜利实现

返回半塔集，刘少奇得到报告：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新二旅共5个团和1个教导营计12000余人，在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率领下，分两个梯队从冀鲁豫边区南下华中，1940年6月下旬到达涡阳新兴集一带，同彭雪枫部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同时，由彭明治任司令员、朱涤新任政委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即将越过陇海铁路南下皖东北，同胡田大队汇合。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部，也从苏南渡江北上。

这显然是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在全力支持刘少奇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大计划。在苏北做一篇大文章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刘少奇对此已经期盼很久了！

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共同打开苏北、发展华中，这是刘少奇早就提出的战略建

议。刘少奇到华中后，又几次三番同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电报联络，商调开赴苏北的部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提议，多次通知有关方面抽调部队向苏北集结。但由于种种原因，部队老是调不过来。特别是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总是强调许多理由把部队留在江南不放，主张新四军主力应该南下，还几次要求已在苏北的叶飞、张道庸（后名陶勇）两部返回江南。

现在，向苏北调集部队的问题终于解决，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队就要到位，刘少奇十分欣慰。他预感到，解决苏北问题的时机就要到了！也就是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目标，有可能很快实现！

然而，刘少奇也深知，这件事做起来难度相当大，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恶战。政治上必须站得住，防止授人以柄，军事上更要大胆谨慎，决不能贻误战机。他很清楚，在苏北同共产党较量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侵占苏北的日本军和伪军任援道的江浙绥靖军一部，占据着几乎全部水陆要冲。国民党方面，有苏鲁战区副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直接指挥的 7 万人，和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指挥的十来个游击纵队约 3 万人，另外还有 10 个地方保安旅和税警总团 4 个团。

敌、伪、顽兵力大大超过在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

眼下刘少奇还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江北各部队的统一军事指挥问题，现在华中地区的部队已经不少，大体上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三部分，但隶属关系和组建情况各不相同。光八路军派出的就有好几支，地方武装更是参差不齐。要使这些部队密切配合共同打开苏北，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刘少奇为此多次请示中共中央，要求派得力的军事指挥员来华中，担当统一指挥各部队军事行动的重要责任。

但中共中央却要求刘少奇先把这副担子挑起来。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项英：江北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划归中原局指挥。^{②⑧}八路军一些部队陆续开到华中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又在1940年6月1日指示：“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②⑨}

刘少奇对此非常焦急。华中这么大的局面，党、政治、军事、统战、群众工作，事情千头万绪，他一个人实在照顾不过来，而且他对军事本来不熟悉，要指挥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万一出了差错，将是无

法弥补的损失。6月22日，他再次上书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恳请中共中央迅速委派军事指挥员来，解决华中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他在电报中说：目前华中部队均分散各处，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在目前迫切需要成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目前江北指挥部能力过弱，不能照顾华中全局，我个人在军事上多少还是外行，且有党政各方面的工作，在军事上是不能负责的，因此请中央迅速考虑这个问题，派人到华中来负军事责任，或朱德、彭德怀中来一个，或稼祥来，或八路军三个师长与陈毅中来一个。^{③⑩}

5天后，中共中央的答复来了。6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复电刘少奇说：“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但只有大会后才能设法。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③⑪}

既然中共中央再三这样说了，刘少奇只有先把指挥担子担起来。他在请示中共中央之后，首先下令将豫皖苏的两支部队——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对外仍保留新四军第六支队名义），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全纵

队 17000 余人。部队整编后，迅速扩张根据地，越过涡河，以风卷残云之势扫清沿途土匪和杂牌武装，直抵淮河。

在刘少奇的华中战略中，豫皖苏是“向西防御”的阵地，是开辟苏北的西线屏障。这一部署而今已经胜利实现。

八路军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主力，刘少奇要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月后，刘少奇指示黄克诚率 3 个团 1 个教导营东进，进入皖东北地区，同当地张爱萍部和新来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以及其他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实施“向东发展”战略，执行支援叶飞部、打开苏北的任务。1940 年 8 月 16 日，中共中原局正式下令：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皖东北成立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金明、刘瑞龙、彭明治、朱涤新、张爱萍、韦国清等为委员。合编后的第五纵队分为 3 个支队（相当于旅），由韩振纪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全纵队 2 万余名指战员意气风发地向东开进。

在皖东、津浦铁路东西两侧的根据地也已建设起来。1940 年 6 月刘少奇回到半塔集后，又在党的建设、政权、军事、财政经济方面采取诸多举措，粉碎了日伪军大规模“扫荡”，使皖东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到 1940 年 9 月，津浦路西有新四军第四支队、江北

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共 1.5 万人，政权区域包括定远、凤阳、滁县及合肥东北部，人口约 70 万。津浦路东有新四军第五支队等武装 1.1 万人，政权区域包括来安、嘉山、盱眙、天长、六合、仪征、高邮、宝应和新开辟的淮河北岸的将坝、岔河地区，人口约 150 万。皖东已成为向苏北发展的强大基地。

1940 年 6 月，率部驻在苏南的陈毅、粟裕不理睬项英的阻挠，独立决定带领新四军 3 个团渡江北上，准备同苏北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会师。

这样，刘少奇高兴地看到，经过一年多的苦心运筹，整个华中战场已完成预定布局。八路军、新四军从北、西、南三面对苏北韩德勤顽固派呈围攻态势。北面是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西面是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徐海东、罗炳辉部，南面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部，东面是大海。在豫皖苏，还有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部，可以阻住西面援军。而这时，执行固守待援任务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已经在苏北郭村打响了。

1940 年 6 月中旬，由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的挺进纵队，撤到国民党苏鲁皖游击纵队司令李明扬、副司令李长江的防地——泰州西北 30 里的郭村休整。下旬，两李在韩德勤的唆使下，限令管、叶部 3 天内退出郭村。6 月 27 日，韩德勤下令：“决

将该匪军就江都及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进而歼灭之。”28日拂晓，李长江部约10个团的兵力在韩德勤派出的1个旅的配合下，将新四军挺进纵队团团包围，轮番猛攻，妄图将挺纵一举歼灭。

郭村鏖战正急。挺进纵队以1个团和1个教导队的兵力，顽强地抗击着10倍于自己的敌人。

刘少奇急电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队增援挺进纵队，打开苏北局面。新四军苏皖支队星夜驰援，最先赶到。两支部队并肩战斗，艰苦拼杀。正当敌我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之际，突然发生了并未事先安排的情况：在李明扬、李长江部担任支队长的陈玉生、担任大队长的王澄和担任连长的姚力三位中共秘密党员，根据中共苏北特委的决定，率领所部阵前起义，掉转枪口协同挺纵作战。此举使战场形势陡然大变。挺纵转守为攻，将两李部打得狼狈逃跑，还击溃了他们3个团。7月3日，陈毅也赶到了郭村。

刘少奇还想把文章做大。7月4日他致电彭雪枫、张云逸等，提出利用增援挺纵进军苏北的部署意见：以新四军第五支队两个团，已到皖东北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和南进支队共约5个团的兵力，迅速赴援，箝制敌之主力，使之不能南调，待江

南陈毅、彭朱支队主力及第三四四旅到达后配合总攻。^{③②}第二天，他又发电报进一步补充说：李明扬、李长江及韩德勤对管文蔚、叶飞部的第一次进攻已被击退，我正实行部分反攻，苏北顽军已大部南移，准备与管、叶决战，其北面空虚，正是我发展的好机会。现陈毅已到管、叶处，江南增援部队不久即可到达，望令三四四旅3个团迅速东进，以便配合陈毅、管叶等部开展苏北工作。彭朱支队主力应兼程东进，在苏鲁豫支队及三四四旅来到前，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及南进支队即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东进，皖东北只留张爱萍部坚持。^{③③}

正在各路人马向苏北移动的过程中，传来郭村保卫战已经胜利结束的报告。于是，各部队根据刘少奇指示，利用空隙时间巩固阵地，整训部队，待机行动。

郭村保卫战固然胜利了，但刘少奇认为这还是小胜，苏北局面并未彻底打开。他相信机会还会来的。新四军一部在陈毅、粟裕率领下到达江北苏中，已构成蒋介石、韩德勤的心腹之患，他们是决不会坐视不管的，因而势必有一场决战。陈毅所部连同挺纵，战斗兵员不足5000人，韩德勤必定认为好对付。这就可能再次出现少量部队固守待援，大部队增援合围歼敌的战局。而且，陈毅到了苏北，统一军事指

挥方面也有了合适的人选，条件更具备了。

陈毅时任中共东南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兼政委。在新四军里，他对项英的右倾主张是抵制的。以前，由于陈毅在苏南的电台不能同中共中央通电报，因而刘少奇对他的观点也不大了解。通过这次陈毅独立决定进军苏北，刘少奇对他了解了。4月21日陈毅经过努力和中央通了电报，刘少奇同他有了直接电报往来，就更信任了。8月2日，刘少奇发了一封给陈毅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苏北各部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请立即进行准备工作。^{③4}

同顽固派在苏北决战的机会又一次来到了。1940年7月底，陈毅率部东进黄桥地区建立根据地，9月在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泰县地区成立了由管文蔚任主任的“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韩德勤大为恼火，调集大军分左右两路进攻黄桥，想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把他们一下打垮。

刘少奇又开始运筹。1940年9月1日，他发电报部署行动方针说：韩德勤主力将向陈毅部进攻，华中各部队应集中全力向东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及新四军第五支队即向南、向东出击，在西面应采取守势，力求对桂系和缓；为了保障苏北问题的彻底解决，必要时八路军第三四四旅部队须调至津浦路东，

新四军第四支队须再抽调部队赴路东。③⑤第二天他又致电黄克诚、罗炳辉：如韩德勤大举向陈毅部进攻，苏北各部必须不顾一切全部南下，向盐城、东台、兴化攻击前进，以便增援击破韩的主力。③⑥

9月3日，刘少奇发电报向正在黄桥固守的陈毅、粟裕布置：由于地形条件和顽军的阻碍，黄克诚和罗炳辉部开到东台、宝应的时间尽可能求快，但事实上决不会快的，因此，对韩的自卫作战，你们要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最好在开始时只进行防御战，不作大的出击，如能独立解决战斗亦好。还应加强政治宣传，加紧统战工作，瓦解韩部的战斗意志，并让路给韩部退走。③⑦

陈毅已经对刘少奇的运筹心领神会，接电第二天就回电刘少奇并报毛泽东、朱德说：“我处即照胡服3日电原则办理，吸引韩之大举进攻，先逐渐向后引退至适当地点布置巩固，争取延长时间，以便公布韩之罪状及我之正当防卫之理由。”③⑧

刘少奇对这次能解决苏北问题很有信心。他计算了一下，集结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已经有46个团加4个独立营，人数有66200余人，加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约2500人，这还不包括豫鄂边区李先念部和华中各部队的行政机关武装。而且，华中的大部队分布在韩德勤的北、西、南面，呈钳口形包围的

有利态势。陈毅部楔入苏中黄桥地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已进至大运河西岸。所以，刘少奇向陈毅提出：解决苏北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只要政治上有充足理由，军事上是有把握的。^{③⑨}

但是韩德勤利令智昏，以为他的数万大军对付黄桥地区这区区不足 5000 人的小部队绰绰有余。10 月 4 日，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等 1.5 万余人开始向黄桥发起进攻，同时布置两李和陈泰运的税警总团从两侧策应。全部力量加起来，韩德勤部共出动 26 个团约 3 万余人。

黄桥面临大兵压境，形势确实严峻。刘少奇急电黄克诚部向南推进增援，并报告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接电后通知在重庆的周恩来，要他向国民党交涉，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对策。

韩德勤急欲把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这一“眼中钉、肉中刺”拔掉，按他的原定计划疯狂扑向黄桥。双方猛烈交火，黄桥地区炮火连天，枪声大作。陈毅、粟裕调动部队诱敌深入，分割围歼，各个击破，终于打退了韩军的进攻，还一路追击到海安、东台。这时，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向韩军背部出击，攻占盐城。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夹击，一路肃清残敌。

10月10日，两支部队的先头部队在盐城以南白驹镇北的桥头胜利会师。

黄桥决战胜利结束！

这一仗，歼灭了韩德勤部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共12个团，连同被歼的保安旅一部，共消灭顽军1.1万余人。顽军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阵中自杀，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黑夜突围时落水淹死，韩德勤率残部逃往兴化。

黄桥决战的胜利，使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已被共产党控制。中共中央确定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胜利实现。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40年10月8日，刘少奇高兴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敌寇汉奸与顽固派的夹击中，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④①}

局面打开了，根据地扩大了。刘少奇决定尽快把中共中原局的指挥机关移往苏北。

1940年10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原局领导机关、江北军政干校学员和其他干部1000余人，从皖东半塔集出发去苏北。

刘少奇一面曲折行军，一面顺道检查工作。他先

到淮阴县刘皮镇张爱萍部，接着到阜宁县东沟黄克诚部，11月4日同黄克诚一起乘船南下，11月5日到达海安，同陈毅、粟裕会合。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委

中共中央：

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④①}

电波从苏北海安飞向陕北延安。这是刘少奇1940年11月5日同陈毅会合五天后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在华中地区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件事情刘少奇早已要办。经过在海安同陈毅的长谈，情况更加清楚，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成熟了。

两天后，中共中央正式批复：同意以叶挺为华中

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未到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的复电另外加了一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④2}

统一指挥问题解决之后，领导工作顺手多了。刘少奇、陈毅等一面调兵遣将布阵华中，一面抓紧筹建华中总指挥部和苏北政权机构。

1940年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议会海安召开。会议选举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选举产生了以管文蔚为主任的临时行政委员会。两天后，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也正式成立。在当天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胡服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华中总指挥部所辖主力部队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兼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豫鄂挺进纵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

11月23日，刘少奇、陈毅率中共中原局、华中总指挥部机关移驻盐城。一个月后的12月31日，刘少奇接到通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共山东分

局归中共中原局管辖，由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

刘少奇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这时的局势却越发严峻起来。黄桥战役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11月，国民党军河南汤恩伯部9个师和安徽李品仙部4个师共15万人，分别向皖东、淮北进攻。国民党东北军霍守义部借口武装调停磨擦，也从山东南下淮阴，到苏北抢占地盘。韩德勤不甘心失败，伺机东山再起。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虽然数量不算太少，但驻地分散，没有真正连成一片，在许多地方立足未稳。各部队组织了一些打击日寇和反磨擦的战斗，但没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总体格局。

必须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刘少奇、陈毅经过郑重研究，拟订了坚持华中的部署意见。1940年12月14日，他们向毛泽东、朱德等报告说：由于华中在战略上的重要，蒋介石和国民党桂系是绝不能让我们在华中建立这大块根据地的。国民党可能在西北、华北和缓，而在华中进攻，以各个击破我们。还由于华中根据地是在抗战两年后来建立，所以各方面的工作比华北要困难些和复杂些，加上这里干部少而弱，部队与根据地还不够强、不够巩固。目前皖东已成了最薄弱部分，苏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须要很大努力。为此，拟令第四支队撤回津浦路东，苏北

部队在可能时增援皖东。请中央即令杨得志 4 个团到彭雪枫处，皖南部队从速北移，否则皖东阵地削弱，将影响华中全局，江南部队转移的困难亦将增多。④③

要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到皖东、苏北，在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和项英的电报中对这一部署提出过不下十来次。为使皖南部队顺利北渡，刘少奇还根据中共中央意见放弃了在黄桥战役后接着解决韩德勤的计划，以避免国民党向皖南新四军报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更是频频给项英去电，敦促他率皖南新四军“速速过江”。可项英就是迟迟不动，找出种种理由一拖再拖。毛泽东十分生气。1940 年 12 月 26 日他给项英去电严厉批评说：“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④④

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吃大亏”的不幸事件果真发生了！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9000 余人，在项英、叶挺率领下移师北上。6 日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军第

三战区7个师8万重兵的包抄歼击。新四军官兵浴血奋战，拼死抵抗……

皖南事变的枪声打响，泾县茂林战况惨烈！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在苏北的中共中原局无法及时获得军情，心急如焚。刘少奇彻夜不眠，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焦急地等候着延安和皖南的电报。

1月9日，刘少奇的电台突然接到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电报：“今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④5}

刘少奇接电大惊：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关键时刻不告而别脱离部队，此情非同小可。刘少奇立即复电叶挺、饶漱石，要他们二人“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带领部队突围。他同时急电中共中央，提议鉴于“项、袁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请中央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并撤项英职。^{④6}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刘少奇、陈毅，要他们就近随时帮助皖南新四军，指示皖南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执行北移任务。^{④7}第二天，中共中央又正式决定，皖南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④8}

但这时，皖南新四军已经被围攻了整整六昼夜。突围不成，弹尽粮绝，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巨大危险。

刘少奇寝食不安，每天抽烟量由一包增加到五包，想尽一切办法为皖南新四军解围，以挽救这支部队。1月12日，他和陈毅向毛泽东等去电建议：请山东八路军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④9}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答复：同意刘少奇、陈毅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⑤0}

然而此时事实上已经来不及了。皖南新四军在血战七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惨遭覆没，只有两千余人逃了出来。叶挺被国民党军队扣押，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反咬一口，诬称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

一时间中国上空乌云翻滚，反共鼓噪甚嚣尘上。社会舆论认为，这次皖南事变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形势又将陡然逆转。在共产党内，主张同国民党决裂、为新四军报仇的呼声一下子高涨起来。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⑤1}

刘少奇严肃而慎重地分析着形势。冷静下来之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1月15日，他给毛泽东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说：“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他提出：全国局面，国民党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建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⑤2}

中共中央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经过认真讨论，重新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刘少奇又积极向中共中央提议重建新四军，以同国民党想消灭新四军的图谋针锋相对。1941年1月17日、18日，他两次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⑤3}

两天后，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任命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惊人之举，像一声春雷，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为之震慑。它又像一阵春风，把皖南事变以来郁积在人们心头的愁云一扫而光。中国人民又看到了希望。

中共中央的决定传到苏北，新四军官兵和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振奋不已。人们为新四军将在苏北新生而倍感光荣。干部战士中间还兴奋地传颂着一个信息：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原来就是胡服同志！

从华北到华中，刘少奇因工作需要一直使用“胡服”这一化名，在多年来中共中央的文电中也都称他胡服。所以知道刘少奇真实姓名的人不多，一般同志只知道他叫胡服。这次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中，突然打破以往惯例直称刘少奇，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在惊喜之余，咀嚼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细节，因而兴致勃勃地谈论了好一阵子！

刘少奇自己当然没有心思多想这些。重建新四军，是又一副艰巨的重担。从发动安源大罢工起，刘少奇已经多次受命于危难之际，这已经说不上是第几次了。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时间就是武器，就是胜利！新四军军部重建工作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1941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

四军命令的第五天，离皖南新四军在茂林覆没仅 12 天，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宣告成立！激动人心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1 月 25 日下午，盐城游艺园红旗招展，群情振奋，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新四军各部队干部战士代表，盐阜区各县政府、参议会、群众团体、直属学校的代表以及地方爱国知名人士，共 1000 多人出席大会。当刘少奇宣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发表讲话。刘少奇坚定有力地说：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植根在人民之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虽然能给我们造成一时的损失，但想消灭我们却是痴心妄想。我们是越打越强，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现在他一打，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

陈毅的讲话热情洋溢。他说：新四军是一支特殊的人民军队，具有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具有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要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陈毅特意向大家介绍公开真实姓名后的刘少奇，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革命形势就迅速好转。抗战后，

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今后新四军直接在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在政委领导之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我们能依照中央的政策做下去，一定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

新四军的整编工作很快完成。刘少奇、陈毅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将新四军全军编为 7 个师 1 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全军共 9 万余人。

刘少奇、陈毅又对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作了新的部署：第一、第三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第二、第四师在淮河北、津浦路两侧坚持，加强对西防御；第五师在鄂豫皖独立发展，并逐渐向东与第七师连接；第七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积极同第二、五、六师接通；第六师坚持苏南，阻止反共军北渡。

华中部队自此形成了刘少奇、陈毅的统一领导。新四军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劲旅，战斗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抗日战场！

自打到苏北以来，特别是皖南事变以来，刘少奇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加上长期过着无人照顾、没有规律的单身生活，使他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几乎要垮下来。同志们都希望他再找个伴侣，以便有人照顾他的生活。在一些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下，刘少奇和军部保健护士王前于3月30日结婚。

●重建后的新四军声威大震，华中抗日根据地一步一步巩固起来

新四军重建以后，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中原苏、皖、鲁、鄂、豫五省的抗日战场，声威大震。在西起汉水，东到黄海，北达陇海铁路，南跨长江两岸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范围内，到处都有新四军健儿的活动足迹。

华中呈现前所未有的抗日民主新气象。两年前，这里还是日伪军和反共顽固派的天下，仅有的几支新四军部队弱小而分散，很容易被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在整个华中敌后，共产党已经控制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占据优势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已经胜利实现。

皖南事变后，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遇害，副书记

饶漱石等幸存的一些干部陆续辗转来到苏北，东南局实际上已经不能履行职责。中共中原局自1939年在河南竹沟组成至今，也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成立新的中共华中局。

1941年4月底至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华中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后称华中分会）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中共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曾山任组织部长；新四军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整个工作的进展按部就班，令人满意。可刘少奇脑子很清醒。在一片赞扬声中，他看到的是形势的复杂，任务的艰巨。1941年5月6日，他主持召开中共华中局会议，冷静而又郑重地向委员们分析着华中的形势。他指出：华中继续存在着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军三股势力，现在华中敌、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无论哪一方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而是一个相持的长期的斗争。目前在华中敌后地区，我们已占优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接着的任务就是巩固华中的问题。发展易、巩固难，华中工作又比华北困难些，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他接着又一项一项地提出了加

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学习革命理论等方面的任务。^{⑤4}

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巩固华中的总目标开展起来。

新四军按照刘少奇提出的“建设正规化党军”的要求，建立起各种制度。各师努力充实兵源，配齐干部，又经过一番整顿训练，顿时气象一新。仗也越打越大了，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清乡”。1941年，新四军各师共作战2391次，缴获枪支2.6万多支，打死打伤敌人3.3万多人、俘虏2万多人。全军总人数由9万人发展到13.5万人。

华中根据地的党、政机构一步一步健全起来了。全华中设置了苏中、盐阜、淮北、皖东北、淮海、津浦路东、豫皖苏、鄂豫边、苏南9个中共区党委。行政区也重新划分，并且按三三制原则层层设置了专员公署和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人口增加到1500万人，占华中敌后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地政府开办的江淮银行，还发行了华中地区通用的江淮币。

各类学校、团体、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华中建立起来：中共华中局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江淮大学，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苏北文化协会、在华日人反战同

盟，《江淮日报》、《老百姓报》、《江淮文化》、《真理》、《实践》……这方面事业的兴旺，把许多著名文化人和国际友人也吸引到苏北来了。

苏北一时人才荟萃。新四军越发兵强马壮。华中抗日根据地一步一步巩固起来。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清乡”和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至1942年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华中根据地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就，实属相当不易了。

作为这一切统帅部的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军政首长们各司其责，干劲十足。刘少奇除了统领全面，有一件工作他是要直接抓的，这就是党的思想理

图7 刘少奇、陈毅同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合影。

论建设。

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英勇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为世界上大多数政党所不及，但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思想准备和理论修养不够。他还认为，抗战以来随着共产党在各方面的胜利，大批非无产阶级成分加入党，带来了各种不良意识和倾向，因此，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是完成党面临的艰巨任务的根本保证。

刘少奇指示华中局党校、抗大分校抓紧培训军政干部，首先让这些担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坐下来学习，换脑筋。他亲自去给接受培训的干部们上课，给他们讲马列理论，讲共产党的基本知识，讲工作方法。

中共华中局党校设在阜宁县汪朱集。刘少奇已经多次从他住的阜宁县城单家港去党校讲课，1941年9月华中局党校第二期开学。这批300多名学员都是各单位选送来的负责干部，师生们希望刘少奇给他们系统地讲一讲理论知识。为了方便，刘少奇索性也搬到汪朱集，和学员同吃同住在群众家里，白天找军政干部谈心，晚上在油灯下备课。

在11月2日到12月4日刘少奇住在华中局党校的这一个月里，他给学员们讲了《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唯物辩

证法》、《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在这前后，他还在华中局党校作了《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讲演，写了《人的阶级性》、《答宋亮》等理论文章。其中的《论党内斗争》这篇讲演，后来传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到之后，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语，说：“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⑤⑤}

冬去春来，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巩固发展中跨进了1942年。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华中局会议，听取陈毅作关于淮海区和皖东北情况的报告。他正开着会，机要人员送来刚收到的中共中央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⑤⑥}

这是中共中央第二次来电要刘少奇回延安了。上一次是1941年10月3日，但当时华中的诸多工作使刘少奇不便马上离开，所以经中央同意推迟一段

时间。现在中央再次催促，恐怕不能再拖了。

中共华中局的同事们还想挽留，就又给中共中央回了封电报，说：“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⑤7}

中共中央没有同意继续推迟的要求。1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通知，还给刘少奇增加了一项使命，要他在回延安途中，先顺道去山东根据地解决有关问题。^{⑤8}

于是，刘少奇抓紧时间召开原定的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正式议程从2月14日进行到3月5日。由于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所以开起来很顺利，一致通过了刘少奇作的《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1942年3月5日，扩大会议就要结束。刘少奇在作会议总结讲话的最后，向华中局的同志们宣布了他即将回延安的消息。他平静但不无动情地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

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⑤9}

刘少奇话音未落，代表们已经议论纷纷，挽留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就要走了。朝夕相处的同志们从心里舍不得他离开。在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联合召开的欢送会上，陈毅代表大家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他说：“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势危急时刻，于1939年初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统帅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3年时间，但这3年，是血雨腥风的3年，是不平凡的3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功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圆满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第二，提出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第二，提出了正确处理皖南事变的斗争策略；第四，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了华中党组织……^{⑥0}

大地春回，和风拂煦。1942年3月19日上午，刘少奇启程离开华中。和他同行的，有吕振羽、贺绿汀、沈其震、吴信泉、王兴纲、崔义田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赴延安的100多名干部，和有关的工作人员、警卫

人员。上午 10 点左右，刘少奇一行在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地方各界干部群众的热情欢送下，从阜宁县单家港出发，踏上回延安之路。

第六章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从苏北到延安，穿越敌人 100 多道封锁线，行程 3000 里

正当刘少奇在苏北为华中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而紧张忙碌的时候，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热切地关注着他，酝酿着要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941 年 9 月 10 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康生、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凯丰、博古、邓发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和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一些重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的内容，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会期拉得比较长，断断续续开了 1 个多月，到 10 月 22 日才结束。会议经过分析讨论，确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

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一些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不约而同地推崇刘少奇。陈云9月11日发言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陈云郑重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任弼时在第二天的发言中也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①王稼祥在发言中讲到：“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②康生在9月29日的发言中还检讨了自己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刘少奇对，他当时反对刘少奇反错了。他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①

会议开完后，毛泽东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里面多处肯定刘少奇，称赞“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

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③

对会议上的这些情况，远在华中的刘少奇当然并不知道。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不等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就发电报要刘少奇回延安：

少奇并告陈毅：

（一）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二）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三）何时可以动身盼告。④

可这时华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刘少奇处理，如果一下离开，将对工作很不利。刘少奇回电请中共中央考虑能否暂缓回延安。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再次表示甚望刘少奇参加中共七大，七大后即留在延安指挥华中，行期可推迟两三个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一直记着这件事。3个月刚过，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又一次作出决定：致电华中局要刘少奇回延安。第二天，电报通知正式发出，并且语气坚决：“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

延。”⑤

看来再不走是不行了。刘少奇决定开完华中局扩大会议就动身回延安。1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打来电报又给他增加了一项使命，要他代表中央去山东根据地指导工作，解决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

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交通困难，中间有很多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光敌人设置的武装封锁线就有100多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刘少奇回延安途中的安全问题极为重视。2月13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说：“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⑥2月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⑦

毛泽东也许觉得这样还不保险，于是又给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去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同时要刘少奇再等一等：

少奇同志：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障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⑧

一个星期后，3月21日，毛泽东把彭德怀关于沿途敌情的电报转给刘少奇，并且又一次强调：“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⑨

其实这时刘少奇已经动身两天了。他自己对安全问题倒并不太在意。既然决定了要走，那就尽可能早点走。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越过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山东临沭县朱樊村。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副书记黎玉，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已经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所以早就在盼望刘少奇的到来。

山东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根据地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山东根据地的工作却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要领导人之间不团结，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从而影响到整个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曾经收到争论双方各自的申述，但终因情况不明加上派不出人，只好把这事搁置了下来。最近，山东根据地形势吃紧，部队减员，生活困难，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中共中央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刘少奇。

刘少奇一到，便分头找朱瑞、罗荣桓、陈光、黎

玉等干部个别谈话，召集小型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还把根据地的全套文件、报刊找来，仔细研究，以弄清问题的症结。

情况逐渐明朗，刘少奇着手解决问题。1942年4月26日，他召集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意见。刘少奇充分肯定几年来山东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分析说：山东境内共有日本军3.3万人，伪军8万多人，合计11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约13万人，其中反共的就有8.5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11.1万多人，其中主力部队5.5万人。但我方主要分布在一个狭长地带，中间还被日伪军的据点和公路多处隔断。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日伪占优势，国民党次之，我方居于第三的劣势地位。1939年12月中共中央曾指示要“在山东争取优势”，这一任务没有完成。刘少奇严肃指出：“目前山东故我友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然后，刘少奇提出了山东根据地的总任务和六项具体任务。^⑩

紧接着，刘少奇参加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建立山东有力的政

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在分局下设一军政委员会；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机关人员大幅度压缩；朱瑞、黎玉均驻一一五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一起办公。这次会议以后，山东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来朱瑞 1943 年 8 月调赴延安，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的领导核心进一步改善。

1942 年 6 月，刘少奇在中共山东分局会议上作关于山东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随后，山东分局作出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把刘少奇的一系列意见写了进去。这个文件，成为山东根据地从困难、挫折转变到巩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山东工作由此明确了方向，摆脱了徘徊和困境。

中共中央原来没有安排刘少奇在山东停留这么长时间，刘少奇本人也没有想到。可一来由于山东工作的需要，二来途中安全仍令人担心，出发的时间便一再地延宕下来了。

1942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打来一封电报：

胡服同志：

26 日电悉。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

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⑪

过了一个月，交通安全情况仍未好转。毛泽东又发来一封很长的电报，里面说：“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蹲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⑫

没办法，只好再等。一晃十来天又过去了。这时山东工作已告一段落，刘少奇觉得没必要再等下去，决定启程。

为了应付沿途险情和行动方便，刘少奇将原先随行的100多人精减为18人，统统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他自己化名老许，打扮成生意人。1942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这支轻捷的小分队在旅长曾国华率部队护送下，离开朱樊村，继续向西北进发。

刘少奇一行一踏上鲁南便进入了敌占区。小分队只得昼伏夜行，常常要从日伪军的据点之间穿行，或者是从汉奸地主的庄园旁擦身而过。为了躲避敌

人，光过沅河就来回过了3次。

从鲁南到陕北，途中敌我势力犬牙交错，情况复杂。在一个根据地和另一个根据地的中间，是环境险恶的敌占区。刘少奇一行只有一段一段地小心通过，曲折行进。

鲁西南地区——冀鲁豫边区——晋东南辽县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沁源县太岳军区司令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刘少奇像踩石头过河一样，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接力过去，终于在1942年12月下旬进入陕北境内。

这一段漫长的行程，真正是充满艰险，不仅敌情严重，而且生活困苦。因为在这一年，所有的抗日根据地都处在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9月刘少奇路过涉县赤岸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的时候，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盛情招待刘少奇吃了顿饭，吃的东西却只有干羊肉。邓小平后来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有吃肉了。”^⑬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继续关注着刘少奇离开山东后一路上的安全。得知刘少奇到了一二九师师部，毛泽东立即发去电报：

少奇同志：

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

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⑭

10月16日，毛泽东获悉刘少奇即将穿越敌人严密封锁的白圭至晋城铁路，特地通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书记兼晋绥军区副政委林枫、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琪，要他们派人小心接护：

林、周、甘同志：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⑮

1942年年底，艰难的行程终于结束。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延安。随行的警卫员们扳着指头一算：这趟路程整整经过了9个多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里，真称得上是一次小长征！

●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此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1943年，元旦之夜。

延安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共中央大礼堂里，灯火

通明，彩旗高挂，欢声笑语响成一片。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新年庆祝晚会，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会场，同 1000 多名机关干部一起欢度元旦。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新年讲话，刘少奇向大家报告了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接着，大家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延安平剧院的演出。欢乐的晚会一直持续到午夜方散。

刘少奇在杨家岭的两孔新窑洞里安了家。同敌后战争环境相比，生活是相对安定了，可工作的担子却更重了。他的工作马上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参加中共中央日常领导，同时继续指导华中、山东根据地工作。

1943 年 3 月 16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

组织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会上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华中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同时决定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这次会议意义深远。会上所决定的事项，对中国共产党此后的路线和历史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但职务只是补选为政治局常委，担任负总责（通常称总书记）的是张闻天。那么为什么大家早就叫他毛主席呢？这是因为，毛泽东1931年11月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底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们称呼他“毛主席”，就是从那

时起形成的习惯。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表明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这是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的开始。

从这次会议到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①⑥}

刘少奇身兼数职，越发忙碌起来。

这时候全党整风运动已经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和各根据地地进行得如火如荼。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已经作为运动中的学习文件，现在他本人更以相当的精力参加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整风运动逐渐进展到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阶段。刘少奇为此发表《六年华北华中经验的报告》、《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讲话和文章，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向高级干部会议作中共历史问题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以来党内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把投降路线纠正过来了，政治路

线上解决了问题，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①7}他在这里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第二天，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很快为大家所接受，人们从此开始把毛泽东的理论、路线、策略等称为“毛泽东思想”。

这些观点和提法新颖、有力，顿时成为延安整风总结阶段的思想武器。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在延安的中共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全面领导这场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进入更高层次。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利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相对稳定的环境，坐下来总结历史，统一思想。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到实际工作日程上来了。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着手进行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召集起草中共七大组织问题报告，由任弼时负责召集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共七大之前先举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通过了一个决议，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个五人主席团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断断续续开到1945年4月20日，历时11个月。七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开中共七大，五人主席团成员又作为中共七大主席团的常务主席，继续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所以五人主席团实际上一直工作到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出新的领导班子才结束使命。而主席团的这五位常务主席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全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充分说明了这个班子的众望所归和久经考验。确如邓小平所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

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⑮

五人主席团担负着领导党、政、军、民全面工作的重任。首先是指挥各解放区向日伪军展开反击，将抗日战争推进到战略反攻阶段。在主席团统一领导下，从1944年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攻占沦陷城镇，拔除敌人据点，扩大解放区。光这一年，各解放区共作战1.1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虏6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失地，使解放区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民军队扩大到91万人。同时，主席团还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国19个解放区开展整党建党、减租减息，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等工作。

中共七大的各项筹备也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刘少奇在精心准备新党章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任弼时负责的关于历史问题文件的起草工作更是抓紧，因为它要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先行讨论通过。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作了结论。在这个长达5万字的文件中，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也对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作了充分肯定。

《决议》里面写道：

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①9}

这些是重要的历史结论。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的贡献和水平已经为全党所公认了。

1945年4月20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里，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代表们眉头舒展，喜气洋洋。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通过的时候，代表们无不为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空前一致而感到心情格外的舒

畅！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修改党章报告， 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系统阐述

延安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大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前檐上方写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内是一排排整齐的木座椅，两边墙上挂着 24 面鲜红的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 24 年战斗历程。晚上，礼堂屋顶吊挂着的五盏大汽灯，把整个会场照得通亮。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 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自中共六大以来，17 年过去了，由于长期处于严重的战争环境，直到今日，才能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力量也不大，只有 13 万党员，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使代表大会只能搬到国外去开。现在不同了！经过了 17 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壮大了。共产党员人数已发展到 121 万，党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和其他抗日正规军已达 91 万人，民兵 221 万人，并拥有 9550 万人口的解放区。

根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提议和七大预备会议决定，中共七大的议程有四项：（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朱德作军事报告；（三）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1945 年 4 月 23 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 544 名正式代表、208 名候补代表，意气风发地步入中共中央大礼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们看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是主席团常务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共七大开幕。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接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又名野坂参三）发表了简短演说。

第二天，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没有在大会上念这个报告，而把印好的报告稿发给每一位代表。在这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又作了长篇口头讲话，进一步阐发了《论联合政府》中的内容。

4 月 25 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5 月 14 日至 15 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七大的代表们用大量的时间对这三个报告和新党章草案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概括和论述，代表全党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而成为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

图 8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 年）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刘少奇受命主持起草新党章的过程中，他反复组织有关同志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使新党章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特点。他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串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的历史特点。”^{②①}

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他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情况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他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他提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②②}

6月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44名正式中央委员，33名候补中央委员。6月11日，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始，6月11日闭幕，前后共进行了将近50天，中间开了22次全体大会。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总结道：“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②②}

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组成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势如破竹！

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位助手。这年，他47岁。

●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就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军民为中共七大的胜利闭幕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又接二连三地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联军队随即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攻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对日伪军发起猛烈反攻，连连攻克城市，收复大片失地；

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

历时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全国城乡一片欢腾！人们流着喜悦的眼泪奔走相告，欢呼跳跃！这一天的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中

国人民为此进行了整整 8 年的极为艰苦的斗争，付出了伤亡 2100 万人、财产损失难以数计的巨大代价！

整个延安城洋溢着比过年还要兴奋的喜庆热浪！从城区到郊外，漫山遍野红旗飞舞，锣鼓齐鸣。入夜，人们燃起篝火，举着火把游行庆祝。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扭秧歌的队伍。狂欢一连持续了 3 天。

想想看，在 8 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军作战 12.5 万余次，阵亡和负伤的指战员达 60 余万，伤亡的根据地群众达 600 余万哪！现在终于胜利了，人们怎么能不欣喜万分呢！

然而胜利后的国内局势甚是复杂。蒋介石觉得这下子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了，但又顾虑国际国内呼吁和平的舆论，军队部署也尚需时日。于是他耍了一个手腕：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1945 年 8 月 14 日、20 日、23 日，蒋介石向延安连发三次电报，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毛泽东要不要去重庆谈判呢？对蒋介石的用意，中共领袖们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怎样应付，仍需认真对待。

1945 年 8 月 23 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的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时局和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定下了应邀谈判的方针。毛泽东总结说：“我是否出去？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②③}

会议最后作出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刘少奇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中央局发出电报通知：在毛泽东赴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就在这一天，简陋的延安机场降下了一架美式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气宇轩昂的外国人和一位戎装笔挺的中国人。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军张治中上将。他们是专程来迎接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

毛泽东就要走了。他把刘少奇请来，仔细地交待

着方方面面的工作。两个人交谈了整整一天。

8月28日，刘少奇、朱德和上千干部群众，来到延安机场，为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行。

飞机徐徐驶离跑道，冲向蓝天。刘少奇仰望天空，目送毛泽东南行而去，深感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

●刘少奇主持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大决策，中共军队大规模战略移动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的全面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进入有利战略态势，真可谓日理万机。

刘少奇到了他一生中又一个最紧张繁忙的时期。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一件件大事。

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东北。东北三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丢给了日本人，国民党军队跑得精光。蒋介石现在又想重新

控制东北，却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几年在那里有了相当的基础，在东北和华北的接合部还建立有冀热辽根据地，可便于八路军出关。东北地域辽阔，工业、交通发达，物产丰富，一旦建成巩固的解放区，使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斗争中处于极有利的战略地位。

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这一点。日本投降后，他也在抓住各种机会，利用中央政府的合法名义和同苏联订有条约的有利条件，在美国支援下加紧向东北空运部队，行政、军事、外交三管齐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东北。

这是战略部署的争夺，时间的比赛，就看谁调度、开动得快！

8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曾陆续抽调延安两个团、由原东北军万毅部组成的滨海支队、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以及冀中、冀鲁豫各一团，先后往东北开进。但由于交通不便，情况不明，特别是对苏联军队碍于中苏条约是否同意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尚不清楚，所以直到毛泽东赴重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奉命开往东北的部队大部分还在路途中。

毛泽东走后，刘少奇立即加紧调集部队和组织人员开赴东北。8月28日他对从延安出发去东北的干部讲话说：去东北的人员要想方设法尽快进入东

北，只要我们在那里有了工作，就可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资本。^{②4}9月7日，他指示中共华中局，要他们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带队，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9月11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当时正在延安待命的八路军第三支队政委张启龙，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伍晋南等一批干部，中共中央原准备派他们南下去新四军第五师和广东工作，现在也掉转方向，改派去东北，即日启程。

正在刘少奇加速往东北调兵遣将的当口，1945年9月14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突然降临一架苏式小型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部队贝鲁罗索夫中校和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下旬曾克林带领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奉命开进东北，9月6日进驻沈阳，组成了由曾克林任司令员的沈阳卫戍司令部。他们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又是第一次接管大城市，孤军深入，缺乏经验，迫切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可偏偏他们的电台功率低，在出关后便不管用了，怎么摆弄也同延安联络不上。正在犯难之

际，他们获悉苏联红军派驻东北的前线总司令罗翁季·雅科夫列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也想派代表去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谈问题。冀热辽军区前委便决定曾克林搭乘苏军代表的飞机去延安，当面向中共中央请示。就这样，曾克林同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一起飞到了延安。

贝鲁罗索夫的使命和曾克林不一样。他一到延安，就去会见朱德总司令，正式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这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

外交辞令冠冕堂皇。贝鲁罗索夫转达的意见，显然就是苏联当局的意见，不可等闲视之。朱德立刻把会见情况向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下午，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

讨论之前，先把曾克林请来介绍情况。刘少奇对曾克林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

在曾克林作了详细汇报之后，刘少奇主持政治

局会议展开讨论。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问题，刘少奇说：可采取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4个师到东北，还是去，方针还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用八路军，但须使群众知道是八路军。②⑤

最后，刘少奇又提议，为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加强东北的领导，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②⑥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项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兵贵神速。第二天早晨，新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和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便同贝鲁罗索夫、曾克林一起，乘他们来的那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东北。

新的战略部署一经确定，就要狠抓贯彻。9月15日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力量。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

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 100 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100 个团干部的分配为华中 20 个，山东 30 个，晋察冀 25 个，晋冀鲁豫 25 个。^{②7}

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引出的连锁反应牵动到各个部队，各个解放区。这无疑是抗战以来最大的战略移动。军队、干部、专业人员根据层层下达的命令，不声不响地然而却是坚决迅速地重新布防、调动。

向全党全军提出新的战略方针，以指导各解放区、各部队的统一协调行动，已是迫在眉睫。

时机成熟了。1945 年 9 月 17 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写道：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 10 万至 15 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②8}

中共谈判代表团当天就发回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 月 19 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又发来电报，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

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②9}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的意见显然相当重要。刘少奇一刻也没有拖延，立即于当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庆来电和战略方针、军事部署。

刘少奇首先在会上系统发言说：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控制张家口、山海关，使蒋介石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不可能。东北海岸只要5万人在渤海湾一段被我们控制，蒋军就上不了岸。东北局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同时要各地配100个团的干部，马上就去。准备11、12月在冀东屯集5万兵，在苏军撤退时宣布八路军进东北。各地不要疏忽，还有两月多。15万兵力，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我们就能控制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因此，我们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③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由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

会议结束，刘少奇回到住的窑洞，顾不上休息，

坐下来一连起草三份电报，连夜发出。

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

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③①}

第二、第三份电报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其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其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

毛泽东也是高效率，连夜发来了回电，完全同意

中共中央的部署，并且说，江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③2}

方针、部署、计划都定下来了，现在就是要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抓落实，一抓到底。

中共军队的大规模战略移动进入实际操作。

驻山东地区的部队在这次战略行动中任务最重，几乎全部要调往东北和冀东。1945年9月20日，刘少奇首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全部力量来完成当前任务，要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起20万至30万的作战部队，在冀东屯集5万至10万的军队，以阻绝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机紧迫，越快越好。望罗荣桓、肖华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③3}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指示，紧急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赴东北。本来林彪在中共七大闭幕后被派往山东，8月25日他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延安先到太行山，这时得到中共中央调令，也便改道出山海关而去。

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二个指示是给中共华中局的。这时华中地区的主要领导

人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军长陈毅。刘少奇指示他们：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苏南及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能迅速向东北开动。^{③4}

这一天，刘少奇还主持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截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命令山东军区派 3 万基干兵团，限电到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 3.5 万基干兵团，限电到后 20 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③5}10 月 6 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等，要第三师部队到山东后继续兼程北进，开赴东北。^{③6}

但行动的实际进展却不如人意。这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由于任务紧急，组织工作繁重，交通工具奇缺，进度还是跟不上。如此下去，将痛失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决定采取断然措施。9 月 29 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东北的领导人：山东部队和干部，如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也不能到达，那

时国民党军队必将进入东北，所以必须不顾美舰巡逻，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确实办法，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要在 20 天至一个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战略任务，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③7}

刘少奇紧盯不放，第二天又追发一电，提出更严厉、更严密的部署。他发出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电：（一）望令万毅、吴克华立即带电台及工作人员到海岸附近去与胶东密取联络，接引部队和干部过海，邹大鹏立即带电台到庄河貔子窝一带与胶东联络，收集船只，到胶东接运部队，并筹集粮食。肖华应立即过海，以便指挥全军渡海及渡海后的部署。伍修权立即到旅大与苏军言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肖华联络。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务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务，并不得擅自离开。（二）胶东指挥机关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吴、邹、肖密取联络，全力组织渡海。必须渡过三至四万人，方能打开与支持东北局面。（三）美军于今日在天津一带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应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达旅大口外苏军防线内，再沿辽东海岸东行或北行至适当地点登陆。（四）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③8}

新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部队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由于东北军情紧急。10月17日刘少奇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到冀东的部队速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在根据延安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进行看相应的调整、布防。

在延安的机关、单位也刮起一股“东北旋风”。根据统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后勤等单位，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编成干部团开赴前线。1945年10月1日，又有一批300多人的干部队伍要出发开往东北，刘少奇亲自来为他们送行。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刘少奇用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开始了他对出征干部的送别演说。

他做了个启发式的手势，接着说下去：“恩格斯是干什么的呢？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

干部们被这个新鲜的问题所吸引，静静地等待着下文。刘少奇挥了一下手臂，坚定而热烈地说：“他们，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

出征队伍中气氛活跃起来。干部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认真地听着刘少奇的每一句话：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才能最后解放。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同

时是自己解放自己。”

“你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你们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新解放区的旗帜！”

“你们到了东北，要靠什么呢？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只要你们永远牢牢地记着，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③⑨}

刘少奇短短一席话，使出征干部们热血沸腾。当天，大家就满怀激情地启程奔赴东北前线。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 11 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 6 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部 3.5 万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 2 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刘少奇在 9 月 21 日曾电示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军。10 月 31 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 10 个军区。

在华东解放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陆续

撤到苏皖边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大部分主力部队转移到了山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下辖5个军区。原中共华中局也移到山东改为中共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原华中地区组成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大批中共主力部队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决策迅速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这一切部署完毕，刘少奇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看到，各部队已经先后到达预定位置，相关的党政工作也已展开。从全国看，中共军队已经摆脱了分散被动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

●刘少奇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

1945年10月11日下午，延安机场又聚集着熙

熙攘攘的人群。神情激动的人们不时小声交谈，伸首探望天空。

原来，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在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之后，今天就要回延安了。

刘少奇和数千名干部群众一起，等待着毛泽东的归来。

下午1点30分，机场上空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飞机徐徐下降，停稳在跑道上。机舱门打开了，毛泽东健步走下舷梯。跟在他身后的，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共产党谈判代表王若飞。他们是专程陪同毛泽东飞返延安的。

欢迎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刘少奇、朱德等迎上前去，同毛泽东、王若飞、张治中热情握手，互致问候。

毛泽东回到枣园住处，稍事休息之后，便开会向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报告重庆谈判经过。刘少奇等也向他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由于连续的奔波操劳，毛泽东回延安后感到身体疲乏。在他离开延安的40多天中，这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毛泽东顾不上多休息，便急切地了解动态，进入工作。

然而毛泽东的身体却顶不住了。他感到周身不

适，睡不着觉，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足痉挛，冷汗不止。他让人用冷湿毛巾敷在额头上以减轻痛苦，但毫无效果。无奈之下，只好住进医院边治疗边休养。

1945年11月，毛泽东正式住院疗养，一直到12月中旬出院。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继续担负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以便让毛泽东安心休息。

令人欣慰的是，按中共中央部署调往东北的10多万部队，这时已基本到位，正抓紧进行休整和扩编。

蒋介石也在竭尽全力向东北调兵，同共产党争夺这块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原驻九龙的全美式机械化部队第十三军石觉部，和原驻越南的半美式机械化部队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共7万人，已海运到秦皇岛登陆。这两个军在蒋介石新任命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亲临指挥下，正凭借其精良装备和炮空优势，杀气腾腾向中共军队控制的山海关、锦州方向扑来。

林彪奉命火速赶往辽西前线指挥御敌。中共各部队远道新到，协调联络不畅，只得在立足未稳又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山海关很快于11月16日失守。11月19日，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当局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按照中苏条约把中长铁路沿线及城

市移交给国民党当局，要求中共军队撤出大城市。11月26日，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出锦州。11月底，中共东北局也由沈阳迁往本溪。

情况发生变化，刘少奇迅即调整方针。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说：退出大城市后，“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洪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④⑩}

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2日他打电报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④⑪}

这一策略方针的改变关系到东北今后的行动，是万万大意不得的事情，一定要东北的领导同志切实了解。11月28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说：苏联由于受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除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的控制要作为工作重心，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④⑫}

然而中共东北局动作迟缓，路子也不大对。12月7日刘少奇向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发去一电，告诫说：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④③}12月24日他又给彭真发电强调：“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④④}

还在休养中的毛泽东对东北形势的发展也是牵肠挂肚，很不放心。12月下旬他的病情一有好转，便要人把一个多月中间东北和延安的往来电报统统调来，细细阅读。一番研究之后，毛泽东在休养所的病房里写了一篇对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再次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方针。他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

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④5}

中共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东北形势逐渐改观。到12月底，军队已经扩编到22万多人。部队和干部分散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铺开，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清算汉奸、减租和开展生产，使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坐视共产党同他分庭抗礼。他一面假装同中共代表和谈，一面秘密印发所谓《剿匪手本》，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开往内战前线。

在中共领导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也是早有准备，严阵以待！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

就在国共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却在1946年即将来临之际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上将来华“调停”内战。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协议，呼吁中国“停止内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

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不得不作出和平姿态。经中共方面提议，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月10日，毛泽东、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1月中下旬，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平气氛一时占了上风。

对于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准备认真遵守的。毛泽东在停战令中就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④⑥}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建设的新阶

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

但蒋介石根本不想履行协议。国民党军队继续不断地向解放区蚕食进攻。1946年2月，美国第七舰队用运输舰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5个军运抵秦皇岛转赴东北，使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猛增到28.5万人。在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国民党也运去了大批军队。

设在北平的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派人四处调停，却无济于事。军事冲突在全国各地时不时地发生。

1946年3月1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和对策。他发言说：在东北问题上一定要加强同国民党的斗争，国民党提出苏军撤退区中共不能占，这苏军撤退区的含义模糊，差不多会包括苏军到达的一切区域，这就无法承认；为这一问题要周恩来回来一次，详细谈谈；根据过去的谈判经验，决定比较大的问题不要急，反复磋商一下好。会上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提醒全党：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

谋，破坏停战整军，为此，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

时局越发波诡云谲。3月18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怕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④7}

这份电报是一个重要转变。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准备不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打这以后，中共虽仍力争和平，但不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政策，逐步把主要注意力用于准备对付全面内战。

3月21日，周恩来应召飞返延安。刘少奇同他就目前时局作了仔细研究，最后商定了对策：决定利用美国方面急欲解决东北问题这一点，我方答应让出沈阳至长春铁路及其两侧各15公里给国民党驻兵，但要求同时准许新四军第五师和广东东江纵队全部北移。

为了带领全党作好应付内战的准备，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认真做好减租、生产、练兵三件大事，以增强打破国民党进攻的实力。

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是进一步发动农民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的重要一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习惯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大政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有了重要改变。

这个新政策贯彻下去，解放区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盼望得到的土地，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增。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获得了空前的支持，使解放区的自卫有了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保证。仅1946年7月至10月的四个月当中，各解放区就有30万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成果、保卫家乡踊跃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然而中国大地上的火药味还是越来越浓了。1946年6月，蒋介石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立马翻脸不认帐，出动军队160多万人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22万人向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紧跟着，蒋介石陆续调集大量军队相继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发起大规模攻击。

中国上空战云密布，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战争的初期，形势对中共来说相当严峻。国民党拥有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兵力

达 200 万人，其中的 80% 直接用于进攻解放区。而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仅 127 万人，装备简陋，武器多是从日伪军手里缴来的。有 1.3 亿人口，230 多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大多经济贫穷，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

共产党人不信邪。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沉着应战，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1946 年 6 月 26 日，中原军区主力在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率领下，分两路突围成功。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 5 万余人。在其他解放区，也纷纷传来捷报。

1946 年 11 月 21 日，在延安枣园的一座宽大窑洞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的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正围着炭火商谈，对形势和今后方针作全面的分析运筹。毛泽东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说：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约三年到五年，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提出：“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④8}刘少奇、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这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新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指导思想。刘少奇当天就召集中共中央会议，传达毛、刘、

周三人会议精神，贯彻“打倒蒋介石”的方针，确定发展国民党区的游击战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但现在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2月4日，刘少奇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半年到一年内作出成绩来，全国的形势是进攻而不是退却，要有适应进攻的工作布置；党内目前的主要倾向仍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

形势的发展确实是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有效反击下，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它的全面进攻计划很快破产。1947年3月，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收缩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接连打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几个漂亮仗，使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到1947年5月即告失败。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出动100架飞机，气势汹汹杀向陕北延安，企图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一举摧毁。

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只有6个旅2万多人，是国民党军兵力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暂时放弃延安。3月16日，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带领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从延安转移到瓦窑堡办公，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共的

神经中枢都能正常运转。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也撤离延安。

从3月13日起，西北野战兵团一部在延安以南顽强抗击来犯之敌，激战6天6夜，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3月19日主动从延安撤出。

胡宗南得意洋洋地进占延安。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表功行赏，就发现高兴得太早了。3月25日，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2900余人在延安东北青化砭被全部歼灭，而他急于寻找决战的西北解放军主力却不知去向。

194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来到子长县王家坪会齐。3天后，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工作，其他四位书记率中共中央机关向清涧县北面石咀驿附近的小山庄枣林子沟转移。3月29日晚至30日，书记们在枣林子沟召开高层会议，研究中共中央领导的分工和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在郑重讨论之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书记处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以便于灵活、及时地指导全国党、政、军、民

各方面的工作。这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时刻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4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通知：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为常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社会部、总政治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分、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分，均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去太行，受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

1947年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带着一部分机关人员由石咀驿动身，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第七章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

●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

即使是北方，到了三四月份，也开始显露春意，树木田野渐渐发绿。

1947年3月31日晚，刘少奇、朱德等在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了黄河。稍作停留之后，他们从临县三交镇出发，率领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顺着晋西北大地东行。

这一带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晋绥、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现在，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形势和任务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根据地的情况是否能适应新的要求呢？

刘少奇、朱德一行沿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一线向东，横穿山西全省，沿途一面观察民情，一面检查根据地工作，向干部们讲解形势和任务。4月26

日，这支小队伍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这里是中共晋察冀局和晋察冀军区的驻地。

一路上老百姓生活困难的景象使刘少奇感触良深。从兴县到原平，他看到山区许多农民穷困破产，不少人衣不蔽体，其状令人刺目。刘少奇很快就发现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症结所在：土地改革不彻底，干部作风脱离群众。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解放区将难于支持长期战争。

4月22日，刘少奇给中共晋绥分局的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方面的问题。他提醒他们说：那些地方虽然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但群众运动非常零碎，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而没有一个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任何干部，包括各级负责人，都必须受到群众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如果群众没有实现这种权力的积极性和这种最低限度的勇气，那将更害怕地主和恶霸，群众就不能压服地主阶级。①后来毛泽东把刘少奇的这封信批转各地，指出：“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②

刘少奇、朱德等 1947 年 5 月初到达河北建屏县

(今平山县)西柏坡村。他们在察看了这里的地形环境之后表示满意，决定把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就安在这里。

这是太行山东麓一个很小的山村，只有七八十户人家。它的北侧紧靠着一座高高的山岭，就是柏坡岭。在它南面的不远处，著名的滹沱河日夜不息地哗哗流过。这里属于晋察冀解放区，离它最近的大城市是石家庄，大约相距 90 公里的路程。

刘少奇把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安下来之后，便抓紧发出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通知。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分成两套班子以前就决定了的事情。因为，在解放区进行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已成紧迫任务。这件大事不做好，解放战争便很难获得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更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就是要制订一套完备的法规和政策，把延续了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彻底推翻，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生产积极性。

受中共中央委托，全国土地会议由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在西柏坡召开，时间定在 1947 年七八月份。

可刘少奇这时却因旅途劳顿胃病复发病倒了。1943 年他从华中回到延安后，因为和王前在性格、感情上合不来而分了手。他又过着无人照顾的单身生

活，偏偏工作又那样忙，加上肠胃不好吃不下饭，身体状况便一直不大好，体重只有 48 公斤，所以这回一劳累，就撑不住了。毛泽东知道后于 6 月 14 日发来电报问候说：“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③

完全休息当然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只是适当减少一点工作，一面为全国土地会议准备材料，一面穿插处理晋察冀军事问题。

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晋察冀地区在军事上有很大成绩。但晋察冀的野战部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种状况显然同迅速发展的战略反攻形势不相适应。

刘少奇、朱德经过研究，决定首先正式组建晋察冀野战军，以便使这个地区的野战部队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他们在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等商量之后，决定晋察冀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随后，朱德还和聂荣臻一起前往冀中，具体指导部队完成一切必要的改组。7 月 11 日，朱德向毛泽东报告

说：此间军事工作，经少奇同志的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尚非易事，财政经济及土地改革更是困难解决的事，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军事进行仍是会遇到许多阻碍的。④

朱老总说得很对，土地改革和统一华北财政经济这两件事，做起来更加困难，然而非做不可。

194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五名成员全部到达西柏坡。从晋察冀、冀晋、察哈尔、太行、太岳、晋冀鲁豫、冀鲁豫、冀南、冀热辽、晋绥、山东、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赶来参加土地会议的100多名代表，也陆续抵达。刘少奇决定全国土地会议马上开始。

会议主席团由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康生、彭真任常委。参加会议主席团的还有各代表团负责人和有关领导干部陈伯达、聂荣臻、刘澜涛、王从吾、叶剑英、邓颖超、薄一波、李雪峰、刘秀峰、李林、张晔、张稼夫、武新宇、李卓然、冯文彬、齐燕铭、胡锡奎，安子文任秘书长。

西柏坡有一条很小的山沟沟。山沟的里端有一小片长着青草和少许小树的平地。这一天，在这块小地坪上搭了一个简易布棚，山沟里地上放置了一些石块。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就在这露天山沟里举行。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主持会议。主席台就是那小布棚，代表们则坐在石头上听报告。时值盛夏，山沟外面气候炎热，与会人员置身山沟里树荫下，倒也清静凉快，别有一番情趣。

刘少奇在开幕会上讲话，说：《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

图9 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
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

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土地问题是解放区一切问题的基本环节，“左”了一切就“左”，右了一切就右，会影响各种问题，今后如何有意识地使其他工作有计划地推进，应从解决土地问

题开始。他提醒代表们说：“大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开个老实会。如果根据假报告做决议，就会害死人。”^⑤

会议开得非常地认真。各解放区都介绍了情况和存在问题，也带来了经验。代表们就整党和土改两大问题展开了详细讨论。刘少奇在8月20日至21日向大会作了长篇报告，9月13日作了会议结论报告。

刘少奇集中了会议代表的意见，提出：一年多来的土改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不彻底，造成土改不彻底的原因有三，一是指导土改的政策不彻底，二是党内不纯，三是官僚主义的领导。

制订新的土改政策已是当务之急。刘少奇组织代表们反复研究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政策：普遍彻底平分土地。对这一土改新政策的成文形式，刘少奇原先打算搞一个会议决议，后来改变主意，决定制订一部正式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公开举起的一面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旗帜。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正式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

地，在土过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刘少奇在9月13日主持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后说：“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⑥

《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1947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

此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把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打了个稀巴烂，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了极大震撼。尽管在土改运动猛烈发展的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但这毕竟是支流，而这场运动带给中国社会的触动之深、影响之广，简直无法估量。分得了土地的亿万翻身农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怪不得美国人韩丁在他写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感叹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

1946 年至 1950 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 1861 年至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⑦

●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 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

华北原有大大小小十来个解放区，其中主要是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抗战以来，它们一直被迫处于割据状态，财政经济方面只能是各自为政，连老百姓日常用的钞票都不一样。1947 年 11 月，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世道已经大变，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反攻，仗越打越大，那种分散、独立的经济形态就无法适应新任务的要求了。

这件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分工董必武具体负责，刘少奇参加指导。全国土地会议期间，由董必武任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在河北建屏县峡谷村开始办公，并且很快在协调军工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取得进展。

当然，要实现完全的统一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从根本上解决。194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集了一次财政经济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他提议：为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等经济工作，有利于大批干部南调，可先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起，先统一晋察冀、晋冀鲁豫和西北，而后再及其他。他说：这两个区的分割，过去是被迫的、合理的，现在这两个地区已打通，敌人已不再能分割太行与五台，今天完全是我们自己人为的，极不合理，故必须解决，要向中共中央和两个中央局建议。⑧

四天后，2月16日，刘少奇致电正在晋察冀帮助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正式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刘少奇在电报中说：“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

东，是不可限量的。”⑨

毛泽东很快于2月20日就给刘少奇发来了回电。他想得更远，提议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3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开一个会，讨论两区合并的有关问题，成立统一的华北机构，还要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⑩

这个专门讨论两区合并的会3月3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开了一天。大家一致同意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刘少奇要同志们看到这一举措的长远意义，说：“两区的合并和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将为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⑪

3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即以中央工作委员会为中心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以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

两区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牵动党、政、军、民和财政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处理的事务多不胜数。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分工由朱德主持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合并工作，由董必武主持两个边区政府的合并工作。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刘少奇提出：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第二步即以

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第三步再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以使天津、胶东、渤海等海口与华北、西北内地联系，统一组织对外贸易，货畅其流。^⑫

统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的工作进展顺利。除中共华北局迅速组成外，行政方面成立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任主席，黄敬、杨秀峰任副主席；军事方面成立了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

在华北 4400 万人口的广大区域建立起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未来统一的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同华北的紧张筹备相辉映，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分别率领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大量歼敌。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并不遥远的事情了。

为准备全国范围的胜利，这时尚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华北。

1948 年 3 月 10 日，刘少奇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我们拟于 3 月 20 日动身东移，约于 4 月 15 日左右可到你处。”^⑬

刘少奇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准备，热切地期待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的到来。

●朱德写来祝寿诗：“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干部，一队又一队的解放军战士，陆陆续续开进西柏坡和附近村庄，使这个原本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空前热闹起来。

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不久，毛泽东也来到了。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在这个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山村会齐。

西柏坡，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完全合合，工作委员会的历史使命随即结束。刘少奇的工作重点转向为接管全国政权作准备。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集中到离西柏坡不远的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开会。这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开了七八天，到5月7日才开完，讨论了许多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准备的重要问题。讨论的内容包括：（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

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二）关于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其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毅、粟裕兵团的行动及其他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华北、中原两大解放区寄予厚望，决定加强对它们的领导，使它们在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要求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全部合并，统一成新的华北解放区，并实现同山东、晋绥两解放区的完全衔接。中共中央委托新成立的华北局为全党全军创办统一的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中原地区在刘邓等三路大军挺进后，已开辟了拥有 3000 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会议要求中原地区解放军集中兵力在长江以北黄淮地区尽可能多地消灭敌军主力，决定新的中共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为第二、第三书记，新的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

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解放区的范

围不断扩展。未来新中国的曙光，已经清晰在望。

为全国胜利作准备的工作很现实地提到日程上来了。5月20日，刘少奇在中共华北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的情况是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是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现在中央的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建设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他要求大家要有全国眼光，要实干，务须团结一致，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状态。^⑭

为未来新中国打基础的诸多事情一项一项进展起来。

5月25日，刘少奇找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负责人谢觉哉、陈瑾昆谈话，派他们到即将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法院院长，要他们着手建立正规法治。刘少奇对他们说：刑法和民法先就旧的改一下施行，边做边改，有总比无好，因为现在急需稳定秩序，使财产有保障，人民乐于建设。^⑮

6月8日，中共华北局决定创办大党报，将原《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成新的《人民日报》，作为未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6月15日，新的《人民日报》在石家庄创刊出版。

7月，设在华北、面向全党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正式创办。党校名为马列学院，由刘少奇兼院长。¹¹

月8日马列学院在平山县李家沟开学后，刘少奇去向学员们讲话，要他们认真学习理论，将来更好地为新中国工作。

8月，代表全中国工人阶级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在代表们赴会前向他们交待方针说：这次大会的性质是全国代表大会，可仍用劳动大会名义，虽不科学，但历史上有意义，各大城市老工人都知道；可以多选一些委员，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址暂设在哈尔滨，等打开北平后再搬到北平；解放区工人运动的方针是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①⑥}

全国胜利后最紧急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成立中央政府。为未来的新中国中央政府搭架子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要由华北解放区承担。从7月份起，刘少奇开始指导组建华北政府机构。这项工作包含着从制定施政方针、确定代表大会开法、起草各种法规、安排人事等等费力费时而又丝毫马虎不得的种种事情。7月至8月，在刘少奇指导下，有关部门起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土地农业税暂行税则》、《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村县（市）人民政权选举条例》、《危害解放区治罪条例》、《惩治

反革命暂行条例》。刘少奇又花了很多时间，对这些法规文件作了逐条逐款的审阅修改。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8月7日至19日召开。代表们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民主选出27名共产党员和党外民主人士为政府委员，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任副主席。这个华北地区统一的人民政府，成为后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各地各方喜讯频传。刘少奇和西柏坡的所有同志一样，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同时也强烈地感受着胜利即将来临的欢乐和振奋。这年夏天，他更比别的同志多了一份喜悦：8月21日，在同志们热情祝贺中，他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

刘少奇在西柏坡居住和办公的一里一外两间土墙瓦顶简易房，就成了新房。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兴冲冲来到刘少奇住处表示祝贺。正好，中央外事局的同志们送来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贺喜蛋糕，王光美第一次作为这里的女主人给毛泽东、周恩来每人切了一块。在谈笑风生中，两人高兴地把蛋糕都吃了。

王光美是天津人。她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就

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联系。1946 年春，中共北平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崔月犁介绍她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翻译。1946 年秋军调部工作业务减少，王光美报名去延安，11 月 1 日搭乘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和宋平等一起飞抵延安。她被分配在中央外事局工作，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当翻译。不久各解放区纷纷开始土地改革，1947 年

图 10 刘少奇、王光美
在香山住所合影。
(1949 年)

3 月王光美也同张香山等外事局干部一道，作为工作队员到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山西兴县等地农村蹲了差不多一年。等她 1948 年 3 月结束土改工作队工作回机关的时候，外事局已经从延安搬到了西柏坡。她和刘少奇在延安时便已相识有来往，到西柏坡后就更加熟悉了，终于结成伉俪。

秋收的季节到了。土改后的解放区人欢马跃，一派丰收景象。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 1.6 亿人口，面积 235 万平方公里，在地域上已基本连成一片，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可靠后方。

在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经过两年的较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解放军已经从1946年6月时的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相反，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它的主力胡宗南部、白崇禧部、刘峙部、傅作义部、卫立煌部这5个战略集团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已经成不了完整的战线。

时机已到。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波澜壮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个接一个地打响，到1949年1月31日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

三大战役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指挥。刘少奇除了参加重大决策的研究外，仍主要负责为夺取全国政权作准备等诸多工作。形势发展之快，已经使这些工作的紧急程度不亚于军事了。

刘少奇开始筹划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9月，他撰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0月至12月对东北局报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作详细修改，在1948年9月和1949年1月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新

民主主义经济和接管城市的发言。他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提出了对未来新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意见。刘少奇提出：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各种经济成分都要得到发展，国家争取用 10 到 15 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8 年 11 月 24 日是刘少奇的 50 岁寿辰，12 月 1 日是朱德的 62 岁寿辰，两人的生日离得很近。于是，西柏坡的同志们选择中间的一天，为他俩合起来办了个简单、热闹的祝寿晚会。几年来朝夕相处的老战友朱德，特地写了一首幽默而又热情的五言诗送给刘少奇，以示对他 50 大寿的祝贺：

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群运见新姿。
人山人海，从容作导师。
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
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
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

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
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

第八章

开国建国费运筹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毛泽东 要刘少奇赶紧去天津一趟

在太行山东麓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的土公路上，一支由几十辆吉普车、卡车组成的混合车队，正自南向北疾驰。山区公路路况不好，扬起的烟尘犹如滚滚长龙。

这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车队。车队从西柏坡出发，沿着灵寿——行唐——曲阳——唐县一线，向北平开进。在车队前面的几辆吉普车上，坐着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这一天，是1949年3月23日。

十几天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工作几个问

题的发言。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在西柏坡的工作，迁往北平。

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以农村包围城市，准备最后夺取城市。这一目标现在已经开始实现，中共中央就要堂堂正正地开进大城市了。

经过两天的旅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于3月25日上午抵达北平西郊颐和园。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又驱车去西苑机场。

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早就迎候在西苑机场，激动地等待着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到来。

下午5点，毛泽东等人的车队驶进西苑机场。欢迎人群中立刻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军乐队奏起雄壮欢快的乐曲。

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当地军政首长林彪、聂荣臻、贺龙等立即上前迎接各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北平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都推选出了自己的代表，来这里欢迎他们仰慕已久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他们亲切见面。接着，毛泽东等又来到民主人士欢迎行列面前，同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一一握手问候。

还没有等天色暗下来，天空忽地升起一颗耀眼的照明弹。紧接着，一颗又一颗雪亮的照明弹腾空而起。整个西苑机场如同白昼。

阅兵式开始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在受阅部队前缓缓驶过。展示人民解放军雄姿的步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兵受阅部队的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英气勃勃。领袖们高兴地向指战员们亲切还礼。

阅兵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香山。这里将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个驻地。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宣布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等已胜利到达北平。

香山，是北平西郊著名风景区，距市中心约 30 公里。山中峰峦迭嶂，树木苍翠，景色优美宜人。但由于年久失修，此时整个山林呈现衰微破败景象。选择这里作为中共中央的驻地，主要是因为城市敌情复杂，特务很多，北平解放不到两个月，还来不及清理，而香山远离闹市，又是山区，警卫工作比较好做。这里还有慈幼院留下的 3000 多间房子，正好可以用作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用房。

毛泽东居住在香山寺下的双清别墅。出双清别墅西侧门往北，不远处另有一处幽静院落，叫来青

轩。这里房子较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就都住了进去。³小间东房，就成了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宿舍。

刘少奇在香山住下不到半个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便要他赶紧去天津一趟，因为天津在城市管理和恢复生产方面都有一些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在平津战役快结束时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共产党接管天津政权很顺利，但接管后恢复经济的工作却不那么顺当。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恢复正常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的不足³成。全市经济滑坡，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本家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党领导工人清算他们，因而消极生产，有的甚至准备弃厂携款外逃。而工人、店员也误以为共产党允许分厂、分店，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竟发生⁵³次自发的清算斗争。在共产党干部中，则普遍存在怕犯右的错误，怕沾资本家，因而不敢制止工人的过高要求。

主持中共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对此非常着急。他两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说：北平、天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是存在的突出问题，“所有城

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①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刘少奇开始作行前的必要准备：调阅材料，确定调查提纲。他还特别请刚从香港回国、长期在大城市从事贸易金融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同行，中共北平市委派了张文松等几名干部随行。

一切准备停当，刘少奇特意从香山进城，到东城区后圆恩寺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找到薄一波，笑着对他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

薄一波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刘少奇说明原委之后，他高兴地回答道：“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来告诉我呢！”

刘少奇却认真地说，按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他还交待薄一波：我在天津的活动，一般情况由中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有些重要问题由你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由你向我传达。①

利用这次进城的机会，刘少奇、王光美夫妇还顺路去西城旧刑部街看望光美的父母。在那里正好见到在天津办企业的光美的哥哥光英，刘少奇便向他了解天津的情况。

王光英以为南方还在打仗，中共中央肯定关心军事工业，便认真地向刘少奇介绍，天津哪些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工厂可以生产子弹，哪些工厂可以改装装甲车。

刘少奇听着忍不住笑起来，说：“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该如何管……”

王光英这才明白刘少奇关心的是经济建设，便向他详细反映了天津生产下降和资本家思想波动等实情。刘少奇觉得王光英谈的情况很要紧，叮嘱光英回去多同工商界人士联系，做做工作，使天津尽快恢复生产。

图 11 刘少奇和王光英

交谈。（1956 年）

王光英却又领会错了刘少奇的意思，急着辩解说：“我不愿干工商界的事了。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我不需要企业和资本，我完全可以搞技术，干本行。再说，我兄弟姐妹中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我干嘛当资本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这回刘少奇不再笑，而是用浅显明白的话，向他

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

王光英后来说：“他是多么通俗易懂、多么形象地指明了我该走的路。几句话明确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②

4月10日晚，刘少奇离开香山，乘火车去天津。随行的除王光美和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槐外，还有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等干部。

列车在夜幕中抵达天津站。在车站迎接他们的是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三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敬、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主人安排刘少奇一行在海河边小刘庄附近台湾路9号的两幢小楼住下来。

从第二天上午起，刘少奇开始了一个接一个不间断的视察、开会、听汇报、作报告。

4月11日上午，刘少奇首先来到中纺一厂。这个厂子刚刚完成接收，生产还没有完全正常，工人、职员之间还有矛盾。

工人们看见厂里头忽然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由军代表张振华陪着，这里看看那里问问，猜想一定是来了共产党的大干部，便都围了上来。天津解

放了，工厂换领导了，但人们对共产党还不太熟悉，很想多知道一点东西。

刘少奇也看出了人们的心情，当即要军代表请一些工人、职员来座谈，听听大家的意见。

职工们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的大干部这样随和，都想来听他讲话。一会儿工夫，工厂的会议室里便坐满了人。

刘少奇首先让大家提问题，反映情况。接着，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共产党的政策，要求工人、职员、接管干部团结协作，共同把生产搞好。他热情地提出希望说：天津解放早，现在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天津的工人阶级有责任搞好生产，支援大军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1949年初的时候，一般老百姓对中共领导人既不认识，更搞不清楚他们的职务大小，所以参加座谈会的人到散会也没有弄明白面前这位共产党干部的身份。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和蔼可亲的干部，原来是中共中央的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惊喜之余，大家又不免为共产党领袖的平易近人和公仆形象啧啧赞叹。

刘少奇回到小刘庄住处，下午便召集黄克诚、黄敬汇报情况，研究工作。会议开了整整一下午。刘少奇听罢汇报，对天津的接收工作表示满意，认为很有

成绩，但是他又说：“我们接收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③

黄敬市长在汇报中谈到：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我们的干部却多是站在工人一边；再加上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得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有困难，复工复业便成了问题。刘少奇立即表示：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要抓紧纠正。③他和黄克诚、黄敬当即商量决定，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会反映意见，并安排中共基层干部到工会去做工作。

以后几天，刘少奇差不多都是上午视察工厂，下午听取各部门汇报，研究解决问题。各方面工作，正按预定目的逐一展开。

首先是向干部们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刘少奇在天津将近一个月，开得最多的是干部会议：市委干部会开了三四次，各系统的汇报会不下十次。他再三告诉干部们：为了完成管理、改造、发展天津的任务，必须诚心诚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

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今天，自由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相反是团结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必须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④

恢复生产，解决劳资关系，重要的是做通工人的思想工作。刘少奇从到达天津的第二天起，几乎每天都要去 1 个工厂。他先后到了中纺一厂、造纸厂、自行车厂、电工器材厂、汽车制配厂、电灯泡厂、永利制碱厂和新港码头，一路了解工人情绪，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4 月 21 日，他又来到私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大公司建于 1932 年，在工商界颇有影响。它在天津有 3 个工厂，在香港还有 1 个工厂。刘少奇参观了东亚的工厂之后，又同工人们座谈。他耐心向工人们解释：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性。4 月 28 日和 5 月 5 日，刘少奇又去向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作报告。他对代表们说：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

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大了。我们必须分清敌友，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要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在英、美、法等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才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

⑤

工人们听了这番深入浅出的道理，心里一下子豁亮了。

刘少奇天津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在他的日程中，找资本家谈话，参观他们的私营企业，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是预定的重要安排。应邀同刘少奇座谈的，既有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朱继胜、资耀华、毕鸣岐等知名资本家，也有中小工商业者。5月2日在天津市政府交际处开的座谈会，就有来自天津进出口贸易、染织、皮革、火柴等十余个行业的128名资本家。

这些座谈会开得煞是热闹。资本家们本来肚子里装了许多问号，这回见来了中共中央的大干部，便一古脑儿的倒了出来。

对这些资本家，刘少奇也向他们认真解释共产党政府的政策，说：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有个资本家说：“现在我们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刘少奇回答说：“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⑥

有的资本家反映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

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⑥

刘少奇的一席话，把蒙在资本家心头的疑云顿时吹散。

东亚公司经理宋棐卿在刘少奇同他谈话之后，很快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还写信向刘少奇作了汇报。为表示鼓励，刘少奇给他回了封信：“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⑦

刘少奇来天津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讲话内容在干部、工人、资本家当中飞快地流传。天津的

人们兴奋地议论着，从心里升腾起一股希望：困难即将过去，生产就要恢复发展，老百姓的生活一定会很快好起来。

天津市政府立即着手落实刘少奇的指示：设立机构调解劳资关系，组织复工复产，平抑市场物价，救济失业工人……

资本家解除了顾虑，积极性也上来了。私营企业纷纷克服困难，恢复开工。大批人失业的难题开始缓解。

工人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大家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到工会组织中来，自觉地投身生产建设。有了工人阶级的理解和支持，天津恢复经济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全市主要工业行业到六七月份就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天津的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1949年5月6日，刘少奇向中共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作了最后一次讲话，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本来他是打算返回北平的，但当他得知唐山开滦煤矿濒临破产的严重情况之后，立即决定赶去那里解决问题。

他的妻子王光美却不能陪他一起去了。因为她怀孕即将临产，再也经不起旅途颠簸，只好先回北平了。

唐山开滦煤矿当时是由中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

家合办的大型煤矿，有职工 5 万多人。由于英方在唐山解放前夕把一部分人员和物资器材转走，滦河大桥又被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炸毁，断了煤矿的运输线，致使开滦生产瘫痪。工人已有 4 个月没有发到工资，正在酝酿罢工。中英资方乘机撂挑子，连连向华北政府要求大量借款，声称否则就要破产。

刘少奇已经看出，中英资方骨子里的真正用意是在试探共产党的政策。开滦煤矿是当时华北最大的煤矿，生产继续停滞下去将影响华北国计民生和几万工人的就业。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赶赴唐山。

5 月 7 日，刘少奇离开天津去唐山，当晚就召集开滦煤矿军代表王林、王涛江连夜汇报情况。

在接下来的 3 天里，刘少奇抓紧时间召开矿工座谈会、资本家座谈会和唐山市干部会议，视察工厂、矿区，现场解决问题。

他先向军代表和有关干部指示工作方针：第一，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开滦，监督资方按时给工人发薪，同时要向工人讲清楚我们的困难，发动工人同我们一道克服和战胜困难。第二，对待中外资本家要讲究策略，在当今的情况下，我们的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第三，开滦的企业性质已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经被剥夺，但开滦不同于一般的私营

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开滦实行监督，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供应要遵循国家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5万职工的生活才有保障。他反复叮嘱军代表说：“不管怎样，你们要放开手脚，领导工人进行生产。要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中外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国家生产。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有利。”⑧

对开滦恢复生产中确实存在的困难，刘少奇当场拍板解决。他指示华北贸易公司每月用相当于15万袋面粉的实物同开滦换煤炭，以维持职工生活；要人民银行向开滦发放贷款，以便发还拖欠的工人工资。他还要求当地政府采取用现款购煤，用杂粮、坑木换煤等各种办法帮助开滦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这一套措施被迅速贯彻下去。原本生产停滞、人心浮动的局面一下子稳住了，煤矿生产开始复苏。

刘少奇却不能久留了。5月10日，他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让他速回北平，有要事。

在临走之前，刘少奇按预定安排向唐山市干部会议作了报告，又去开滦林西煤矿视察了洗煤厂、电厂、灯房、绞车房和四号井天桥，然后连夜乘火车经天津匆匆赶回北平。

回到香山来青轩，已经是5月11日上午。这天，新设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要在香山开会。刘

少奇马上又赶去出席会议，同朱德、陈云等一起，讨论中央财经委的工作方针和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对外贸易问题。晚上，刘少奇到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唐山之行的情况。

同毛泽东见面后才知道，要刘少奇赶回来，是要派他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为开国作准备。任务来得仓促，时间已经不多，刘少奇抓紧利用中苏双方接洽日程安排的间隙，一面处理积压的文件，一面为访苏作准备。

就在刘少奇回到香山的第三天，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北京医院生了一个胖乎乎的女儿。5月13日女儿出世那天，偏巧刘少奇全天有事，¹⁴日才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望着襁褓中女儿圆圆的红红的脸蛋，夫妇俩不禁回想起他们自建屏县西柏坡结婚以来的幕幕往事。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从建屏到北平，这真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于是，他们决定给女儿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平平。

●刘少奇秘密赴苏同斯大林会谈，为开国作准备

形势的飞速发展超出人们的意料。一个接一个

的胜利捷报雪片般地飞往北平香山，又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接着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在5月份连续占领杭州、武汉、南昌、上海，直逼华南。在北方，留存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全中国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开国筹备工作必须大大加快了。1949年6月，在北平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就建立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等工作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代表团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和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工作人员带了师哲、戈宝权、邓力群。

6月21日，中共代表团从北平启程。战争尚未结束，出访的路线不得不迂迴绕道而行。刘少奇和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车站上了专列火车，经沈阳时带上高岗，再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换乘飞机，绕道北朝鲜上空到苏联远东伯力，又相继经停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月26日才到达莫斯科。这一路整整用了五六天时间。为防不测，飞机还常常故

意高一阵低一阵地飞，引起舱温忽冷忽热，折腾得几个人都得了病。

中共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街 8 号公寓。休息几天之后，刘少奇连着给斯大林写了两封正式信函，通报有关情况。为便于围绕主要问题会谈，刘少奇在信中把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建立中央政府的方案、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外交政策的考虑、加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设想、毛泽东访苏的时机等等主要问题，都一一阐述清楚，还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活动的安排意见。

7 月 10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郊孔策沃他居住的别墅里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站在别墅门口迎接刘少奇等中国客人。双方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气氛极为热情友好。

所谓宴会，实际上是双方会谈的开始。这是斯大林习惯采取的方法。宾主边吃边谈，显得轻松自然。一些重要的问题在随意交谈中进行着初步的讨论。

第二天晚上，斯大林把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接到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会议厅，请他们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晚 10 时，会议在斯大林主持下开始。出席会议的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苏联

红军的一些领导人。

斯大林首先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比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斯大林继续侃侃而谈，对刘少奇信中表达的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赞赏，讲了一些补充意见。末了他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予以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得不如此，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莫斯科，即可解决中苏条约问题。

苏共方面主要是斯大林在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正襟危坐，难得插句把话。刘少奇提了一些问题，斯大林一一谈了他的看法。可以看得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尊重的，发表意见很谨慎。

这次会议是中苏两党第一次正式的高层会谈，使双方都对对方的立场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表达了希望加强两党团结协作的愿望。会议最后商定了几件具体事项：成立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制订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具体文件；苏联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和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苏联派电影摄制人员到中国前线帮助拍摄影片。

会谈取得了成果，会议尽欢而散。斯大林显得很高兴，盛情邀请中共代表团散会后接着看电影。他亲自挑选了4部片子，放映时还兴致勃勃地边看边向刘少奇等讲解。

两党会谈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7月11日克里姆林宫会议以后，刘少奇和斯大林又陆续会谈了几次，就制订宪法、派遣苏联专家、扩大中苏贸易等专门问题交换意见。

在会谈的间隙，刘少奇抓紧安排访问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机关。他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等部门的负责人交谈，详细了解这些机构的组成情况和工作方法。他还尽量多看一些苏联的工厂和单位，先后到了汽车制造厂、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和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工业展览馆，注意观察人家的管理经验和特点。

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国同志的热情，决定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楼大厅里再次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他获悉毛泽东夫人江青和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正在莫斯科养病，便提出同时邀请这两位女同志赴宴。

江青得到邀请极其兴奋。她来苏联休养已经很久，可从没有机会在这样高层次的人士中露脸。为赴

宴时穿什么衣服、祝酒时说什么话等等细节，她和当她翻译的林莉商量了很长时间。可刘少奇考虑的是外交场合特有的严肃和敏感，因此事前特地关照她，要她不要多讲话。王稼祥也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有让朱仲丽赴宴。

宴会开始了。像上次一样，宾主边吃边谈，气氛亲切友好。只有江青有点反常，赌气似地沉默着。马林科夫、贝利亚似乎想让江青高兴一点，笑着劝她向斯大林敬酒。

江青马上答应，端起酒杯走向斯大林，笑了笑，一字一句地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

斯大林听罢大笑起来，同大家举杯一饮而尽。他站起来走到中国同志身边，说：“我的健康，竟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他接着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斯大林似乎有感而发，又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

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

他意犹未尽，继续说下去：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快意，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我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刘少奇显得为难了。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正在筹建之中，今天就说超过苏联的话，似乎太早了一点；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这时已经出现矛盾，他不想因这类细节引起人们误解为中国党要向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挑战。因此，他回答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表示这杯敬酒他不能喝。

斯大林却是诚心诚意。在下一次他和刘少奇商谈中苏两党分工指导国际共运时，突然问道：“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觉得现在不是谈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客气地说：没有，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

斯大林却主动作起了自我批评，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但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⑨

经过1个多月的接触会谈，参观访问，中共代表团访苏的预定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同苏共中央交换了看法，听取了斯大林对新中国建设的意见，同时搜集了苏联党政机关的组织情况、管理经验，签订了贷款协定，还落实了其他几个经济军事合作事项。苏联政府同意选派200余名专家分批到中国帮助工作，第一批80多名将随刘少奇同车到中国。

该谈的谈了，该办的办了，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他要回国了。在这之前，由于高岗在会谈过程中表现有些不正常，刘少奇已要他提前返回。而王稼祥需要留下来筹建中国驻苏大使馆，这次暂不回国。

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

这回斯大林又换了一种新方式款待刘少奇。他亲自引导刘少奇参观他那宽敞美丽的别墅花园。两人一面在花木、小溪、果园、鱼池、小运动场之间遛达徜徉，一面随意交谈。斯大林自豪地指着菜园一角的番茄、豆角、谷子，介绍这是他亲手种植的，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长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

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

参观之后是吃饭。这次是小范围的家庭式的便宴，因而更加亲切自然。

吃着吃着，斯大林想起一件事，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同志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⑨

这个意见很值得重视。刘少奇回到住所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

刘少奇的访苏使命终于大功告成。中苏两党的高层领导第一次进行这样全面、深入的会谈，建立了两党两国合作的基础，从此开始了两个世界上最大共产党之间的蜜月时期。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以苏联原铁道部长柯瓦洛夫为首的第一批苏联专家，和刘少奇同车来中国。

列车穿越苏联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经哈尔滨、长春，8月25日到沈阳。沈阳是中共东北局驻地，

刘少奇在这里住了几天，召集会议，解决问题，安排一部分苏联专家在东北工作，一直到8月底才回到北平。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从香山搬到了城内中南海。刘少奇到了北平才知道，他家的住处安排在中南海西侧的万字廊，王光美已经带着孩子们先搬进去了。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 升起，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

各方面代表人士云集北京。开国筹备工作正加快速度进行。起草法规，安排人事，组建机构，集训检阅部队，组织群众性庆祝活动……方方面面的准备事项全线展开。

1949年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完成了开国筹备中的一个大事，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三个根本性法规文件。9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最后讨论确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名单。

至此，新中国开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顺利完成。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

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庄重辉煌。礼堂门前，气球飘带高悬空中，各色彩旗迎风舒展，场内更是灯火通明，流光溢彩。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的代表共662人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要在这里举行！

晚7时，礼炮齐鸣，军乐高奏。这一空前的历史性盛会在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中开幕！

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⑩

接着，刘少奇代表拥有448.8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发表讲话。他说：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

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⑪

刘少奇在阐述了加强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意义后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有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了。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⑪

刘少奇的讲话，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经过连续几天的认真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还通过了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几天来，中南海怀仁堂内群情振奋，高潮迭起。代表们沉浸在书写历史的神圣氛围之中。9月29日，大会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0日下午，会议代表又一次步入怀仁堂，出席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经过投票，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⁵⁶人当选为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高昂乐曲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胜利闭幕。

10月1日下午2时，中南海勤政殿庄重严肃。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⁵⁶名委员在这里举行

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宣布就职。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会议结束，委员们驱车来到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首都 30 万军民聚集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通过麦克风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着嘹亮的国歌乐曲，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它告诉人们：旧中国已经灭亡，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刘少奇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出席这一举国欢庆的盛典，不能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他从青年时代起投身革命，1921 年冬加入共产党，为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奋斗了整整 30 年。其间所经历的艰险曲折，真是难以数计，今天终于理想成真，同亿万人民一起共享胜利的喜悦，这是多么令人快慰的事情呵！

●全世界刮起一股中国旋风，国际要事纷至沓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新纪元。从此，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这时，刘少奇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949年10月19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刘少奇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伊始，百乱待治，百废俱兴。担任着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工作十分繁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举世瞩目，一时成为全球议论的热点。全世界顿时刮起一股中国旋风：不少国家纷纷表示要同新中国建交，一些国际会议要在北京召开，斯大林正式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国际要事纷至沓来，一个接一个地摆到了刘少奇的面前。

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联政府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随即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毛泽东访问苏联，二是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刘少奇

出任总会会长。

刘少奇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中苏友好协会。开国大典后仅五天，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向大会作了报告，提出了中苏友协的任务和工作方针。从此，中苏两大国之间通过友好协会这个渠道，开展了大量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助工作。这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起步，是一个有力的帮助。

11月25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于12月初启程访问苏联，在毛泽东出访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是刘少奇1945年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以来，又一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只是这次代理的职务又多了一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经过一番联络准备，毛泽东访苏终于成行，1949年12月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一个月后，为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周恩来也去了莫斯科。他们二人一直到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这期间，刘少奇在国内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周恩来不断将中苏会谈情况和条约内容用电

报发给刘少奇，刘少奇就在国内做工作配合他们谈判。他多次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条约草案进行讨论，又把征询来的意见汇总起来，反馈给毛泽东、周恩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

中国革命的胜利，令全世界民主进步力量大受鼓舞。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刘少奇具体指导了这两个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性会议，关乎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开国大典后不多久，筹备工作便在北京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提出会议方针、同有关国际组织和人士商讨会议开法、起草文件到会务安排，刘少奇都一一悉心指导。

1949年11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和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汇集北京。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

但在会议进行中间却发生了风波。一些苏联、欧洲的代表自认为是工人运动的正统和当然领袖，摆出一副架子，处处指手划脚，什么事都想按他们的意

旨办，根本不尊重东方国家的代表。会上出现了争执。中国工会的代表从来没有碰到过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麻烦局面，一时一筹莫展。

刘少奇得到汇报，立即采取措施。他不慌不忙，把有关人士请来，不卑不亢地说了一番话，晓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求同存异的大义，同时提出对议程和会议文件作适当修改。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满意，一场风波立马平息。路易·赛扬也口服心服，称赞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告别宴会上，他举杯走到刘少奇面前，热情地翘起大拇指向刘少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12月1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之后闭幕。

接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也在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顺利举行，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关于争取妇女权力的决议》等文件。刘少奇还和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越南等国的妇女代表亲切座谈，向她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回答了她们提出的问题。

两个会议还没有开完，越南也来人了。越南共产

党的领导人胡志明派李碧山、阮德瑞送来一封他给中共中央的信，要求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派人到越南帮助工作。这时中共中央的机构很不健全，还没有设立中央对外联络部，因而这些涉及外国党的问题只得由刘少奇亲自处理。

但这时中国到越南的铁路、公路都没有，交通和通讯极为不畅，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带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

派谁去呢？经过一番研究，刘少奇选调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他把罗贵波叫到中南海万字廊办公室，当面交待任务。

刘少奇首先正式通知罗贵波：“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⑫他接着向罗贵波简单介绍了越南的形势，说：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对越共提供援助，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要求罗贵波到越南后完成好这样几个任务：负责向越共中央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同时把越

共中央的意见带回来；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供中共中央参考；告诉越共中央，援助越南的方针中共是定了的，但有些事情现在还做不到，公路、铁路都没有，靠人肯是不行的，要先设法畅通道路。刘少奇还特意要罗贵波向越共中央表示，感谢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我们两广一支部队的照顾。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带着刘少奇写给越共中央的亲笔介绍信和八名工作人员、电台，出发去越南赴任。1月17日，刘少奇给越共中央发电报，通知他们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已启程赴越。第二天，他又正式通告越共中央：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谁知，罗贵波刚走，刘少奇得到广西部队报告，胡志明已经秘密抵达中国境内。刘少奇立即指示当地负责同志迅速派人护送胡志明安全来北京。他还通知罗贵波返回北京同胡志明见面，可由于通讯出现差错，罗贵波竟没有收到，径自去了越南。

1月30日，胡志明化装成一位老先生模样，乘火车秘密到达北京。刘少奇热情设宴为胡志明接风。原来他们两人早就认识。刘少奇1925年至1927年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副委员长，领导工人运动。正好胡志明1925年也在广州组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

会”，开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的“特别政治训练班”。那时刘少奇已经是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胡志明便邀请刘少奇去给训练班讲课，两人便相识了。不过当时胡志明还没用“胡志明”这个名字，而叫阮爱国。这次在相隔了 20 多年之后又在北京见面，两人自是感慨万端，欣喜万分。

胡志明比刘少奇年长 8 岁。他告诉刘少奇：越南共产党面临的斗争任务十分艰巨，困难很大，迫切希望得到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次他为了来中国，秘密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脚步行 17 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离开越南来中国，只告诉了两个人。他要求不要公开他来中国的消息，希望在北京逗留数天后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和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向胡志明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告诉他中共中央已派罗贵波去了越南，负责两党联络工作。对胡志明提出的援助要求，刘少奇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具体研究解决。

刘少奇一面把胡志明秘密来访的情况打电报报告毛泽东，一面安排他去苏联。2 月 3 日晚 9 点，胡志明离开北京前往苏联。

从此，处理同越南有关的问题，就成了刘少奇工作的一部分。1950 年 8 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正

式通知罗贵波组成援越顾问团，任命罗贵波为团长。后来，他又陆续加派了陈赓、韦国清、乔晓光等一批干部赴越南，帮助越共中央训练部队、指挥战役和开展土改。这方面的大小事情一直由刘少奇亲自处理。直到1951年3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些具体工作才交由中联部办理。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内工作更是千头万绪

同国际事务相比，更重要、更艰巨的当然还是国内工作。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稳定物价，救济失业，恢复经济，培养人才，整训干部，土地改革，健全党政机构……真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且没有一样不重要、不紧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由武装斗争转到了国家建设。这一变，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到处人才奇缺，尤其是管理、技术人才大量缺乏。刘少奇从建国一开始就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着手主持创办一所教学内容不同于旧学校的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他几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汇报筹建情况，选调著名

教育家吴玉章担任校长。经过一年的准备，在解决了设置、人员、招生等一系列问题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在1950年10月3日开学。

开学那天，刘少奇去向师生们讲话。他说：“我们不只是破坏旧中国，而且还要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因此要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⑬

刘少奇还要求人民解放军开办专门学校，帮助干部战士学文化、学技术。许多军队干部有战功，打仗有一套，但文化水平低，在经济建设面前却成了门外汉，英雄无用武之地。刘少奇要求赶快解决这个问题。1950年5月16日，他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提出：部队每个师要开办一个学校，把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抽上来学习，部队原有的技术人员也要进专门学校进一步提高。他说：“我们将来就要靠这些干部来管理国家各方面的技术工作。军队要建设海军、空军、炮兵及各种技术兵种，也有赖于这些干部的提高和掌握新的军事技术。”^⑭

由刘少奇兼任院长的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更是克服困难按期招生，培训干部。1950年9月10日，刘少奇去参加新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热情鼓励学员们“理论不够的学理论，文化不够的学文化”。他说：“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

和理论水平。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不可能一下做好，大约要花十年的工夫才能前进一步。”^⑮

正当人民大众欢庆解放、建设国家的时候，敌视新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却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这时，大陆上残留着 200 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势力还相当大。这些反革命分子继续以人民为敌，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1950 年 3 月 18 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安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徒，必须给予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⑯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各地的反革命分子以为形势对他们有利，更加猖狂地反攻倒算，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无法顺利进行。7 月和 10 月，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为了使运动有法可依，1951 年初，刘少奇主持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2 月 20 日，这个条例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第二天正式公布。条例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反、剿匪有了法律武器

和量刑标准，进行起来也就更加顺利和健康了。这场斗争在1951年10月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打掉武装匪徒近百万人，平息了匪患。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中南、西南之后，大陆战事基本结束。恢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此时，全国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有3亿多人口，其中农业人口2亿多。这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最大任务。

土地改革这项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中历来由刘少奇分管。1950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确定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1950年6月6日，刘少奇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债务、人民法庭等方面的政策，得到全会同意。会上还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全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两个文件。7月下旬，刘少奇又主持制订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8月经政务院通过后颁布施行。

这一整套文件贯彻下去，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有章有序地开展起来了。到1952年冬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毫无疑问，这是巨大的胜利。党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胜利呢？

刘少奇建国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

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点。①⑦

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个变化实在是大，给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建国后，刘少奇开始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1951年3月至4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的队伍中确实存在着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要求对党的组织普遍开展整顿，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他根据党内实际情况，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各种措施，号召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会议制定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整党工作在全国各地的中共组织中逐步展开。

开完组织工作会议，又要开宣传工作会议。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党的宣传工作也面临着许多迫切

需要解决的新问题。1951年5月，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举行。刘少奇两次向大会作报告，总结中共宣传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任务、方针。会议精神的贯彻卓有成效。很快，中共各级组织的宣传机构健全了，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一套相关的制度建立了，全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刘少奇开始对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宏观研究

对于新中国建设的艰巨复杂，中共领袖们早就估计到了。毛泽东就曾郑重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①⑧}

刘少奇也一再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干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建设本领。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面对经济建设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他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坐下来扎扎实实地钻研、探索。

刘少奇首先从宏观上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

展步骤。继 1949 年 6 月他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之后，约半年时间，他又研究写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1951 年 7 月他又写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在这些文章中，他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步骤应该是“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现在应该进行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不要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①9}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刘少奇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思路。

刘少奇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有着独到的思考。他主张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应该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不要急急忙忙组织集体生产。1950 年 1 月 23 日，他在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话时提出，东北应该让“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户大量发展，允许农民包括党员农民单干、雇工，要防止在向集体生产过渡问题上犯急性病。1951 年 7 月 3 日，他在读到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后，对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急于否定私有制的倾向

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②①}

那么怎样才能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呢？刘少奇主张不能用行政命令，必须找到一种能为广大农民乐意接受的形式。他认为发展合作社经济，特别是在农村大力组织供销合作社，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刘少奇对发展合作社经济倾注了大量精力，写了《论合作社问题》、《为组织广大的合作社经济而斗争》等好多篇文章。他提出目前主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合作社。在他的指导下，1950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此后，各种类型的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工人问题变得突出了。在新中国的国营工厂里面和工人当中还有没有矛盾？是什么性质？如何对待这种矛盾？这些问题是新问题，而且在中共党内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况引起刘少奇的理论思考。

1951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开始集中研究工厂管理、工会工作问题。他把反映党内不同意见的邓子恢、高岗的两篇文章找来，还专门从东北等地调来一批文件资料，详加研读。随后，他写了《读邓子恢和

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理论概念，主张要分清敌对和非敌对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②①}文章还指出：“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②①}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刘少奇十分重视工人的切身利益。1951年7月上旬，他代表中共中央批转了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他在批语中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如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如果不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就不能取得工人阶级对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的支持。”^{②②}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劳动部主持对全国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职工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增长。在这次调整工资中制订的方案，成为后来中国职工工资体系的基本框架。

1951年11月底，刘少奇经中共中央安排去南方视察和休养。自从到中央工作以来，他除了打仗转移

和必要的外出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到各地去看一看。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每次都是匆匆赶路。现在，各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规，使刘少奇有了下去参观的机会和条件。全国解放了，工人、农民翻身作主人了，老百姓的情绪怎么样？生产恢复如何？政治局面是否稳定？他要去看一看，顺便也使老是绷紧着的神经和疲累的身体得到一次放松。

11月27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离开北京去天津，参观了正在那里举行的华北物资交流大会，然后沿津浦铁路南下。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走了八九个省市。每到一地，他总要找当地的负责同志谈话，了解各方面情况，视察有代表性的工厂、学校、军事单位，还参观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等革命纪念地。

刘少奇特意参谒了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山故居，又去看望了在上海居住的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夫妇的来访非常高兴，亲自煮咖啡招待。宾主谈起了孙中山先生。宋庆龄说，她已经知道刘少奇去向中山陵献了花圈，她对此表示十分感谢。刘少奇诚恳地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答道：“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②③}

在上海，刘少奇还去视察了海军部队。他乘海军“南昌”号军舰，冒着凛冽的严冬寒风，航行巡视了吴淞口要塞。中国的海军部队1950年刚刚组建，刘少奇是第一位去海军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刘少奇这次外出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杭州，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在那里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

刘少奇是个很爱读书的人。但平时紧张繁忙的工作使他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读书学习，对此他总是感到十分遗憾。这次到南方休假，刘少奇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的时候，他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

西子湖畔，杨柳依依，风景优美。但是，刘少奇对这些兴趣不大，而是埋头攻读中国通史。他想到，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要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艰巨的事业！因此，必须熟悉历史，借鉴历史，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汲取有用的经验。每天，他戴着老花眼镜，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看书。他一边读，一边思考，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圈点点，写上眉批。有的书页的空白处，竟差不多写满了。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着读书，常常

忘了吃饭。

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新书变成了旧书，刘少奇的休假也结束了。1952年1月中下旬，刘少奇经南昌、长沙、武汉回到北京。

第九章

探求中国富强之路

●刘少奇再次赴苏同斯大林会谈，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犹如朝阳升起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使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山水一下子变得年轻、亮丽起来。全国上下，从南到北，几亿炎黄子孙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身祖国建设。仅仅经过短短的 3 年，新中国就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把国民党统治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烂摊子整治一新。1952 年 8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3 年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干？怎样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中共中央在进行着新的决策。

当然首先是搞经济建设。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就斩钉截铁地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

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20 年甚至于 30 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①现在，经过 3 年奋斗，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胜利完成，国民经济顺利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 1953 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变得不适应起来。1952 年 6 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主持制订关于加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实施方案。他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新调到中央工作的高岗、邓子恢、习仲勋等先后约来，同他们研究中央机构怎样设置为好。他还打电报给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联中央机构的情况，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机构。”^②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刘少奇指导有关同志写出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提出：“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1952 年 8 月 4 日，毛

泽东对刘少奇呈报的报告批示说：“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③

一些重要领导干部从各中央局调来北京，充实加强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力量。根据这一情况变化，刘少奇又起草了《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提出：“为了集体地和迅速地处理各项重要问题，决定每星期举行两次政治局会议和两次书记处的扩大会议”，并对会议召开方式和出席人员作了规定。④中共中央通过了这个《决定》。刘少奇拟定的这种中共中央议事办法，一直持续到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的机构随即进行了调整，一些新的工作部门开始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建国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基本格局从此大体确定。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陆续奉调进京。第一个调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刘少奇 1952 年 7 月 13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邓小平，批准合并四川四个区为一个省，同时通知邓小平来中央工作。8 月，邓小平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随后，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导干部，也陆续调中

央，在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担任领导职务。

在积极准备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提出来了。1952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本来在刚刚建国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曾经说过，搞社会主义至少还要过10年，多则15年20年。现在毛泽东的提议，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个新提议，刘少奇很同意。但毛泽东这时只是出了一个题目，具体的内容和完整的表述都没有形成。刘少奇开始对这一新思路的内容和表述进行研究。

正好，10月份苏联共产党要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苏共十九大，并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这是刘少奇第二次专程赴苏同斯大林会谈。

1952年9月30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

算起来，刘少奇这回是第四次去苏联。条件毕竟

是越来越好了。1921年他第一次从上海去莫斯科，乘的是轮船加火车，经过了将近三个月才到。第二次是1930年6月从上海经大连、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水路陆路走了一个多月。1949年7月第三次是火车加飞机，用了五六天。这次，因为有了专机，只花了两天时间，9月30日出发，10月2日便到了。

刘少奇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公开、正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全国代表大会。

苏共的这次代表大会十分隆重。因为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还是卫国战争以前开的，至今相隔已经13年了。这次大会还将决定更改党的名称，调整党的领导结构，制订新的建设路线，内容相当重要。

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了。在45个应邀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当中，中共代表团最引人注目。刘少奇作为团长，同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一起，被安排在主席台来宾席的第一排，位置十分突出。

10月8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在完成了一系列的议程之后，苏共十九大于10月14日闭幕。

斯大林同刘少奇已经熟识。大会闭幕后，他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向刘少奇表示问候，并致歉说，最近

他忙得不可开交，一时抽不出时间会见中共代表团，希望稍等几天。

从国内出来之前，毛泽东要刘少奇就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订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决定就这几个问题给斯大林写一封信，先让他了解中共的基本观点，这样会谈的时候就比较集中和方便了。这也是上一次他同斯大林会谈的经验。

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写了一封给斯大林的长信，然后让随团翻译师哲译成俄文后送交斯大林。他在信上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他分析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谈了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设想：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

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⑤

刘少奇的这封信，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说明。

10月24日，刘少奇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会谈。中方参加的有饶漱石、陈毅、王稼祥，苏方参加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

斯大林已经看过刘少奇的信，所以谈起来比较顺利。刘少奇对信的内容作了简要补充。斯大林谈了他的看法，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

要商量的内容很多，这次没有谈完，10月28日又接着谈了一次。因为要讨论有关越南、日本、印尼

等国共产党的问题，正好这时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也在莫斯科，斯大林便邀请他也参加。

斯大林在会谈中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订宪法。他对刘少奇说：“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⑥

斯大林的建议很有道理。刘少奇在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这次同刘少奇会谈，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中国领导人。4个月后，斯大林突患脑溢血逝世。

1952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纪念日。苏联全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那天参观莫斯科大学时登上室外的一个高台，受凉得了感冒，回到住处一检查又发现血糖等指数不正常。在代表团的成员当中，王稼祥的身体也不好，战

争年代负的伤时常复发。于是，他们相约趁此机会利用苏联的医疗条件作一次检查治疗。毛泽东对此想得很周到，还要他俩的夫人去照顾他们。他给刘少奇发电报说：“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⑦

11月下旬，刘少奇在王光美的陪伴下去苏联南部黑海边治疗休养。

12月12日，刘少奇在休养地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⑧1953年1月初，刘少奇结束休养去莫斯科，1月7日启程回国，因飞机故障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两天，1月11日回到北京。

●向社会主义过渡、制订宪法、全民选举，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

刘少奇回国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制订宪法、全民选举这几件事情摆到了中共中央的紧要议事日程，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纷纷在各种场合讲述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也围绕这些要事展开。

首先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论中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内容到提法，一次比一次讲得明确。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⑧毛泽东的这段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毛泽东讲的意思，同刘少奇1952年10月20日给斯大林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起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亲自动手对《提纲》作了修改。1953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批准向全国发出这个《提纲》。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确定下来了。它最后的规范化表述是这样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个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很快在全国兴起。它确实像一座灯塔，指引着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从此，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宪法和选举是另一个热点。

1953年1月11日刘少奇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接到通知，要他1月13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等32人为委员。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席，朱德等28人为委员。

自此，制订宪法和准备全民选举两项工作，便一步一步地进行起来了。

1954年1月9日，毛泽东亲自带领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西湖畔一处僻静地点住下来，集中精力起草宪法草案。1月15日他发电报给在北京的刘少奇，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要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看外国和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宪法，以便为讨论宪法草案作准备。

刘少奇当然照办。第二天，他回电给毛泽东：“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⑨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宪法起草小组把初稿写出来了。2月17日，毛泽东派专人把初稿送给刘少奇，同时附了一封信说：“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2月20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⑩

于是，讨论修改工作在南北两地分头进行，时间是一个月。北京城里，刘少奇召集中央有关人员一次次讨论；杭州方面，毛泽东主持起草小组一次次修改。北京讨论一次，意见发到杭州，杭州就修改一次，然后又将改稿传回北京。如此循环了三四个回合，每次都很多修改。北京方面，还专门成立了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组成的研究小组，请了周鲠生、钱端升作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作语文顾问，从各个角度对宪法草案进行研究推敲。一个月后，《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正式完稿。

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多位委员聚集中南海勤政殿，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会上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人士共8000多人，对这个草案初稿进行讨论提意见。

这样，讨论修改工作又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齐头并进。8000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不断汇总上报，宪法起草委员会则在北京开了七次会议，吸收各地报来的意见，逐章逐条对初稿进行修改。两个月后，这一阶段的工作告一段落。

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对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审查。这次会议非常庄重，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部到会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起草委员会的几位正副秘书长、法律顾问、语文顾问也列席会议。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作重要讲话，说：“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⑪会议最后在一片掌声中通过了这个草案，决定将它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3天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开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决定向全国人民公布这个草案，组织各阶层群众广泛讨论，提修改意见。

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社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场大讨论很快遍及全国城乡，一时间宪法成了几亿老百姓的热门话题。这场讨论持续了将近3个月，参加人数达1.5亿。

基层群众在讨论宪法，刘少奇也没把这件事放下。他在关注全国讨论的同时，抓紧起草准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对宪法草案的系统说明，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报告初稿写出来了。刘少奇一面动手从头到尾修改，一面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9月8日拿到报告稿的全文，审改了整整一夜。为慎重起见，他决定约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再研究斟酌一下。9日凌晨2时，他写了个通知条交给秘书：“请周、朱、陈、小平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时以前及下午七时以后，看少奇同志宪法报告的头两章，以便晚上十一时左右，和少奇、伯达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中的有些问题。”^⑫

经过最高领导层的讨论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基本定稿。

全国人民讨论宪法草案的情况也陆续报上来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还真不少。处理这些意见是一件很仔细的事情，对好的、合理的要吸收，对不能吸收的要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明理由。9月12日，刘少奇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他向委员们报告说：“我们的宪法草案与五法草案在全民讨论中提了一百一十八万多件意见，其中对宪法草案的意见有五十二万多件。这些所提意见中，一部分是关于修改内容的意见，一部分是关于修改文字的意见。对这些意见，有些是作了修改的，有些是作了解释的。”^⑬会议最后决定，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至此，起草宪法的各方面工作全部完成，就等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

差不多在宪法起草工作开始的同时，刘少奇还领导着另一项相关的重要工作，就是全民选举。

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层层选出乡、县、省人民代表并召开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三级的权力机关和行政、司法机关，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工程相当浩繁。而且，由于中国文化落后，缺乏民主传统，

要组织几亿人民投入普选，具体操作起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少奇作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工作量相当大。

刘少奇为此多次召集会议，制订政策，布置选举工作。1953年4月他主持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于是，选举人民代表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全国从乡到县到省逐级层层铺开。到1954年六七月间，全国150个省辖市，2064个县、自治县和其他县一级单位，170个中央直辖市的区，全部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出了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大代表16680人。在此基础上，7月底8月初，全国25个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昌都地区以及14个直辖市，选出了全国人大代表1136人。军队召开了军人代表大会，选出了全国人大代表60人。华侨系统选出全国人大代表30人。总计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1226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普选。老百姓又新鲜又兴奋，投票十分踊跃，许多地方盛况空前。亿万群众在选举中体会到了当主人翁的感觉，民主意识和政策热情大为提高。1953年到1954年，全国参加投票的选民超过2.7亿，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

各项准备相继完成。1954年9月，1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云集北京，期待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召开！

●高岗、饶漱石企图拱倒刘少奇、周恩来后取而代之，结果自取灭亡

正当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带领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预想不到的严重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中央委员饶漱石联手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建国初，高岗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东北、华东两地的党政一把手。195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重要干部调北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样，高岗、饶漱石先后从外地调往北京。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在进京之前就已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新组建的国家计委权力很大，人称“经济内阁”。但他并不满足。他知道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要进行新的人事安排，便迫不及待起来。同样野心勃勃的饶漱石，同高岗一拍即合。两人一唱一和，伺机兴风作浪。

可是，在他们的篡权野心面前，横着两座巨大的障碍，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长期以来，刘少奇、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无论是资历、能力还是威望，高岗、饶漱石都无法同他们相比。可这时高、饶已利令智昏，特别是高岗，以为只要把刘、周扳倒，他就能一窜而上，执掌大权。

正在这时，高岗发现，毛泽东在农业生产合作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以为这是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周恩来不信任，不禁心中暗喜：机会来了。

1953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制订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同时对财经工作中在推行修正税制等问题上出现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薄一波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过较长时间。高岗一看有机可乘，便首先发难，在会上猛攻薄一波，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批薄射刘”。

高岗在会上发言，明里批判薄一波，实际攻击刘

少奇。他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在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内容等，故意栽在薄一波头上，然后大张挞伐。饶漱石则充当了敲边鼓的角色。

在会下，高岗更是格外忙碌。他的住处东交民巷8号一时车水马龙。他频频约人谈话，散布流言蜚语，在背后中伤刘少奇、周恩来。他造谣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拍过他的肩膀。高岗声称：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并不成熟，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他还把刘少奇的一些讲话搜集起来，扬言这些讲话有错误并在干部中间传播。他明明自己拉帮结派，却反诬刘少奇、周恩来搞宗派，说什么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时高岗的狼子野心还没有暴露，所以毛泽东要他找刘少奇直接谈清问题。高岗却做贼心虚，一直没有去。

倒是刘少奇心里坦然。他听说高岗对他有意见，便主动去找高岗谈话，连着谈了两次。可高岗根本不

是出于公心，谈话没有起任何作用。

高岗依然我行我素。他经常在他的住地请客、办舞会，利用这些场合说三道四，散布了大量挑拨离间的言论。他公然推翻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对头，要重新作结论。高岗还提出一个怪论，说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改组”中央。

全国财经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到8月中旬才结束。会议的后期走偏了方向，对薄一波作了不公正的批判。

财经会议开完了，可高岗的非法活动有增无减。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四处放谣风说：毛泽东已不重视刘少奇，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让高岗搞政治局。他还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政府总理，主张由林彪担任。

高岗还用拉拢的办法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邓小平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场驳斥了这种说法，明确表示反对。高岗不甘心，又去找陈云谈判，提出：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遭到陈云断然拒绝。

邓小平、陈云这才觉得问题严重，很快去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这种不正常活动。

这厢高岗四出串连的同时，那厢饶漱石也行动起来。

饶漱石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上任没多久，就在部领导班子内挑起事端，发动对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中央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刘少奇得知这个情况，把饶漱石找来谈话，表示不同意他的错误做法，要他冷静从事，不要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可饶漱石这时已头脑热昏，根本听不进去了。

饶漱石曾经是刘少奇的老部下。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兼任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刘少奇离开华中回延安后，又委以他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重任。饶漱石过去一直对刘少奇表现得毕恭毕敬，可这回，他以为高岗要上升，刘少奇可能不行了，便一反常态，投向高岗。

1953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成了饶漱石配合高岗行动的场所。会议的主题本来是研究加强干部工作，可饶漱石故意扭偏方向，继续狠批安子文，否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并且指桑骂槐地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饶漱石的反常表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中央决定整个会议暂停，先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迫使饶漱石作了检讨。刘少奇两次到会讲话。针对饶漱石的分裂活动，刘少奇强调指出：“我们要时时刻刻记着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我们决不允许把我们的眼光只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只关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部分同志。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长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⑭

这一举措，把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撕开了一个缺口，他们的非组织活动开始漏馅。

可高岗还执迷不悟，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态度。195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准备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他依照过去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提出谦让，说：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不赞成轮流，主张仍由刘少奇主持。高岗却跳出来反对，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这一连串表演，把他的险恶居心露了出来：他是要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取而代之。他自己后来在《我的反省》的书面检讨中也承认，他就是“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人们终于逐渐看清了高岗、饶漱石的真面目，许多领导干部陆续向中共中央揭发他们的不正常活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在会上针对高岗、饶漱石的行径警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⑮

毛泽东的发言，把高岗、饶漱石问题的盖子揭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和领导起草宪法草案，刘少奇留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很快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送给毛泽东审改。文件中虽然没有点名，内容却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分裂行为的。

鉴于事情的重要性，毛泽东决定提高规格。1954年1月7日，他在杭州写信给刘少奇，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由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全会上应开展自我批评，

但他特别叮嘱刘少奇本人作自我批评时“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①⑥}

眼看阴谋越来越败露，高岗慌了手脚。他给毛泽东写信，承认犯了错误，表示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还要求去杭州同毛泽东面谈。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写信给刘少奇说：“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①⑦}

1月25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当面批评他，同时也希望他悔过自新。为了尽量挽救他，2月5日又谈了一次。2月3日同饶漱石也谈了一次。但高岗、饶漱石百般抵赖，企图蒙混过关。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刘少奇主持下正式开会。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向全会作报告。他概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所进行的工作，提议召开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并对《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作了说明，提请全会讨论。他着重讲了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针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严肃指出：“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

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⑮

会议开得极为严肃认真。在会上发言的高级干部达 44 位。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发了言。这些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全会经过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作的报告，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报告，并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2 月 10 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圆满结束。

在这次全会上又揭发出高岗、饶漱石的许多问题。而他们本人却仍然遮遮掩掩，拒不作深刻检讨。高岗竟在住处触电自杀，虽然没有死成，但他顽固对抗中共中央的态度已暴露无遗。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全面查清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也召开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查核和对证了他们搞阴谋的大量事实。

高岗、饶漱石原指望拱倒刘少奇、周恩来后取而代之，却不料偷鸡不成反蚀米，连老本都输了个精

光。高岗见大势已去，决意自绝于党和人民。8月17日，他在东交民巷8号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药，一命呜呼，真个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自从中共中央领导层出现了高岗、饶漱石这两个野心家阴谋家以后，一时间中共党内被搅得无法安宁。现在剔除了这两个蛀虫，整个风气为之一扫，各方面的工作又顺畅起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继续按部就班进行。6月至7月，刘少奇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接着，他又主持中央选举委员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审定宪法草案。

一切准备就绪。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开幕！1954年9月15日，1000多名代表欢聚中南海怀仁堂，出席这次盛会。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全民选举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气氛极为欢快热烈。

开幕的头一天，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开幕词，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而豪迈。他说：“我们这次

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①⑨}

刘少奇的报告从新中国国家的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的基本内容。他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我国国家生活中，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我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我国的宪法。”^{②⑩}

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星期。代表们对宪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9月2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21日通过了其他几个重要法律，9月23日听取了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9月27日，全体会议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9月28日闭幕。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图 12 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们向他表示热烈祝贺。（1954 年 9 月）

刘少奇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职务。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要审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制订和颁布法律，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监督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并同国家主席结合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又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许多工作带有奠基和开创性质。

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大小事务，成为刘少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刘少奇担任委员长这件事，竟在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当中引起了一点小误会。

平时，刘少奇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互相称同志，不称官衔职务。刘少奇担任了这么多年的中共中央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他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一直都是直呼“少奇同志”，从不称他的职务。这回他当了委员长，秘书们想，这是国家领导人的正职，应该改改称呼了吧！

这天，秘书杨俊到刘少奇办公室报告工作，进屋后喊了声：“委员长！”

刘少奇正在埋头批文件，没有反应。杨俊以为他没听见，又叫了一声，他还是没吱声。当叫到第三声“委员长”时，刘少奇抬起头来，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

刘少奇平时对工作人员一向很和气，这一下把杨俊闹了个大红脸，一时语塞。还好王光美忙从隔壁走过来，笑对杨俊解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嘛！”刘少奇补一句，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后来，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②①}

对于这一点，刘少奇始终坚持。他不称别人的职务，也不许别人称他的职务。所以，从中央领导、各级干部到普通党员，一直都是亲切地称呼他“少奇同志”。

●刘少奇向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说：现在的任务是保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宏大深刻的社会变革。几亿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商业改成公私合营。从城市到乡村，社会主义改造热潮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涌动滚过。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指引这场变革的灯塔。

在这场变革当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富有中国特色。刘少奇在建国前曾几次讲过对私营工商业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行和平改造。1953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1个月，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地讲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他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②②}

这项工作从1953年9月以后逐渐开展起来。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进一步座谈这件事。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政策。刘少奇对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说：

现在，资本家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情绪也很不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改变两种所有制：要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要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所以，牵涉的人很多，农民牵进来了，小手工业者牵进来了，小商小贩牵进来了，资本家牵进来了。要改

变他们的所有制，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因此，他们动荡不安，感觉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不晓得明天怎么样。毛泽东同志讲，现在资本家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我们不加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或者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再加上反革命分子一鼓动，就可能发生大问题。②③

刘少奇接着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到1956年1月，全国主要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起，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逐步合作化的方式全面铺开。但到了1955年春，刘少奇在指导这场运动过程中发现，合作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4月20日，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前夕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其中发展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两

三万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②4}

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当时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一再反右倾的政治气候下，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在 1955 年夏秋以排山倒海之势超高速发展，几个月工夫就全部实现了合作化。

到 1956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了。然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富强之路应当怎样走？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毛泽东在思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在思考。他们开始对这个课题进行认认真真的探索。

于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的就是要制订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

1955 年 12 月 5 日下午，100 多名高级干部，包括在京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座谈会。刘少奇主持会议，布置中共八大的

筹备事宜。他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关于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刘少奇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要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的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准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负责准备修改党章的报告。

政治报告是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报告。它要全面总结中共七大以来的经验，提出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说，这个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昭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它将怎样带领全国人民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为了写好这个报告，刘少奇决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工作，以便切实摸清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他在12月5日座谈会的最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只隔了一天，汇报座谈便开始了。

刘少奇依次把中央各部、委、局的负责人约请到

他住处的会议室，要他们谈本系统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特别是带全局性的问题，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他一面听一面记，时不时地询问、插话，同部长们一起讨论。汇报会经常从白天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

这段时间，刘少奇除了会见外宾、出席重要会议和穿插处理日常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了这项“汇报工程”。从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日复一日地召集一个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汇报座谈：

1955年12月7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城建总局局长万里。

12月8日、10日——一机部部长黄敬；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三机部部长张霖之。

12月9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廖鲁言、刘瑞龙、魏震五。

12月1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陈郁。

12月13日——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

12月14日——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景范、宋应；石油部部长李人俊。

12月15日——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副部长周荣鑫。

12月16日——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

东。

12月22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

12月27日——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

12月28日——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张琴

秋。

12月29日——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

12月30日——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副局长邓洁。

12月31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副局长金明。

1956年1月2日——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陈希云、喻杰。

1月3日——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王磊。

1月4日——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邓飞。

1月5日——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解学恭。

1月6日——农产品采购部部长杨一辰。

1月7日——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副部长刘子久、毛齐华。

1月8日——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

2月16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刘建

章、余光生。

2月17日——交通部副部长李运昌、朱理治、马辉之。

2月18日——邮电部副部长范式人、钟夫翔。

2月21日——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李平、沈图。

3月5日——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刘皑风、刘子载。

3月6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柳湜。

3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傅连璋、崔义田、郭子化。

3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

3月9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

经济建设，是刘少奇和部长们议论的重点。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刘少奇提出要处理好一些基本关系，如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手工业、轻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关系，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关系，国营和集体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

正在刘少奇一个接一个部门听取汇报的时候，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来了。一天，薄一波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偶然讲到刘少奇正在逐个召集各部门汇报。毛泽东一听大感兴趣，说：“这很好，我也想听

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毛泽东说干就干。各部门向他的汇报也很快开始。从1956年2月中旬到3月底，毛泽东连续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开头几次，刘少奇也参加了。5月以后，刘少奇又单独约新华社、高级党校、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负责人作了汇报。

这次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是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国国情所作的一次宏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在这些座谈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概括大家的意见，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却并不一帆风顺。在大反右倾保守的情势下，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急躁冒进，造成物资短缺，财政入不敷出。种种紧张状态反映出经济已经过热。这使刘少奇、周恩来深感不能一个劲儿地反右倾保守了，再这么反下去要出大毛病了。周恩来1956年2月首先提出要注意急躁苗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会上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待参加会议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要他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干部们早已对屡反右倾的做法忧心忡忡，如今听到中共中央定了这样的新方针，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6月1日陆定一高兴地在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透露：“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

6月10日前后，中央宣传部把社论稿写出来了，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刘少奇要胡乔木先作些修改，接着他自己也改了一遍。

改完后，刘少奇在社论稿上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报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3个字：“不看了”。

社论登在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里面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些工作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只有我们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一个《论十大关系》，一个“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已经获得了初步的但却

是重大的成果。这样，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刘少奇向八大的《政治报告》也比较好写了。

经过起草班子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又经过刘少奇的多次修改和毛泽东的审阅，《政治报告》最后定稿了。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的1026名代表，欢聚在新落成的政协礼堂，出席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整个会场热烈庄重，洋溢着团结、兴旺的气氛。

中共七大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已经过去了11年。在这中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正满怀信心地向着富裕、强盛的目标迈进。这一切，使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成为格外引起世人瞩目的大事。

毛泽东在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中宣布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②5}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方针和任务。他说：“现在，革命

图 13 刘少奇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1956 年 9 月）

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⑥}

在以后几天，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9月27日，大会在选出97名中央委员和73名候补中央委员之后胜利闭幕。

接着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领导人。

一开始酝酿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和人选的时候，党内曾提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拟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刘少奇不同意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倡议多设几个副主席。中共中央领导层经过慎重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党章中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毛泽东向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报告这件事说：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办好。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②⑦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在9月28日召开。经过充分酝酿，选出了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波匈事件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种种反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上工作日程

鼓舞人心的喜讯在1956年频频传出：全国的社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中共八大成功举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这一切，使几亿中国人振奋不已。人们对祖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然而，一些令人惶惑的消息却从国外传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6月份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群众罢工和骚乱，10月份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发生更大规模的群众骚乱。

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0月下旬匈牙利事件爆发，东欧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苏共中央紧急要求同中共中央磋商应对办法。1956年10月23日，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他们到达后顾不上休息，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同等在那里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交换意见。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波匈事件问题，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中不同意苏共那种惊慌失措的处置办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苏共中央吸取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确定了处理方针。

不久，波匈事件平息了下来。

这是一次短暂的工作访问。10月31日，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一起回到北京。

波匈事件不能不在中国各阶层人士中引起种种

反应。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对许多问题迷惑不解：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件？怎样才能避免这类问题发生？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刘少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思考的结果，他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从波匈事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②⑧}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专门讲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向全会介绍了波匈事件的经过，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重点谈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针和从中获取的教训。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他对会场内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们语重心长地说：

我个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谈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

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②9}

波匈事件后，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经济和政治生活出现某些紧张：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各部分人之间待遇不公，物价上涨。一些地区出现工人、学生闹事。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农村中则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

毛泽东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这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应该很好地研究。

刘少奇马上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会议结束后，他约请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教育部的一些同志组成调查组，在他亲自带领下，到一些省市就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组出发的日子定在1957年2月18日。这天

下午，一列墨绿色专列停在了北京火车站。从几个单位抽调来参加调查组的李修仁、罗毅、张黎群、徐方庭、邢坚，还有邓力群等同志，陆续上了专列上一节整洁简朴的车厢。

刘少奇已经等在那里。来参加调查组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开始不免有些拘束。刘少奇随便地一一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单位和简单情况，然后同大家聊了起来。他说：“同志们，我们要在一块工作了，从北方去南方，到干部中、人民中作调查研究。今天到保定，去河北省委那里谈谈。”^{③⑩}

北方的2月，春寒料峭。火车沿京广线南下，车窗外仍是灰蒙蒙一片。车厢里，调查组的同志们继续听刘少奇讲这次外出工作的指导思想。

“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刘少奇继续说，“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的就接受，不正确的就解释和批评……”^{③⑪}

晚上，列车抵达河北省保定市。刘少奇把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叫到专列上来，汇报有关工会、农业、教育、青年工作等情况。第二天，刘少奇主持开

了两个座谈会：一是同中学教职员、学生代表座谈，一是同大专院校教授、学生代表座谈。第三天，又去石桥村同农民座谈。

调查组工作正式开始。调查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反映上来了。调查组一路南下，保定——石家庄——栾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走走停停，沿途调查，听到的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刘少奇了解到，群众中反映最多的情况有这样几个：一是中小学毕业生升不了学，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书读，没有工作做；二是反映农民生活苦，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悬殊；三是城市职工住房、宿舍不够；四是猪肉等副食品供应紧张。^{③2}

3月19日到长沙，刘少奇在这里多停留了几天。他开始尽可能解决这些反映突出的问题，当然是要从全局上解决。

3月22日，他把长沙市几所中学的教师、学生代表请来开座谈会。他首先说：“同学们，教职员先生们，你们好！你们提了很多意见，我都看过了，已经叫人给我摘录了。你们今天还有话讲没有？现在还可以拿出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来讲一讲。”

在刘少奇的热情鼓励下，年少气盛的学生们又

纷纷发言提问题。比较集中的意见，还是对不能升学不满意。有的说：“我无论如何要升学，不升学就不干。”有的说：“说来说去还是要我们下乡，我们就是不愿意下乡。”有的说：“下乡务农社会压力太大，老师、家长看不起怎么办？”

刘少奇从全局情况讲起，一层一层地给同学们讲道理：

同学们提的意见很多，有很多具体问题应该交给有关机关解决，现在我想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毕业生升学的问题。今年的毕业生升学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同学们很紧张，教职员先生、家长也紧张。今年学校招生的计划还没有最后确定，我还不大清楚，大体上我能告诉大家几个数字。现在全国适龄儿童不能入学的大约有 4000 万人，已经入学的有 6000 多万；高小毕业生 500 万人中，约有 400 万不能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 109 万人中，大约有 80 万不能升高中；高中毕业生大约有 8 万人不能升大学。不是说看问题要全面不要片面吗？所以要了解一下全国的情况……

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是耻辱的、丢人的、没面子见人的，这个观点对不对？这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呢？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你们的父母不是也有种地的吗？他们干的都是不光荣的事情吗？有的祖祖辈辈是种地的，难道祖祖辈辈都丢了人吗？中国六亿人口有五亿是种地的，难道五亿农民都是可耻的、丢人的？这是侮辱农民，这可不得了呀！中国就是靠这五亿人，革命靠他们，建设还是靠他们……^{③③}

刘少奇讲了整整一下午。循循善诱，入情入理，向学生们做思想工作。

后来，刘少奇的这次谈话被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他在另一次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被改写成《中国青年报》社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这两篇社论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全国的青年学生争相阅读，组织讨论，对解决这一代青年在升学、就业、学习经费等方面同社会的矛盾起了极大作用。

经过1个多月来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这一路的调查，刘少奇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³

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而这些又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刘少奇对干部们说：

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闹事都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利益，至于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恐怕不容易发生……我建议省委、市委及各个部门每年专门集中地向他们征求两次意见，让人家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无非是提出几百条几千条，归纳起来也就是那么几类问题，还是有头绪的。征求了意见后，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加以交代，解释清楚，答复人家，看这样好不好？不然有意见没地方提，问题积累在那里，总有一天火山爆发……

群众起来闹事，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说闲话，乱七八糟讲，自由主义；然后就正式提意见或派代表交涉；如达不到目的

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出墙报；再达不到目的最后就大民主、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不注意小民主，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还不理睬，非等到大民主来了才不得不做工作解决问题。我看说闲话是最好解决问题的阶段。不要怕闲话，让他们讲，不要批评、责备、禁止讲闲话，它就是社会舆论嘛……

③④

离开长沙，刘少奇又继续南下，经停株洲、衡阳，到了广州。

广东历来是思想、经济活跃之地。诸如地下工厂、自由市场、小商小贩这些当时在全国受到非议的东西，在广东却非但屡禁不止，而且屡见不鲜。

刘少奇由此看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步子过急造成的弊端，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早在1956年12月他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

③⑤在广州，他又更肯定地对广东省的干部们说：“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缺点，补充国营商业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个大的项

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保留一点竞争好，这样若干年后还可以一方面有计划性，另一方面又有多样性，丰富多彩。让自由市场唱对台戏，挖苦我们国营、合作商业、税收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会更好一些。”^{③⑥}

调查很有收获。刘少奇准备接着对广东的社会经济关系进一步作些了解研究。可这时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尽快回北京。

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要来中国访问。刘少奇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应由他主持接待客人。

1957年4月11日，刘少奇仍沿京广铁路返回，4月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去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来访。以后几天，他又连着同伏罗希洛夫会谈和主持接待活动。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继毛泽东之后，刘少奇当选为 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大获全胜，一派喜人景象。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超额完成，

工业增长 129%，农业增长 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 53%，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 23%。全国人民为丰产丰收和生活改善而欢欣鼓舞。

然而，这一年的政治形势却是错综复杂。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向党进攻，随即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又严重扩大化了。在九十月间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从而不恰当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这一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 1956 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

经济建设方针变得曲折起来。1956 年初出现冒进，1956 年年中开始反冒进，到 1957 年底又形成反反冒进。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 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 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这一目标很快成为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的口号。12 月 2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就宣布了这一口号：“在 15 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

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 1958 年 1 月在南宁、3 月在成都两次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批判 1956 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严厉批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说：“1956 年 6 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③⑦}毛泽东还批评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③⑧}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针对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也包括刘少奇。于是，他们开始在不同场合作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发言，检查自己“所设想的与主席所设想的是有距离的”。他说：“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可能速度问题，我的脑子中也有些问题，觉得快点慢点都行，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问题。”他接受了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中提出的建设速度快一点的观点，说：“速度，可以快。到底可

以快多少？以前也估计不足。没有意料到水利、生产运动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以后还是有可能的。”^{③⑨}

这次在反冒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以大家服从毛泽东获得统一，却也由此伏下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因素。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大跃进”这个名词屡屡出现在文件和报端。最早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里面说：“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发现后大加赞赏，批示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④⑩}

于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唯恐落后，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纷纷出道。

为了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确定下来，成都会议决定近期内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决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草稿已经由秘书班子起草出来，会上指定胡乔木负责根据成都会议精神再作大改。

报告稿越改越长，最后几乎增加了两倍。1958年4月22日，刘少奇带着修改后的报告稿，飞赴广州，请毛泽东作最后的审定。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开会，一年半以前出席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的1000多名代表，再次汇齐北京，讨论路线大事。开幕的头一天，刘少奇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根据一年多来毛泽东历次指示的精神，阐述了目前形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今后任务，特别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④①}

代表们发现，这次大会和上次大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上次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确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

刘少奇报告以后的几天，是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毛泽东作了五次讲话，提倡鼓干劲，批评反冒进。

会议气氛越来越热。冶金部门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煤炭部门提出“两年赶上英

国，十年赶上美国”；纺织部门提出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湖北谷城县提出“一二年内小麦亩产1000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1000斤、争取1500斤等等。不少代表还提出，刘少奇报告中对反冒进的批评份量不够，太轻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到5月23日结束。会议最后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全国各条战线迅速贯彻。“大跃进”已不再是纸上谈兵，而化作千千万万人的行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高潮。

原来制订的各种产量指标一再提高，改了一次又一次。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指示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以的。这里主要是钢。”^{④②}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更是倍加欣赏。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我在河南调查之后，叫河南同志跟红旗杂志合作，搞一个卫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不然我为什么如获至宝呢？”^{④③}

8月在北戴河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等高指标，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样，一个大炼

钢铁，一个大办人民公社，很快把“大跃进”浪潮推向巅峰，席卷全国。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上呼啦啦迎风招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然而没有多久，国家财政、人民生活必需品到处捉襟见肘，国民经济开始下滑。

北戴河会议后两个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有所察觉，着手纠正这些错误。

1958年，刘少奇除了参加中央会议和处理重要国务，差不多一直在各地调查视察。他终于看到，人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都相当混乱。11月初，他在浙江转了几个地区，发现问题不个。他批评浙江的工作不够谨慎，对省、市委负责人说：不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重，要反对把富裕农民、小商小贩、知识分子推到敌人一边去的倾向；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是高标准；现在对许多地方报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也不符合实际；要反对说假话，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④④}

毛泽东从11月2日起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书记参加的工

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刘少奇在浙江接到通知，急急赶去参加。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又相继在武昌、北京、郑州等地召开了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采取措施纠正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图 14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乘公共汽车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958 年 5 月）

“大跃进”开始降温，形势开始扭转。

1959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汇集上海。3 个不同层次的会议将要在

这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相当重要。

首先是继续纠“左”进程，检查人民公社整顿工作，压缩 1959 年国民经济指标。这件事进行还算顺利，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两个文件。但对至关重要的钢产量指标没有降，仍为 1800 万吨，只是内部说明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后来到了 5 月份，才由陈云调查落实后提议降为 1300 万吨。这一提议先得到刘少奇的支持。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④5}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讨论确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方针和人事安排。其中突出的一项，就是正式决定不再提毛泽东作为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而提议由刘少奇担任这一职务。

毛泽东早在 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就提出她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这样一个新的条款。几年来，对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件事，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已经作

了充分的酝酿，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还作了专门决定。现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开会在即，这一安排便正式定下来了。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18日在北京开幕，4月28日闭幕。

4月17日，刘少奇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选出了97人的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推定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

图 15 刘少奇、宋庆龄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程潜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彭真任大会秘书长。

4月18日，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经过代表们反复讨论酝酿，4月27日进行大会选举。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还依据宪法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提名，会议决定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

图 16 群众欢庆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代表们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通过了选举结果，祝贺新的一任国家领导人当选。

当晚，喜讯传遍各地。许多大城市披上节日盛装，彩旗招展，霓虹灯闪烁。成千上万的群众敲锣打鼓，举着旗帜标语上街游行，欢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欢庆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从会场出来，刘少奇坐上车静静地回到中南海西楼甲号楼住处。会场上的掌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但他的心里却感到很不轻松，高兴不起来。眼下，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显露，人民生活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逆流已经形成且有日益嚣张之势。在这样的时刻就任国家主席，这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

西楼甲号楼如喜事临门。刘少奇办公室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和他的子女家人们，早已等候在门厅。刘少奇一进门，大家一齐迎上前去，高兴地同他握手，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刘少奇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向大

家点了点头，便又像往常开会回来一样，匆匆地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在场的工作人员默默地目送他去了办公室。大家从刘少奇的表情上仿佛又读到了他平时常说的这样一句话：“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怀，庐山会议由反“左”变为反右

从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沿长江顺流而下，在宽阔的江面上航行 300 多公里，即到达赣北重镇九江。从九江上岸不多远，便可远远地看到闻名遐迩的庐山了。

1959 年 6 月下旬，这段水陆交通线多了一些平时少见的交通工具。细心的人们发现，一些整洁的中型客轮，这几天老在武汉和九江之间往返，从九江去庐山道路上的大小汽车也大大增多了。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相传殷周时期有一对姓匡的兄弟在山上搭了个茅庐隐居，因而得名庐山，又叫匡山。庐山山势雄奇，景色优美，气候宜人；主峰高 1474 米，登顶北可远眺蜿蜒东流的长江，东、南

可遥望碧波浩瀚的鄱阳湖，确实不愧为世界级的游览胜地。

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以来经济方面遭受的挫折，是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经验教训不少，需要冷静总结。这一段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们，一直处在工作忙累、精神紧张的状态，也需要放松一下，以便接着大干。所以，开会的地点就选在了庐山，让大家上山当一回“神仙”，边避暑边总结，开个“神仙会”。

各路干部从四面八方赶赴庐山。大部分人走的路线都是武汉——九江——庐山。这一线的交通便繁忙起来了。

正在湖南视察的毛泽东，6月2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到武汉。刘少奇是6月27日同朱德、彭德怀乘一部专列离开北京到武汉的。中央的部长们则是集中起来从北京乘铁道部安排的专列南下，7月1日下午才到达武汉。

毛泽东刚刚去他的家乡韶山转了一趟，还在韶山水库游了泳，兴致很好。到了武汉，他还想游长江。6月29日他约一些中央同志到江面船上谈话开小会，开完会愿游泳的游泳。刘少奇、朱德、李井泉、柯庆施等都来了。大家先在船上见面谈话，随后毛泽东和几个人便下水游泳了。刘少奇没下水，倒是王光

美在毛泽东邀请下游了一程。毛泽东鼓励她说：“下来，让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

6月30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同船去九江。这条船上有挨在一起的一大一小两个包舱，他俩便各住了一个。由于是夜航，正好一上船就睡觉。刘少奇一觉醒来，船到九江，天已大亮。毛泽东醒得早，已经先上岸了。刘少奇便也抓紧时间驱车上山。

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是第一次上庐山。所以在头几天，大家利用开会的间隙，纷纷游山吟诗，看戏跳舞，真有点“神仙会”的味道。

刘少奇是来过庐山的。那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经组织安排来庐山养病，还是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帮助找的住处。时光匆匆，转眼30多年过去了。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了形势、任务、政策方面的18个问题，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从7月3日起，与会人员按地区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六个大组进行讨论。讨论的主调是继续纠“左”。各组发言踊跃，气氛松快。

刘少奇连续几天参加华中华南组讨论。他发言说：1958年出现了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的聪明人；国民经济的发

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什么叫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④⑥

代表们听得出来，刘少奇主张继续反“左”，不过话讲得比较婉转。

会议开到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发生的错误、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些话讲得比较尖锐。毛泽东一开始没有表态，只在7月16日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一个标题，印发与会人员。

分组讨论照常进行，大家各说各的。

7月16日，刘少奇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了一次话，说：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他特意重提陈云的经济思想，说：“1956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多数年），略有赤字（少数年），这些都需要。”④⑦

各小组第二天传达了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这时不少干部正对会议下一步怎样进行心中无数，听了传达，都感到按刘少奇提出的方针可以开好这次会议，解决问题。一时间，“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成为小组讨论中的口头禅。

围绕着彭德怀的信，会议出现微妙变化，气氛不再那么轻松愉快。与会人员各有各的理解，意见纷纭，分歧开始表面化。7月19日、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先后在各自的小组里发言，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另有一些人则表示反对。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上午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昨夜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的药性还没有过去，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警卫员连忙扶着他下山进了会场。

毛泽东结束几天来的沉默，在大会上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

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④⑧

毛泽东顺着他的思路讲下去，针对彭德怀信中的观点，逐一批驳，尖锐批评。他说：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他还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④⑨

毛泽东讲了一上午，讲完即散会。人们三三两两地沉默着离开会场。

刘少奇慢慢往回走，胡乔木顺路跟了过来，刘少奇便邀他同行。两人一起回到刘少奇的住处，正好到了开中午饭的时间，刘少奇便要胡乔木在这里吃一点算了。胡乔木前几天经毛泽东指定负责带几个人起草庐山会议文件，已经写出初稿，文件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基本内容是纠“左”。现在情况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文件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呢？两人在饭桌上谈起了这个问题。刘少奇明确对胡乔木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毛泽东又接连在不同场合更加严厉地指责彭德怀等人。会议开始转向对彭德怀等几个人的批判斗争，由反“左”变成了反右。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等种种原因，会上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住处的楼上会议室连续两次开会，当面批评彭德怀。会上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话，其他人略有插言。刘少奇只插话问了长征中红三军团的一件具体事情。7月29日才上庐山的林彪，讲话虽不算多，却是声色俱厉，调子最高，一开腔就给彭德怀扣上了“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帽子。

根据毛泽东提议，8月2日至16日接着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会议进行中间，刘少奇对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然而当时“击退右倾机会主义进攻”的火药味已经极为浓烈，刘少奇的提议没起作用。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8月17日，又

接着开了一天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问题。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批判彭德怀的“错误”。他讲到：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过去几年的这些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有人说缺点错误很多，无非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同时刘少奇也没忘了作自我批评，说：“1956年那个反冒进，我是没有顶住的。”^{⑤0}

8月17日，庐山会议的议程全部结束。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干部陆续下山，返回工作岗位。

反右倾的决议在庐山会议后贯彻到全党，一场反右倾斗争随之开展起来。彭德怀的悲剧在许多地方重演。不少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斗争。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则依然故我，继续肆虐。

刘少奇8月21日由庐山飞返北京。当天，他就和周恩来一起，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政治局委员武元甲会谈两党关系。两位越南客人已经在北京等候好久了。

●刘少奇常常说：“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它的 10 周年大庆。首都北京早已是一派节日气氛。以人民大会堂为代表的北京十大建筑陆续竣工，逐一向人们露出亮丽的新姿。北京机场格外忙碌，外国专机降了一架又一架。一大批高规格的国际客人专程来参观中国的 10 周年庆典。他们当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

北京的市民们还不晓得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人们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出门游览披上节日盛装的市容，参观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站、民族文化宫、美术馆……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主持国庆 10 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

9 月 28 日、29 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祝大会。他在开幕词、闭幕词中，向远道前来参加国庆典礼的各国来宾表

示欢迎和感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在十个月时间内建成这座大会堂的一万四千多名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崭新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耸立两侧，使天安门广场比原来更加宽阔、雄伟，在金秋10月的蓝天白云下熠熠生辉。10月1日，首都几十万群众，欢聚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重要来宾，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一盛大庆典，检阅人民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队伍。

忙完国事回到家里，刘少奇还有一件家事要接着办。

他要亲自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参加人员是他的妻子儿女和几个亲戚、本家。事前他已经要秘书刘振德通知他们到小会议室集中。

全家这么多人正儿八经地坐在一起开会，还真是从没有过。孩子们感到新鲜有趣，在会议开始之前嬉笑打闹，乐成一片。

刘少奇进来了。连续的国务活动，使他不免感到疲乏劳累。他在孩子们中间坐下，点燃了一支香烟。

“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他边吸烟边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

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⑤1}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刘少奇的一些亲属以为他在北京当了大官，办事只要一句话，于是都来找他帮忙。有的想从农村进城当工人，有的要调工作，有的想用内部价买手表，等等。刘少奇当然不能帮这个忙，一些亲属为此很有怨气。

刘少奇的一席话，使到会的人深受教育。大家不禁想起他平时常说的一句话：“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纷纷发言拥护刘少奇的意见，有的表示马上返回原来的岗位。

国庆10周年的各项活动差不多持续到10月底。除了迎送国宾和进行一系列会谈外，国内方面还有不少事情。特赦战争罪犯，任免人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国庆10周年文艺会演，全国“群英会”……各方面的活动一个接一个。

10月26日，刘少奇去接见全国群英会即全国工

交财贸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

代表中有一位身穿粗布劳动服、剃着光头、一脸憨厚的工人，名叫时传祥，是北京市崇文区掏粪工人。刘少奇一眼就认出了时传祥，老朋友似地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图 17 刘少奇同清洁工人时传祥亲切握手。

连轴转的庆祝活动和日常工作，把刘少奇累得够呛，终于使他的肩周炎大发作，胳膊抬不起来，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有次王光美在春耦斋碰见毛泽东，

顺便把刘少奇得肩周炎的事告诉了他。毛泽东说：“肩周炎我知道，我在延安时得过，这是我们男子的更年期症。”很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安排刘少奇去海南岛休息治疗一段时间。

刘少奇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一点书。毛泽东曾于1958年11月9日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后来在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又一再号召读书，具体要求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刘少奇早就想对照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钻一钻这本书，可平时杂事不断，难得安安静静坐下来看点书。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了。

1959年11月1日，刘少奇带上一套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和一些资料，飞往海南岛。

到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鹿回头招待所安顿下来之后，刘少奇便开始安排读书。他几乎把这次读书当成了一次正规的学习班。他邀请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和海南地区党政军的部分负责人，同时把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还有王光美也都召集拢来，同他一起学习讨论。为了帮助辅导，他还特意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

京请来了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作老师。

这么多人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别致的学习班。一个国家元首，和秘书、警卫员、护士围坐一起学习讨论，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事。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又一次体会到了他说过的“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的含义。

11月10日，刘少奇主持第一次学习讨论会。他指了指手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大家说：“对这次学习，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我们的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谁有话就讲，会上可以展开辩论；第二，在我们的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有拘束；第三，这里学习所讲的话，不要到处去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自己的意见讲，错了自己负责；第四，第五分册内有些内容比较难懂，同志们有看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去请教老师。我们的会议大家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搞得很拘束。”^{⑤2}

一些身边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一开始有顾虑，担心讲错了闹笑话。现在听刘少奇这样一讲，顾虑消失了。头一次的讨论会就显得非常热闹。

刘少奇的发言深入浅出，观点新颖。他说：“不论做什么工作，总离不开吃饭穿衣。一个经济学，一个哲学，不论做什么，总离不开……我先提几个问题：一、国家的性质问题。教科书认为所有制是社会

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这和列宁的讲法不同。十月革命的第二天，所有制未变，苏俄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国家性质的主要标志，看国家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主要的标志还不是所有制……”^{⑤3}

打这以后，大家在刘少奇的带领下，上午读书，下午讨论，认认真真地钻研起政治经济学来。

海南岛的秋季，树木葱笼，气候温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阳光下翻滚着万顷碧波，景色十分美丽。但刘少奇除了接受治疗、洗洗海水浴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和讨论上。

上午，他坐在房间里读书本，查资料，想问题，一坐就是老半天。下午讨论，他总要带头发言，结合实际讲他的心得。

学习讨论会一共开了十几次。刘少奇在发言中把苏联经验和中国经验加以比较，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主张全民所有制需要不断调整，认为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由谁来体现，用什么方法去执行，结果大不相同，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他提出：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过渡阶段，要使它成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能性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社会主义也有剩余价值，只是属于社会占有或劳

动者集体占有；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劳动力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帐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帐那是错误的……^{⑤4}

不知不觉，20多天过去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学习讨论完了。

图 18 刘少奇在海南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发言。

11月下旬，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去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讨论国际形势和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于是，他结束休假，于11月

24 日离开崖县，经海口、广州赶赴杭州。

刘少奇组织读书讨论会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他一听马上觉得这个办法好。1959 年 12 月，他也带了一些同志到上海住下来，阅读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读了一遍。他们还把薛暮桥叫去，让他介绍刘少奇讨论发言的内容。

一时间，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都在研读政治经济学。大家都希望通过看书学习，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一条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道路。

第十章

领导国民经济调整

● 尽管庐山会议后不断反右倾、鼓干劲，“大跃进”还是难以为继

庐山会议上大反右倾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继续“大跃进”的劲头没有维持多久，令人担心的国民经济大滑波的局面终于发生了。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大破坏。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粮食实产 1958 年 2 亿吨，1959 年 1.7 亿吨，减了 15%，1960 年 1.435 亿吨，又减少 15.6%，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棉花 1958 年 196.9 万吨，1959 年 170.9 万吨，减了 13.2%，1960 年 106.3 万吨，又减少 37.8%，也跌到 1951 年的水平。油料 1958 年 477 万吨，1959 年 410.4 万吨，减了 14%，1960 年 194.1 万吨，又减少 52.7%，只相当于建国前的水平。

工业方面由于不顾一切“保钢”，使得各方面的

比例乱了套。1960 年钢指标又加码为 1840 万吨，把别的东西都挤掉了。轻工业更是大幅度下降。

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严重不足，猪肉消费减少了 70%。老百姓面带菜色，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随处可见，饿死人的现象也发生了。后来统计知道，1960 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九个县的死亡率超过 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尽管庐山会议后不断地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跃进高潮，可到 1960 年下半年，“大跃进”再也难以为继了。

不少人对经济现状忧心忡忡，但彭德怀的前车之鉴，使得保身远祸之风流行，人们不敢讲出真话。

1960 年上半年，刘少奇一直在全国各地视察调查。他发现经济形势很不妙，在轰轰烈烈的表象后面，问题相当严重。

6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这时中共中央刚刚在 5 月 30 日批准冶金部提出的 1960 年钢产量的三本帐：计划完成 1840 万吨，确保完成 2024 万吨、争取完成 2200 万吨，实际上是又一次提高钢产量指标，继续“大跃进”。

刘少奇在会议期间召集了一个有各大区和各省

市自治区、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向这些领导干部鲜明地点出了经济形势的严重性。6月10日他在座谈会开始时提出：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如不纠正，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①

6月18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又作了个正式发言。他说：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强农业问题上通了，但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不通，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所以我今天再提一下，要下决心，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②

紧接着，从7月上旬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会上终于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8月10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总结了与会同志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压缩基本建设，加强农业第一线。他在总结讲话中说：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除开尖端以外，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③

在这种氛围下，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建议对

1961 年的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后来周恩来把这个方针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其中提出：“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由此正式提出。

进入 60 年代，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在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中强加于人，要别人听它的。1960 年 7 月，正当中国经济困难之际，苏联落井下石，突然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废除所有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使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困难加剧。

1960 年 11 月 5 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赴莫斯科，主要是为出席 81 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顺便应邀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典礼。

刘少奇、邓小平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等进行了会谈，希望求同存异，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可在 81 党会议上，苏共又发难，粗暴攻击中共。刘少奇、邓小平当然毫不客气地回击。两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总算达成协议，使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2 月 1 日，刘少奇在 81 党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

发表讲话，就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等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

12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

●刘少奇到湖南省农村住下来，调查研究了44天

两辆草绿色的帆布篷吉普车在沙石公路上缓缓行驶。天下着小雨，路况不好，使得这老式吉普车开起来晃晃荡荡。

南方的4月，按说应该是绿水青山，春意盎然，可眼下沿途所见，却是荒山秃岭，庄稼稀疏。车里的人注视着这一切，不禁皱起了眉头。

吉普车颠簸西行。一块旧木牌映入眼帘：“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车子停了下来。

从前面那辆车上下来一位穿着蓝布衣、黑布鞋的60开外的老人。他便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他走进“万头猪场”。环顾一看，猪圈又脏又乱，臭气熏人，猪却见不到几头，而且瘦弱不堪。所谓

“万头猪场”，原来如此而已。

刘少奇吩咐随行人员，就在这个猪场住下来，调查研究就从这里开始！

刘少奇是从广州经长沙来到这里的。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调整农村政策。刘少奇在会上说：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他提出：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④

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讨论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刘少奇决定带头到农村的最下层去，扎扎实实地搞一次调查研究。为了便于摸到真实的第一手情况，他选择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长沙一带作为调查地点。

在下去之前，刘少奇特意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交待说：这次是来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个别找人谈

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他还一再叮嘱说：“这次去乡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⑤

就这样，刘少奇在广州会议结束后，4月1日从广州赴长沙，4月2日就冒着细雨到了乡下。同他一起来的，有王光美和秘书吴振英等几个工作人员。省里派了公安厅厅长李强随行。

“万头猪场”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刘少奇当即要随行人员把他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一起来的工作人员，就住到了旁边的一间空猪舍里。

秘书们找来门板，为刘少奇架床，但却找不到像样的铺床稻草，只好将就。

刘少奇信步走到屋后山坡上。放眼望去，只见田地荒芜，杂草丛生，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挖野菜。

路边有一堆已经风干的人粪。刘少奇走过去，用脚搓开，仔细瞅了瞅，不禁摇头叹息。他对秘书们说：“你们看，这里面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

这一带历来是鱼米之乡啊，现在竟连铺床稻草

都不好找！刘少奇感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

猪场饲料房成了刘少奇的临时办公室。他在这里逐一召见先期到达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组汇报情况，同时插空子找老百姓谈话。所见所闻使刘少奇得到的印象非常强烈。他对一起听汇报的张平化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

是不是湖南的农村都是这个样子？刘少奇决定多看几个地方再作判断。

在王家湾猪场住到第五天，刘少奇听说毛泽东要路过长沙，便赶去见面。两人就农村形势初步交换了意见。

经同中共湖南省委商量，刘少奇又选择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这是一个全省出名的先进单位。他要去看看这个“红旗大队”的情况究竟怎样？

从4月12日起，刘少奇在天华大队一间阴湿的土砖房里住了18天。他除了召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外，还走村串户，到田头地边、农民家中查看，找老人、妇女、青年个别交谈，实地体察民情。每到一处，他总是鼓励群众如实反映情况，讲真话。他一再对这里的干部、社员说：“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真实情况越来越清楚。原来这个“红旗大队”的情况也和王家湾差不多，虚报浮夸严重，群众生活困难。这里的干部还多了一个“先进”的包袱，不愿揭露问题。

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梅秀竟想方设法阻止群众向刘少奇和工作组反映真情，还发牢骚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的。”其实刘少奇不留胡子，彭梅秀之所以用这样的当地土话称呼他，只是表达她的一种不满。

刘少奇没有计较这位年轻干部的态度，而是几次找她谈话，帮助她提高认识。⁴另30日晚饭后，刘少奇要动身去长沙参加第二天的五一劳动节群众庆祝活动。汽车已经发动了，他想了想又要人把彭梅秀请来，同她作了最后一次谈话。

“彭梅秀同志，我作为国家主席，是你的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天华大队的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但问题也不少，要总结。你们要作真正的‘红旗’，向前发展。”刘少奇的话语重心长。

几天来彭梅秀也想通了。她含泪表示：“我们天华大队的问题很严重，如不是中央首长来，问题发展下去，后果将更加严重。是刘主席帮我们发现了问题。我诚恳接受刘主席对我的批评。”

“彭梅秀同志这个态度很好。”刘少奇高兴地说，“老百姓说我今年来没有吃上红薯、芋头和鸡蛋，明年我再来一定有红薯、芋头和鸡蛋吃，我明年争取再来。”

谈话完毕，已经9点多了。刘少奇一行结束了在天华大队的调查，准备转移到下一个地点。

5月2日上午，中共宁乡县委的大院里，开来了两辆吉普车。从车上下下来几个人，他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随着三三两两的人群向县委办公室走去。走在前面的一位，穿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蓝布帽子，脚上一双黑布鞋，毫不引人注目。

县委书记闻讯迎出来。他同这位穿蓝布衣的人照面而过，没有引起注意。忽然他认出了后面的一位女同志，立即惊讶地招呼：“这不是王光美同志吗？刘主席呢？”

王光美笑着指了指前面穿蓝布衣的人：“喏，这不是！”

“啊？”县委书记见自己同刘少奇打了个照面都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连忙转身把刘少奇等迎进县委办公室。

是啊，县委的人怎么能想到，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竟是这样朴素无华、普普通通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呢！何况，这是回到

他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啊！

刘少奇 1898 年出生于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早在 1920 年，22 岁的刘少奇只身离家，投身革命。打那以后，他除了在 1925 年五卅运动后因回湖南养病在长沙同母亲见了一面以外，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转战南北，国事倥偬，再也没有机会回过家乡，算来已 40 年了。

他在县里只停留了一天，还开了中共宁乡县委和县工业、政法、商业方面的座谈会，5 月 3 日就带人去了乡下。

中共宁乡县委本来在花明楼区政府所在地准备了 12 间房子，作为刘少奇和随行人员的居住、工作用房。可他连看也没去看，晚上不声不响地进了炭子冲他家的旧宅，还是住在他小时候住的那间屋子里。

旧居的堂屋权充接待室。刘少奇在这里连续召集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了解这几年农村的真实情况。这里毕竟是他的故乡，什么事情要瞒过他，就不那么容易了。

许多汇报材料说，湖南去年遭受大旱，农村经济困难是因为天灾。

刘少奇找来小时候一块放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同他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然后问他：“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李桂生直话直说，一语惊人。

李桂生说着带刘少奇去看附近的公共食堂，指着胡乱堆在地上灶上的炊具、脏碗筷和一小堆莴笋叶，说：“这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

刘少奇后来又到一些农民家里，揭开锅盖，打开碗柜，看到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锅里炒的是野菜。来见面的亲戚、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他步行到赵家冲看望亲姐姐刘绍德。他的外甥女鲁新秀告诉他，她家所在的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她的父亲“吃糠粑粑屙屎不出来闭死了”。70岁的老姐姐颤巍巍地对他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啰！”

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这样困难，刘少奇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一再向乡亲们道歉，表示他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大家。

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刘少奇就发现公共食堂是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指示当地停办。可宁乡县的公共食堂，这时仍普遍存在着。反右倾斗争把人们搞怕了，谁也不敢挑头解散食堂。

图 19 刘少奇看望姐姐刘绍德。

刘少奇找来担任过大队书记的农民朋友王升平，问他：“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王升平已经因为“右倾”被撤了职，心有余悸。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鼓励他，“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心里话。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图 20、21 刘少奇访问农民家庭。(1961 年 5 月)

“好，讲得我就讲。”王升平壮了壮胆说，“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里话，食堂还是早点散伙的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 120 人，眼下不到 80 人，死了十多个，跑了十多个，还有几个得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 20 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

听到的，看到的，问到的，都表明这里的食堂也不受群众欢迎。刘少奇当机立断，要王升平回去把他所在的柘木冲食堂停掉。

5 月 7 日，在炭子冲刘少奇旧居的堂屋里，坐满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还有几个基层干部。

刘少奇把乡亲们迎进屋，给他们让坐、递烟。王光美为大家沏上茶水。

“田里工夫忙不忙？”刘少奇操着乡音问。

“正在插秧。”几个农民回答。

“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同你们谈，今天谈谈。”他又一次当众向农民们道歉，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⑥

刘少奇的话又亲切又诚恳：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可以包产到户。”

“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⑥……

刘少奇专门谈了对公共食堂的意见。他知道，这是老百姓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他态度坚决地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⑥

刘少奇支持解散食堂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地区的群众奔走相告，纷纷要求把他们那里的食堂也

撤掉。不几天，中共宁乡县委根据群众要求和刘少奇指示，把全县的公共食堂都停办了。

刘少奇又把注意力转向食堂解散后的新问题。他走家串户，边看边问，注意到许多人家缺少炊具，老百姓厨房里的锅碗瓢勺、坛坛罐罐见不到几个。

他找来宁乡县的负责同志，说：“现在食堂一散，许多社员没有锅碗瓢盆，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想办法给大家搞齐这些东西。”

他为此专门召集县里的财贸工作干部开了个会，具体安排群众生活用具的生产和供应。他对大家说：“别看锅碗瓢盆这些是小东西，这是群众生活少不了的。财贸工作是为人民群众办事的，要时刻为群众着想。在人民困难的时候，更要服务好。”他还具体指示：“六角窑的陶器要立即开工生产，黄材锅厂要马上开炉。总之要千方百计地解决群众的当务之急！”

宁乡县政府立即行动起来，组织生产日常生活用品，满足群众需要。

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吃、用问题以后，刘少奇又关心起他们的住房来。这几天他已经了解到，不少民房被挪作公用，社员之间也互相交叉挤占，造成很大矛盾，群众居住极为不便。

一天，刘少奇路过双凫铺公社黑塘仑生产队，下

车进村察看。他听到路旁屋子里传出哭泣声，便快步进去，只见一位妇女正哭得伤心。原来，这位妇女叫颜桂英，丈夫病死了。由于刮“共产风”，两年前生产队把她家在土改中分得的住房拆除，盖了队里的养猪场。她失去了固定住处，先后搬了8次家，现在住的仍是别人的房子。这两天原房主急需用房，催她赶快搬走。颜桂英拖儿带女，既没有帮手，也不知往哪搬，急得哭了起来。

刘少奇十分同情她的困难，当即找来大队干部，请他们做工作暂时不要让这位妇女搬家，等上面下达文件后统一安排。

晚上，刘少奇来到中共宁乡县委，找来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何长友等干部，同他们一起研究群众住房问题。他了解到，宁乡全县原有农民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搞“茅屋洗澡”（即用茅屋的茅草泡在水里沤肥）拆了一批，大炼钢铁时因为需要木材拆了一批，办公共食堂、养猪场等又拆了一批，总共拆了15万多间，超过1/5。另外还有5—7%的民房被公家平调占用，社员之间互相挤占更是普遍。刘少奇恳切地对县委同志说：“鸟有窝，人有屋，一家人没有一个落脚点，怎么也不会安心。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怎么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我们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的吃穿

住问题，要为群众分忧解愁，不然老百姓要共产党干什么？”他要县委立即把研究的办法写成文件贯彻下去。

凌晨两点，中共宁乡县委的同志把文件稿送到刘少奇住处。正在工作的刘少奇连忙放下别的材料，接过文件稿审阅修改，一直到黎明才改完。然后他给何长友写了个便信：“何长友同志：此件我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此件是否印发或在电话会上通知各公社、各大队？也请你酌定。又，此件应立即报告省委。”⑦

第二天，这个文件就在全县传达贯彻了。接着，中共湖南省委也向全省转发了这个文件。文件执行后，一大批被公家平调的房屋退赔给了农民，对社员之间互相挤占也规定了调解办法，总算使当地群众基本上都有了安定的住处。

刘少奇还指示把他在炭子冲的旧居腾出来让给群众住。他不满意地说：“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随即他在炭子冲的社员会上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这个房子退出来，分几户社员进来住，这些门板，拿去替没有门的人家做门。⑧

他点了几个社员的名，嘱咐他们赶紧搬进来住，说：“社员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到

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愿意搬再搬。”⑧

刘少奇在宁乡县农村住了11天。5月1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报告他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并对解决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在部分乡村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等一些农村带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5月15日，刘少奇离开长沙回北京，结束了历时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

回到北京，刘少奇赶上出席5月21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会上反映的情况看，党内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坚持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还有的自批彭德怀后余悸尚存，不敢讲真话。

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这样苦，还有什么犹豫的呢？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大声疾呼道：“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⑨

他还果敢地推倒了“经济困难是因为自然灾害”、“成绩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的公式套话，在会上提出：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⑨

他反问道：“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⑨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终于在贯彻八字方针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刘少奇总结会议精神说：“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⑨会议最后决定，当年就要下放 1000 万城镇人口，钢产量也要进一步压缩。会上还决定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毛泽东在 6 月 12 日的大会讲话中，特意向大家

介绍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还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⑩毛泽东的又一次提倡，使全党的调查研究之风再度兴起，大批领导干部在会议结束后，打起背包、轻装简从下了基层。

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方针的指引下，196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钢、煤产量和基本建设都有较大压缩，关、停、并、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达2.5万个，回笼了几十亿元货币。由于下放了1000万城镇人口，使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得到初步调整。

● “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兴安岭森林，树木茂密，林深如海。

一支小小的考察队伍，正沿着丛林中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行进着。他们个个穿戴着硬梆梆的雨衣雨帽和笨重的高腰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观察边前进。

这是刘少奇为解决国家森林资源开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兴安岭林区实地考察。时间是1961年7月。

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覆盖着大片的原始森林，是国家主要林产区。但是，长期以来林业工作问题不少：采伐和培育比例失调，育林跟不上采伐，欠帐越来越多，森林资源浪费很大。刘少奇觉得这些问题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他说：林区工作很重要，但是历来很少有中央领导同志去那里深入了解情况；我国森林资源很少，“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⑪

本来刘少奇是准备 1961 年上半年去林区的，后来因为广州会议和湖南调查，拖了下来。正好 7 月份在哈尔滨要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也一再希望刘少奇去林区视察，所以他在 6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和处理完一些紧迫工作之后，就赶到了东北。

7 月 20 日，刘少奇带领林业部负责同志和林业专家周重光教授，离开哈尔滨，乘一列森林小火车进入了小兴安岭林区。

小火车钻进茫茫林海，开开停停。在小兴安岭林区的日子里，这列小火车既是刘少奇和随行人员办公、开座谈会的流动工作室，又是他们吃饭、住宿的临时宿舍。

进入林区以后，刘少奇白天深入林场，调查森林生长情况，观察林业工人的生产操作，同工人们交

谈，晚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或者是整理资料，研究问题，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兴安岭的7月，天气反复无常，经常有雷阵雨的突然袭击。在浓密的树林里，阴暗潮湿，山路泞滑。尤其是这里的蚊子，没日没夜地追逐咬人，涂驱蚊药水也不起作用。由于它们平时吸不到人血，只能叮入树皮吸吮树里的汁液，这种环境把它们的尖嘴磨练得特别厉害，可以穿透很厚的衣服吸吮人血。可63岁高龄的刘少奇全然不管这些。他每天和同来的小伙子们一样，穿上雨衣雨靴，手里拿着一小把树枝不停地轰赶蚊子，步行到丛林深处实地考察。山林里没有路，地上湿漉漉、滑溜溜的，他却精神抖擞地在树林里穿来穿去，走了一山又一山。

7月22日，刘少奇来到带岭林场。他仔细地数了数一棵刚刚伐倒的红松的年轮，发现这棵树活了200多年。在丰林林区，他让随行人员用生长锥在一棵红松树上取下样本，一看，这棵直径20多厘米的红松，竟整整生长了150年。刘少奇沉思良久，一会儿用手抚摸着幼小的松树，一会儿抬起头来望望那历尽沧桑的松林，感慨地对一起来的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把它们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啊！”他一边走一边嘱咐林业部负责人：“砍了多少树

应该很快地栽起来，而且栽起来的要比原有的多，砍了栽上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图 22 刘少奇在兴安岭林区视察。（1961 年 7 月）

看过小兴安岭，刘少奇一行在牡丹江市镜泊湖休息了两天，8 月 1 日经完达山去内蒙古境内的大兴安岭林区。

刘少奇在视察中发现，有的地方采伐不合理，留的茬太高，树放倒时压伤小树太多，有的采伐后的山林丢弃着许多木料，白白浪费掉了。他惋惜地说：“这些枝枝丫丫、棍棍棒棒，扔在山上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要让它们为人民造福啊！”他向

林业干部们指出：“过去日本占领时期，他们是掠夺性的采伐，只伐不造，给我们的林业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们国家的林业不发达，从现在起必须狠抓这个问题。否则，伐不了多少年，林源就要枯竭，是个危机啊！在采伐的同时造林、育林，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要处理好这个矛盾，我们的知识还不够。”^⑫

经过连日的调查，刘少奇对东北林区的情况有了切实了解。他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两个林业干部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又在哈尔滨同出席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的同志谈了两次，对林区开发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性的意见。他指出：林业工作方针应该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森林更新要实行人工和天然相结合，以人工更新为主；林区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调整工资制度和木材价格，改进管理体制。

从大兴安岭回来，8月7日刘少奇专程去了一趟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是1959年9月底国庆10周年之际发现的，所以命名为“大庆”。1960年5月国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大庆油田，可到了1961年，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需要压缩基本建设，国内各方面对大庆油田是下马还是继续上马议论纷纷，有关部门举棋不定。刘少奇到油田第一线，看到建设已初

具规模，石油工人干劲很大，决定不惜一切力量保大庆。工人们感谢他的支持，他说：“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干劲鼓舞了我。”^⑬

刘少奇8月11日赶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有巴西、加纳两国的领导人在等着要同他会见和会谈。几桩外事刚处理完，8月20日他又从北京启程再上庐山，去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

●蒙哥马利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

伴着强烈的轰鸣和气流，一架银灰色客机徐徐滑向武汉机场跑道，在停机坪稳稳停住。

舱门打开，从飞机上走下一位西服革履的外国老头儿。他的左侧，是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中国军官。

这是大名鼎鼎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统率英国军队远征北非，组织北非战役，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元帅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以后又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参加诺曼底登陆，因而名扬天下。大战结束后，他历任英国军队

总参谋长、西欧联盟统帅、北大西洋公约最高司令部副司令，1958 年退休。

1961 年 9 月，蒙哥马利第二次来中国访问。他提出希望会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蒙哥马利对中国友好，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功臣、国际著名元帅，所以中国方面接待很隆重，尽量满足他的访问要求，还派了李达上将全程陪同。

9 月 22 日，周恩来先安排蒙哥马利在北京会见了刘少奇，然后派出一架专机，送他到武汉去见毛泽东。

9 月 23 日下午，专机抵达武汉机场。高级轿车把蒙哥马利一行迎进汉口胜利饭店。

毛泽东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晚 6 点半，蒙哥马利驱车来到毛泽东住处。他们在 1960 年 5 月已经见过一次，所以并不陌生，一见面便像老朋友似地聊了起来。当晚谈到 9 点半，两人都感觉意犹未尽。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接着交谈。

这年毛泽东 68 岁，蒙哥马利 74 岁。两位老人谈兴甚浓，内容涉及天下大势，政治军事，人生哲理。

蒙哥马利忽然提出一个问题：“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

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慨然答道：“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蒙哥马利又问。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笑答。

毛泽东显然有意要向世人说明这一点。就在昨天，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先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接待蒙哥马利的有关情况。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对毛泽东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立即说：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

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⑭

但毛泽东不同意称“继承人”。他对浦寿昌、熊向晖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暂就用“继承人”吧！

蒙哥马利回国后很快写了本书，书名叫《三大洲》，里面介绍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这样，“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这层“薄薄的纸”，果真就让这位英国元帅捅破，捅到了世界上。

其实，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形成的。如 1963 年 9 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又一次说明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当然，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导人，在这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明朗态度，党内许多同志都是很清楚的。

图 23 毛泽东、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2 年 10 月)

就在去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他以前也曾几次提出过这件事,但刘少奇总是推辞。1960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研究同意这一提议,还专门作了决定,成立了编辑班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自告奋勇负责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组织决定,刘少奇也就不好再反对了。1961年5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编辑小组康生、邓力群、熊复、王宗一等专门到长沙向他汇报初编情况。他听了之后说: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不过既然书记处已经作了决定,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⑮

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这件事,很快在党内外干部中间传开了。大家马上感到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共产党员们更是盼望着能早一点读到这部书。

编辑《选集》是一件严肃细致的工作,很费时间。编辑小组整理好之后,要一篇一篇地报送刘少奇本人审定。每次送来文稿,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但他的注意力还是忙于当前工作,送审的文稿在他那里也就一再地拖延下来了。

这时很多同志建议，如果整个《选集》不能很快出版，可以先发表一些有关党的建设、党性修养的文章，这对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将大有裨益。谁都知道，“大跃进”以来发生的问题，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些干部脱离群众，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首先被选中的一篇。经过编辑小组整理和刘少奇最后审定，这部名著在1962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同时还出版发行了单行本。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新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把它当作必读的人生教科书。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欧阳海等等英雄模范人物，都认真地学习过这本著作。

●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 工作会议，调整国民经济大步推进

1962年1月27日，北京。

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礼堂里，回响着刘少奇那深沉清晰、带湖南口音的讲话声：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主席台上，是10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在第一排。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坐满了一层大厅。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今天刘少奇的讲话只准备了一个简要提纲，没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空的，只是带耳朵听。人们脸上的表情显示出，这个讲话的内容非常重要。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

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①⑥

这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规模空前，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2人，地委3人，省委4人，中央部委4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单位的负责人，加起来总共达7118人之多，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扩得最大、也就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八字方针提出已经一年多了，可围绕国民经济调整，党内的认识老是不能很好统一。国内形势究竟如何？大跃进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人民公社是不是

非办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怎样评价？调整工作怎样进行？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干部。大家议论纷纷，褒贬各异。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尽快克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能不能使 7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干部统一认识，关键就是这个主报告。刘少奇抱定一个宗旨：实事求是。他在主持起草报告过程中一再强调，无论是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指出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

报告的初稿已经印出来了，长达 4 万多字，是刘少奇主持一个班子在会前起草的。按以往惯例，报告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毛泽东这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直接把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高层次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

这样，七千人大会 1 月 11 日开幕后，首先就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修改后的报告稿准备在 1 月 27 日再次发给到会人员。毛泽东这时又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

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一页传阅。好在总共只有十来张纸，字又写得很大，不多会就传看完了。

7000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

图 2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1962年 1 月)

刘少奇在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的困难之后，又开始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

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①⑥

他果断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①⑥

这些论证充分的观点，鲜明、尖锐的语言，使干部们听得信服顺劲，感到报告人真正是敢于实事求是。大家痛感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弄得“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现在听到这样透彻入理的报告，感奋不已。然而也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有的人心里非常佩服，却担心一些提法过于大胆；也有的人认为刘少奇的讲话对缺点错误讲多讲重了，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却也难以辩驳。

当然，根据毛泽东意见和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程度，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肯定“三面红旗”。对庐山会议反右倾，虽然他说彭德怀写信不算犯错误，信中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但还是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1962年2月5日是春节。本来会议准备开到1月底结束，大家回去过新年。可到了29日，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肚子里还有气。安徽大组还有干部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省委主要负责人压制民主，捂盖子。

气没有出完，就是还没有统一认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延长会期，7000多人都在北京过春节，让大家把话讲完。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都代表中共中央对这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经常主持者，特别指出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后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代表国务院，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也都在大会讲话中主动承担责任。在中央的带头下，会议开得生动活跃，民主气氛浓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刘少奇到安徽大组解决“捂盖子”问题。一连几天，他插到安徽大组，参加讨论，听取汇报，找人谈话。

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撑腰，安徽的干部消除了顾虑，大胆地摆开了问题，出了气，也总结出了经验教训。2月9日，刘少奇再次到安徽大组讲话，勉励大家回去把工作做好，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调动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的工作，另派李葆华去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7日闭幕的。除安徽大组稍留几天外，其他各省的干部纷纷离京。经过20多天的会议，问题摆开了，经验总结了，气也出了，劲也顺了，大家轻松愉快地登程返回。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七千人大会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很多人在多少年以后仍对这次会议津津乐道，赞赏有加，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又感动又钦佩。

人们对刘少奇在会上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等等话语，一直记忆犹新，深感讲得中肯和精当。

然而，会上林彪那与众不同的发言，也在人们心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林彪说：经济困难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他的讲话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的讲话分明是两个路子，同大会的整个氛围很不协调。然而毛泽东对林彪讲话很欣赏，称赞它“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①7}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南下。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殚精竭虑落实大会精神。大会从宏观上出了题目，认识到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可具体怎么个调整法，却没有切实研究，那么多

人在一起，也没办法研究。这个任务便落到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们身上了。

刘少奇决定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件事。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两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连着开了3天。常委当中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出没有到会，其余都参加了。因为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会议地点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所以后来称它为西楼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这是原先没预料到的。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刘少奇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①7}

常委们纷纷发表意见。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详细分析了财政经济情况，提出克服困难的措施。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批评说：“中央工作

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①⑦

经过三天讨论，参加会议的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陈云提出的几项办法切实可行。刘少奇对他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①⑧

国务院立即落实刘少奇的提议，通知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到会的大多数是部长、副部长。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作关于工业、财政问题的报告，然后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重申和发挥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部长们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赞同的心情。

开完西楼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在考虑恢复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后来“大跃进”浪潮呼啦啦掀起，一切常规被打乱，这个小组也就无形之

中停止了工作。现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指挥部。刘少奇竭力主张把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并且希望陈云继续担任组长。

真是“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的经济主张曾一度受到批评和冷落，眼下经济困难的现实使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当初要是照陈云的意见去做就好了！

刘少奇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一直很赞赏，在当前经济调整时期尤其如此。他首先提出用中共中央名义把陈云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批转全国，还交待有关同志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对怎样写、写什么谈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批语的草稿拟出来之后，他又动手作了修改。这个中央批语向全党传达了2月西楼会议精神，提出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3月12日、13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转陈云等的讲话和另外几个文件。会上他又提出由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最后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近期研究的这几件事情。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文件，表示同意。

回到北京，刘少奇觉得陈云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起来，编辑印发。陈云对编印他的言论曾几次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劝说道：“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看看。”^⑮

邓力群抓紧时间把陈云的经济言论编印了出来，并写了个内容提要。刘少奇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推荐这些论述：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

求陈云同志意见。

刘少奇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以至舆论上，尽力支持陈云就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因为他深知，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工作相当艰巨，况且陈云的身体又一直不大好。刘少奇亲自登门看望，同陈云促膝长谈，交换意见。他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⑮

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有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一套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真正上路了。4月下旬，财经小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具体方案。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工作会议，讨论这个报告。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共105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不来虚的，而是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八字方针提出以来，由于中共党内对形势看法的不统一，已经迟误了不少时日，这种情况不能再让它继

续下去了。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刘少奇在会上痛切陈词，“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②①}

刘少奇强调：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困难，“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②}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1962年调整计划，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不惜“伤筋动骨”。会上确定了几项准备出台的重大举措：

（一）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

（二）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

（三）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全年减少企业1.8万个。

（四）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

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刘少奇说：“‘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他要求领导干部们：“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各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②①}

这回确实是动真格的了！会议之后，全国上下，各条战线，都迅速行动起来，调整工作大步推进。

经济调整，政治关系也在调整。1962年3月和4月，刘少奇两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报中共中央的诸多决策，听取意见。紧接着，延迟了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也相继举行。刘少奇还几次找政法部门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好好总结这几年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随意关人捕人的教训，把弄错了的改正过来。与此同时，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平反和为右派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也加快进行了。

上面政策一宽松，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又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到1962年年中已超过20%，安徽全省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些地、县超过70%。但这件事情很敏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认识不一致。1961年刘少

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对包产到户也没有明确表态，只讲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开了个口子。

1962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带了几个调查组下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恢复农村经济很有效，应当实行。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马上向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汇报。汇报刚进行一会儿，刘少奇就听明白了意思，要田家英不必再详细讲下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讲了他对当前困难形势的看法，表示同意田家英的意见，提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田家英在汇报结束时间。

刘少奇说：“可以。”^{②①}

邓小平、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同意包产到户，支持田家英起草有关文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则早就明确支持包产到户。

在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政策性文件，题目初拟为《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然而此时毛泽东尚在邯郸，这事还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几天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连忙跑去向

他汇报。事情到毛泽东那里却打住了。他在田家英汇报时反问了几个问题，虽没有当场批评，实际上已明白地显示出不同意。

毛泽东接着通知刘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来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还批评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

包产到户的文件就这样胎死腹中。但广大农民对这些情况毫无所知，只要没人来管就照干，所以包产到户在农村这时仍在蔓延。

在实际工作中，整个的国民经济调整在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已经全面铺开，并且很快见效。经济形势到1962年底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抹掉了连续4年的赤字。市场上的东西开始多起来，自由市场的价格下降了35%。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全国平均每人比上年多吃粮食11斤、猪肉1.6斤，多穿棉布2.5尺。国民经济开始走出锅底，逐渐好转。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 城乡四清运动曲曲折折，波澜迭起

从万里长城的东端山海关往南不远，便是著名

的游览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滩，峥嵘起伏的峰峦巉岩，茂盛葱郁的树木丛林，还有历朝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遗迹，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海岸。

这里离北京不远，又交通方便，空气清新凉爽，所以中央行政管理部門常常把要在夏季召开的会议安排在北戴河。

1962年7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来到北戴河。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也陆续抵达。中共中央将在这里召开一次工作会议。

会议从7月25日开始，议程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通过几个有关的文件。

先是围绕几个文件的初稿按部就班讨论。内容涉及形势、农村包产到户、甄别平反等等，虽小有争论，但总的说比较平静。

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8月5日他在小组会上还说：地主、富农、反

革命残余都还存在，既然阶级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想复辟的。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 1959 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②②}

以后，毛泽东又连续好多次在中心组讲话、插话，强调阶级斗争，严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第一阶段的平静状态一扫而光，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5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够。“单干风”，主要指包产到户，邓子恢、田家英等由于提倡包产到户受到批评。“翻案风”，则指对划为“右倾”的人甄别平反，向中共中央写了申诉信的彭德怀成了“翻案”的代表。很多领导同志在这三件事情上有帐，他们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进行解释，作自我批评。

8 月 11 日，刘少奇在中心小组发言，承认前一段对困难看重了。他说：5 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 1962 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 20%。^{②③}

田家英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就因为支持彭德怀，差一点被划到“军事俱乐部”里，这回又因主张包产到户再次挨批。在一次小范围会上，毛泽东又点名严厉批评田家英。刘少奇出来圆了几句场，意思说

田家英的意见是在党内说的，党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从而把一场尖锐批评调和了过去。上次庐山会议上也是，有人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揭发李锐和田家英背后议论毛泽东、把毛泽东比作斯大林晚年，当场要李锐交代。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马上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解决，于是使惊险场面得以化解。^{②4}

刘少奇很担心这次强调阶级斗争会打乱当前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重犯 1959 年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的毛病。8 月 20 日，他在中心组提议说：“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②5}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显然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会上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专门的讨论。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中共中央办公厅重新按照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范围调

整出席人员，把开会地点移往北京。

8月26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除讨论几个文件外，重点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先是批判邓子恢的“单干风”，后一阶段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会上康生突然发难，提出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这一意见偏又得到毛泽东同意。这样，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打成“反党集团”，在会上受到激烈批判。

预备会议开了29天，正式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只在9月24日至27日开了4天。毛泽东再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报告，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在这4天当中主要是大会发言。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

刘少奇是9月26日发言的。他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他又尽力维护西楼会议和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正确性，说：“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

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显然他是把西楼会议和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归入第一种态度，并说：“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②6}

刘少奇在发言中还不得不检讨自己前一时期对困难估计重了，并且说：“现在我们受到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我看，现在就是这样大”，“就是如此而已”。然而他又提出：在宣传上不要把形势说得太好了，还是有困难，还要继续克服。他再次重复他在北戴河的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他说：“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妨碍工作。”^{②6}

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同意“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最后确定阶级斗争问题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全党全国的工作在会后呈现一种复杂的“两张皮”的情形：政治上，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扩大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照常进行，生产逐渐恢复和上升。

重提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要

付诸实践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两个运动：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四清”就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这场运动，本意确实是为了打击犯罪，抵制腐败，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刘少奇是赞成毛泽东意见的。他在会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严重的铺张浪费、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②7}他还向会议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

为了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9月，中共中央又制订《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都有十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之为《前十条》、《后十条》。文件中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期间刘少奇忙于出访周边邻国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和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没顾得上参与两个《十条》的讨论。

在《前十条》、《后十条》的指引下，农村四清运动在1963年冬首先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

刘少奇用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倡导的这场旨在防止修正主义的运动。他把身边工作人员分批派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办公室的秘书，第一批下乡。1963年11月，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中共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刘少奇的其余几个秘书，还有他刚参加工作的二儿子刘允若，后来也陆续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

进入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由点到面铺开。刘少奇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这场运动。

1964年春节，四清工作队放假，王光美回家过年。刘少奇向她详尽询问了农村四清的进展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

吃竭，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②⑧

在这之前，王光美在中南海春耦斋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向她了解农村四清的各种情况，问得很仔细。王光美讲到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他还对王光美提议说：你下次到南方去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后来，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卫士小张果然随王光美一起参加了下一期的四清工作队，不过没有去南方，而去了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因为王光美担心南方农村口音太重，听不懂话，没法开展工作。这回她换了个新名字：鲁洁。

阶级斗争形势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了。在 1964 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刘少奇则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 95% 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②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运动中揭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干部贪污腐化，地富分子反攻倒算，基层组织变成两面政权，还有什么“牛鬼蛇神”、“变

天帐”、“美人计”等等，似乎比比皆是。

中共中央决心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负责修改《后十条》。

刘少奇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6月底，刘少奇离京南下巡视。7月份他到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8月又到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一路上，他一面了解运动情况，一面向当地干部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中间回到北京，他还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了一次。

刘少奇要求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蹲点。他强调说：“大家说，我们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比过去的土改、合作化还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的确是这样……我们各级负责干部、领导同志，自己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③⑩}

在广州，刘少奇住下来，准备修改《后十条》。先由田家英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起草初稿。初稿出来后，刘少奇又改了一遍，加写了一些话。

8月16日，他让田家英把《后十条》的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主席和中央审核”。

修改稿拿到北京，先印发正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其他与会人员讨论提意见，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来习惯称这个文件叫《后十条修正草案》。

这个《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农村形势估计更加严重。里面提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强调要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一来，基层组织和干部被撇在一边，打击面扩大，四清运动在原来已经“左”了的路子上又向“左”跨了一大步。

刘少奇在广州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批转河北省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了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当时许多四清工作队员毫无经验，下去之后不知道怎么个搞法，因此王光美的经验介绍大受欢迎，不少地方请她去作报告。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特意找刘少奇，积极提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

党委和四清工作队。

桃园大队的四清是刘少奇过问过的，比较符合他的意图，所以他同意把“桃园经验”转发各地参考。为了慎重，他亲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报告这件事：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③①}

毛泽东 8 月 27 日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③②}

这样，“桃园经验”又拿到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大家当然同意。9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尽管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拟的批语中指

出：“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但它毕竟是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发下去的，“桃园经验”也就实际上成了农村四清运动的一个样板。

“桃园经验”对纠正干部特殊化、打击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起了有效作用。然而，它同样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大队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工作方法上则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

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其他一些典型经验和指导性文件。后来运动的发展证明，这些文件导致“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打击。

转眼到了1964年的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举行换届的三届一次会议，各地的领导同志都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等负责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工作会议是12月15日开始的。本以为开个十来天就可以结束，谁知中途发生意外情况，会越开越长，到1965年1月14日才正式结束。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仍按原定日程从12月21日开始，1965年1月4日结束。

刘少奇在两个会上都是主角。在党内，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日常工作由他分管；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是国家主席的候选人。两个会议交叉开，他只好两边跑。

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开头一段比较顺利，讨论起草了一个政策性文件。可到后来，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的看法大不相同，以至产生严重分歧，而且在会上表面化了。

12月20日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刘少奇讲了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看法。他认为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当场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③③}他还针对刘少奇主张的四清工作队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连等做法，提出批评意见。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和少数部长、劳动模范、科学家同他一起过生日。毛泽东同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加耕等一些劳动模范、科学家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安排在别的桌子

上。

在喝酒前，毛泽东作了即席讲话。

“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听得出来，毛泽东似乎话中有话。接下来，他讲到了这样一些内容：你们都是有功之臣，我要感谢你们；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等等。^{③③}

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今天却是一脸严肃。他的话闪烁其词，使人听不大懂，那些基层来的劳动模范更是莫名其妙，只是隐隐感到毛泽东今天情绪不好。这顿生日寿筵，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隔了一天，12月28日，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继续开会。毛泽东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两本小书进了会场。他又一次强调了他对四清运动性质的看法，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一九六二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

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③③}他指指带来的两本小书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③④}

会场上不少人注意到，毛泽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但又猜不出是冲谁而来？了解一点内情的人作了这样的猜测：这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的。因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是总书记邓小平负责的，他鉴于平时一般性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这次会议也是讨论具体工作，大部分都是各地汇报，所以他提出，如果毛泽东有事可以不参加会议。而刘少奇，在一次毛泽东插话发言讲四清运动性质时，因为没有注意到，没等毛泽东讲完就自己讲了起来。联系到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这两件偶然小事使毛泽东产生了“一个不让参加会议，一个不让讲话”的误解。

这以后，毛泽东又几次不点名批评刘少奇。1965年1月3日，他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使运动冷冷清清。1月5日他又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

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
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
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③③}

本来在会议开始阶段，已经由工作班子起草了
《十七条》的政策性文件，现在当然是不能用了。大
笔杆子陈伯达于是将原已定稿的《十七条》推倒重
来，另行起草。毛泽东在陈伯达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了一
些严厉的话，如：“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
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
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
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
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新起草的文件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有 23 个条文，通常称它为
《二十三条》。文件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
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明确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
件突出了整“走资派”的内容：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
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刘少奇是不同意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他认为这个提法在马列著作里从未见过，运动中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最好不要说成“派”，一说“派”，涉及的人就多了，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这个《二十三条》文件，竟使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深深的思想分歧。参加会议的不少干部看出了这一点，很为这种状况担心。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领袖的威信，周恩来、贺龙去找刘少奇谈心，希望他主动找毛泽东致歉，消除一些不应有的误解。

刘少奇照办了，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似乎原谅了他，在过后不久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领导同志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在场的同志听了心里暖洋洋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二十三条》下发之后，四清运动按新的方针重

作部署，继续进行下去，虽然人们对文件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新概念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有694个县、市重点清了一遍，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其余的城乡也都开展了学习教育。四清运动自1963年冬开展以来，历经数载，其间曲曲折折，波澜迭起，最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不了了之。这场运动对解决干部蜕化腐败、改进经济管理起了一定作用，但运动中打击面过宽，阶级斗争扩大化，还把包产到户等一些受农民欢迎的好措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在四清运动一波三折进行的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指示，中共党内还错误地批判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所谓“三自一包”、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所谓“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所谓“向资产阶级投降”。一批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也受到猛烈批判。思想政治文化领域的这种过火批判，显示出“左”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大为抬头的。

●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

子夜过后，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响起。先是稀稀落落，继而此起彼伏，渐渐地阵阵发紧。到清晨时，已汇成哗啦啦一片。

这是 1963 年的春节。

有几年的春节没有这么热闹了！大街小巷，人们穿红着绿，来来往往。和平门外琉璃厂的厂甸集市，更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午后，一辆黑色轿车从中南海西门开出，往左一拐，经六部口、绒线胡同到和平门，静静地在路边上停了下来。

一对夫妇带着 3 个十来岁的孩子，轻快地走下汽车，直奔琉璃厂，很快消失在厂甸市场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这是刘少奇、王光美和他们的儿女。

孩子们上午已经来过一趟厂甸了。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饭桌上又说又笑，兴奋地向爸爸妈妈讲厂甸市场的盛况：大糖葫芦啦，风车、面人啦，数不清的小吃、土特产啦，总之是特棒！

孩子们眉飞色舞的描述感染了刘少奇。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我们也去看看！”他当然比谁都明白：厂甸贸易集市的再度活跃，是经济回升、市场复苏的表现，说明去年以来的经济调整举措已经奏效，最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

刘少奇牵着孩子们的手，在乌压压的人群中挤过来拥过去。他一会儿停下脚步看大师傅加工小吃，一会儿蹲下来摸摸那些农副产品，一会儿又伸过头去瞧艺人们当场制作小手工艺品，偶而同他们笑谈几句。看到初步繁荣的市场，老百姓脸上的笑容，他比小孩子过年还高兴。他戴了个口罩，所以厂甸市场的人谁也没有发现国家主席刘少奇今天也来逛了一趟。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但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仍照常进行。这样，到了1963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北京的老百姓，已经从厂甸集市的重现辉煌感受到了这一点。

刘少奇十分欣慰。他要再接再厉，不动摇地继续贯彻八字方针。1963年7月，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确定了这样一个总思路：国民经济全面

好转，但在农村等方面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要花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认了这一方针，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应推迟3年开始。

于是，3年继续调整的大机器开始启动，沿着既定的轨道向纵深目标推进。

刘少奇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试验在调整中同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继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刘少奇认为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由行政部门调拨生产资料的做法，是落后的管理办法。他提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管理生产资料的物资部应该像商业部那样，把生产资料当成商品来经营。1962年，刘少奇专门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到石家庄、无锡作调查，进行物流合理化试点，他每个月听一次汇报。从1962年到1965年，刘少奇先后8次作了关于改革物资管理的讲话。根据他的指示，1964年组建了国家物资管理部，全国性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逐渐形成。

为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刘少奇倡导试办托拉斯。1960年他就提出：“组织托拉斯，实行多种经营，也

是生产关系的改革。”^{③④}1963年3月，在刘少奇的提议下，试办了第一个托拉斯：中国烟草公司。10月24日他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生产时说：“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和减少官僚主义。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

这样，试办托拉斯这件事在1964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牵头真的干起来了。当年一下子就办起了12个全国性托拉斯：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刘少奇高兴地说：“托拉斯办起来了，上面部的工作就少了。企业让托拉斯去管，部只管做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③⑤}

刘少奇对这件事一直抓得很紧，经常过问指导。他特别强调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办得活泼多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方便人民。

^{③⑥}

刘少奇还早就有心对传统的“铁饭碗”式的劳动用工制度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1957 年他就提出要少用固定工，多招亦工亦农的临时工。1958 年他进一步提出要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和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1964 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此事，得到会议肯定。会后，他先后南巡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一路上大讲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从此，这种新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开来。许多工矿企业打破了单一的“铁饭碗”模式，实行既用固定工，也用临时工、合同工。半工半读的学校和工厂更是遍地开花，着实红火了一阵。

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越来越见效。到 1964 年，工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财政收支平衡，市场也开始繁荣。1964 年底 1965 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1964 年 12 月 21 日，3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听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宣告中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了 15 天，中间大部分是代表们分组讨论和各专门委员会活动，全体大会只开了四五次。这是因为，与此同时还在开着另一个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制订《二十三条》，许多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把精力放到那个会上去。刘少奇也是如此。

换届选举是这次人代会的一个主要议程。1965 年 1 月 3 日，3000 多名代表又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坐定，投下神圣的一票。

在一整套选举程序完成之后，计票结果出来了。大会选举刘少奇连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任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提名，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在第二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决定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等政府组成人员。刘少奇依据宪法继续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会议又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提名，决定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 刘少奇主持常委会议讨论通过 《二月提纲》，随后出访亚洲3国

蜚声中外的北京中南海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它是始建于辽、金并历经元、明、清各朝长期修缮而成的古典园林，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在地。所谓中南海，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两个占地 700 亩的城市湖泊，一曰中海，一曰南海。刘少奇居住的福祿居，就坐落在南海西侧，怀仁堂的后面。

在这以前，刘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的甲楼。那是一幢灰色小楼，没有围墙，结构类似公寓，办公室、卧室在楼上，会客室在楼下。这种布局无论对已经 60 开外的刘少奇本人，还是对来办公室谈工作的干部，都很不方便。加上这期间西楼一带几次发生小孩子在各楼乱窜，警卫部门感到不利于安全和保密，

坚持要刘少奇搬出西楼。正好原来林伯渠副委员长居住的福禄居，自他1960年逝世后长期空着，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便安排刘少奇一家在1963年夏天搬了进去。

福禄居是一所有着两进小院的老式庭院，全部平房。从大门进去，一转弯就进了前院。南房一排平房，做了刘少奇的办公室和卧室。西厢一间较大的房子，改成会议室兼会客室。平时由刘少奇召集的小型会议，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东西厢还有一些零星用房，是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沿东侧走廊可以通往后院，那就是孩子们住的地方了。

1966年2月5日下午3点来钟，几辆红旗、吉姆轿车先后开到福禄居大门外，轻轻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陆续进了福禄居前院会议室。他们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姚溱。不一会儿，周恩来、邓小平也一前一后进了会议室。邓家和福禄居是同一个巷子，只相隔几十米，所以邓小平是走着来的。

这个会议室不大，但光线很好。这是因为它的整个东壁是一排玻璃窗。室内陈设简单：西壁一排放满了书的书柜，南面靠墙半圈沙发，北面一张会议桌，桌边摆了几十把椅子。

来开会的人在会议桌边坐定之后，刘少奇宣布开会。

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议程是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当前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

学术讨论问题为何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来汇报讨论？此事说来话长——

自从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难批判之后，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便不得安宁起来。

先是昆剧《李慧娘》被拉出来开刀。这个剧本的作者孟超和为它写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赞扬文章的廖沫沙受到公开批判。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人写的，登在了1963年5月的《文汇报》上。文艺界的阶级斗争空气于是越发紧张。

康生、江青并未就此罢手。众多的文艺作品在他们的策动下一部接一部地遭到公开批判，光电影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等十几部。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了1964年，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遭殃。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翦伯赞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文艺界代表人物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

等等，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批特批。

这场批判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批示，尖锐批评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对一些作品和观点进行公开批判，也经过他的首肯。

江青这期间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她到处搜罗材料，寻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档地批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密谋，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文章由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写成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突然发表。

这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点名批判吴晗，说《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词严厉，语气刻薄。人们对此极为震惊。

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却一无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蒙在鼓里。

在上海市的报纸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却不给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开发表这样一篇批判著名学者的“高档次”文章，却不给中共中央

宣传部说一声；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泽东继续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①这个谈话预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要升级。

本来，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彭真感到，事情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组有责任出来加强领导。于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五人小组开了一天会，研究指导方针。除周扬因病住院开刀外，其余成员都到了会，另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关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讨论。会后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执笔写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提纲形成于1966年2月，所以后来通

常称它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显然是想对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加以约束，不让它发展为政治斗争。它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这些都针对着江青、张春桥在批《海瑞罢官》一事上乱打棍子的蛮横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五人小组汇报。汇报提纲已经在开会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会上用不着照稿子念，只由彭真和许立群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时询问一些情况。

彭真在口头汇报中特意说明，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

常委们经过讨论，对提纲中的意见表示同意。刘少奇最后说，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与会者纷纷起身离去，福祿居又静了下来，

刘少奇已经顾不上仔细琢磨这件事，因为他要准备出访亚洲³国，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还有好几件国内国际的公务要处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所以，有关五人

小组汇报提纲的后期工作，刘少奇委托总书记邓小平接着办。这样，《二月提纲》在彭真、陆定一等 2 月 8 日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邓小平在 2 月 12 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刘少奇抓意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刮起一股妄图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歪风。为了坚决抵制和冲破这股势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由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 3 国进行友好访问，是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项。

在出访准备过程中，刘少奇提出这次不带夫人。因为他觉得女同志出国比较麻烦，在服饰、礼仪、活动安排等等方面更多了一层讲究，再加上王光美这时正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中途离开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门坚持要求主席夫人随行，以便增加友好气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后来过中国，她已经表示一定要亲自出面接待中国客人，这样中国方面主席夫人不出场就不大好。这事拖到 3 月中旬，刘少奇才同意王光美从农村赶回家作出国准备。随同出访的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也差不多这时候才脱离工作。

时间紧迫，王光美和张茜抓紧时间阅读材料，熟悉礼仪，准备服装。这中间，她们还要穿插着安排家

务，叮嘱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偏巧这时毛泽东又要刘少奇去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从3月18日开到20日。刘少奇开完会回到北京，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启程了。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前往巴基斯坦访问。

中国方面对这次刘少奇出访的安排极为隆重。随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外，还包括4位副部长级官员，阵容可观，新闻记者队伍也很庞大。到机场送行的仪式是按国家最高规格安排的。参加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7位副委员长、3位副总理、4位全国政协副主席、2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次访问的高度重视。

3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一时间，这里刮起了空前规模的中国旋风。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洋溢着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每当中国客人的车队在街道上经过，总是受到市民群众的夹道欢迎。

3月28日，刘少奇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伊斯兰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陪同去拉合尔访问。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国客人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欢迎简直难以形容。

当刘少奇等乘车从拉合尔机场去省督府时，受到了近100万人的极其热烈的欢迎。一路上，欢迎的人群密密层层，汇成一片海洋。道路两旁的树上、房屋上、电杆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满了人。人们挥舞着旗帜、彩带，作出种种欢迎表示。

车队开出不久，两旁的欢迎队伍突然失去控制。拥挤的人群冲破警察的警戒线，兴奋地站在马路中央高呼欢迎口号，争睹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无数工人、学生、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都争着把手伸进汽车窗口，同中国客人握手。整条马路水泄不通，刘少奇一行的车队一再被热情的群众阻住。通过这条5英里长的道路，车队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为刘少奇主席的来访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开始前，宾主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双方不约而同地谈论着白天拉合尔人民自发欢迎的情景，都对这种令人难忘的盛情赞叹不已。

宴会上，刘少奇举杯为英雄的拉合尔人民、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祝酒。他再次热情地说：“今天拉合尔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其热烈的欢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的景象。这生动地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②

刘少奇一行 3 月 30 日离开拉合尔到卡拉奇访问。以后又接连访问了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缅甸，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情谊。

整个访问十分成功。4 月 10 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回答巴基斯坦记者提问时说：“刘主席的访问，无疑将对今后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和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和感谢。”③

4 月 19 日，刘少奇、陈毅一行结束了对亚洲 3 国的访问，回到昆明。

●历时 20 多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开完了，可与会者仍充满困惑

1966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

许多。

上午将近 10 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 70 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 4 月 19 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

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

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

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④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

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句话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人们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就更加震惊了。

林彪从5月18日上午10点讲到午后1点。他大谈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制造恐怖气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 70 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 100 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 岁，100 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天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天天大会发言。会场后来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些人的发言越来越不可思议：批彭真，批陆定一，批罗瑞卿，后来竟批起了朱德。内容却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纠缠细微末节。在这些批判发言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可谓出足了风头。

5 月 23 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

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

5 月 8 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

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声称：“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权威性文章”一出，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如排炮一般，充斥各报。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下，邓拓、田家英分别于5月18日、23日含冤自尽，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从5月17日起，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人到北京大学秘密串连，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写大字报。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突然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社会上的这一幕幕，显然是有人有意要将《五一六通知》内容透露出去，有些则明显是康生、江青等直接组织的。

在会场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逐渐进入尾声。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发了言。他们都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他们的讲话同林彪趾高气扬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5月26日上午10点多钟，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天是由刘少奇讲话，周恩来主持会议。

刘少奇的讲话谦逊而平和。他首先对会议专门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警句。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⑤

刘少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缺点错误。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

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订《二十三条》时不主张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把参加革命几十年间的缺点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

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其中的大多数现在看来不但不错，而且是极为可贵的真知灼见。其所以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把党内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当作正确，有的则是因为同毛泽东的意见相悖。

中午1点30分，刘少奇讲话结束。周恩来随即宣布散会。

历时20多天的会议终于开完了，可人们的脑子里仍充满困惑。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离开会场。一辆辆轿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口开出，代车喷出的缕缕尾气，好像是留下了一串串问号。

● “文化大革命” 哄然而起，工作组开进学校

5月过去，6月来临。北京已是骄阳红火，燥热

阵阵，显示出夏天匆匆降临的逼人气息。

1966年6月1日上午，人们打开新到的《人民日报》，忽见一篇标题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还没等人们琢磨过味儿来，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的全国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又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份大字报更是其势汹汹：“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两篇东西在一天之内突然冒出来，不但令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惊愕不已，也使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感到意外。

《人民日报》社论是陈伯达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连夜搞出来的，并且不经中共中央审查直接见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则是康生私自把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的，事先也没有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

事情还刚刚开了个头。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的通栏大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人们起来同“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下午4时，人们在广播中又听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6月4日，《人民日报》在发表改组中共北京市

委、北大党委消息的同时，连发两篇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点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修正主义者，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日、6日、7日、8日……鼓动“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开动了起来。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

人们的兴奋点被迅速催生出来。特别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更是被这一连串的激进事件弄得心急火燎，再也坐不住，纷纷在本单位寻找黑帮，揪斗当权派。

在街头巷尾，在各公共场所，成堆成群的人们热烈地议论着几天来的新鲜事，常常滞留到深夜还久久不散。北京大学等校园更是热闹非凡。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开始乱套。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哄然而起。狂热的气氛从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向全国城乡辐射。

这样的局面，实在是连久经群众运动风浪的刘少奇也始料不及。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問題。

会议在福禄居会议室举行。参加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就是各方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交口薄一波，财贸口李先念，农林口陶鲁笏，军队方面叶剑英，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办公厅汪东兴，北京市李雪峰、郭影秋，还有新近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岗位上调来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陶铸，以及一些有关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他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他最后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向各学校传达贯彻所拟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

学生很快的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会议精神迅速布置下去。中共北京市委开始向一些大学、中学派工作组。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然后由北京市委统一介绍到各学校。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工作组，是由陈伯达率领的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5月31日进驻。第二个工作组是以张承先为组长的驻北京大学工作组，6月1日晚进驻。张承先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已准备调任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还没有到职，正好就先去了北京大学。这两个最早派出的工作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负责同志商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

自从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以后，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师生成群结队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大多数学校的党政领导被青年学生冲击得够呛，确实也无法行使领导职能。为使局面不致失控，中共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新调任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还主持向国务院

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了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林彪亲自批准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 300 名干部参加这些工作组。

工作组开进学校，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被《人民日报》那一篇篇激动人心的社论文意撩拨起来的学生们，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学校秩序还在滑坡，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开一个会，研究一下运动的指导方针。

6 月 9 日，三位常委和从北京去开会的人乘一架专机飞抵杭州。

小会在毛泽东住的刘庄宾馆开了两次。出席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参加。会议完全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工作组，农村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组问题倒是涉及到了，但没有形成明确意

见。毛泽东只顺便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如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

可是，事实上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常委们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6月15日要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现在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身上了。

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是大学、高中停课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是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组织都关心的问题。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个报告，讲对运动的部署意见，在杭州会议上也谈过。这两件事都急，所以刘少奇、邓小平在6月13日回北京的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把停课半年的决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发了下去。

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这以后，他们又多次在福祿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听取文化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精神把群众发动起来，又不使社会陷于混乱。

为了增加感性知识，刘少奇利用夜深人静，到北京大学校园看了看张贴的大字报。隔了一天，又到清

华大学看了一次。

两个学校的大字报真可称得上是铺天盖地。不但专门搭起来的一排排芦席棚上贴得满满的，就连那些位置稍为适宜的楼墙外面，也横七竖八地刷上了大标语。在苍白的灯光下，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文字的、漫画的大字报连成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

然而，乱批乱斗的势头有增无已。几乎所有大中学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冲击。许多教授、专家被当作坏人揪出示众。出身不好的人被称作“狗崽子”，横遭歧视、污辱。抄家、打人、批斗会成为家常便饭。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少数学生同工作组发生对立，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

6月18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利用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斩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谓的“黑帮”、“反动学生”揪来批斗。学生们给这些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对他们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肆意污辱。现场极为混乱。工作组长张承先闻讯急急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行为，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北大工作组将这件事编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张承先亲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汇报。李雪峰立即将《简报》转呈给了刘

少奇。

6月19日，清华大学也出事了。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这事也报到了刘少奇那里。

这天，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回家，告诉父亲说，她上学的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有人反工作组，正在写大字报。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这些学生又在四处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许多学校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局面似有进一步失控之势。

刘少奇感到事态严重。他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⑥

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刘少奇决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运动情况，及时反映动态。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⑦

这天，刘少奇还把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约来谈话，要他们发动群众回击学校出现的反工作组大字报。他说：“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⑧

第二天，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布置对运动的领导。在汇报讨论之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6月3日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听蒋南翔话的，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一些基本的教学、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行为得到遏制。清华大学等一些学校的工作组还开展了反干扰斗争，把反工作组势力的猖狂气焰打了下去。

1966年的夏季，炎热异常。老百姓被前一段不分昼夜吵吵闹闹的“革命行动”弄得头昏脑胀，身心疲

惫。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制度，社会治安渐趋好转，许多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当然，要使运动真正走上正常轨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刘少奇指示为学校文化革命制订规划，大学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有了规划，就可以使学校开展运动有章可循，结束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令人忧虑的还有生产问题。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工业、交通生产情况越来越糟。钢、钢材、煤的产量节节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设任务上半年只能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于原定计划。很清楚，如果让乱揪乱斗的浪潮涌进这些部门，生产将更大幅度下降。

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笳等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商量这件事。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 and 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且由上级派工作队领导进行。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正式请示这一重要提议，并且附上了准备下发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毛泽

东理解了这一建议，同意将这个通知迅速发下去。

几天后，刘少奇得到报告，《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已经起草好，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

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希望走上正轨了。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

毛泽东 1965 年 11 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 8 个月，差不多是建国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 年 7 月 16 日，他以 73 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7 月 18 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

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

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

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三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日、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

作出反应。

7月25日、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7月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

形势急转直下。

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

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

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三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

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

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我同意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

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

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⑨

会场内鸦雀无声。师生们安静地听着这位老革命的肺腑之言。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因此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中央首长的讲话。

刘少奇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

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⑨

师生们听得很认真，许多人在作记录。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讲了他的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

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⑨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

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工作组撤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41 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

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⑩

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

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⑪

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2日，全会鉴于有些负责同志还有话说，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他们都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讨。周恩来6月中旬至7月初出访欧洲不在国内，对工作组一事参与较少，但他也主动承担了责任，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

个人都要对决定派遣工作组负责任。”^⑫

这天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毛泽东在前几天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北京开会的负责同志，都应该亲自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这样，刘少奇经同李雪峰商量，选择北京建工学院做试点，直接参加学校的运动。这个学校在北京地区高校中最早形成两派组织，而且对立比较严重。刘少奇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使分成两派的学生团结起来。

北京建工学院归口属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建委主任谷牧决定随刘少奇一起到学校参加运动。刘少奇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外地来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同志听说后，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跟来了。

刘少奇等出席了这天晚上北京建工学院两派学生的辩论会，耐心地听取了几种不同意见，最后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⑬

同一天，邓小平、陶铸去人民大学做学生工作，

希望保学校党委书记郭影秋过关。邓小平对康生等人有意讹传“二月兵变”一事十分生气。他在会上以总书记身份公开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

8月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北京建工学院。他把“八一团”和“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谈了话。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⑭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⑮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⑯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

异乎寻常的文字：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⑭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打破，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

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一天，刘少奇来到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这个小组里有一位老大姐叫陈少敏，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39年刘少奇任中共中原局书记时，陈少敏曾任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对自己尊重和了解的老领导忽然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非常难过。等到讨论主持人宣布休息，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旁，亲切地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问题。”

刘少奇马上明白了这位老大姐的好意。他缓缓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周围那些正默默注视着同志们，淡淡一笑，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陈少敏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一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划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⁴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

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检讨后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

中南海福祿居比原来安静多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由过去的紧张忙碌一下子变为清闲无事，开会、外出等活动急剧减少。现在，他可以整天整天地呆在家里，有充分的时间看书看报，阅读材料。

刘少奇的办公室、卧室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正门开在当中一间的正中。进得门去，迎面靠近北窗是一张办公桌，靠西壁放着两把简易沙发。这一间是作为刘少奇秘书的王光美的办公室。

从中间屋东壁的侧门进去，是刘少奇、王光美的卧室。卧室的陈设十分简单，主要就是2张床，2把椅子，1个挂衣架。2张床没有床架，是2个放在地上的床垫。因为王光美1963年冬天以后长期在农村参加四清，很少回家，刘少奇为防止夜里从床上滚下来，就索性摆成了地铺。这个习惯也就一直沿用了下来。卧室西北角立放着一架国产熊猫牌收音机、唱

机，这算是房间里最贵重的东西了。

从中间屋西壁的侧门进去，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办公桌也是面朝东放在靠近北窗的地方。靠北壁立着 1 个书架，陈列着一些日常用的经典著作、工具书。靠南壁是 1 张放报纸的小桌，1 把藤躺椅。每天早饭后，刘少奇总是先靠在这把躺椅上，把当天的报纸浏览一遍。西边靠墙处，是圈成半圆形的 4 把单人沙发，中间 1 张圆茶几，这是为一些领导同志来谈工作和会见少量客人而设的。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这时常委已由原来的 7 个增加到 11 个，好几个常委只是挂名。刘少奇、邓小平因为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只能闭门思过，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

就在刘少奇、邓小平变得清闲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突然忙乎起来。

8 月 13 日，是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发号施令的第一天。当天他作了著名的“罢官”讲话，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罢官”，提出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这天，林彪还把有人在叶群指使下写的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送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又

一次勾结，是他们合谋直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康生在这一天也行动起来。他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

江青、陈伯达等文革小组要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频繁地组织大会，发表演讲，鼓动青年学生起来批判前一阶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声鼎沸，配上五色杂陈的彩旗、标语牌，确实盛况空前。

大会上午7点半开始。林彪、陈伯达讲话。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检阅了游行队伍。

这是刘少奇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的时候，他在靠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看。

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攀谈了几句。刘少奇指了指报纸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复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①6}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

爆炸般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奔腾。青年学生已是一片狂热，成千上万的群众也莫名其妙地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身不由己地跟着疯转。林彪有一句话：“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话确实不过分。

红卫兵浪潮也波及到刘少奇家里。正上中学的平平、源源、亭亭3个孩子也成了红卫兵，有的跟着抄了一回家。孩子们以为这是参加了“革命行动”，十分兴奋，回到家里还在兴致勃勃地议论。

别人的事管不了了，但对自己的儿女不能不管，要对他们负责。刘少奇听孩子们说到红卫兵组织通知晚上还要去抄家时，当即阻止道：“不要去！”

吃过晚饭，刘少奇把儿女们叫到办公室。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给他们看宪法的有关条文，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①7}

孩子们虽然已经风闻刘少奇犯了错误，但他们

心目中的父亲仍是崇高的、权威的。他们似乎懂得了宪法的神圣，从此不再去参加抄家。

刘少奇对这种不要法制和秩序，鼓动不谙世事的学生娃娃胡闹的做法实在不理解，但他无能为力。他已经得到通知，9月份召开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要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检查。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写检讨。

他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着重检查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他写道：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

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9月10日前后，检讨终于写成了。刘少奇放秘书把检讨稿送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快有了回话。他给刘少奇写来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

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⑮

刘少奇当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给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周恩来也很快照办了。可是，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取消，改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随着移到工作会议上去作。

10月9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

少奇、邓小平，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但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积极贯彻的很少，多数消极应付，不少人用各种方式抵制。对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很是恼火，毛泽东也不满意。于是，决定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解决这种两头热、中间顶的局面。

经过几天小组讨论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月16日在会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会场之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操纵下，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自10月6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张春桥亲临讲话之后，北京的各个大学又一次骚动起来。许多工作组成员被揪被斗，抢广播站、冲击机关、围攻批斗等野蛮行动又一次在各学校流行。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也开始在一些校园和大街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还采取许多手法企图把王光美揪到学校批斗。这些动向明显是对陈伯达报告的呼应。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读了他们的检讨。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各小组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然后，毛泽东讲话：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 Q 正传》看一看。①¹⁹

为什么要学生们看《阿 Q 正传》？意思是要他们不要学鲁迅笔下的那个假洋鬼子，不准别人革命。毛泽东和颜悦色地继续说下去：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②¹⁹

在一旁听讲的康生突然有意插话说：“八大的报告当中就有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刘、邓两个人的报告中都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们两人负责。”③¹⁹康生讨了个没趣，不吭声了。

10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大会。议程比较简单，就是毛泽东、林彪讲话。

林彪先讲。他在讲话中也指名批判“刘邓路线”，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的讲话同林彪、陈伯达的调子不一样，显得和缓多了，并且认为中央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他说：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②⑩}

周恩来、陶铸也在为制止群众的过火行为费尽心力。10月12日，周恩来断然拒绝了清华大学红卫兵要王光美到学校接受批判的要求。10月19日，他回答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说：“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11月2日，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明确要求把中央组织部机关内张贴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取下来。他对在场的群众说：“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群众。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欢呼声震天动地。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慢慢转过身，同刘少奇亲切交谈。毛泽东特意问了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一一回答，然后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②1}

休息的时候，刘少奇迎面碰见邓小平。

“小平同志，你怎么样？”

邓小平笑了笑说：“横直没事。”

刘少奇也笑了笑说：“没事，学习。”^{②②}

刘少奇、邓小平共事多年。自中共八大以来，他俩一个负责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个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工作关系相当密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在工作组问题上一起犯了“路线错误”，一起检讨。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的简短交谈，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对话。

回到家里，刘少奇除了看书看报，仍然无所事事。每天，他仔细阅读着孩子们从外面买回来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传单。他看到的是，这些满天飞的印刷品上，充斥着对“刘邓路线”的攻讦之词。

毛泽东不是已经几次表态了吗？为什么还这个样子呢？

刘少奇指着那些小报、传单对王光美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

一天，王光美对丈夫说：“能不能跟中央说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

刘少奇摇了摇头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②③}

可是，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图 25 刘少奇、王光美和小女儿在中南海福祿居。(1966 年秋)

● 各方面打击接踵而来。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66 年的冬天，出奇地寒冷。

宽阔的中南海湖面结起了厚厚的冰，灰白一片。路边、园中的林木，大都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原本是姿态各异的假山怪石，这会儿也显得冰冷而又凶

险。凛冽的西北风从坦荡的冰面席卷而来，又从树林、房舍间呼啸而过，把整个中南海大院搅得满园寒彻，一片萧索。

12月18日下午2点来钟，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两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关着门密谈。这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人称“蒯司令”的蒯大富。

“蒯大富同志，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受旨意后，迅速离去。

几个小时后，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又是一番情景。

公安部长谢富治和另一位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正在召集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4个人开会。

谢富治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接着他交待了领

导关系、工作方法等事项。末了，他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交给他们，说这是王光美专案组领导成员名单，要他们好好保存。

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王光美专案组”这样就算成立！

从此开始，形形色色针对刘少奇的大动作小动作，像西伯利亚南袭的寒流，一阵又一阵接踵而来。

1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公开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12月18日张春桥的密谈授意，发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他率领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大事张扬地举行“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这支人马兵分五路，由天安门广场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一路辐射开去，沿途呼口号、作演讲、贴标语、撒传单。“大行动”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作为主要口号，一路呼喊，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这一活动持续了多日。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讲话中公然将

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者达10万人众。会上公开喊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12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代组长江青带着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要她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很快贴出造刘少奇反的大字报。

从1967年1月1日起，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时不时地去刘少奇住处骚扰，1月3日第一次直接面对面地围攻、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发生在北京和中南海的这些举动，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遍各地。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全国，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舆论和行动到处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在各地随便呼喊。

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在北京第二人民医院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他们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平平遭车祸压断了腿，需要

家长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到医院，当场扣押了王光美。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好不容易脱身返家。周恩来闻讯后连夜派秘书去清华大学交涉，造反派才将王光美放回。

1月12日，戚本禹在钓鱼台16号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他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红色造反团”联络了150多人，喊着口号强行冲进福祿居，围斗刘少奇、王光美。造反派要刘少奇低头弯腰，背语录，回答问题，要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语录，造反派便大声起哄嘲笑。刘少奇回答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②3}

第二天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冒着严寒开进福祿居前院。从车上下来的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

毛泽东在他的临时住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等候刘少奇的到来。他一见面便关心地问：“平平的腿好

了吗？”

这显然是指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智擒王光美”开头时的情节，没有想到传到毛泽东那里竟误以为真了。刘少奇立即据实答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客气地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则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他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②3}

针对有人在大字报中不惜用造谣来进行人身攻击的恶劣行径，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此人品质极坏，话不可信，并拿出一封群众检举信作证明。

毛泽东表示信不看了，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他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

谈话结束，毛泽东起身为刘少奇送行，一直送到北京厅门口。分手时毛泽东亲切地说：“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平静地踏上归途。回到家里，他对焦急地等待着的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到了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作了系统批判。3月21日下午7点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然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决定了几件事情。其中一项就是，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并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从此，审查刘少奇似乎有了“合法依据”，专案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社会上，攻击、批斗刘少奇的种种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3月下旬，一份红卫兵小报披露张春桥等人的揭发，说刘少奇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刘少奇凭他的政治敏感发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他在看到小报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叙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驳斥张春桥等的诬蔑，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

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类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②4}

可是，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继续散布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用所谓八个为什么肆意攻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他越说越生气，“我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②5}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相反，从戚本禹的文章开始，一个所谓“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迅速掀起。从北京到各地，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充斥于各个报刊的版面，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这时对刘少奇只能说他坏，不能说他好，如果有人敢于表示出不同意见，轻者遭批斗，重者打

成反革命甚至逮捕判刑。

在这种风雨如磐的情势下，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也成立了造反组织，起了个名称叫“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保皇派”，他们在4月6日、12日也对刘少奇采取了两次“革命行动”，要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8个为什么。

面对这些平时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刘少奇采取了尽量不对立的态度，耐着性子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据理力争。但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追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光火了。他终于控制不住，大发雷霆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②5}

陷入怪圈的“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对刘少奇的种种打击迫害仍是接二连三袭来。

1967年4月9日，刘少奇获悉，清华大学造反派第二天要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人陪斗。他看出这是针对自己的一个严重步骤，心中万分不服，却不得不

作最坏的打算。刘少奇的儿女们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地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

中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

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着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清晨，王光美果然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拉到学校，先是在小范围接受审问，然后被揪到大操场批斗。造反派强迫她穿上旗袍，戴上一串乒乓球“项

链”，还对她拳打脚踢，施以种种人格污辱。王光美在武力面前不屈服，坚持说理斗争。她严词回答造反派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你们要是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4月14日，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了戚本禹文章中“八个为什么”对他的攻击诬蔑，逐一说明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报，另外用大字报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但几个小时后，这份答辩大字报不知被什么人撕了个粉碎。

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里，刘少奇还不能不为儿女们的处境担忧。他无法估计等待着孩子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他确信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保护他的后代。他叮嘱眼前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最小的女儿小小只有6岁，平时活泼可爱，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可现在，刘少奇预料自己已经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他决定把小小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把小女儿带出去，带到群众中去。他交待妻子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连续不断的打击使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7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刘少奇说，中

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刘少奇实在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只好按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的内容改写。

“检查”由刘少奇签名送出后，他又把它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

这份检查尤其是后加的这句话，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所谓“揪刘火线”，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在四周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送《勒令》来的人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尽管刘少奇作了最坏的打算，但重大的打击还是比他预计的来得更快、更严酷。

7月中旬，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毛泽东、周恩来去武汉视察不在北京之机，决定组织群众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由戚本禹具体指挥。其中重点是批斗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批斗会的同

时抄家，批斗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监护”。

7月18日上午，刘少奇、王光美得到了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的消息。刘少奇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日子也许就在今天。他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②⑥}

晚上，一群造反派闯进福禄居前院，七手八脚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送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两个地方。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却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

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带回到已经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什么两样。他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处于严密监视下，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的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曹轶欧、王道明，坐阵指挥。算起来，这已是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是最残暴的一次。

刘少奇的几个儿女，也奉命参加批斗会，目睹他

们的父母遭受凌辱。他们看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②7}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造反派们将刘少奇押回福祿居前院。一进办公室，刘少奇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慨地对来人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②7}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关押在

福禄居前后院。看管措施更加严格，昼夜有哨兵监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逝世，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

8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少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读到后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他写道：“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他再次郑重提出辞职，“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②⑧

但是，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理。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刘少奇孤零零一人被关在福禄居前院，对他的迫害还在一步步加剧。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 伪证报告获得批准，铸成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渊潭东北侧，有一个风景幽雅、设施考究的去处，人称钓鱼台。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钓鱼台由此得名。金代还有一个文人叫王郁，也曾在这里“筑台垂钓”，可见当时这一带大概鱼不少。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大批工匠在这里整治湖面，大兴土木修建行宫，盖起了登漪亭、瀟碧轩、养源斋等别墅型建筑，成为一处著名的皇家园林。1949年后，人民政府经过多年修葺建设，把钓鱼台辟为国宾馆，用以接待最重要的来宾，作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坚持要把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她自己率先搬进来占据了地势、环境优裕的11号楼。其他文革小组要员也陆

陆续跟着搬了进来。陈伯达进了 15 号楼，康生占了 8 号楼，张春桥、姚文元住了 16 号楼，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散住在 16 号楼等处，可谓各得其所，优哉游哉！

钓鱼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这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把个平静的中国搅得天下大乱，浊浪滚滚。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繁杂事务当中，有一件事是他们始终紧抓不放的，这就是千方百计打倒刘少奇。

中央文革一帮人，还有林彪一伙，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 and 攫取高位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们获得了处理刘少奇专案的权力。为剪除后患，他们加紧从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两方面入手，置刘少奇于死地。

他们首先控制了刘少奇专案的领导权。“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执掌公安大权的谢富治，他是专案工作的前台负责人。但帅上有帅，谢富治又唯江青的马头是瞻。1968 年 2 月 22 日，他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待：“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

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还有一个康生，他作为中央常委分管这个专案，也加入了穷凶极恶迫害刘少奇的行列。刘少奇的命运落到这伙人手里，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真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索材料。光为寻找“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调阅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一无所获。为逼取口供，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审讯，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达64人。把这些人抓来之后，他们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1968年9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问题定了性。9月16日，她虚张声势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

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林彪、康生、陈伯达也都批了意见，林彪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195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97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稿后提交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在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坚决不举手。

这时在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已是重病缠身。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关于专案的种种情况，他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曾经几次三番地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精神上的重重打击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使刘少奇的身体急剧地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月12日中央警卫局整理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月9日，他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

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赶紧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少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过抢救医治，到7月24日刘少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打那以后，刘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可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仍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随着他。

刘少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关在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1967年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个未成年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门，流落各处；19岁的平平被关在单人

牢房；17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年12月又被抓进拘留所；15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还时不时要她检查；年仅7岁的小小也饱受欺负和歧视。

刘少奇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1968年10月11日以后，他不能用嘴吃东西了，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他逝世。

1969年7月，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再度大发作：高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们又紧急会诊，一致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治疗，病情总算又暂时稳定了下来。

到了10月份，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17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以副统帅的资格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备战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当然首当其冲，决定将他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早已停在

北京西郊机场待命。19点23分，躺在担架上的刘少奇，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脚抬上飞机。由于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刘少奇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条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落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

这个地方是旧中国的同和裕银行。小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三层楼房的墙面，墙体高大坚固，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去。刘少奇被安置在北楼一层一个套房的里间。在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

这些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为刘少奇已经病得神智昏迷，不能下床了。

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负责。

看管、护理刘少奇的人员是从开封驻军部队抽调来的。尽管事前他们都接受了“激发对刘少奇阶级仇恨”的阶级教育、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

眼前所见的景象，同报纸上所谓“最凶恶敌人”的说法，反差实在太太，怎么也对不起头来。他们看到的是，这位“重点监护对象”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似乎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到开封没有几天，刘少奇的病情就发作了 3 次。第三次是在 11 月 10 日，刘少奇又高烧不退。当地医护人员限于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疗。

11 月 12 日凌晨 1 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 6 点 38 分，

图 26 刘少奇遗容。

图 27 专案组人员填写的刘少奇遗体火化申请单。

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 点 42 分医护人员到齐，3 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71 岁。

此刻，是 1969 年 11 月 12 日早晨 6 点 45 分，离刘少奇被送往开封还不到 26 天。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下落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林彪灭亡后的 1972 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 3 年前离开了人世。

11 月 13 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

场秘密火化。

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火葬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骨灰。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刘少奇之死毫无所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尾声

共和国不会忘记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

1976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后与世长辞。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左”的思想的长期束缚，彻底清算了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党内外许多干部群众早就对刘少奇一案表示怀疑和不满，这时纷纷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刘少

奇平反。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1月，复查组经过认真周密的核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发表公报指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

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1980年5月15日，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

图 28 刘少奇的骨灰从郑州迎接回北京。

表人士组成的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在这之前的5月13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派出代表，同刘少奇的亲属一起，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河南省暨郑州市举行了隆重的骨灰迎送仪式。

5月17日这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

图 29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他说：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

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

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

众多的人民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主要参考书目

-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1985 年 12 月出版。
- 《刘少奇年谱》(上、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
-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1993 年 6 月出版。
-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8 月出版。
- 《红旗飘飘》第二十辑,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3 月出版。
-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黄祖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出版。
- 《刘少奇在白区》,陈绍畴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1 月出版。
- 《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 8 月出版。

《刘少奇主持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确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8 月出版。

《刘少奇在天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

《我眼中的刘少奇》，郭思敏、天羽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

注 释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 ①刘少奇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1942 年春。
- ②《中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20 周年专刊，1939 年出版。
-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24 页。
- ④长沙《大公报》，1920 年 8 月 23 日。
- ⑤刘少奇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0 年 12 月 7 日。
- ⑥肖劲光：《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缅怀刘少奇》第 76 页。
- ⑦刘少奇在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 年 7 月 1 日。
- ⑧刘少奇填写的“团员调查表”，1922 年。

第二章 工人运动领袖

- ①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信，1968 年 2 月 11 日。
- ②③④⑤⑥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 年 8 月 10 日，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 ⑦《红色的安源》第 137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 ⑧《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第 132—13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2 月出版。
- ⑨刘少奇：《“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中国工人》第 4 期，1925 年 4 月出版。

- ⑩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1923年8月20日，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年10月10日出版。
- ⑪《邓中夏文集》第514、2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 ⑫⑬《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90—2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 ⑭《申报》，1925年8月31日。
- ⑮《工人之路》第249期，1926年出版。
- ⑯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页。
- ⑰《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2页。
- ⑱《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第三章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 ②刘少奇在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928年3月。
- ③④《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5、18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
- ⑤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纲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17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 ⑥徐彬如：《用“六大”精神武装顺直省委》，《不尽的思念》第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 ⑦谢觉哉：《关于满洲工作报告》，1929年4月13日。
- ⑧⑩⑪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红旗飘飘》第20辑。
- ⑨⑫⑬⑭辽宁社会科学院：《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 ⑮《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30年第一分册，第462页。
- ⑯黑龙江省档案局档案：全宗号80，目录号1，案宗号229，转引自《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第76页。
- ⑰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文件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15日。
- ⑱刘少奇：《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 ⑲《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54页。
- ⑳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
- ㉑㉒㉓《缅怀刘少奇》，第2、3页。
- ㉔《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5、9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 ㉕刘爱琴：《女儿的怀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

第四章 开创华北新局面

- ①④⑤王林：《党在白区工作中的楷模》，《红旗飘飘》第20辑。
- ②赵舒：《张闻天与瓦窑堡会议》，《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
- ③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缅怀刘少奇》第18页。
-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0页。
-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45页。
-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9—980页。
- ⑨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三期；《少奇同志和南京谈判》，《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
- ⑩1963年6月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转引自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第142页。
- 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48页。

- ⑫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1967年4月14日。
- ⑬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
- ⑭《一二九运动》第34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 ⑮⑯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缅怀刘少奇》第83、85页。
- ⑰《薄一波文选》，第465页。
- ⑱《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00页。
- ⑲《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7—618页。
- ⑳访问郭明秋谈话记录。郭明秋：《永存的记忆》，《红旗飘飘》第20辑，第83—84页。
- ㉑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缅怀刘少奇》第101页。
- ㉒《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第144页。
- ㉓刘少奇：《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火线》第69期，1937年1月1日。
- ㉔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缅怀刘少奇》第102—103页。
- ㉕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的信，1936年8月5日。
- ㉖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
- 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6—57页。
- 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78页。
- ㉙《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3—264页。
- ㉚㉛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缅怀刘少奇》第87、89页。
- ㉜《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5页。
- ㉝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的电报，1937年11月17日。
- ㉞转引自《缅怀刘少奇》第90页。
- ㉟《刘少奇选集》上卷，第85页。
- ㊱《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6页。

- ③⑦《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0页。
- ③⑧刘爱琴：《女儿的怀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
- ③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3页。

第五章 发展华中根据地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9页。
- ③刘少奇1939年1月29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 ④王阑西：《驰骋中原》，北京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 ⑤《解放》第81—84期，1939年延安出版。
- ⑥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
- ⑦本节中的一些具体情节、对话根据：徐海东、周东屏《随少奇同志去华中》，《刘少奇主持中原局》。
- ⑧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10月12日。
- ⑨《刘少奇主持中原局》，第86页。
- ⑩刘少奇致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11月21日、27日。
- ⑪刘少奇在新四军游击队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7日。
- ⑫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11月11日。
- ⑬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的电报，1939年11月19日。
- ⑭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的电报，1939年12月19日。
- ⑮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的电报，

1940年3月6日。

- ①⑥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致皖东各部队、游击队负责同志的电报，1940年3月13日。
- ①⑦谭希林：《江淮春晓》，《怀念刘少奇同志》第22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
- ①⑧魏文伯：《刘少奇叫我当县长》，《刘少奇在皖东》第128页。
- ①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6页。
- ②⑩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刘少奇等的电报，1940年4月5日。
- ②⑪刘少奇给张爱萍、黄春圃、刘瑞龙的信，1940年2月28日。
- ②⑫张爱萍：《少奇同志在苏皖抗日敌后》，《缅怀刘少奇》第121页。
- ②⑬《刘少奇主持中原局》，第169页。
- ②⑭《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68页。
- ②⑮叶飞：《少奇同志与新四军》，《缅怀刘少奇》第108—111页。
- ②⑯刘少奇致毛泽东、王稼祥的电报，1940年4月。
- ②⑰刘少奇致叶飞的电报，1940年5月22日。刘少奇致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5月22日；刘少奇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5月24日。
- ②⑱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的电报，1940年1月19日。
- ②⑲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的电报，1940年6月1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91页。
- ③⑩刘少奇致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6月22日。电报中所说的“三个师长”，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 ③⑪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刘少奇、彭雪枫并告八路军总部的电报，

1940年6月27日。

- ③②刘少奇致彭雪枫、张云逸等的电报，1940年7月4日。
- ③③刘少奇致彭雪枫、黄克诚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40年7月5日。
- ③④刘少奇致陈毅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40年8月2日。
- ③⑤刘少奇致张云逸、郑位三、彭雪枫的电报，1940年9月1日。
- ③⑥刘少奇致黄克诚、罗炳辉等的电报，1940年9月2日。
- ③⑦刘少奇、邓子恢致陈毅、粟裕的电报，1940年9月3日。
- ③⑧《刘少奇主持中原局》第212页。
- ③⑨刘少奇致陈毅的电报，1940年9月7日。
- ④⑩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转山东局的电报，1940年10月8日。
- ④⑪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0日。叶希夷，即叶挺，时任新四军军长，这时仍在皖南新四军军部。
- ④⑫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的电报，1940年11月12日。
- ④⑬刘少奇、陈毅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4日。
- ④⑭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1940年12月26日，电报为毛泽东起草。
- ④⑮《皖南事变》第12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
- ④⑯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 ④⑰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 ④⑱《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53页。
- ④⑲刘少奇、陈毅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41年1月12日。
- ④⑳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叶挺等的电报，1941年1月13日。
- ⑤①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各根据地负责人的急电，1941年1月14日。
- ⑤②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41年1月15日。
- ⑤③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41年1月17日、18日。

- ⑤4 刘少奇在中共中原局会议上的形势报告，1941 年 5 月 6 日。
- ⑤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06 页。
- ⑤6 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1942 年 1 月 13 日。电报中“中原局”为“华中局”之误。
- ⑤7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陈毅传》第 283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
- ⑤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55 页。
- ⑤9 刘少奇在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42 年 3 月 5 日。
- ⑥0 《刘少奇主持中原局》，第 298—300 页。

第六章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 ① 《党的文献》1994 年第一期，第 42 页。
- ② 《王稼祥选集》第 326 页。
-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229、274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出版。
-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30 页。
- ⑤ 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1942 年 1 月 13 日。
- ⑥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63 页。
- ⑦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65 页。
- ⑧ 毛泽东致刘少奇的电报，1942 年 3 月 13 日。
- 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70 页。
- ⑩ 刘少奇在中共山东分局委员谈话会上的发言，1942 年 4 月 26 日。
- ⑪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85 页。
- ⑫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392 页。
- ⑬ 转引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 46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出版。
- ⑭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 405 页。

-
- ⑮毛泽东致林枫、周士第、甘泗琪的电报，1942年10月16日。
- 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 ⑰《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页。
- 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
- ⑲《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79页。
- ⑳刘少奇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党章起草情况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
- ㉑《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5、337页。
- ㉒《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页。
- 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1—12页。
- ㉔刘少奇对延安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的讲话，1945年8月28日。
- ㉕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9月14日。
- ㉖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林枫，当时任晋绥军区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 ㉗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的电报，1945年9月15日。
- ㉘中共中央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1945年9月17日。
- ㉙中共谈判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5年9月17日、19日。
- ㉚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5年9月19日。
- ㉛《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1—372页。
- 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7页。
- ㉝中共中央致中共山东分局的电报，1945年9月20日。
- ㉞中共中央致中共华中局的电报，1945年9月20日。
- 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罗荣桓、黎玉、饶漱石、张云逸的电报，1945年9月20日。
- ㊱中共中央军委致黄克诚、刘震、洪学智的电报，1945年10月6日。

- ③⑦ 中共中央军委致罗荣桓、黎玉、彭真、陈云、许世友、林浩的电报，1945年9月29日。
- ③⑧ 中共中央军委致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罗荣桓、黎玉、许世友、林浩的电报，1945年9月30日。
- ③⑨ 黄钢：《“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缅怀刘少奇》第179—180页。
- ④⑩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3—374页。
- ④⑪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1945年11月22日。
- ④⑫ 中共中央致中共东北局的电报，1945年11月28日。
- ④⑬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的电报，1945年12月7日。
- ④⑭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4页。
- ④⑮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79—1180页。
- ④⑯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4页。
- ④⑰ 中共中央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1946年3月18日。
- ④⑱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51页。

第七章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

- ① 刘少奇致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的信，1947年4月22日。
-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209—210页。
-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96页。
- ④ 朱德致毛泽东的电报，1947年7月11日。
- ⑤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47年7月17日。
-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4页。
- ⑦ 韩丁（美）：《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第7页。
- ⑧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座谈会上的讲话，1948年2

月 12 日。

⑨刘少奇致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1948 年 2 月 16 日。

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 284—285 页。

⑪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48 年 3 月 3 日。

⑫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8 年 3 月 9 日。

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 293 页。

⑭刘少奇在中共华北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 年 5 月 20 日。

⑮刘少奇同谢觉哉、陈瑾昆的谈话，1948 年 5 月 25 日。

⑯刘少奇同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的谈话，1948 年 4 月 28 日。

第八章 开国建国费运筹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50、51 页。

②王光英：《少奇同志二三事》，《缅怀刘少奇》第 389—390 页。

③《刘少奇在天津》第 166 页。

④刘少奇在天津市党政军民干部会上的报告，1949 年 4 月 24 日；刘少奇对在天津工作的东北南下干部的讲话，1949 年 5 月 1 日。

⑤刘少奇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 年 4 月 28 日；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 年 5 月 5 日。

⑥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 年 5 月 2 日。

⑦刘少奇给宋斐卿的复信，1949 年 5 月 3 日。

⑧王林：《刘少奇同志 1949 年在开滦》，《革命回忆录（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⑨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4—40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

-
- 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0—691页。
- 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2、433页。
- ⑫罗贵波：《少奇同志派我出使越南》，《缅怀刘少奇》第234页。
- ⑬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50年10月3日。
- ⑭《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7页。
- ⑮《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8页。
- ⑯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
- ⑰《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 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页。
- ⑲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
- ⑳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的批示，1951年7月3日。
- ㉑《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4、99页。
- ㉒中共中央批转李立三《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批语，1951年7月4日。
- ㉓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刘少奇和宋庆龄的革命友谊》，《缅怀刘少奇》第228页。

第九章 探求中国富强之路

- ①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8月28日。
- ②刘少奇致张闻天的电报，1952年6月20日。
- ③毛泽东1952年8月4日的批示。
- ④刘少奇：《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1953年4月28日。
- 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40—243页。
- 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30页。
- ⑦毛泽东致刘少奇的电报，1952年10月19日。

-
-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
- ⑨刘少奇致毛泽东的电报，1954年1月16日。
- ⑩毛泽东致刘少奇的信，1954年2月17日。
- ⑪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11日。
- ⑫毛泽东的一封便信，1954年9月9日。周、朱、陈、小平即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伯达即陈伯达。
- ⑬刘少奇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9月12日。五法草案，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 ⑭刘少奇在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1953年10月22日。
- ⑮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20页。
- ⑯毛泽东致刘少奇的信，1954年1月7日。
- ⑰毛泽东致刘少奇的电报，1954年1月22日。
- ⑱《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27页。
- ⑲《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5页。
- ⑳《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32页。
- ㉑吴振英、刘振德：《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缅怀刘少奇》第420页。
- ㉒《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19页。
- ㉓《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6页。
- ㉔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20日。
- 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 ㉖《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203页。
- ㉗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党的文

献》1991年第三期。

②⑧《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3页。

②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4、646页。

③⑩张黎群：《青年一代的严师益友》，《缅怀刘少奇》第353页。

③⑪刘少奇同调查组的谈话，1957年2月18日。

③⑫刘少奇在广东省干部大会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1957年4月10日。

③⑬刘少奇在长沙市中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22日。

③⑭刘少奇在中共湖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4日。

③⑮《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26页。

③⑯刘少奇听取广东省有关部门汇报工作时的讲话，1957年4月7日。

③⑰毛泽东在南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日。转引自解放军出版社《庐山·1959》第131页。

③⑱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9页。

③⑲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3月26日。

④⑩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1958年5月26日，部分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6页。

④⑪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5月5日。

④⑫毛泽东关于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99页。

④⑬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38页。

④⑭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中共宁波地委负责人的谈话，1958年11月5日。

④⑮《陈云文选（1956—1985）》，第130页。

④⑯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中华南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9日。

④⑰刘少奇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16日。协作区，指

根据中共中央 1958 年 6 月 1 日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 7 个协作区。

④⑧转引自解放军出版社《庐山·1959》第 95 页。

④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861 页。

⑤⑩刘少奇在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9 年 8 月 17 日。

⑤⑪吴振英、刘振德：《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缅怀刘少奇》第 417 页。

⑤⑫吴振英、刘振德：《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缅怀刘少奇》第 413 页。

⑤⑬《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 373—374 页。

⑤⑭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 373—417 页。

第十章 领导国民经济调整

①刘少奇在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 年 6 月 10 日。

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 年 6 月 18 日。

③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 年 8 月 10 日。

④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的讲话，1961 年 3 月 19 日。

⑤中共长沙县委党史办、中共宁乡县委党史办关于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概述，《长沙党史通讯》总第 20 期，1988 年 3 月。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28—334 页。

⑦中共宁乡县委党史办：《刘少奇主席 1961 年回宁乡进行农村调查概述》，《长沙党史通讯》总第 20 期，第 15 页。

⑧《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30 页。

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38、337、341 页。

⑩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908 页。

⑪刘少奇听取林业部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1961 年 7 月 12 日。

- ⑫吴振英、刘振德：《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红旗飘飘》第20辑，第178页。
- ⑬王光美：《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缅怀刘少奇》第259页。
- ⑭转引自熊向晖：《毛主席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外交史资料》总第10期，1987年7月1日。
- ⑮转引自邓力群：《逝者和生者的欣慰》，《缅怀刘少奇》第33页。
- ⑯《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8—419、421页。
- ⑰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46、1048、1052页。
- ⑱转引自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做经济工作》。
- ⑲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信，1962年4月16日。
- ⑳《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5、446、447页。
- ㉑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 ㉒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4、1087、1092、1098页。
- ㉓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5页。
- ㉔参见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71页。
- ㉕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的发言，1962年8月20日。
- ㉖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1962年9月26日。
- ㉗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2月12日。
- ㉘刘少奇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2月上旬。
- ㉙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2日。
- ㉚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在京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上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 ㉛刘少奇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1964年8月19日。
- ㉜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3页。
- 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9—1131

页。

③④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5月26日。

③⑤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82页。

③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73页。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①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9页。

②《人民日报》报道，1966年3月30日。

③周恩来总理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问，1966年4月10日。

④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6日。

⑤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6日。

⑥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缅怀刘少奇》第435页。

⑦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示，1966年6月20日。

⑧为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成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⑨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日。

⑪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插话，1966年8月1日。

⑫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日。

⑬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日。

⑭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2—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
- ⑮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4页。
- ⑯引自伍修权的回忆。
- ⑰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缅怀刘少奇》第435—436页。
- ⑱毛泽东致刘少奇的信，1966年9月14日。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06页。
- ⑲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08—109页。
- ⑳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13—114页。
- ㉑王光美和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参见《红旗飘飘》第20辑第259页。
- ㉒王光美的回忆。
- ㉓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缅怀刘少奇》第438页。
- ㉔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信，1967年3月28日。
- ㉕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缅怀刘少奇》第439页。
- ㉖王光美的回忆。
- ㉗《缅怀刘少奇》第444—445页。
- ㉘刘少奇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1967年8月8日。